

三联
耳关

生活周刊

2017.7.10
2017年第28期
www.lifeweek.com.cn



纪念“七七事变”八十周年 走向“最后关头”

9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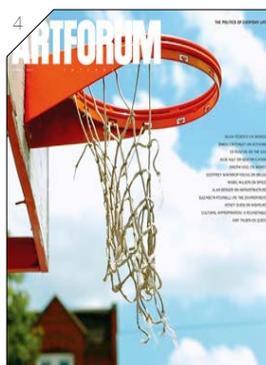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编辑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 ISSN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 82-20 定价: ¥15元



《时代》(美国) 2017.7.10

美国医保：远不止废除和取代

美国参议院公布的共和党医改法案引发了许多民众的抗议。共和党计划削减 7.01 亿美元的税收，并撤销奥巴马医改法案中的“个人强制医保”条款。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新医保法案如果通过，未来 10 年将有 2200 万人失去医保，联邦预算赤字将减少 3210 亿美元。白宫的预算总监则认为，削减医保是以弱势群体作为代价，会减慢未来的发展速度。



《新闻周刊》(美国) 2017.7.7

1 新基因密码

人类使用动物皮毛制作皮革的历史可追溯至 3500 年前，然而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不断向大自然索取，资源终会有枯竭的一天。事实上，皮革的主要原料并非动物皮肤，而是构成结缔组织的胶原蛋白。科技的发展和市场的驱动使得利用基因工程合成胶原蛋白等生物产品成为可能，但这种解决方案仍具有争议，引发了生物伦理学家和环境学家的担心。

《经济学人》(英国) 2017.7.1

3 特朗普的“裂缝”美国

特朗普执政 5 个多月以来，不但没有减缓矛盾与分歧，反而加剧了美国的“裂缝”。共和党与民主党、乡下人与城里人、工人阶级与大学生、精英阶层与大众之间的鸿沟愈发凸显。对内，税改、医改方面并没有实质上地填补法律的漏洞，反而更多是在为富人服务；对外，特朗普决定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引起多国不满。这些新的“裂缝”大概是他留给下一任的难题了。

《新科学家》(英国) 2017.6.28

2 迷之年龄

年龄是一个特殊的概念，我们的生理年龄往往与实际年龄有所偏差，即使在个人身上，身体的不同部位也可以以不同的速度产生年龄差异。近年来，研究表明，生理年龄往往比实际年龄更为可靠，甚至是我们的未来健康指标。它可以通过跟踪变老的速度来帮助我们识别乃至预防疾病，甚至可能让我们减缓或逆转老化过程。

《艺术论坛》(美国) 2017·夏季刊

4 用艺术阐述日常生活中的政治

经济金融、国际政治这些宏观架构和政策是如何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的，艺术家通常会选择更微观、更个性化的视角去呈现这种潜在的变化，从而在观看、聆听和感知的层面，解构庞大的地理政治体系。本期夏季刊中，多名重要的艺术家、建筑师、批评家、思想家共同试图解答这个问题，从金钱到种族、基础设施到信息流、罢工到市场、地质学到性别，当代艺术给出了不同于政治家的解读。



P30

封面故事

纪念“七七事变”八十周年

走向“最后关头”

- 34 1937，牺牲已到最后关头
- 46 金冲及：卢沟桥事变——全民族抗战的起点
- 54 “七七事变”前华北中日驻军
- 60 “中国通”崛起：侵华元凶的战前岁月
- 70 宋哲元：“华北柱石”的是与非
- 76 张自忠：“汉奸”污名下的名将
- 82 黄郛：华北危局中的外交官
- 92 殷汝耕：投机者的覆灭

P110

杭州保姆纵火案：消失的三小时



P120

基因算命靠谱吗？



社会

- 热点：四川茂县泥石流：整体消失的寨子 102
- 热点：杭州保姆纵火案：消失的三小时 110
- 调查：基因算命靠谱吗？ 120

经济

- 市场分析：央企重组深水区 100
- 商业：雷诺的机会还有多大？ 132

文化

- 文化：诗人余秀华：喧哗后的清醒 134
- 收藏：摄影师何藩与香港市井记忆 138
- 戏剧：陆帕与史铁生的时间对流 144
- 思想：梭罗 200 周年诞辰 154
- 书评：在夏天，读懂普鲁斯特 156

专栏

- 邢海洋：谷歌的天价罚单 16
- 苗千：万物理论到底是什么意思 148
- 袁越：健身的后续效应 150
- 张斌：以西班牙 U21 为例 152
- 宋晓军：国产万吨大驱刚完成“入学考试” 153
- 朱伟：余华：温暖与百感交集的旅程 (1) 158

(封面摄影：方大曾)

环球要刊速览	2	声音	21
读者来信	8	生活圆桌	22
天下	10	好东西	26
理财与消费	18	个人问题	160
好消息·坏消息	20		

2017年第28期，总第944期，2017年7月10日出版
 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刊文字及图片。
 本刊保留一切法律追究权利。



www.lifeweek.com.cn

主管 / 主办 Published by

主管：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出版：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总编辑 Publisher

路英勇 Lu Yingyong

副总编辑 Deputy Publisher

常绍民 Chang Shaomin

主编 Editor-in-chief

李鸿谷 Li Honggu

副主编 Deputy Editor-in-chief

李菁 Li Jing 李伟 Li Wei

主编助理 Associate Editor-in-chief

吴琪 Wu Qi 曾焱 Zeng Yan

采编中心 Editorial Center

资深主笔 Senior Editor

邢海洋 Xing Haiyang 谢先凯 Xie Xiankai 袁越 Yuan Yue
陈晓 Chen Xiao 蒲实 Pu Shi

主笔 Editor

李三 Li San 钟和晏 Zhong Heyan 薛巍 Xue Wei
陈赛 Chen Sai 葛维樱 Ge Weiyang 贾冬婷 Jia Dongting
徐菁菁 Xu Jingjing 杨璐 Yang Lu 曹玲 Cao Ling

主任记者 Senior Reporter

李翊 Li Yi 李晶晶 Li Jingjing 蔡小川 Cai Xiaochuan
何潇 He Xiao 黑麦 Hei Mai 丘谦 Qiu Lian
吴丽玮 Wu Liwei 俞力莎 Yu Lisha 王丹阳 Wang Danyang
张雷 Zhang Lei 苗千 Miao Qian

记者 Reporter

邱杨 Qiu Yang 付晓英 Fu Xiaoying 孙若茜 Sun Ruoxi
杨丹 Yang Dan 刘敏 Liu Min 张月寒 Zhang Yuehan
张星云 Zhang Xingyun 艾江涛 Ai Jiangtao 宋诗婷 Song Shiting
王海燕 Wang Haiyan

特邀撰稿人 Overseas Feature Writer

鲁伊 Lu Yi 赵潇 Zhao Xiao

摄影记者 Photographer

于楚众 Yu Chuzhong 黄宇 Huang Yu

视觉设计中心 Vision Design Center

视觉总监 Visual Director

邹俊武 Zou Junwu

执行图片总监 Executive Photo Director

陈晓玲 Chen Xiaoling

设计总监 Design Director

王小菲 Wang Xiaofei

美术编辑 Art Editor

黄罡 Huang Gang 刘畅 Liu Chang

插图 Illustration Editor

张曦 Zhang Xi

图片编辑 Photo Editor

覃柳 Qin Liu 陈喆 Chen Zhe 韩雅丽 Han Yali

编务总监 Coordination Director

程昆 Cheng Kun

发行中心 Circulation Center

执行总监 Executive Director

周旭 Zhou Xu

区域经理 Regional Manager

杨雪梅 Yang Xuemei 潘海艳 Pan Haiyan 张富伟 ZhangFuWei

发行服务 Circulation Service

李卫红 Li Weihong 刘琳瑶 Liu Linyao 乔龙宁 Qiao Longning
王霄 Wang Xiao 王荻 Wang di 金宇迪 Jin Yudi 姚贺梅 Yao Hemei

读者服务经理 Reader Service Manager

朱静 Zhu Jing

行政管理中心 Administration Center

行政主任 Office Manager

高媛 Gao Yuan

行政助理 Assistant

刘蓓 Liu Bei

财务总监 Financial Director

郝大超 Hao Dachao

财务主任 Financial Controller

陈晓华 Chen Xiaohua

出纳 Accountant

张宇 Zhang Yu 李明洋 Li Mingyang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 9 号 B 座
邮编：100125

商务推广合作电话：(010) 84681038
联系人：连华伟

E-mail: lianhuawei@lifeweek.com.cn
采编中心热线电话：

(010) 84681030 84681029 (传真)

E-mail: letter@lifeweek.com.cn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 84050425/51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印刷：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010) 59011318

物流总代理：北京双禾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010) 61256299

广告许可证号：京东工商广字第 0063 号

期刊登记证号：ISSN 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 Price：¥15.00 \$8.00 港币 20.00

本刊为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法国航空公司、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机上阅读刊物

如何购买 《三联生活周刊》

读者朋友，购买本刊请登录官网商城
shop.lifeweek.com.cn

或到当地邮局办理，本刊代号：82-20

也可直接向本刊读者服务部咨询
电话：010-84050425 84050451

另外，本刊在下列城市经销商的联系电话：

- 上海：上海汇敦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021) 63769858
- 成都：四川尚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028) 86667805
- 重庆：重庆弘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3) 86359776
- 南京：南京星与火文化有限公司 (025) 83327129
- 杭州：杭州华鸿图书有限公司 (0571) 88256120
- 广州：南方都市报广州发行部 (020) 87376490
- 武汉：武汉春秋书店 (027) 85493562
- 西安：陕西五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29) 82100585
- 昆明：昆明尚云图书报刊有限公司 (0871) 64122816
- 沈阳：新中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4) 23883566
- 哈尔滨：志诚远大书刊公司 (0451) 88341879
- 青岛：盛世飞龙图书有限公司 (0532) 83840608
- 济南：山东前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531) 82903395
- 长春：吉林九歌图书有限公司 (0431) 82752206
- 大连：大连渤海书店 (0411) 84609410
- 南昌：江西省邮政报刊零售公司 (0791) 88820509
- 太原：山西森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351) 7065397
- 贵阳：贵阳尚和图书报刊有限公司 (0851) 5661974
- 兰州：兰州大漠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0931) 8521090
- 郑州：河南大河书局有限公司 (0371) 67647337
- 天津：天津天智书店 (022) 23683854
- 河北：石家庄远大书店 (0311) 83993043
- 安徽：合肥皖新书店 (0551) 64252409
- 新疆：乌鲁木齐市纵横文科书刊有限公司 (0991) 5582981
- 内蒙古：呼和浩特融联书店 (0471) 6263358
- 深圳：深圳市新宏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755) 22203426
- 长沙：湖南国闻书局书报刊配送有限公司 (0731) 82253036

本期广告目录

- 封二~扉 1 · 宾利
- 3 · 卡萨帝
- 17 · 三联全媒体
- 45 · 生活周刊
- 99 · WWF
- 109 · 松果生活
- 119 · 三联中读
- 131 · GANT 软文
- 151 · 三联书店
- 封三 · 熊猫茶园
- 封底 哈苏



拍摄二维码直接
下载客户端



新浪微博 @ 三联生活
周刊或扫描二维码



微信搜索 Lifeweek
或扫描二维码



扫描二维码下载
松果 APP

手机报订阅：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8000，电信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9000。包月 8 元，
周一至周六每日一期。

网络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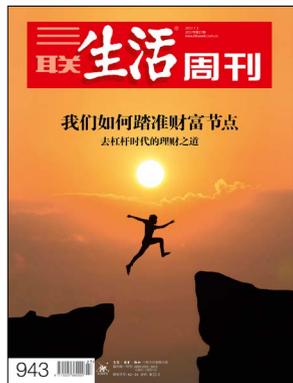
新浪网官方微博：<http://weibo.com/lifeweek> 腾讯网官方 QQ:800033183

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三联生活周刊》 全媒体广告与商务运营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
中电发展大厦B座
邮编：100125
电话：+86 10 84681038
传真：+86 10 84681396
电邮：jingying@lifeweek.com.cn
网址：www.lifeweek.com.cn





我们如何踏准财富节点

作为一个经济学小白，一直觉得理财是富人的游戏，我们这些穷学生拿什么理财，国家的政策、经济形势的变化与自己又能有多大关系呢，对各类理财产品以及相关的专有名词更是一窍不通。而如今即将踏进社会工作，发现身边不乏在炒股、炒房，或者投资货币基金的朋友，听到他们条条是道的分析，我才迷迷糊糊地意识到学会理财也是人生的必修课之一。这一期的封面故事让我初步了解了国内外的经济趋势，鞭辟入里，虽然仍有很多专业术语不太理解，但还是丰富了我对经济学原本肤浅的认识，但愿未来在理财投资的路上能少走点弯路。（@陆琼）

关注《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众平台（lifeweek），回复您对封面故事的评论，精彩留言将刊登在下一期杂志中。

留学生与四六级

在刚成年的那年，我拉起了箱子独自赴英国留学，5年之后的现在，终于再度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决定毕业回国发展也是深思熟虑后的想法，毕竟这儿有太多割舍不掉的情结。然而，在归国找工作的漫长征途中，我也吃到了一些略感心酸的闭门羹。前一阵本市大波事业单位招聘，放出100多个空缺岗位。我坐在电脑前，兴致勃勃地从密密麻麻的一篇Excel列表里挑出了为数不多的几个和自己专业较相符的岗位进行了报名，然而却无一幸免，通通因没有获得国内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证书（CET）而未通过报名资格审核。

那天心情愉悦地在浦东机场等待转机，不碰巧地收到了最后一家申请单位发来的审核未通过通知信息。仅因为这个理由被心仪的单位们多次拒之门外，不免有些欲哭无泪。于是我趁着候机时间，找出了它们的联系方式进行一一致电。在电话里一一解释了自己本科与硕士全部没有在国内大学读的情况，询问有没有可能用雅思（IELTS）成绩证明自己英语水平云云。得到的都是这样的回答，“请稍等啊，我

问一下”“不可以的，抱歉，我们有硬性规定”……我没放弃，决定抓住一家公司打破砂锅问到底：“那这样的话贵公司是不考虑留学生的意思了？”电话那头沉了几秒回应：“反正必须要四六级证书的，不可替代。”被连泼了几次冷水后，终于起身离开了座位。

其实早在国内读高二的时候，因为报考大学的“刚需”，我便去参加了学术类雅思考试，全称为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包括听、说、读、写四方面的综合考核，被国外大多数英语国家所认可。那时得到了7分的成绩，虽不算惊艳，但加上这些年在英语环境里的学习生活、耳濡目染，在英语水平这一方面我相信只会有所提高。应届毕业生网曾发表过一篇关于四六级与雅思分数换算的文章，单是衡量英语水平的话，客观给出了这样的雅思成绩可以有实力考取国内六级水平的评价。当然这两项考试存在本质性的区别，不能替代也不置可否。如果上岗真的需要具备一定英语能力，为何不依个人情况再进行当场的英语测试，比如现在很多企业流行的英语笔试或面试。那如果我现在去考四六级还来得及吗？很遗憾网络上给出

的答案都是：非国内在读大学生不能报考。这是自2007年1月CET改革后的规定。大概因为我所学的专业是文科，很多事业单位的相关岗位都有对四六级证书的硬性要求，可以预料到下半年将至的公务员考试也难免遇到类似的困境。上网搜索相关字眼，便发现也有不少和我情况类似的人在发问，得到的只有无解。留学生们就这样默契地形成了一片灰色地带。

长辈们一直是微信好友里的最忠实的链接党，最近他们不约而同地转发来了同一篇报道，题目为“白马非马式招聘当止”。也许类似的境遇是一种安慰。其实我早在之前也看到了这条新闻，起因为某笔试、面试成绩第一的女硕士被某事业单位拒录，以其所学专业与所报岗位专业要求差了一个字为由。被条条框框框在了外面，职场上的厮杀向来不具人情味儿。联系起了我的经历来看，自己的遭遇并不算委屈。可现如今的情况是大批的留学生回潮，我恳切地希望有关单位有朝一日也能为这一日渐壮大的群体酌情考虑，也设立一些符合实况的条条框框，以便公平竞争；或者干脆写明所考虑的群体，而不

是用一股无形的力量推走他们。

读者 李碧溪

不切实际的扶贫

前不久，笔者到联系的贫困村走访几位村干部，问及村里存在的困难，几乎众口一致要求建一座桥梁与挡水坝合二为一的工程，以彻底解决村里的饮水及灌溉问题。我们粗略估算，要完成这项工程及配套，所需资金至少在千万元以上。更大的问题在于，此项工程即使建成，也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因为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去了广东务工，田地大多荒芜无人耕种，包括将来村里的自来水工程，也面临一个巨大的浪费。

将我们的想法跟村干部一说，几位年长的村干部想不通，坚持要求工程尽快上马，说只有生活条件改善了，年轻人才会回来。而从村里的多位年轻人那儿了解到的情况，与老村干部的想法相反。不少年轻人在县里或市里供了房，他们只是逢年过节回家看看，基本都不愿回到穷山沟定居。老人们帮他们建在村里的新房，二楼以上多数是闲置的。包括年轻人的下一代，虽然都由老人们带着，但随着

城乡一体化步伐的加快，迟早会想办法跳出农门。村里留守老年人占的比例越来越高，当务之急，是建一个上规模和档次的养老院。而这项投资，仅需桥梁和挡水坝工程的一半都不到。

村里目前虽然有一座养老院，设施却极其简陋，里面住着相邻三个村20多位五保户，只有两位年纪60多岁的卫生员帮着打理，且管护、医疗条件严重不足。由于服务不到位，老人大多也不安心在那儿住。随着年纪增大、身体不便，需要养老院的村民越来越多，但许多老人恋家观念重，宁愿待在潮湿破旧的危房，也不肯住进养老院，成了村里不愿改建养老院的直接原因。另一方面，外出的年轻人，却迫切希望建一个上档次的养老院，他们甚至表示愿意出点钱，解决年轻人的后顾之忧。

由于务工青年不属于脱贫对象，没有发言权和签字权。按地方精准扶贫考核办的要求，贫困户脱贫，必须由结对的贫困户签字同意，这些对象又多为留守老人，不答应他们的条件，脱贫这关是没办法过的。此外，经过几年

对口扶持，不少得到好处的贫困户不愿脱贫，有意找由头拖延，有的还附带一些不合理要求，逼得牵头单位只能想办法委曲求全。除了物资上的供给，每名对口扶贫干部还要背诵一本厚达90多页的扶贫手册，里面的内容既不是什么专业知识，也不是扶贫理论，而是上级统一编印的扶贫脱贫问答，同时另附通知：扶贫对象要熟练说出结对帮扶的姓名、职务、单位、手机号，对口扶贫干部要做“问不倒”先生，做到对脱贫攻坚对象的情况、扶贫手册内容脱口而出，对答如流，否则会在考核中扣分。

精准扶贫是中央的大政方针，事关国计民生。但一些基层部门生搬硬套，机械地出台不切实际的扶贫考核指标，将一部好经念歪了。尤其是很多耗费巨资的扶贫项目，由于缺乏长远规划和具体论证，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一些急需改善的地方，又缺乏资金投入。脱离实际的扶贫后果，使得一些贫困村仅仅多了一层表面的风光，背离了真正意义的小康生活。

湖南 蒋平





阿富汗 | 寡妇社区

6月29日，在阿富汗喀布尔郊区名为“Zanabad”的地方，是寡妇们聚集的生活场所。过去10多年里，战争寡妇们聚集在此地并修建泥坯小屋居住。现在这里的寡妇数量可能超过了1000名。起初的非法居住地已发展成了一个拥挤的、拥有私人饮水供应和电力供应的社区。寡妇们在那里相互扶持生活。



迪拜 | 女特技飞行员

(右图) 6月28日,百年灵喷气机队在迪拜参加航展。图为百年灵喷气机队的女飞行员正在表演。百年灵喷气机队是世界最大的民用专业喷气机特技飞行队,每年都会在欧洲进行50场左右的飞行表演,包括航空展、一级方程式大奖赛等。



巴西 | 消失的雨林

(左页上图) 6月28日,巴西朗多尼亚州境内,一辆卡车驶过遭到破坏的雨林区域。在巴西,国家太空研究院每年公布森林砍伐的数字。自2000年以来,亚马孙雨林每分钟消失的速度相当于50座足球场,总消失面积是英国国土面积的10倍。

英国 | 蒸汽机展

(左页下图) 7月1日,在英国赫尔姆斯利邓库姆公园举行一年一度的蒸汽机展,展出了40多种蒸汽机和一些拖拉机、老爷车、摩托车。

利比亚 | 非法移民

(右图) 6月27日, 利比亚海岸警卫队在西部港口扎维耶附近海域救起147名试图进入欧洲的非法移民。据意大利海岸警卫队透露, 过去48小时在利比亚水域救起超过8000名移民。

中国 | 香港回归20周年

(下图) 6月30日, 香港回归20周年阅兵仪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石岗军营举行。





谷歌的天价罚单

文 / 邢海洋

6月27日，欧盟委员会宣布对谷歌实施24.2亿欧元的“天价”罚款，这笔缘起于2008年的反垄断调查终于落槌。长达9年的反垄断调查，对美欧的经贸关系，对全球范围内互联网领域的反垄断有着诸多思考价值。

折合人民币200亿元的罚款还不是互联网领域最大的，去年欧盟反垄断机构曾要求苹果在爱尔兰补缴130亿欧元的税费。爱尔兰靠低税率吸引高科技公司避税，低税率乃立国之基，无论苹果还是欧盟都表示将上诉。美国财政部则立刻以牙还牙，向欧洲第一大行德意志银行开出了140亿美元的罚单。再联想到中国发改委向高通开出的高达60亿元人民币罚单以及两年后国企中兴与美国政府达成的8.9亿美元的认罚协议，全球反垄断或合规调查几乎都是对等的“点对点”打击，各经济体拿垄断说事，可到头来结果却是各经济体之间利益平衡，互相震慑。反垄断调查本来就就业界笑称能预防老年痴呆症，高度复杂且普遍历时漫长。经济全球化下，跨国公司渗透到各个角落，各国利益犬牙交错，互为犄角，即使调查完结事实充分，也可能因为利益盘根错节半途而废。

对谷歌的调查，离奇之处在于“同伴插刀”。欧盟针对谷歌的反垄断线报多来自七家美国大型科技公司：甲骨文公司、新闻集团、Yelp公司等。美国企业之所以背后插刀，也不难解释，普华永道预计，谷歌的广告营收相当于全球所有印刷类广告营收的总

和，Facebook的广告收入接近于全球所有广播广告的收入总和。这两位巨无霸相加，大约有一半的新增广告费都被他们拿走了。而今年全球三分之二的美元广告费都会源源不断地流进谷歌、Facebook、阿里巴巴、百度、腾讯这五家巨头的账户里。一项服务的客户越多，其价值就变得越高，互联网天然助长赢家通吃，技术巨头们深谙市场份额决定企业前途的道理。如今，谷歌和苹果为90%的智能手机提供操作系统，超过半数的北美人和三分之一以上的欧洲人使用Facebook。相比之下，在五大汽车制造商中，没有一家能够控制超过五分之一的美国市场。

互联网巨头们为消费者带来了愉悦与便利，为他们那些为数不多的天才员工带来了财富和价值实现。与老一代的铁路大亨、石油大亨相比，更不会卷入无休止的劳资斗争：1901年，卡耐基的美国钢铁公司雇用了25万工人，比当时美国陆海军的总兵力还要多。今天，谷歌、Facebook和推特分别只有5万、8000和3500名员工。竞争中败下阵来的企业只有诉诸政府，也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政府。但绝大多数情况下，正如前文分析，政府也有苦衷，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当技术天才们凭借科技与市场才能摧枯拉朽，他们当然有权利享受创新带来的额外收益，当然也有权享受如苹果般自创生态圈，并在自己的王国中收“苹果税”的特权。否则，如果规则不保障这份收益，创新者的动力将彻底泯灭，大众的利益也将受损。可现实是，硅谷创业者经历了一代人的开拓，已经是几大山头的天下，曾经极富创造力的、打破陈规的人，光彩正逐渐褪去，变成了贪婪的生意人：收买政客，使用血汗工厂的劳动力，垄断着市场。谷歌被欧盟调查，就是因为当消费者搜索商品时，总是优先显示“Google Shopping”的结果，涉嫌滥用了自己的市场支配地位。

这不由得使人联想起围绕着“拆分微软”的旷日持久的诉讼，事实上没有拆分，微软也走下了神坛。既然互联网的寡头化不可避免，给故步自封的垄断者的最好礼物，就是创新者的挑战。☑

谷歌股价



生产知识

也生产知识产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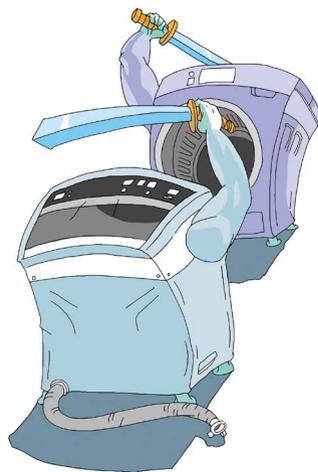
栏目插图 | 老牛

“老千股”爆仓

6月27日多只港股闪崩，14只股票跌幅超50%，汉华专业服务跌幅达94%，中国集成控股跌93%，公司旗下拥有《财经》《证券市场周刊》等媒体的财讯传媒跌61%。不仅跌幅惊人，成交金额也出现历史上罕见的巨量。暴跌股票都可归入“老千股”行列，为了激活香港小企业创新，港交所近日提案要强制低于1元且平时交投不活跃的僵死股（也就是“老千股”）退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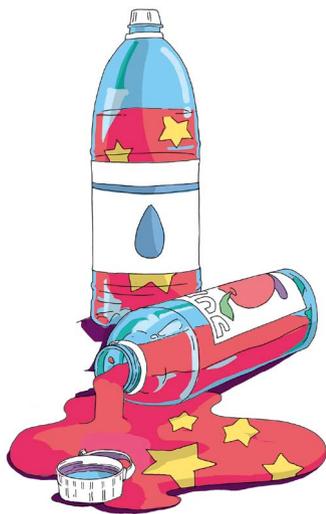
谁买了伦敦房子

伦敦市长萨迪克·汗竞选时曾宣布要深入调查海外投资客在伦敦的购房行为，如今有了结果。令市长恼火的是，海外投资客不但买豪宅，还抢走了大量适合伦敦本地首次购房者购买的新房。伦敦首次置业者购买的平均房屋总价为40.5万英镑，海外投资客大举横扫了50.5%的50万英镑以下房产。按国家或地区排名：中国香港(28%)、新加坡(20.1%)、马来西亚(7.1%)、中国大陆(5.4%)，华人占了海外买家的六成多。



白电对决

6月19日，格力率先动手向美的发难，告其侵犯专利。美的不甘示弱，也提起三起专利侵权诉讼。早在9年前，格力曾诉美的并获得2000万元赔偿。2009年，双方先后状告对方虚假宣传，各自胜诉一局。两家白电巨头之所以竞争白热化，很大的背景是空调市场已经触及天花板，2014年中国空调市场的零售规模是1575亿元，仅比2013年增长0.6%。2015年反而下降了4.8%。2016年酷热，空调零售额上升到了1606亿元，也没比2014年多多少。



快销品

从瓶装水、果汁、化妆品到牙刷，在中国的日用品市场，国际品牌正被本土企业夺走市场份额。据贝恩和凯度消费者指数对4万个家庭进行的调查，在26个快销品品类中，雀巢、宝洁和联合利华等跨国公司拥有的品牌，去年18个品类的市场份额下降，只有4个品类上升。2016年，中国企业销售额扩大逾8%，而外国品牌仅增长1.5%。跨国公司不适应这个市场不断变化的品味，本土品牌驾驭了消费升级的潮流。

基金“中考”

二季度以来，白酒、家电等一批中国版“漂亮50”领跑大盘，A股一度走出极度分化的“一九”行情。基金的业绩排名也较一季度末出现明显变化，在一季度便显现出不错功力的消费类主题基金，进入二季度之后，其业绩更是稳步增长，取代沪港深主题基金成为二季度普通股票型以及混合型基金中表现最好的类型。截至6月27日，普通股票型基金平均回报率为2.42%，含有“消费”字眼的基金平均区间回报为7.73%。

“漂亮250”

在上证50和沪深300之间是250只中盘股。截至6月28日，6月上证50指数2.36%的涨幅明显跑输中证100、中证500和中证1000的4.20%、4.50%和2.92%。不仅如此，沪深300成分股中，6月以来涨幅居前的也主要以总市值排名的“第二梯队”为主。由此，6月中盘股在大盘股的“掩护”下实现了“闷声发大财”。

欧元“语出惊人”

美元指数连续大跌，6月28日跌破美国大选当日的低点95.91，最低至95.76。而欧元则高歌猛进，兑美元突破1.14关口，为一年来首次。欧元暴涨，绝大部分原因来自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27日一句“通缩的压力已经被通胀力量取代了”，欧元兑美元当日大涨逾1%站上1.13关口。全球国债也遭到抛售，欧美长债收益率应声大涨。虽然通胀离2%目标差距较远，但欧元区似乎也要步美联储“缩表”的后尘了。





别具一只眼

所谓审美，关键往往不在于风景，而在于看风景的人。英国伦敦大学和班戈大学的研究小组日前便发现，受过长期训练的艺术家对图像和空间的感知，与普通有着相当显著的区别。发表于《认知科学》上的论文指出，针对16名至少拥有8年经验的建筑师、画家、雕塑家和16名普通志愿者的对照感知试验显示，画家对维度更为敏感，而建筑师则较多地着眼于边界，还会使用更多动态词语描述，雕塑家则介于两者之间。与这些专业人士相比，路人组留意到的细节更少，使用的词语也远不丰富，而这种差异并不能完全用不熟悉专业术语来解释。

好消息



越聪明，越长寿

高智商不能保证一生中从不走弯路，但却可能给你多一点从头再来的机会——仅仅是因为活得比较长。《英国医学杂志》上的最新研究调查了6.5万余名1936年出生的苏格兰人的健康数据后发现，11岁时智商较高的那些人，死于心脏病、脑卒中、癌症和痴呆症的风险要低得多。



感官游戏

优秀广告都是诉诸感官的高手，但根据发表于《消费者研究杂志》上的最新调查结果，不同感觉对消费决策的影响也有远近之分。强调味觉和触觉通感的广告，要比激发视觉和听觉通感的广告更能促使消费者立即做出购买决定，而后者在潜移默化地塑造品牌形象上则更重要。

坏消息



焦虑与过敏

为什么发达国家中经济、社会地位较低的孩子患食物过敏症的风险特别高，但同样情形却没有出现在普遍贫穷的低收入国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小组在《儿科学杂志》上指出，这或许是因为前者成长过程中更多受到焦虑和抑郁的困扰，身体长期处于应激状态而增加了过敏的风险。



不平等的水深火热

发表于最新一期《科学》杂志上的论文发出警告，气候变化对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打击严重程度是不一样的。以美国为例，住在南方和中西部地区的最贫穷的三分之一人口，未来经济收入可能会减少20%，但集中于北部的富裕地区居民不但不会蒙受太大损失，甚至还会获益。

50年前，自动取款机（ATM）问世，它确实无处不在，但它的价值被低估了。跟发育迟缓的孩子一样，它静静地伫立在我们的商业街上，受尽误解，似乎除了吐钞票之外毫无用处。然而，ATM绝非蠢笨：它有逾1.1万个工作部件，与智能软件系统相连，堪称来自英国的最复杂发明之一。试图通过破坏机器从现代ATM机中盗取现金简直就是浪费时间：在窃贼得手前，钞票就已在存放的塑料箱中与胶水或酸融为一体。

——ATM发明人之子詹姆斯·谢波德-巴伦说

三种最为有害的令人上瘾的东西是：海洛因、碳水化合物和月薪。

——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

苹果手机不但防泼溅、防水、防尘，还防历史。

——《纽约时报》技术作家列弗·格罗斯曼在评论《iPhone 秘史》一书时说

爱默生说，哈佛大学传授各种分支的知识。梭罗回答说：“是的，所有分支，但不教任何根基。”

——哈佛大学校刊说，梭罗16岁入读哈佛，离校时已经能读古希腊文、拉丁文、意大利语、德语和法语著作，不能太把他对哈佛大学的抗议当回事，哈佛大学深刻地影响了他

+/-
数字

7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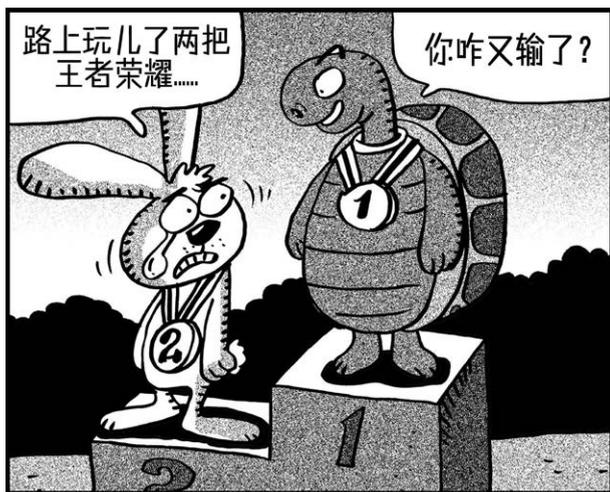
一项对16岁到25岁的英国年轻人职业意愿的调查显示，当今英国年轻人最向往的工作是自由自在的“博主”，75%的人做了这一选择。其次是体育健将、医生、政治家和音乐家。

140
米

7月1日是加拿大建国150周年纪念，华裔居民李振中制作了一面全世界最大的加拿大国旗，在温哥华市中心一个公园展出。这面国旗长约140米，宽70米。李振中在中国找了20人连夜制作，花了半个月才完成。

1.0434
万美元

拉美最大的电商Linio调查了全球50个国家美容产品的费用，发现给脸动刀整形全世界最便宜的地方在越南，其次是印度和南非、泰国，最贵的国家包括瑞士、挪威、丹麦和芬兰，以及澳大利亚、瑞典和美国。比如隆胸在印度收费1650美元，在瑞士则要1.0434万美元。



（插图 山羊明）



虽然我一开始并没有打算为儿童创造帕丁顿，但陪伴孩子长大的经典人物，性格是永远不会变的，就像大力水手永远都吃菠菜，帕丁顿也将永远只爱橘子果酱。

——6月28日，帕丁顿熊的创作者迈克·邦德因病逝世。帕丁顿喜欢吃橘子酱三明治，2007年，某个啤酒酵母广告假借帕丁顿之口说“改吃这个也不赖”，无数“粉丝”群起抗议



美人蒙昧

文 / 闫晗

图 / 谢驭飞



金庸小说中有几位美女，是美而不自知的。《神雕侠侣》中杨过在绝情谷撩公孙绿萼，夸她是个美人。绿萼姑娘愣了：谷中从来没有人说过我美。杨过继续贫嘴，用夸张的方式加大了吹捧力度：你这么美貌，他们却不赞你，这谷中所居的都是瞎子么？

《天龙八部》里的第一美女王语嫣也是如此，从小幽居在曼陀山庄，没有见外人也没有被外人见过，被段誉夸赞美貌，觉得很新奇。丫鬟婆子眼中她只是小姐，美与不美与她们没有关系，表哥慕容复醉心武学，也没心情欣赏她的美丽。

这些美女的蒙昧不自知，反而显得单纯可爱，出尘脱俗，不食人间烟火。世间美女多半如《长恨歌》中的王琦瑶，从小被人的言语态度提醒着自己的美，从幼儿园起就有了“班花”，处处受人关注。资深美女如果深知自己的美丽，如同一种武功，久了自会运用这种魅力。

《天龙八部》中的康敏是一个美而自知甚至自负的女人，她认为天下男人，只要她首肯，没有得不到的。凭借美貌，她和段正淳有一段恋情，也做了丐帮的副帮主夫人。在洛阳牡丹节时的丐帮大会上，她站在牡丹花旁风情万种，引得所有男人向她行注目礼，那些色眯眯的目光，在康敏看来，是被认可的勋章。然而，丐帮最出色的男人帮主乔峰居然瞧也不瞧她，这严重伤害了康敏的自尊心——但凡不承认她的魅力的男人，就是敌人。后来她拿美色引诱拉拢了丐帮几个重要人物，设计陷害乔峰。

久惯牢成的美女，在男人眼里是可怕的，所以金庸才会把熟女康敏描写得心如蛇蝎，如同一个

复仇女神，谁也不能招惹，而且就算你不招惹她，被她看上了也很危险，因为她的信条就是：得不到的就要毁掉。

除了康敏，还有另一种熟女黄蓉，由小妖精进化成懂得人情世故的妇人。在很多人眼中是“死鱼眼”的中年黄蓉其实别有一种魅力。杨过搞“超级大侠秀”，在漫天烟火中的出场，把小姑娘郭襄震得五迷三道，而熟女黄蓉则充满着怀疑和警惕——想当年，这种场面老娘见得多了。

美人蒙昧易相处，不谙世事的“白秀幼”少女，是许多男人的理想目标。公孙绿萼很容易推倒，王语嫣看似高冷也抵挡不住段誉的死缠烂打加一片痴心。没有比带主角光环的偶像派长相少侠征服少女更容易的事。

但对美人自己而言，不自知不见得是件好事，或许意味着没有自我、低自尊。公孙绿萼跟杨过相处短短几日便一往情深，愿意舍身换情花解药相救，也是自卑心态作祟——她认为自己只配被牺牲掉，不可能举案齐眉。王语嫣是表哥的跟屁虫，记下武林秘籍，成为一只人形数据库，只为了讨表哥喜欢。前一阵的娱乐新闻里，佟丽娅觉得自己长得很普通没什么自信这件事，让很多人感到震惊——这也太没有自知之明了，你都不照镜子吗？

男人的美则丰富包容得多，青涩与稳重各有人欣赏，詹姆斯·邦德那种每天都被自己帅醒的有人喜欢，《加勒比海盗》中杰克船长的邋遢帅有人欣赏，《谍影重重》中的伯恩身怀绝技而他不自知，带着笨拙的反差萌也很可爱。☑

冲动一点

文 / 中读 @ 马尾不回头

图 / 谢驭飞



三年前，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情怀还不像现在这么泛滥；我的手机像素还未超过 1600 万，P 图软件也还没有这么多，但自拍的时候，也已经足够小痘痘无处遁形；旅行的唯一选择，只有最便宜的火车，而且，还是硬座。

可是，那真的是我至今一想起，就能嘴角上扬的最好记忆之一。

一只半满的书包，塞上洗漱用品和换洗衣物；一张单程票。从西安到重庆，从晚上 11 点到早上 8 点，我第一次看见西安的深夜和重庆的清晨。

硬座的确是难熬的，尤其是晚上至凌晨 6 点这段时间，窗外黑压压一片，车厢内灯光黯淡。想转头看一看窗外的景色，只能看见玻璃车窗上照出的不算分明的自己；想闭上眼睛睡一觉，火车“哐当哐当”，实在是难以入睡，甚至想小憩一会儿也要紧抱着背包。这便是一个人旅行的感受，除去雀跃、兴奋、紧张，更多的是害怕。

一整夜的失眠，当天光亮起，群山在窗外变得清明，所有的疲惫也在这一刻尽消。我能隐约看见老旧的轨道线穿行在巴渝之地，还有轨道铁丝网外大山的孩子趴在路边看火车。我不知道窗外的人能不能看见车窗内的样子，但我能清晰地看见那个孩子眼神，我也记了他很多年。

火车发出长长的汽笛声的时候，重庆到了。潮湿，扑面而来的潮湿，是我对重庆的第一印象。我感受着山城的湿气，忽然就明白了为什么我认识的重庆姑娘皮肤都那么水灵，因为重庆的空气就是天然的保湿品啊。

一天的时间，我把重庆的老城区逛了个遍。不赶时间，我让自己很快地融入了这座城市，慢慢走，慢慢看。晨跑的人从我身边跑过，有小伙子，也有老人，但速度却一样，没有谁想要超越谁；我路过公园，有逗鸟的，有打太极的，互不影响，怡然自得；老城区的房子剩下的其实不多，有些旧，有些长着苔藓，葱葱绿绿，与老城区是截然不同的色彩。

一条江，隔开了重庆的新老城区。我坐在公交车上，过桥后的一个转弯，我回头看了一眼老城区的方向，才真正明白了古人所说的惊鸿一瞥的惊艳。未拆的老城颜色是青灰色的，一个个或打开或紧闭的窗户，像是生长在一块天然的山石中，跳脱出城市的模样，固执地坚持自己。

诚然，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让老城区渐渐式微，但这是文明发展必经的过程，而重庆的脾气绝不会因为城市的变迁而消退，它藏在街头的一碗豌杂面里，辣而醇厚的重庆火锅里……

重庆之后，我再无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尽管当下这种情怀几近形成泛滥，因为我曾经尝试过了一次。那种雀跃、兴奋、紧张，又害怕的情绪，我再也没有过。也许是因为那时候年轻，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真的只是因为我想走，而不是被泛滥的情怀推着走。

我们常说着什么急，城市在那儿，风景区在那儿，又不会跑，以后有的是时间。可是，我们真的应该着急的，纵使世事不变，永垂不朽，可我们的心态却一日日地在变，越来越平静。

一个人的旅行，太需要冲动！

花农

文 / 杨万里

图 / 谢驭飞



花农是朋友的朋友，头一次到我家来，看着我满院盛开的月季和玫瑰，说了一句，我家有一盆“大马”，下回你去剪一枝来。这就把我勾搭上了。

下回很快就到了。花农没骗我，看着那粉色的花瓣，细长的花托，以及微微颤动的绒毛，我一眼就认出正是我遍寻网店都买不到的大马士革玫瑰，那浓郁的香气完全不是寻常的平阴玫瑰能比得上的。他剪下一截嫩枝给我，说春天好插，埋土里不用管。我才不信呢，我回家后小心地去掉下面几片叶子，把它插在装满水的瓷瓶里，还在瓶口盖上泡沫遮光，只露出几片叶子呼吸。如此精心照料，过了两个月，它竟然还是仙去了。所幸花农没再问过我，省去了我的尴尬。

花农不姓花，也不是真的花农。他姓乔，花农是朋友们对他的爱称。我对这个称号一直很不服气，因为我种的花比他多，即使不算上那些被我种死了的花，我的花还是比他多。当然，花农的花比我种得好，但这不赖我。第一，他比我大了20岁，吃的盐比我吃的糖还多；第二，他家的院子阳光比我家的，虽然每到下午能晒死人，但他家的花就是傲娇地绽放在烈日下，简直要气死我。然而大家都不听我解释，他们拒绝叫我花农，他们叫我花痴。我不会答应的，这是一个贬义词，既不像花花公子那样令人背地里艳羨，也不像采花大盗那样随时可以故作悔恨地回忆年轻时的荒唐。“花痴”就是“傻子”的意思，透着一股心比

天高命比纸薄的傻劲。他们给我起这么恶毒的外号，让我忍不住怀疑这些朋友是不是我捡来的。

老乔种的除了兰花外全都是木本，这真是一个偷懒的办法。木本容易养活，不像草花每年都要播种扦插，到时候自然开花结果，也不用像我这样，跟个真的花农一样辛苦，却还是没人肯给我一个名分。不过我家四时斗艳、满屋飘香的光景是偷懒的人见不到的，所以我总盼着有人来我家看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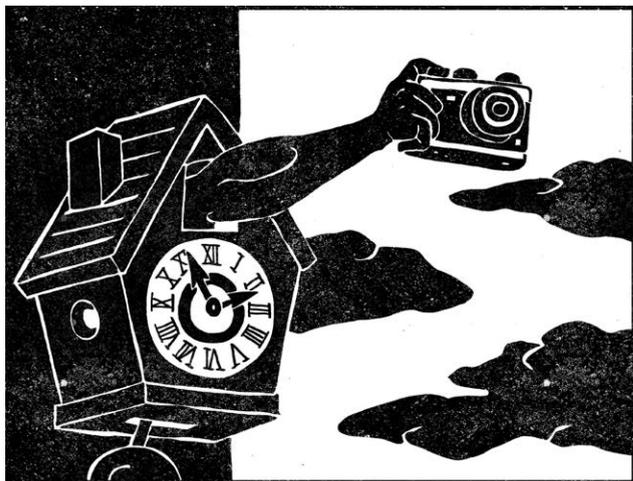
然而老乔来我家，并不专注于赏花。我把他引向繁茂处，热情地向他介绍这一盆矮牛叫轻浪，那一盆是兰靄，他只赞一句开得好，便疾往屋里走。或是对盛开的西伯利亚百合皱皱眉，说一句这香味有些熏人了，又掉头走。这搞得我很郁闷，忍不住问他：“你是不喜欢外国草花吗？我这里的你随便剪呀。”老乔郑重地说：“倒也不是，只是天下之大，像我们这种容易痴迷的人还是少一点兴趣才好，什么都想要的话，这一辈子都忙不完了。”忽然我就觉得这满院的鲜花有些过了，似乎我的贪心也在随着它们生长，如果少一分欲望会多一分快乐的话，明年我大概可以少种几棵。

老乔多吃了不少盐，果然比我聪明。他管好自己花园就够了，我自然也不用眼馋他家的盆景。每个人都该有自己的一片花园，三不五时地除除草，施点肥，浇浇水，笑看花开花落，一辈子在不经意间就过去了。☑

照相这件小事

文 / 董宇轩

图 / 谢驭飞



下午去水果店买雪糕，时好时坏的 4G 信号让这间屋子成了抵抗电子支付帝国的最后壁垒，只好付现金结账。掏出好久不见的钱包，又看到了里面夹着的一家三口的合影，顺便感慨照片中中间瘦削且长发的高中生，真系年轻又靓仔。

老话儿说“人穷志短，马瘦毛长”，但对于一般男性而言，瘦且长发的时期八成不是人生最成功的阶段，但一定是令人最想回溯而不得的时代。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在钱包的透明夹层里放张照片成了种习惯。最开始放的是艾弗森的比赛照片，暗蓝色的 76 人队球衣松垮垮地兜着风、45 度后仰跳投，肌肉紧绷在出手前的那一瞬，透着股轻灵迅捷、赏心悦目的劲儿。可是这场景毕竟跟我的生活没什么交集，赏心悦目的也只是单薄的影像之美，时间久了，就看着乏味起来。后来换成了一张跟爸妈去深圳旅游时照的合影，三个人都笑得开心，三口大白牙，屡看不厌。

电影世界里，无论纵横四海的大哥还是百战余生的老兵，温柔地看着家人照片的场景几乎是一个必死的 flag（旗），下一个镜头不是暴尸荒野就是喋血街头。像我这种没事就看看钱包里的合影还能平平安安毫无无损的，要是混进哪部影片，最起码也得是个“风暴降生坦格利安”级别的主角。

小时候我不怎么爱照相，一是出于小男孩儿对于这种“臭美”行为的天然抵触，二是那个年代照相留影远不如现在方便，稍有纪念意义的照

片通常要在照相馆完成。于是嘴唇上的红色、额头上的小红点和脑袋上的博士帽作为著名的“中国审美三元素”，总是反复出现在不同年份的照片之中，令人烦不胜烦。

以前每年过生日，妈妈总是郑重地让我去照相馆照相，说是每长一岁都要留个纪念。我不爱去，小孩子嘛，总觉得时光漫长，未来久远得一眼望不到头，哪里用得着年年复一年地留影纪念。现在看来这种念头真是太天真幼稚了。

万事屋的老板曾经说过一段话，大意是人越大就越会觉得时间过得快，对他这个年龄来说，时间已经快得像 F1 赛车一般了。我也早有同感。越觉得光阴易逝，就越想回头抓住点什么，但是刻舟求剑、缘木求鱼，终究只是徒劳而已，于是只有过去留下的照片和影像，能带你一遍遍回溯那些注定回不去的过往。所以每次翻看老照片，我都十分感谢当年总是执拗地抓着我进行各种摆拍活动的妈妈。

现在对照相一事早已不再抵触，每次和家人朋友出行游玩，都是手机相机齐飞，摆拍也好、随手拍也罢，不讲构图，没有技法，只求留下过往时光的一鳞半爪，让每张照片都能勾起一段活色生香的回忆，就很满足了。■

本栏目投稿邮箱更改为：roundtable@lifeweek.com.cn



手机单反镜头

设计师 Damon Lin (Momax) 推出了一款便携式单反镜头 X-Lens Pro。它可以让手机变身为一款可以随身携带的 mini 单反。X-Lens Pro 表面采用了阳极氧化金属,看起来更有科技质感。其镜头系列包括 Macro 20x、远摄 2x 以及广角镜头、鱼眼镜头,也可以应用于笔记本电脑。



磁性螺丝

瑞士 Lamello 公司研发的这款 Invis Mx2 磁性螺丝充当了家具中的榫卯结构。它自身可以隐藏,再通过外界的磁场提供旋转力把物件连接起来,表面看不到节点。其外壳在实木的握钉力能达到 400 公斤,主体螺丝拉力能达到 160 公斤。



时尚运动感

泰格豪雅卡莱拉系列 Heuer-01 计时码表用 12 种不同零部件的模块化设计取代了传统的一体式结构,轻质钛金属材料提高了抗震性能,黑色精细磨砂陶瓷表圈上有灰色测速刻度,镂空橡胶表带更具时尚运动感。

空调节能器

Mistbox 是一款可随空调启动而自动开启的空调节能器。它的迷你风力发电机安装在空调外机的散热风扇口，获取风力后给控制单元及雾化器供电；雾化器安装在空调外机的冷凝片处，喷头对准冷凝片喷出水雾；控制单元则获取水箱水量、室外温度及外机运转情况等讯息，自动控制喷射水雾的量。



催眠神器

这款形似发箍的催眠神器 Dreem 内置骨传导音频系统，可以将声音直接传到内耳。失眠情况下，它可通过调整佩戴者的呼吸和冥想，使之进入沉睡状态。一旦进入睡眠状态，Dreem 便开始监测大脑的活动状态，并播放与大脑同步的声音，例如虫鸣、风声等大自然声源。



无龄感羊绒围巾

鄂尔多斯 1980 羊绒围巾通过组织变化、针梭拼接等现代针织工艺重新呈现了经典的面料，简约又不失现代的花形在增加层次感的同时凸显了“无龄感”概念，以天然色系为主的低饱和度透出复古质感。



内容 AI 音箱

在 2017 洛客大会暨全球创新设计大会上推出的小雅音箱是一款顺应共享设计潮流的“内容型音箱”，它可以做到“云历史”以及“断点续播”，记录用户在任何一台设备上的收听情况。除了早上提醒起床、播报天气预报、穿衣温馨提醒等功能外，它还能主动学习，以“猜你喜欢”及“订阅更新”智能推送内容。

伊甸园的花朵

Chaumet 将标志性的 Hortensia 系列变成了郁郁葱葱的伊甸园花园，这款开口戒指把雕刻的绿松石和钻石花朵舒适地放在手指之间，形成一个非常女性化的设计。



几何拼接

设计师马蒂诺·甘普与米兰皮具品牌 Valextra 合作的 Fontana 小肩包，经典的包袋轮廓结合玫瑰金色的金属配件，正面用白色、灰色和黑色小牛皮构成几何形的拼接图案。

农场休闲椅

洛杉矶设计师班德·谷兹受 20 世纪中期铁丝家具的雕塑形式启发，设计了这把名为“农场”的带粉末涂层休闲椅，它的靠背造型则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传统谷仓。



午夜蓝花瓶

Lalique Visio 仿水晶花瓶在形式上融入大自然的美丽与复杂，结合午夜蓝的深邃色彩，水流一般的动感曲线流动在缎面抛光的水晶表面。



编织落地灯

Kartell 品牌的 Kabuki 落地灯由塑料材质注塑成型，精细的注塑技术创造出类似于花边的编织结构，灯光从独特的穿孔表面透射出来。



陶瓷座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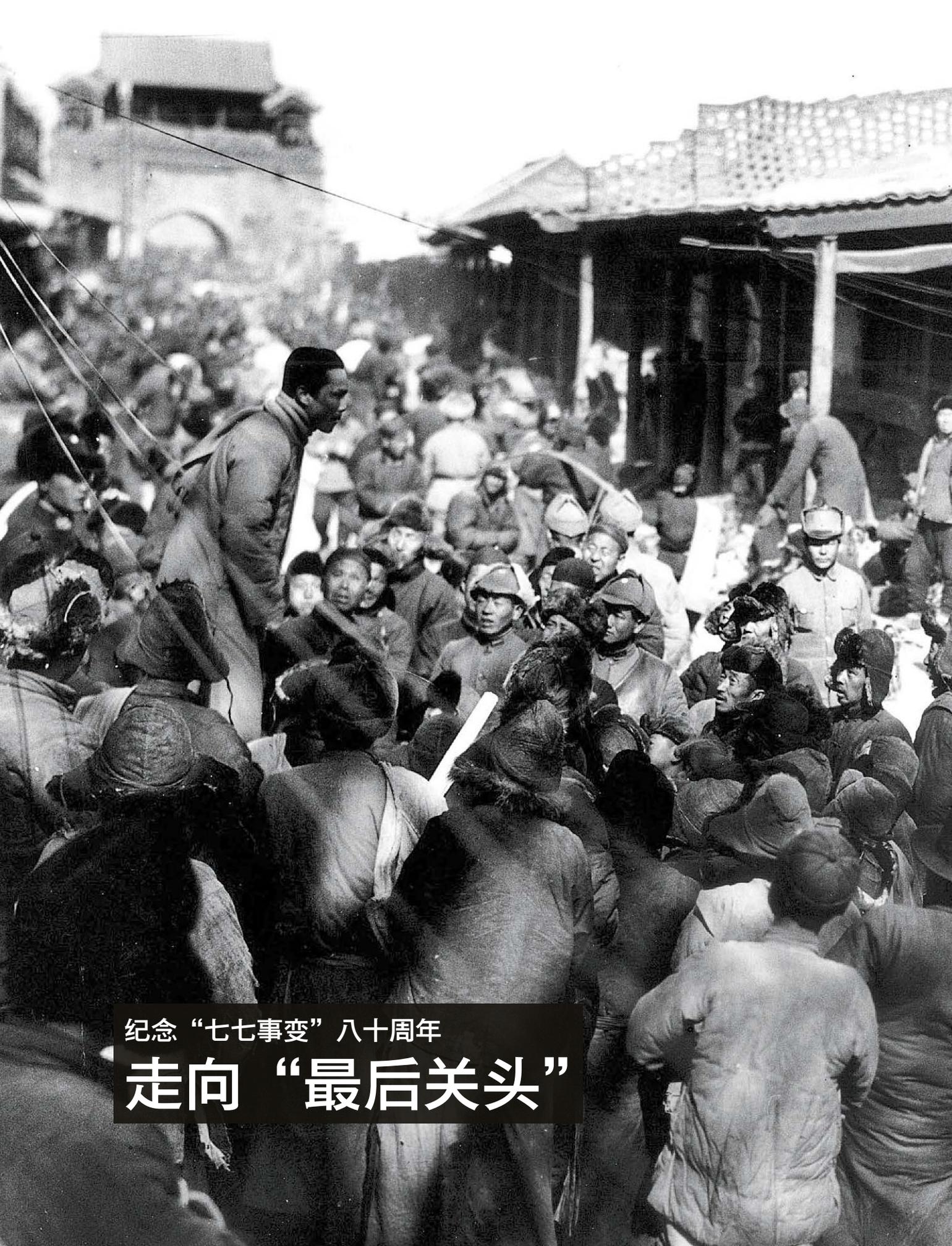
LEFF Amsterdam 品牌的 Base 桌面钟具有特别的工业化外观，亚光表面的白色陶瓷基座搭配金色调的镀黄铜铝质指针，为这一极简设计增添了对比元素。



雪花钻石镶嵌

江诗丹顿 Traditionnelle 传袭系列 33 毫米镶钻女表搭载 1400 手动上链机芯，表圈和表壳密镶珠粒式钻石，表盘上采用雪花钻石镶嵌法来呈现光线变幻的效果。





纪念“七七事变”八十周年

走向“最后关头”



1933年春，一名爱国青年在热河街头发表演讲，呼吁当地守军和普通民众奋起抗日。当年1月，日本关东军主力入关内犯，在4个半月时间里陆续攻陷热河全境和长城防线，直抵北平城下，迫使国民政府签署《塘沽条约》

文 / 刘怡

时隔80年，石敬亭的外甥女张幼兰老人依然能向我清楚地回忆起，舅父不止一次对她描述过撤离北平时的情景：1937年7月28日傍晚，第29军高级将领和冀察政务委员会要员正在铁狮子胡同进德社开会，一行20余人不紧不慢地谈论着进行中的南苑战事，酹茶喝了一轮又一轮，其间还得闲打了两圈麻将。太阳落山后不久，骑兵第9师师长郑大章惊慌失措地闯入，报称南苑已经失守，副军长佟凌阁、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在撤退途中殉职。军长宋哲元一时猝不及防，竟放声痛哭起来。优哉游哉的神仙会立即变成了逃难预备会：在获得南京政府的许可后，宋哲元下令由第38师师长张自忠暂代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平市市长一职，留下与日军周旋，自己则和其他军政大员一同移驻保定。大惊失色的石敬亭当即奔回北玉带胡同的私邸，催促家人将必要的行李搬上两辆汽车，随后直扑西直门火车站而去。其时市内供电已经开始不稳，内城附近的路灯正一条街一条街地熄灭。一行达官贵人乘坐的列车首先经大台铁路抵达三家店车站，接着换乘汽车、绕过战线后方抵达长辛店车站，再经平汉线去往保定。而他们下一次重回北平，已经是整整8年以后的事了。

出生于1884年的山东人石敬亭，早年曾任冯玉祥西北军系总参谋长，中原大战后下野，托庇于坐镇天津的昔日同僚宋哲元。由于石敬亭在华北军界广有人脉，又是第37师师长冯治安的儿女亲家，因此被宋哲元安排担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与日方做外交周旋。他在7月28日这一天的手足无措，正是华北军政高层对“卢沟桥事变”进一步扩大的可能性估计不足的一个缩影。日后第114旅旅长董升堂回忆：尽管早在1936年初就确定了对日积极备战的方针，但由于宋哲元对自己的纵横捭阖之术过于有信心，加上一年前解除了与南京政府关系密切、深为日方所忌惮的天津市市长萧振瀛的职务，他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依然做出了“镇定处置，相机应付”的指示，要求部队竭力避战，争取局部解决。7月11日，中方代表秦德纯一度与日军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久太郎达成《现地协定》，试图以大范围的妥协退让换取日军终止进攻。甚至在29日抵达保定之后，宋哲元依然派人通知松井：他已经按照协定撤退北平驻军、改由保安队接手城防，双方应尽快停战。

徘徊在和战之间犹疑不决的，还不止宋哲元和石敬亭。7月17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庐山对158位社会名流做了题为《最后关头》的内部谈话，宣言“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

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然而他并未批准将谈话全文向新闻界披露。前一天傍晚，在审读过由《中央日报》社长程中行起草的谈话草稿后，蒋在日记中不禁自问：“此宣言发表，其影响究为利为害？”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徐永昌则明确认定“和平仍须努力求之”，21日他致函蒋介石本人，再三陈情“对日如能容忍，总以努力容忍为是”。甚至到了8月6日，刚刚被提名为国防参政会参议员的胡适还在建言“近卫内阁可以与谈，机不可失”，指望中日能继续维持“五十年之和平”。

在2000公里外的东京，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一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同样对“和平”解决“卢沟桥事变”信心十足。1931年，正是身为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的石原策划了入侵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并一手炮制了窃据关外的伪满洲国。时隔6年，他依然倾心于兵不血刃、仰赖渐进蚕食的“不扩大”方针，以免原定用于对苏“北进”的大军被早早牵制在中国。7月8日傍晚，石原从三宅坂的参谋本部办公楼向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发出指示，要求“防止事态扩大，避免进一步行使武力”。首相近卫文磨随后在四相会议上对这一方针做了追认。7月9日夜间，在得知永定河两岸的中日军队已经实现局部停火后，石原高高兴兴地告诉战争指导课长河边虎四郎：“要想解决问题，还是不使用武力为好，让陆军省去了结吧！”随后就下班回家睡觉了。

幻觉仅仅维持了不到24小时。7月10日一早，在石原回到三宅坂之前，参谋本部第二课（作战课）和第七课（中国课）的两位课长武藤章以及永津佐比重已经以各自部长的名义起草了一份新的备忘录，要求增调关东军的2个旅团和朝鲜军的1个师团驰援平津，并从本土加派3个师团的兵力在华北沿海登陆，以“扫除祸根”，“避免帝国威信扫地”。这一方案在规模上甚至超过了当年年初参谋本部估计的在华北全面开战所需的部队数量，令刚刚回到办公室的石原大感震惊。然而武藤随即就以一句语带讥讽的评论瓦解了这位上司希望争辩一番的斗志：“我们不过是以前辈您在‘满洲事变’中的所作所为作为榜样啊！”

“九一八事变”前后，正是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冈村宁次等当时的课长级军官开创了日本陆军的“下克上”传统。他们擅自僭越职权，派出小股部队挑起中日军民间的冲突，随后怂恿上级增兵，将一军、一地的骚动扩大为对中国一省甚至几省的大规模入侵，再胁迫内阁加以追认。在20世纪30年代弥漫全日本

的扩张主义狂热中，如此胆大妄为的“独走”非但不曾遭到任何惩戒，反而被视为值得赞赏的英雄行为。无怪乎武藤章这样的后辈也对上司们曾经的“勋业”艳羨不已，时刻希图加以效仿。而已经官至更高位的石原等人，尽管逐渐生出了“防止事态扩大”“以不使用武力为好”的“理智”念头，却完全无力承担做出否决所需的巨大代价——否定下属们今日的“下克上”，意味着也要连带抛弃自己赖以成名的荣光之路，与陆军中的多年同僚分道扬镳，并承认过去7年里由自己主导制订的对华侵略政策存在唐突之处。机会成本之高，甚至连以“帝国陆军的异端儿”自居的石原也感到恐惧。他最终在备忘录上签署了赞成意见：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遂已不可避免。

历史行程潜移默化地演进，须以每一当事人的具体言行作为依托；然而作为有机体的民族国家的行为逻辑，却远不止是一系列当事人意图的简单叠加。在1937年7月的盛夏，宋哲元、胡适、石原莞尔们对控制冲突所抱的期待，与中日两个亚洲大国对彼此的民族利益及其实现形式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认知探究相比，显得如此单薄而徒劳。

造成这场决战的关键要素，早已埋藏在近代中国从思想到行动建构民族国家认同的漫长进程中，埋藏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府谋求全国政治、经济统一以及国共两党动员社会舆论的不懈努力中，埋藏在日本军界对“下克上”和“独走”模式之以小博大收益的沉醉中，甚至也埋藏在1933~1937年华北军政要员寻求暂时稳定局势而未果的失败尝试中。卢沟桥的枪响，既是导火索，更是历史演进的最终结果。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原东北军将领马占山最早打出“抗日救国”的旗号。他所发起的义勇军的一部分，日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之一。田汉、聂耳在1935年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数千人喊着“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走上街头，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向高潮。1937年2月，国共两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谈判在西安开启。抗日救亡，已不再是一个党派、一个政府之事，它正成为团结中华民族一切进步力量的一致目标。

素有“中国通”之名的石原莞尔、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日本陆军将领，每每自得于其自诩的“知华”才能，对这种隐微不显、却从未停歇的宏大历史行程则惘然无所知。他们单单看到了华北军政负责人与南京政府之间的具体利益分歧，看到了泱泱大国孱

弱的工业实力以及军队的单位战斗力与日本之间的巨大差距，看到了少数中国失意政客、军人企图投靠外夷以谋再起的野心，满以为“九一八”和“满洲国”模式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甚至到了平津战事已经趋于全面化的1937年7月下旬，自认为属于“不扩大派”的冈村宁次依然在日记中判断：“在这一事件的背面，蒋介石对第29军这一地方部队的实力因受外力而削弱，可能是高兴的。这是中国人自古常用的手段。”对长期以来的肢解和蚕食政策的迷信，使“中国通”们丧失了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的民族和国家加以严肃审视的能力。一叶蔽目，不见泰山，此之谓也。

从这个角度看，这些精通汉语、对阴谋诡计知之甚详的日本军人的眼界，甚至比不上上海的一位普通中国新闻人。在1937年7月18日出版的《申报》每周增刊上，编辑吴景崧以“杜若”为笔名，发表了题为《国人对卢沟桥事件应有之认识》的评论，明确指出：“中国无论怎样退让，也没有可了结的时候。”“我们只有集合整个的力量，才能御侮救亡；我们也只有严整全国上下一致的步调，才能获得外交上、军事上的胜利。”“我们全国现在均已不把这件事当为地方事件，而把它当为全国安危所系的重大事件……我们今日整个民族的唯一出路，只有集合起来共赴国难。”与一天前蒋介石在庐山所做，但尚未向全国公开的《最后关头》谈话相比，内涵何其一致！在这个决断时刻，中国从最高领袖到普通民众，皆已做好了牺牲到底的心理准备。

以北平卢沟桥为起点的这场战争，上承1931年的东北“九一八事变”，下接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现代中国历史的最重要篇章之一。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以3500万军民的流血牺牲和超过6500亿美元（按1945年美元币值估算）的经济损失为代价，为中国赢得了联合国创始成员国和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地位，更在于通过漫长而艰苦的战争，完成了中国人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的再造。

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通过《抗战建国纲领》，正式确认中国将以对日抗战为契机，达成消灭帝国主义侵略、奠定宪政基础、整合国民经济与启迪民智的四大目标。这四项目标在战争胜利之后，部分又以《和平建国纲领》（《共同纲领》）的形式进入1946年的旧政协决议，成为全民族共同的精神遗产。如同后来投笔从戎的诗人穆旦在1941年12月中国对日正式宣战后写下的那首诗——《赞美》：“我们无言的痛苦是太多了/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感谢邹德怀先生为本组文章提供个人收藏照片）



1933年初，头戴英式钢盔的第29军官兵在罗文峪长城集结，准备构筑防线

1937，牺牲已到最后关头

文 / 刘怡

从“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机动主义，到财政与军事抗敌准备的启动，再到各党各派摒弃前嫌、一致对外：国民政府抗战决策出台的艰难历程，正浓缩了中国近代史关于国家再建构的全部挑战和回应。

1935年元旦，南京新出版的《外交评论》杂志第3卷第11、12期合刊上出现了一篇奇特的万字长文，题为《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作者署名为“国防设计委员会聘任委员徐道邻”，即皖系军阀要人徐树铮的三公子。文章开篇即言：“我不是一个研究国际政治的专家，本文之作，完全在根据常识和事实，而做一种纯客观的真实事理的指陈，以供中日双方的反省。”然而略知内情者不免推断：曾在柏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徐道邻，虽非政坛要角，在日益密切的中德军事、经济合作中却曾经扮演穿针引线的角色；加上他与国民政府最高领导人蒋介石颇有私交，所任职的国防设计委员会也是蒋氏为复兴全国经济而专门成立的智囊机构，故这篇长文，或许代表了蒋介石本人的意图。嗅觉灵敏的日本媒体立即做出了反应：1935年4月1日，《中央公论》杂志专门邀请资深评论家长谷川如是闲和军事记者伊藤正德就徐氏的长文发表评论，极言“它代表着现在中华民国最高水准的舆论”。但两位论者同时也表示：“像徐氏这样的现实论者……忽视了‘满洲国’存在的严峻现实，对政治外交的现实勉强进行反抗。若拘泥于这一问题，中日提携是绝对无法实现的。”

15年后，真相终于大白。蒋介石在《敌乎？友乎？》的再版前言中亲口承认：该文系他在1934年秋天于病榻上亲口口述，由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记录整理，再假徐道邻之名发表。文中的矛盾言辞，正是当时他进退两难心理的真实写照。蒋氏一方面认为，若继续尝试吞并华北、抑或对中国发动全面入侵，都将超出日本现有的财力、兵力上限，

并招来美、苏等国的干预，使日本最终自取灭亡。但另一方面，他也认为中国一向以来的对日政策存在诸多偏颇，高估了自身现有的军事、经济实力和国际舆论的影响，并且“当局与人民不相一致，人民各派间不能一致，中国国民党与党外不能一致，甚至至于中国国民党内部，更于此时因外交主张而显现分裂，因之内乱与外患益见严重”，故亦无法立即应战。最后，他宣称“解铃还须系铃人”，“打开中日僵局的主动，当然在日本”。但中国也须做好“寸地尺土，不能灭亡于任何国籍之种族”的心理准备。

自陈本国过往政策出现的偏差，同时却又以“为日本政府建言”的姿态陈说依据，自有其情感因素。自青年时代赴日留学之时起，蒋介石在心理上就接受了中日两国的命运实有息息相关之处这一基本设定。1927年他第一次下野之后，曾专程前往日本会晤时任首相田中义一，请日方默许北伐军直抵平津、逐张作霖出关，并“保证考虑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敌乎？友乎？》发表后不久，他又召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会面，极言“中日应该亲善，是我的信念，我所尊敬的孙中山先生，是一向主张中日亲善的”。按照蒋氏此际的说法，他乐见中日关系获得改善，但“中日提携，首当以道义为出发点”。若日方不做让步，则和平碍难达成。

现实很快令他失望了。1935年5月，日本天津驻屯军挑起“天津事件”，迫使中方接受《何梅协定》，从河北省撤出中央军、东北军第51军以及国民党组织，相对和缓已有两年之久的华北局势再度开始升温。1936年11月，日方挑动伪“蒙古军政府”出兵进犯绥远省，遭到晋绥军第35军以及北上增援的中央军的全力反击，成为华北战事全面化的序曲。1937年7月，当枪声再度于卢沟桥畔响起时，蒋介石终于艰难地放弃了两年对“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的执念，决心全面应战。7月19日，他批准将两天前在庐山发表的谈话向全国公布，“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的全国抗战，经过近6年的抉择，至此终于到来。

谁是“中国政府”

在1937年的盛夏，蒋介石已经可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身份，一言九鼎地向全党同志以及全国军队下达对日抗战的命令。然而在过去6年里，这并非中国政局的常态。某些时候，不明就里的欧美观察家甚至必须追问，究竟哪一家才是“中国政府”——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到3个月，时任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的蒋介石为了团结在广州另立政府的粤系中央委员，通电全国下野，由粤系人物孙科入主行政院。然而短短1个月过后，不掌握中央系军队的孙科因为自觉无力应对军事和外交压力，竟也辞职了事，改由前“改组派”领袖汪精卫接掌行政院，蒋介石则回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形成一主政、一主军的合纵格局。此际的华北军政大局，则主要由退回关内的张学良及其东北军负责，中原大战后由张氏收编的西北军以及北上增援的中央军仅作为辅助。即使是在张学良因热河战事失利而辞职，由代表中央的何应钦接任军委会北平分会委员长之后，南京政府依然难于将军事和政治势力渗透到东北军、西北军势力错综复杂的华北。故而蒋介石在此际的对日交涉中，往往倚重与他本人关系匪浅但和国民党保持一定距离的政学系官僚。到了1933年，粤系重要人物李济深、陈铭枢等又在福建发起“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3年后又有粤、桂两省实力军人联合发起“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其意都在颠覆蒋介石及其军事、政治地位的合法性。与此同时，1935年之后，在平津方面有日方扶植的冀东伪政权和基于原西北军第29军系统班底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形成对立，西北甘、宁、青三省和新疆则分别由地方实力派马氏家族和背靠苏联的盛世才形成准独立态势，山西、陕西、四川、贵州、云南亦各有地方军人坐镇。这还没有计入转战中西部多省、始终不曾被剿灭的中共政权及其红色武装。南京政府虽然自称“中央”，实际能调动的不过是数省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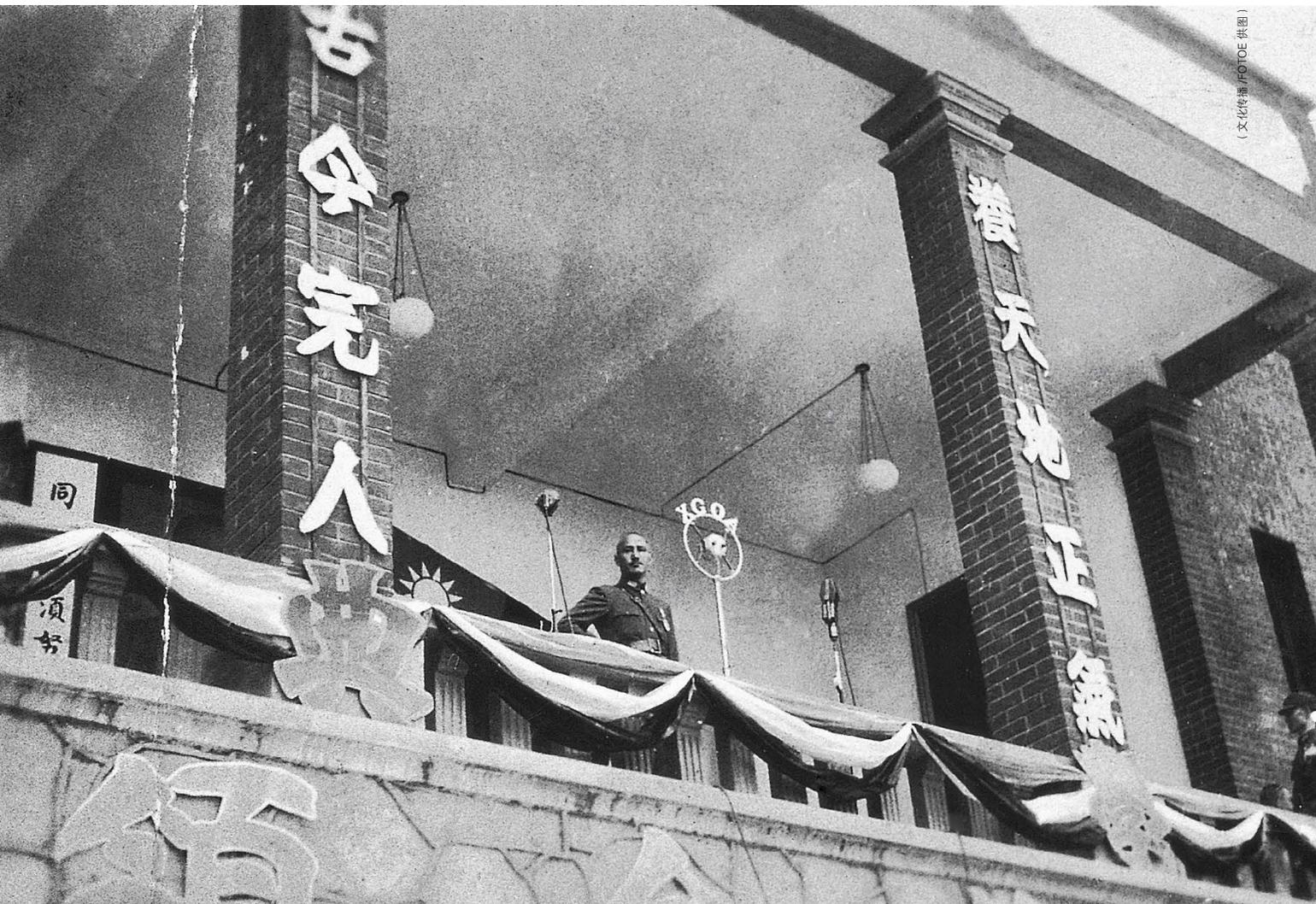
割据政权林立、党内派系众多的局面，固然是北伐战争后期蒋介石主动选择“清党”的结果，却也使中国在对日交涉中，始终无法形成长期而稳定的政策。日军大举涌入东北的1931年冬天，国民党居然有3个“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时在南京、上海和广州召开。到了日本海军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的1932年1月底，国民党内最具影响力的三

巨头蒋介石、汪精卫和胡汉民居然都因为内部斗争而隐退在野，无人主事。直到1932年2月，复出掌军的蒋介石才责成军事委员会制订出北伐胜利后第一个系统的国防计划，但也只是粗率地把全国划分成4个防卫区和1个预备区，拟令各省部队自行迎敌而已。1933年长城抗战中，东北军、西北军与中央军虽都曾在某一时期表现出了高昂的斗志，但彼此间依然囿于门户之见，缺乏配合，终致丧城失地。而这一时期蒋介石的日记，每每抱怨“赤匪”“逆粤”的不太平，使他无法集中力量“御侮攘外”。

正是在此背景下，1931年11月，蒋介石在南京政府召开的宁记“四中全会”上喊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的口号。中国近现代史学会副会长、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院马振犇认为：在北伐战争以降“以党治国”的统治路线下，南京国民政府的决策机制本质上是以其领袖（蒋介石）个人为中心的官僚机器，即所谓“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按照此逻辑，唯有使各地方实力派在军事、经济和行政上齐齐服膺于中央，方能形成一种举国一致的对日战略。因此，从1934年起，借助日本转而奉行相对间接的“华北分离工作”的时机，削弱地方军人的实力，乃至以“剿共”为契机，将中央军派入西南半独立省份，将当地行政、交通、财政、人事各项权力收归中央，使国民政府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政府”，便成为重要布局。

蒋介石本人甚少承认的一项事实是：在“安内”的过程中，他还希望使作为抗日领导者的合法性悉数集中于南京政府，包括以民族大义构成舆论压力、劝诱地方实力派服从中央。

对四川的收服和经营，可以视为南京政府谋求“中央化”的典型例证。早在1934年，蒋介石便在日记中思量：四川“处处得天独厚，可使建设为新的模范省……更可使来建设新中国”。同年秋天，由于在和红军的交手中兵力、财力皆已不济，四川地方军人领袖刘湘被迫主动邀请中央军入川。1935年1月，军委会参谋团进驻重庆，旋即宣布取消本省大小军阀自设的防区；刘湘亦宣布加入即将启动的统一法币流通体系，并就任南京政府任命的四川省政府主席。蒋介石对此大为得意，在这年6月底的日记中感慨：“川、滇、黔得以统一，完全入于中央范围之中，国际地位与民族基础皆能因此巩固。”1935年初，他甚至亲自前往四川，指挥军事行动，并发表讲话称：“即使我们丢失了中国关内的18个省中



〔文化作畫/FOTOFEST 攝〕

1937年7月9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两天，蒋介石在庐山暑期军官训练团开学仪式上发表演讲。当月17日，他对前来庐山的100多位社会名流做了著名的《最后关头》讲话

的15个省，只要四川、贵州、云南在我们控制之下，我们就一定能打败敌人，收复全部失土。”短短3年后，西南三省将成为中国长期抗战的最后凭靠。

抵抗与交涉

尽管自甲午战争以来，中日军队事实上的摩擦和冲突几乎从未终止，但1932年初的“一·二八事变”以及次年春天的热河—长城线抗战，却是中华民国政府军第一次与日军做正面交手（不含此前东北军和义勇军自主进行的抵抗），结局难言理想。“一·二八”抗战中，尽管驻沪的粤系第19路军以及随后投入战场的中央军第5军尽了最大努力实施反击，迫使日军四度增兵、三易主帅，但最终仍以签署城下之盟、中国丧失在沪驻军权而告收场。中方参战的6万名

部队死伤1.34万人，日军出动5.5万人、伤亡5000余人，双方损失比为4.6比1。这还是建立在中方出动了装备较优的中央军且拥有地理之利前提下的。而在次年华北局部抗战中，日寇的关东军仅用两星期时间就拿下了热河全省，接着又连续摧毁东北军、西北军第29军以及中央军第17军依托长城构筑的防线，兵临北平城下。若非特务机关策动的华北暴动未能奏效，平津在1933年就将陷落。

军事上无力御敌，外交谈判上亦落在下风。“一·二八”抗战开始后，紧急复出的蒋介石与汪精卫一致拟定了“积极抵抗，准备交涉”的应对方针。换言之，中方决意不主动与日本方面做双边谈判，而是等待对方前来接触。这显然是“九一八事变”后单纯依靠国际法和世界舆论解决问题的路线的延续。中方自付武器弹药无法自给，担心主动与日本



(文化传书/FOTOFE供图)

上图：1932年4月，从上海战场送返日本本土的伤兵在东京火车站下车，等待被运往第一卫戍病院

下图：1937年7月11日，日本近卫内阁在永田町首相官邸召开会议，讨论应对“卢沟桥事变”的方案。散会后，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左）与陆军大臣杉山元（右）并排离场



(文化传书/FOTOFE供图)

断交、正式承认两国处在交战状态可能招来不利后果；同时又对东京对国际组织和外界舆论的敏感度估计过高，认为中方在军事上只要能继续坚持下去，英美等国一定会加以干涉。但从实际情形看，自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以来，日本与欧美各国之间的贸易密切度已经被大大削弱；东京自感在《华盛顿公约》下扩张欲望原本就极受压制，如今又因各国普遍筑起关税壁垒，出口额大受影响。索性将商业利益和国际形象抛诸脑后，专心从事对中国的直接宰割。1933年2月25日，热河战役开始后不久，由于国际联盟理事会通过了对日本扶植伪满洲国的谴责提案，日本代表松冈洋右干脆退出了会议，次月又直接宣布退出国联。而经济动荡的英美无意直接介入事端，遂使华北和东南的两场局部战争都以中国被迫屈服而告终。

幸亦不幸，由于日本军政两界的内部斗争，从1933年入夏到1935年初，华北有大约一年半时间处在相对平静的状态。斋藤实、冈田启介两届内阁决意推进方式相对隐蔽的“华北分离工作”，以间接渗透替代直接军事入侵。1933年9月，日本新任外相广田弘毅提出所谓“协和外交”方针，鼓吹“日满华三国提携互助”。而执掌中方外交实权的行政院长汪精卫以及部分政学系官僚对此做出了暧昧的回应，使日方产生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幻想。1934年2月26日，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干脆起草了一份《关于日中经济提携之件》，狮子大开口式地设想：“日中提携应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全面实现，此为紧要。”“由于中国正推行恢复国权运动及反对满洲国的成立，政治性的提携至为困难。然而，实现日中提携并非完全无望，如以我方担任中国事务之强有力人物为中心，推动其诸般内政工作，使之确立亲日政权、打倒欧美派、清除国民党内过激分子、禁止排日言论等，即为实现提携之一策。”换言之，希望整个地通过变更国民政府的基本班底来达成解决外交悬案的目标，这当然不可能为中方所接受。为了试探日方的“诚意”，新任财政部长孔祥熙在1935年初向东京提出了给予财政帮助的要求，希望东京提供2亿~3亿元的长期低息贷款，以帮助中国实施货币改革；或至少给予3000万~5000万元的纺织业贷款。口惠而实不至的日方当然不可能

应允，所谓“经济提携”自然也成为空话。

与此同时，中方也在探索除去一味妥协以外的其他可能。1934年7月，蒋介石派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访问莫斯科，探询同样与日本存在安全利益的冲突的苏联与中国合作的意图。1935年7月初，中方明确向苏方询问是否有可能缔结军事互助协定，被苏方婉拒，但斯大林同意承诺两国间互不侵犯，并且未来一旦中日发生冲突，苏联可出售必要的武器装备。这项伏笔在前的承诺，日后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曾发挥不可小觑的作用。但苏联毕竟无意直接成为中国的战略屏障，故而在开展备战行动的同时，中国在华北仍须努力维持局面。

进入1934年底，日本军方基本断定“蒋介石的新政策是欺骗政策”，决意再度实施武力威胁。1935年5月，日方制造“天津事件”，中央军和国民党组织被迫退出河北省，华北的离心倾向已经由可能变成了现实。同年9月24日，新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一项声明，明确提出“我军对华北的态度是：将反满抗日分子彻底驱逐出华北；华北经济圈独立；华北五省军事协作，防止赤化。”11月上旬，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来到北平，正式向第29军军长宋哲元提出了实施“华北高度自治”的具体方案。

所幸宋哲元尚不至于为日方轻易玩弄。南京政府对第29军在华北的准独立局面，采取了姿态上默许、条件上予以助力的方针，目的是利用日本尚未公开抛弃“日中提携”“华北自治”口号的机会，使宋哲元在前台与日方虚与委蛇，抬高时间成本，为中央政府的备战创造时间窗。1935年，南京政府一反常态地宣布为两年前参与长城抗战的有功人员颁发“青天白日勋章”，第29军高级将领多蒙此勋，士气一时高涨。宋哲元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之后，南京政府直接将华北两省两市的行政权统统移交给第29军班底，使宋哲元大喜过望。

1936年初，第37师参谋长张樾亭作为宋哲元的信使，赴南京与蒋介石、何应钦会面。何应钦不仅承诺为第29军的进一步扩编提供每个月80万元的军费补助，还直接拨给步枪2000支、步兵炮8门、子弹400万发以为补充，并批准宋哲元自行筹款从欧洲购买武器。对重视基本力量的宋哲元来说，这实在是吃了一颗定心丸。宋哲元的态度既已稳定，多田骏、土肥原之流的“高度自治”遂再无操作空间。而由蒋介石的宿敌冯玉祥所部西北军分化而来

的第29军，此后基于民族大义，始终为中央守护华北，直至一年半后全面抗战爆发。

军事应战，经济应变

自民国初年军阀混战大开以来，中国兵多、兵弱、财政耗费无度的局面就成为历届政府的极大挑战。北伐结束初期，南京政府初步统计全国各派势力共养兵220万人，每年须花费军费8亿元，是全国总税收的1.6倍。1929年初，以德国顾问马克斯·鲍尔上校提出的整编方案为基础，国民政府初步决定将全国军队缩编为65个师、8个骑兵旅、16个炮兵团、8个工兵团，合计共80万人，军费开支控制在年均税收额的40%左右。然而随着中原大战的爆发，这一希望很快化为泡影。1934年底，军委会再度制订了整编计划，预定先从编制调整着手，将全国陆军100多个师统一改为两旅四团制。到1938年为止，将编练三批共60个调整师（甲种师），用于对日正面作战；另外再编练60个用于后方绥靖的整理师（乙种师）。但实际只完成大约1/4的规模。

到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时为止，在中央军编制内实际已编练好37个师（其中17个甲种师、19个乙种师、1个骑兵师）、5个独立旅、1个骑兵旅和1个炮兵旅。另外广西的粤军整编为10个乙种师和2个独立旅，广西的桂军整编为7个乙种师和近20个民团，湖南的湘军整编为7个乙种师和另外6个旧式六团制师，川军有23个师（含6个乙种师）和10个独立旅，云南的滇军有6个步兵旅、4个补充团和18个独立营。华北方面，老西北军系统的余部还剩下16个师（其中1个甲种师、5个乙种师、2个骑兵师）和11个独立旅，东北军剩余10个乙种师，晋绥军则有11个师和12个独立旅。规模上相较北伐时期已有相当缩减。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后，在陕北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第18集团军），下辖3个两旅四团制的乙种师；在南方8省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编第4军，编制上未做更新。

整军练兵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是中国军事工业基础的薄弱。若以步枪、轻机枪和子弹的产量而言，兵工署直辖各厂的年产量即可与日本相当，然而规格极不统一，火炮、汽车、飞机等技术兵器的产量更是微乎其微。为解决此问题，国民政府自1928年起即聘请“一战”德军将领充当军事顾问，为中国规划国防方案。1934年，中德两国代表在庐山签署

了著名的《合步楼协议》，中国通过德商合步楼公司（HAPRO，“工业产品商贸公司”的德语字头缩写），用钨、锑、锰等战略物资向德国换取工业产品和军火。德国政府和国防部将各向中国提供1亿马克的无限期周转贷款，在湖南、湖北和江西筹建冶金、燃料、机械、电气、化工等17个重工业厂矿，兵工署理化研究所甚至还计划在法本化学公司的协助下于南京郊外修建一个芥子气工厂。

进入30年代中期，德国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中国也成为德国军火的大买主。1936年，德国向中国出口的武器装备占其武器出口总额的28.8%，长期依赖轻武器的中国军队也迎来了第一批现代化榴弹炮、轻型坦克、鱼雷快艇、标准化的重机枪、中型轰炸机、规格统一的钢盔和通信器材等一系列作战物资。尽管原定的装备40个德式装甲师种的计划到抗战爆发时为止仅进行了1/10左右，但在淞沪会战中依旧发挥了重大作用。尤其有价值的是，最后一任德籍军事总顾问冯·法肯豪森中将（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在1935年8月曾经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对未来对日作战中的防御方略做了规划。其中明确提出：华北地位至关重要，最初的抵抗线应尽可能向北推进，以黄河为凭靠，力争延缓日军南下的时间；由于海岸线较长而防御薄弱，东南沿海地区的失陷只是时间问题。为长期抵抗起见，中国军队应利用好华中内线位置，做长期抗战的准备，同时在西南经营新的工业基地和对外交通线。日后这些建议在实战中皆有应验。

与整军同样棘手的任务是整合中央政府所能控制的财政资源。1928年之前，北洋政府甚至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央行，继承大清银行办公地和资产的中国银行，其中官股仅占不到1.5%。向来为北京政府倚重的交通银行，其中官股占比也仅有5%。尽管早在1914年就确定了将银元作为本币，但民间依然通用银两，混乱不堪。1928年国民政府在上海成立新的中央银行并以行政手段入股中国、交通两行之后，即着手准备废两改元、回收白银、发行统一的纸质货币。至1935年11月，法币改革终于启动，至全面抗战爆发前共发行14亿元，其中约4亿元系

在华北发行，阻止了贵金属流入日本势力范围。加上1933年从美国获得的5000万美元棉麦贷款和向英国出售白银所得的收入，中国政府在1937年积攒起了价值3.8万亿美元的金银和外汇。上海沦陷前，库存银洋和纸钞绝大多数被成功转移到香港和内地，成为到1938年底为止的军费基础。

从1931到1937年，尽管中国缺乏重工业基础、钢铁产量低迷的固有困境未能获得根本性扭转，但在南京政府有意识的规划和经营下，全国铁路里程由7876公里增加到1.1419万公里（不含外商直营及东北），公路里程由1928年时的2.91万公里增加到10.81万公里，发电量年均增长9.4%，煤炭产量增长7%，年均工业增长率接近8%（不含东北）。对日作战，终于有了最起码的经济和财政条件。

统一战线的兴起

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参与对日抗战的主要行动，可以追溯至“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连续发表两次宣言，谴责日本强占东三省的暴行，并决定采取军事、政治两手回应。在军事上，由中共满洲省委派遣干部、学生到日军占领区后方组织游击队，利用东北全境抗日义勇军普遍兴起的时机，对关东军及其附庸势力实施直接打击。在政治上，广泛发动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以罢工和游行示威等方式，间接打击敌人的经济和舆论力量。

军事斗争开始之初，由于满洲省委采取了过于激进的路线，在城市罢工、游行中过早暴露了力量，同时呆板地要求一面从事游击战、一面进行土地革命，在力量明显占优的日伪当局的破坏下发展极为艰难。有鉴于此，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向满洲党组织发出了著名的《一·二六指示信》，提出超越阶级视角，“尽可能地造就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力量，共同地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自那以后，东北的红军和游击队开始改组扩编为规模更大的东北人民革命军，总数近万人。

1935年6月3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出《六三指示信》，



1935年出任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总顾问的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中将

（源自中国档案馆）



1936年12月，中央军第13军奉命北上绥远省，支援晋绥军反击伪蒙古军进犯的行动。图为第13军军长汤恩伯（中）在前线

更具体地提出：在对日抗战中，需要实行全民反日统一战线，构筑不分党派、阶级、民族的一致抗敌力量。在这一指示引导下，1936年2月，东北人民革命军通过吸收义勇军余部、会党武装和地方团练，改编为新的东北抗日联军，至1937年共编成11个军，总数近3万人，其中约1/3是统战性质的非党抗日武装。从1936年春到1938年冬，抗联在全东北70多个县发起游击战和交通战，牵制了日伪军队数万兵力，与关内的全面抗战形成了呼应。至1940年冬，由于日军的连续进剿和强制合并居民点破坏了抗日武装活动的基础，抗联余部退入苏联境内，后改编为苏联远东方面军独立步兵第88旅。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后，该旅参与了对东北的反攻。

在东北境内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尝试，为团结和争取南京国民政府，实现国共再次合作、一致对外做出了预演。1935年10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法国创办的《救国报》刊登了两个月前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言明确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

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11月28日，抵达陕北的中共中央以朱德和毛泽东的名义发表《抗日救国宣言》，并在随后的瓦窑堡会议上再次确立了以成立“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现阶段的主要任务。

1936年1月4日，在《救国报》正式刊出题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有可能吗？》的社论之后不久，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进行了初步接触。紧接着，宋子文、陈立夫等国民党要员也通过信使与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建立了直接联系。尽管其间的几轮谈判未能达成实质性协议，但双方在允许中共合法存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等问题上达成了最低限度的共识。1936年9月，党中央下达《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提出当前建立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从一年前的“反蒋”到“逼蒋”，已经为最终的“联蒋”指明了方向。而国共两党间的秘密谈判，一直持续

到“西安事变”前的1936年11月。

影响力更大的则是在国统区城市，尤其是日军威胁下的华北开战的救亡宣传运动。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市委的组织下，北平学联发动数千名大中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国民政府的对日绥靖政策，要求停止内战、立刻准备对外的自卫战争。12月14日，游行再度举行，并逐步扩展到全国20多个大中城市。毛泽东后来评价称：“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是‘五四运动’以来最伟大的群众运动”。

“牺牲已到最后关头”

1936年夏秋之交，已经历“二二六兵变”冲击的日本政府开始做以“柔性”手段解决华北问题的最后一轮尝试。当年8月，广田弘毅内阁开出了解决华北“悬案”的终极条件：中日两国间签署军事同盟条约；冀察政务委员会聘用日本人作为最高政治顾问和军事顾问，允许日方不经南京政府批准开设通往华北的民航线路。蒋介石的回应是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声明：“任何国家要来侵害我们的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否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当年11月，日军唆使蒙古王公德穆楚克栋鲁普和热河地方军人李守信麾下的伪蒙古军进犯绥远省，遭晋绥军傅作义部击退。这是“卢沟桥事变”前最后一次没有日本正规军参与的边界袭扰。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以“兵谏”方式要求蒋介石尽快停止“剿共”、联合全国各界一致抗日。12月25日，在同意张、杨以及参与调停的中共提出的主要要求之后，蒋介石获得释放。这场事变的和平解决，也为开启国共第二次合作铺平了道路。蒋介石获释的当晚，被关押在江苏省第一模范监狱的前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听到了响亮的鞭炮声和欢呼声，他后来告诉秘书郑超麟：至少在团结全国抗日这件事上，蒋并非“独夫民贼”，而是有他的“群众基础”。中国全面对日抗战的政治和民意基础，至此已经彻底形成。

而策动“华北自治”未果的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也在做重新转向直接军事入侵的准备。4月16日，林銑十郎内阁四相会议通过《第三次华北处



1937年7月，北平广安门外一处被日军炮火击毁的民宅





(视觉中国供图)

1937年9月，美国记者在陕西云阳拍摄到的等待改编为八路军的红一方面军一军团战士。他们头戴缴获的日式军帽，手持太原兵工厂仿制的汤普森M1921型冲锋枪

理要纲》，决意不再寻求与国民党当局建立“防共军事同盟”，而要加快推进华北五省彻底脱离中国。“中国驻屯军”的增兵步骤，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打响“卢沟桥事件”第一枪的“中国驻屯军”步兵第1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后来承认，他在1937年春天就已经制订好了奇袭卢沟桥、宛平城和南苑的计划，并且颇感自豪。7月7日在龙王庙附近“演习”的日军，在出发前每人携带了160发实弹。在那名因解手而掉队的士兵志村菊次郎“失踪”后，日军并未就地展开搜寻，而是立即驰往平汉铁路卢沟桥车站和附近的制高点一文字山（可用作炮兵阵地），控制了这两处交通要隘、设置好火力点，随后才装腔作势地到宛平城附近“寻人”。而在实弹“演习”开始之前，日军已经直接或间接控制了北平城以北、以东和东南方向的交通要道，只余卢沟铁桥所在的平汉线。速战速决控制平汉铁路起点的行动，只差一步即可完成。

而中方的全面抗战计划，此时也已经大体成型。1936年6月，蒋介石告诉财政部聘请的英国专家弗雷德里克·李兹-罗斯，一旦战争无法避免，他决心以空间换取时间，在第一阶段遭遇战结束后逐步

向内陆撤退，依托西南省份做长期抵抗，以待英美盟国的支援。同年10月，国民政府高层在洛阳会议上确定了节节抵抗、进行持久抗战的方针。蒋介石宣称：“我们要以逸待劳，以拙制巧，以坚毅持久的抗战来消耗敌人的力量。”1937年3月20日，他又以大本营大元帅的名义发布《国军作战指导计划》，规定：“国军部队之运用，以达成持久战为作战之基本主旨。各战区应本此主旨，酌定攻守计划，以完成其任务。”

一个是蓄谋已久，一个是最终奋起；一个旨在毕其功于一役，一个做好了苦撑待变的准备。从“九一八”到“七七”的将近6年间，中国政府曾经尝试了一切以非军事手段化解冲突的方式，最终无一奏效。“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然而日本军人和政客永无止境的贪欲，最终将中国这个东方大国逼到了最后关头。那些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决心用血肉筑起新的万里长城。

这场“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的全民族反侵略战争，至此终于到来。■

喧嚣时代 给灵魂一个栖息之地

阅读之美



生活周刊

每周一出版 全年52期 多样便捷的订阅方式
邮发代号:82-20 拨打11185上门收订
零售单价:15元 零售年价:780元 订阅单价:10元 订阅年价:520元,全年净省260元
读者服务电话:010-84050425/84050451 读者服务邮箱:dzfw@lifeweek.com.cn

绘画 阿梗



【图文】李菁

原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金冲及

金冲及：卢沟桥事变——全民族抗战的起点

文 / 李菁

原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金冲及，主持编写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传，是公认的“官史”第一人。虽然已经退休，但每周金老仍会抽出一天来到前毛家湾1号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办公。对于出生于1930年的金老来说，抗日战争不仅是一个历史名词和学术概念，更是他亲身经历的岁月，是民族陷于危亡、国家遭受践踏的切肤之痛。一直笑意盈盈的金老在提到“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后，青年学生们一起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时，老人家更是红了眼圈。

小细节与大历史

三联生活周刊：“卢沟桥事变”距今已80周年，我们都知道，引发事变的导火索是一个日本士兵的“失踪”。回到当年的现场，还有一些历史细节，比如第一枪由谁打的等问题，一直是史学界未能确定的。目前对于这些问题，学界有哪些新的研究成果？

金冲及：关于“卢沟桥事变”的经过，大家都知道：当时日本的所谓中国驻防军队已经强行驻扎在离卢沟桥十分近的丰台镇，1937年7月7日夜他们在卢沟桥附近举行实弹的军事演习时，突然说有一个士兵失踪，要进宛平县城搜查。宛平这个县城很特别，东西是640米，南北320米，是一个长

方形结构。城里面没有什么街道、民宅和商店，实际上是一个军营，是扼守北京当时仅存的唯一对外通道的战略要地。当时已经是晚上11时左右，正下着大雨，人们一般都睡了。日军毫无根据地提出进城搜查的要求理所当然地被中方拒绝，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军事冲突。

这个“失踪”的日本士兵很快就自己回来了，不过是自己去解手，但日军仍坚持要进城。因为日军本来在进行军事演习，常有一阵阵枪声传来，天又漆黑，混乱中，谁打第一枪，有各种不同的说法，确实不容易分清楚。日方过去也有讲是日军先开的枪，后来有些人又一口咬定是中国军队先打的，还说是中国共产党指挥的。

有一年，我到日本去参加一次讨论中日战争的学术讨论会。日本一位很有影响、曾写过一部《日中战争史》的秦郁彦教授，在会上说不但是中国人打了枪才引起战争，还说是刘少奇亲自指挥的。我当时回答说：谁打第一枪，在当时枪声不断的情况下，谁也很难查得准确，至于说刘少奇在指挥，那就成了笑话了，刘少奇在1937年4月离开华北到陕北，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五六月份都在开会。7月份从延安回来，走到山西交通就不通了，无法前进。刘少奇怎么能指挥呢？休息时，他来同我寒暄，给了我一张名片，也没再反驳我。历史，本来是不能为了某种需要而任意编造的。

历史的细节重要不重要？关键性的细节当然十分重要。冲突发生时，已近半夜11时，天又下着大雨，人们一般都已睡了，更不知道那个日本士兵“失踪”的事，日军却强要武装进城搜查，从以往事实来看，日军常在这类借口下乘势抢占中国的要地，扬言不答应它就要强行攻城，把中国的领土和主权置若无物。这样蛮横跋扈的态度，是每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人能够忍受的吗？对这些关键性的细节，日本一些右翼分子视若无睹，却专门要在这个在一片混乱中众说纷纭、不容易查清的问题上大做文章，目的无非是要把人们的眼光从关键问题上引开，去争论那些不重要的具体问题上，牵着你的鼻子从要害处移开。

其实，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战争，从来不需要理由，更不在乎谁打第一枪。看一看历史就会明白：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大的战争，包括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中日全面战争、太平洋战争等等，无一例外的都是不宣而战，这在世界历史

上是罕见的。突击旅顺口、偷袭珍珠港，都不是俄罗斯或美国先开了第一枪才发动战争的。他如果要打，没有理由也很容易制造一个出来。例如“九一八事变”是关东军在柳条湖炸了一段铁轨，硬说是中国军队发动的，并不是因为驻在北大营的东北军开了“第一枪”而引起来的。事实真相，只要多读历史就会明白。

进一步说，“卢沟桥事变”的发生并不是孤立的事件。它是日本军国主义者进一步加紧侵略中国，特别是要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变成所谓“日中满亲善”的“自治之本”的必然步骤。

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前，华北早已形成一派人人都能感觉到“黑云压城城欲摧”的肃杀气象。令人难忘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悲壮歌声，就是这时候唱出来的。

我们再来看一点历史细节。日本当时驻扎在北平附近的军队——“中国驻屯军”，最初不多，不到2000人，到1936年便突然增加了4000人，达到近6000人。也是在1936年他们占领了丰台，丰台离前门西南只有30公里，更重要的，它是平汉、平绥、北宁三条铁路连接处。这一来，北平对外的唯一通道只有卢沟桥。一旦卢沟桥再被占领，北平便变成孤品。日军驻扎丰台后，便不断举行军事演习。起初大概个把月、半个月一次，以后就三天两天演习；本来是白天演习，后来晚上也演习；起初是空弹演习，后来变成实弹演习。这种状况，几乎是不停息地进行着。

当时很有影响的杂志——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上面登了一位从南方到北京读书的学生写的信。信里说：“敌人的飞机尽在我们头上掠过，所谓野外演习的炮声震得教室的玻璃窗发抖，机关枪不断地响着在打靶。这一颗颗的子弹，好像每颗都打在我们心上一样的难过。先生，我们能念书吗？”当时的情形，就像“一二·九”运动时蒋南翔为学联起草的宣言中所说的那句名言：“华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

考虑到那个时代背景，考虑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整个部署，那场战争是非打起来不可的，剩下的只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罢了。

三联生活周刊：“卢沟桥事变”当天，当时握有部队重要指挥权的旅团长河边正三，正赶往山海关附近，督导驻屯军与关东军的协同演习，所以一些日本历史学家认为“卢沟桥事变”本身并不是精



(宝头提供/FOIE供图)

心策划的，他们一直强调“偶然性”，声称是一个偶然接着一个偶然，导致事件不断升级和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你怎么看待这个观点？

金冲及：对世间大事，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是只会孤立地看到一件一件具体事情的堆积，就事论事地研究和处理问题，这种思想方法往往是浅薄的、短视的，不能看清事情的根本。另一种要养成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和分析它，整个历史就像奔流不息的大河，中间有起伏，但总体上是一环紧扣着一环地奔流下来的。就像长江、黄河，发源自青海，有时向北，有时向南，最终都向东流入大海，这个趋势是不改变的。现在反观那段历史，中间虽然有曲曲折折，但总的来说，侵华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既定的国策，当然它不是一下子能实现的，需要有阶段性，这样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

在法西斯国家中，日本有它的特点，它的军国主义有历史的原因。明治维新的口号里“尊王攘夷”，天皇有着很强的权威性，他又有很大的封建性保留下来。明治维新，也有两个方面。对日本来说，实现了维新、推动日本走向现代化，的确起了积极作用；但是明治维新从一开始就野心勃勃。明治元年，天皇的诏书里面有两句话，要“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这不光是天皇一个人的想法，他的一些主要大臣，比如大久保利通，都持这样的想法，要“扬皇威于海外”。

日本统治集团，一方面希望日本振兴，另一方面，又要征服东亚以征服世界。日本一个特别的传统是武士道，明治维新骨干主要是中层武士甚至包括教育家，如福泽谕吉，都是武士出身，他们又是那个时代文化知识最高的阶层。所以日本的武士道



(视觉中国供图)

左图：1889年，北洋水师“致远”舰管带邓世昌（叉手者）与英籍总督察琅威理和舰上官兵合影。甲午战争爆发后，邓世昌在黄海海战中壮烈殉国

右图：1932年1月，进占黑龙江省的日军士兵聚集在齐齐哈尔火车站附近

精神是根深蒂固的。它的军国主义能发展到那么一个地步，与此有关。他们认为要“扬皇威于海外”，必须靠武力，以此主导一切。曾在日本受过5年军事教育、民国时期曾统治山西38年的军阀阎锡山也曾学着写道：“昔以简单之军事立国者，今当以包罗万象之军国主义立国”，“苟欲生存竞争于世界，舍此主义，绝不能也”。日本要称霸东亚甚至称雄世界，野心很大，但它是一个后起的强国，实力有限。所以从明治维新到后来一步步对外侵略扩张，很明显地有几个阶段。

从甲午到“七七”

三联生活周刊：日本明治维新崛起后，与中国冲突不断，后来是如何一步步升级为国与国之间的

全面战争？

金冲及：近代中日关系有三个里程碑式的事件：甲午战争、“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每次都跨进一大步。甲午战争起因是朝鲜，日本要“扬威海外”第一个目标是朝鲜，所以明治维新一开始就是“征韩论”，西乡隆盛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朝鲜。那个时候朝鲜同中国关系密切，东学道起义以后中国应它的要求派兵，日本要征韩就得和中国打一仗。

老实讲，日本人和中国打的第一仗，是不是真的那么有把握，很难讲的。甲午战争主要是海战，当时中国有两艘主力舰——“定远号”和“镇远号”，日本没有。他们的军舰小，但灵活，并且日本军队的训练很严格。更重要的是，日本是下了狠心的。而中国，李鸿章是尽量地想要避战。这就决定了战争的命运。



(俄图庆/Force供图)

“九一八事变”后，爱国学生在街头游行，高呼“打倒日寇”口号



(文化传报/FOTOE供图)

1931年9月19日，“九一八事变”次日，日本关东军电请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出兵增援。图为日军第20师团混成第39旅团官兵在中朝边境的新义州车站登车

甲午战争对中国近代的历程，影响实在太大了。中日签订的《马关条约》，赔款“两万万两白银”，后来收回辽东半岛是3000万两白银，加起来是2.3亿两白银。这是什么概念呢？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是8000万两，也就是说，它赔掉的是清政府3年的全部财政收入。赔款这么大，清政府日子怎么活下去？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借款，向英德、向法俄借款，三次大借款，借款的结果是一切就都得听

你的，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强。另外一个就是苛捐杂税激增，老百姓日子过不下去嘛。这是辛亥革命发生的重要社会基础。

那日本拿了这笔钱，干什么呢？85%用在军费。大的国防，像钢铁厂、兵工厂用的都是这笔钱。《马关条约》还有许多其他重要内容，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日本原来没有想到的，这又更加刺激了它的战争野心。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甲午战争对后来中日两国关系的走向影响深远？

金冲及：在我看来，中国人民民族危亡意识的空前觉醒，就是从甲午战争时期开始的。我们今天说，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变成一个半殖民半封建社会，这是今天人们的看法。当时人并没有这样看。鸦片战争失败后，那时最先进的人，如《海国图志》的作者魏源，认为也没有什么了不得，当年新疆准噶尔叛乱，一度几乎控制半个中国，最后还不是都被平定了吗？这次我们打了败仗，只要吸取几条教训，做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等几条，就可以改变局面。所以他没有觉得中国已经衰败了。

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对中国人的刺激该是够大了，但朝廷也好、士大夫们也好，看更重的是太平天国运动。战后英法支持清政府把太平天国镇压下去，他们感觉到已得到足够的补偿，因为太平天国运动对他们才是心腹之患。当时的流行说法却是“同治中兴”。

所以“洋务运动”时讲的是求富、自强，没有讲“救亡”。一直到甲午战争前夜。郑观应该说是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出过洋，懂得外部世界，写了一本《盛世危言》——他感觉到应该讲几句危言耸听的话，所以叫“危言”，但是我不敢说“衰世”，还要叫“盛世危言”，否则压力太大了。可见一直到甲午战争前，中国人还认为中华并未面对灭亡的危机。

甲午战争是转折点。吴玉章回忆录里讲，他们知道《马关条约》后说，这实在是一个可耻的条约，以前我们是败给西方的大国，这次败给了东方的一个小国，而且失败得那么惨，条件定得那么苛。他和二哥听到消息后痛哭，那种痛苦的心情不是言语所能表达的。

1907年上海一个报纸的社论也说：现在我们应当直截了当地讲“救亡”，不要再讲“自强”这种门面话了。甲午战争对中国的震动不会比“九一八”小。

三联生活周刊：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对华战争又是怎么一步步发展的？

金冲及：老实说，日本当年是在未必有把握的状况下打这场仗的，成功了，以后的胃口就更大。此后，他们的眼光就放到中国的“满蒙”，也就是东三省加现在的内蒙古——至于外蒙，它当时还不敢跟俄罗斯打一仗。如此看来，“九一八”是必然的。

日本采取行动，也同1929年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有关。日本当时对外出口占第一位的是丝织品，主要向美国销售。美国经济大衰退，导致日本大量丝织厂倒闭，失业人口剧增，他们就把眼光放到中国东北。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个日本电视连续剧叫《阿信》，里面的龙三公子找不到工作，决定到中国的东北去，说“这是我们唯一的生命线”。

“九一八事变”总不存在谁打第一枪的问题吧。当时他们自己把铁路挖一段，利用这个借口就攻打北大营。9月18日晚上打的，第二天一早关东军就把沈阳打下来。接着，辽宁、吉林——除锦州稍晚一步外其他都拿下来了。北满要动手得晚一点，因为日本对苏俄还有点顾忌。

拿下东北后，一段时间里日本主要想解决的问题仍是满蒙。1932年成立“满洲国”，1933年进攻热河，也就是今天承德以北的内蒙古地区。守在热河的汤玉麟有20万军队，日本军队进攻的先头部队只有一二百人，没有打，就把承德占了。随后向今天内蒙古的察北和绥东推进，到百灵庙了。它是有步骤的。

也有人问，长城会战、进逼北平是怎么回事？在日本军部的部署，要牢固地控制满蒙，必须要把长城拿在手里。长城会战中，仗打得最狠的是古北口和喜峰口。日军把古北口、喜峰口占领后，面前就是无险可守的一抹平原，下一步自然就是北平、天津。

热河的迅速溃败，受到国内各方舆论谴责，蒋介石逼张学良下野，要他负起全部责任。当时国民政府派到北平的是黄郛和何应钦。他们已经准备放弃北平，认为守不住，蒋介石和行政院长汪精卫都批准了。结果日本人要黄郛去谈了一夜，最后签订《塘沽协定》，日本又顺势捞一把。《塘沽协定》的签订，放弃了长城防线，等于在事实上承认了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热河的既成事实。

为什么日军不趁这个机会，把北平和天津拿下来呢？日本的野心是很大的，但实力毕竟有限，没

有把握一口都吃下来，所以只得分阶段来做。在1933年时，世界法西斯阵线还没有正式形成——希特勒1933年1月才当上总理，还没有站稳脚跟；日军占领了东北，还没完全控制住；另外日本还多少顾忌英、法、美的不满和干预。所以，重点还在满蒙，根本没有想一口就把北平、天津一次都拿下，也没有这个力量。这是第二个阶段。

三联生活周刊：从《塘沽协定》的签订到“卢沟桥事变”的爆发还有两年时间，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金冲及：第三个阶段，实际上到1935年8月，日本陆军省抛出一个《关于对北支政策》，首先要控制东北，锣鼓就越敲越紧了。

为什么日军拿了东北、拿了满蒙，还要拿华北呢？一个原因是日本这个国家，资源十分缺乏。虽然他们占了东北，但像煤矿、铁矿、棉花和盐都缺乏，所谓二黑（煤、铁）二白（棉花和盐）。华北这一带，有山西的煤矿、河北的铁矿、山东到河南的棉花，山东盐碱地多，河北有长芦的盐。当然，还有政治、军事、外交、交通等方面的利益。所以就策动华北五省的“自治运动”，要使华北脱离中国，日本文件里说要建立“中、日、满（洲国）友好的自治区”。

实际上就是这样的：日本一步一步地，从控制朝鲜、满蒙、华北再到整个中国，称霸东亚。到策动“华北自治”时已经下定了决心要控制整个华北。不是说因为“卢沟桥事变”引起大战，而是日本军国主义者野心计划的必然步骤。看历史，要看到整个一环扣一环的不停运动的大脉络，又要看到中间有明显的阶段性，离开这个只看一件件个别孤立的事件，讲客气一点是肤浅，讲重一点是无知。

三联生活周刊：也就是说日本到了控制华北之后，“七七事变”是必然结果，占领华北之后下一步就是全中国了。

金冲及：是这样的。但开始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完全料到事件发展的结果。他们有个说法，叫“对

看历史，要看到整个一环扣一环的不停运动的大脉络，又要看到中间有明显的阶段性，离开这个只看一件件个别孤立的事件，讲客气一点是肤浅，讲重一点是无知。

华一击论”。有一种讲法：我们刀一拔出来、威胁一下，中国人就会屈服了。从以往的历史来看，中国的统治者确实表现不佳，甲午战争、“九一八事变”、热河的陷落，都是如此。所以日本的陆军大臣杉山元对天皇说，如果一次派出大量军队，“事变大约用一个月时间可以解决”。但是中国军队在华北的激烈抵抗，他们的确也没有料到，结果就越陷越深。

三联生活周刊：对蒋介石来说，他的底线是什么？从“九一八”到长城会战，他之前一直认为中日之间差距太大，要大家忍，包括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如胡适也充满悲观态度。为什么到了“七七事变”，大家的认识比较一致？

金冲及：蒋介石本来一步一步地退让，但到后来也把他逼到底线。7月17日蒋介石庐山讲话，最有名的就是那句“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有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的话。他中间有几句话，很值得注意。他说：“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古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和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也就是说，蒋介石意识到，再继续忍让下去，下一步就要亡国了，所以蒋介石到后来下定决心抗战，这是值得肯定的。

“七七”与全民抗战

三联生活周刊：以“七七事变”作为全民族抗战的起点，何时成为史学界的共识？

金冲及：“八年抗战”根本不是史学界的人讲出来的。抗战胜利那一年，我是高中学生，举国上下，包括所有报纸和老百姓，一讲起来都是“抗战八年，中国终于胜利了”，没有别的说法。这和史学界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70多年来，这个观念在我头脑里

可能是根深蒂固。至于“十四年抗战”的提法，我是最近两三年才听到的。我不反对说中国对日本侵略者的局部性军事斗争在“九一八事变”后就开始了，但我想“八年抗战”的提法无法因此取消。因为这八年的全民族抗战，无论革命的任务、联合的群众、打击的目标与它以前和以后都有不同。毛泽东在《如何研究党的历史》中说得很清楚。从个人来说，个人的生活和周围的一切同它以前和以后相比也有极大的不同。这样说，可能比较慎重。

三联生活周刊：近年来，我们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地位认识也越来越清晰，胡锦涛的讲话就国民党正面战场地位也做出了历史性的论断。这一认识过程是怎样的？

金冲及：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贡献，以前也没有全部抹去。北京不早就有张自忠路、赵登禹路、佟麟阁路？他们不都是国民党将领吗？国民党将领中确实有很多人爱国，外敌当前时，他们为了民族的利益奋斗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那个时候印象特别深的是看孙克刚写的《缅甸荡寇志》，讲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英勇抗战事迹，很受感动，至今不忘。我在《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中写到了那么几句：“只有把国民党为主体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为主体的敌后战场合在一起，才能再现当年全民族抗战的一幅壮丽图画。”

三联生活周刊：专门研究国民党作战史的人，自发地研究了当年很多的将领和战士，你怎么评价他们的研究成果？

金冲及：我在1949年以前已经做了两年大学生，那时候的报纸、杂志，都是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台湾出版的民国史方面的书和资料，我大概有好几百册，在大陆算是看得多的。但我在那个时代有个有利条件：可以做些自己的比较和区别。我在《二十世纪中国史纲》里面对张自忠一直到临死时候的状况，还有入缅远征军的战况，对台儿庄会战，不光引用大陆人的回忆，也用了不少台湾方面的回忆，我觉得这些都可以说，但看到有些人走到另一头去了，花园口决口，河南、安徽、江苏三省死亡数十万人，财产损失更无法计算，要美化、称赞，我就觉得太说不过去了。

还有一点，不同时候、不同地方，情况也有不同，拿正面战场上国民党的军队来说，前期包括“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徐州战役、武汉战役，总的说打得不错。到后来，除了缅甸战场，胡绳的一句

“只有把国民党为主体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为主体的敌后战场合在一起，才能再现当年全民族抗战的一幅壮丽图画。”

评论我觉得很恰当。他说国民党军队基本上都是防守，你进攻来了，我要挡；你撤退了，我也就不动了。到后来豫湘桂大溃退就不像话了。另外，前期各支国民党军队的表现也各种各样，不能一概而论，国民党军队里面也有许多爱国、痛恨日本人的，这也是事实，但抓壮丁、苛捐杂税、一些部队的腐败，这也是事实。不能骂他时说他一件好事也没做过，要说他好，又不能说他一句坏话。有些人就是走到另一头去了。他们说的，我作为当事人就觉得不是那么回事。

三联生活周刊：你如何评价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

金冲及：共产党八路军成立的时候只有四五万人，在那样复杂艰险的环境中能够发展壮大到100多万人，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有的人说共产党“游而不击”，如果真那样，老百姓会跟你走吗？你能发展吗？老百姓为什么支持共产党？只有不断打击日本侵略者，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而且能够打胜仗，老百姓才会支持你。

另外，民族与民生这两个革命是分不开的。白修德在《中国暴风雨》里说了一段话，我觉得很对：中国的农民整个一生都被人看不起，受人家欺凌。

他的父亲把祖祖辈辈的痛苦感情转移给他，忽然有人把他们当一个人看待，征求他们的意见，要他们投票选举地方政府，给地方权力，叫他们来确定要不要减税减租，问他们用什么方法来抗日。他们怎么会不相信共产党呢？

抗战到了后期，国民党在敌后实在没有多大作用。现在来看，投降日本当伪军的都是国民党的军队，包括有的集团总司令，共产党连一个团投降日本的都没有，有的话国民党早就大大宣传了。所以我说国民党的功劳也不用夸大，总得实事求是。当时是怎么样就怎么样。

三联生活周刊：你觉得未来抗战历史的研究上，如何处理好发掘史实和完善史观的关系？

金冲及：我觉得这两点其实分不开，正确的史观应该在掌握充分的详细的史料基础上形成。你史料没有掌控多少，就在那里苦思冥想，形成不了什么真正有价值的见解。这些年，我们对抗日战争史研究取得的成果是十分突出的。需注意避免的，一种是大而空，一种是小而碎。小而碎，有些还是有用的，但要优先选择小而是重要的，以及可以从小见大的，那就更好。■

（感谢实习记者曹祯、陈雅芳的帮助）

最想念的
年货

年货、年味就是乡愁，就是亲情，而亲情永远不过时。

新的一年、新的一个春节即将来临的时候，《三联生活周刊》推出一个充满乡情、亲情，充满年味的文化产品

——《最想念的年货》

生活
LIFE

1554 1005-3403

ISSN 1005-3403

三联生活周刊



“七七事变”前华北中日驻军

文 / 胡博

1937年7月7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借口在演习时有一名士兵失踪，在卢沟桥附近挑起军事冲突，抗日战争自此全面爆发。长久以来，有关“七七事变”的著作大多着墨于两军冲突发展的经过，但对当时驻防华北尤其是平津地区的中日两国军队的具体实力却鲜有交代清楚者。

1937年初夏之际，中日华北驻军的实力究竟如

何？日军为何敢于挑起事变，进而发起全面侵华战争？这一系列问题的答案，需要回溯到华北中日军队的演变历史，及其在上世纪30年代初的扩充过程。

“29路军”还是“29军”

在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部分著作中，对“卢沟

桥事变”涉及的当地中国驻军的番号，经常有介绍为“第29路军”者，但在另一些著作中则称其为“第29军”。那么，究竟是“第29路军”还是“第29军”呢？

主张“第29路军”者认为：当时该部拥兵10万余众，如果仅是一个军，最多不过两三万人，怎么可能超出数倍？而当时的“路军”，是比军高一级的指挥机构，通常会下辖两个军或一个军外加数个师，这样的单位拥兵10万就合乎情理了。因此，该部队的番号应该是“第29路军”。

主张“第29军”者倒也干脆，直接拿出日后出版的该部队军史和国民政府令、军政部令的档案记载予以反驳。在这些档案中清楚地记载着：这支驻军的番号为“第29军”，于1931年6月17日由军政部正式颁发，并于同时任命宋哲元为该军军长。

既有原始档案作为依据，那自然应以后者之说为准。可奇怪的是，一个最多应该不过下辖两三万人的军，怎么可能会拥兵10万呢？这明显不符常理。其实究其原因，主要还是与该军的派系以及所处环境、地位等因素有关。这一切，得从1930年的中原大战结束时说起。

第29军的前身为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军一部。当蒋介石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时，反蒋一派的冯玉祥、阎锡山等被迫宣布下野，他们位于华北地区的部队大部分由入关助蒋的张学良所部东北军收编。在这些部队中，由孙良诚指挥的原西北军第2路军和由宋哲元指挥的第4路军合计5万余人先后向张学良输诚。张学良考虑到孙良诚为冯玉祥嫡系，而宋哲元是中途加入的旁系，因此决定“用宋弃孙”，全权授予宋哲元担负缩编这两路部队的责任。

为个人和部属的前途着想，宋哲元对张学良当时提出将两路部队（共计12个师、35个团的番号）缩编为一军两师共8个团的方案表示反对。经过不断争取，当两路部队奉命于1931年1月16日缩编为东北边防军第3军时，宋哲元一方面采取拖延缩编时间的战术，另一方面打压旁系、保留自己的嫡系，使部队在得到张学良默许的情况下，改编为一军两师共17个团，总计保留人数为3.8771万人。

1931年6月17日，东北边防军第3军正式改番号为第29军，由宋哲元继续担任军长，并由国民政府军政部正式任命冯治安、张自忠为该军所属第37师和第38师师长。第29军成立时，驻防在晋南地区。在当时的情况下，该军薪饷有限（张学良只提供1.5万名官兵的薪饷），防区又被边缘化，因

此该军内部仍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若不是冯治安、张自忠以及部分旅、团长全力拥宋，恐怕不用一年就会分裂乃至瓦解。在宋哲元的勉力维持下，第29军苦撑到了1933年。在这一年，日军挑起“榆关事变”，长城抗战随即爆发。

为保卫华北，不使日军突破长城沿线，第29军奉命参战。在这次战役中，第29军先后在喜峰口、罗文峪苦战数月，其大刀队夜袭日军的报道更为全国所知。长城抗战结束后，第29军闻名全国，成为一支抗战名军。

扩军十万之路

正当长城抗战进行时，西北军系的开创者冯玉祥也试图东山再起。他招募旧部组建“察哈尔民众

左图：国民革命军第29军装备的75毫米野战炮

右图：1937年7月11日，日军近卫师团师团长香月清司受命接替身患严重心脏病的田代皖一郎，出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图为赶赴部队驻地上任的香月清司



（文化传播/FOTOF张图）



(视觉中国 供图)



左图：1937年7月中旬，第29军士兵在北平街头构筑防御工事

右图：1937年7月，日本中国驻屯军附属炮兵准备向中国军队发起攻击

抗日同盟军”，在察东地区沉重打击伪军，收复多处城镇，尤其是光复多伦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事件。蒋介石无法容忍冯玉祥以抗战为名重组军事武装，因此在中日两国谈判停战期间，调遣部队以军事围剿的手段试图消灭同盟军。

在此情形下，冯玉祥被迫于1933年8月5日通电全国，表示“完全收缩军事，政权归之政府，复土交之国人”，并请宋哲元前往张家口“善后”。冯玉祥认为，已经成为抗日名将的宋哲元毕竟是西北军故人，自己虽然在各方压力下无法继续维持同盟军，但如果由宋接收同盟军余部，仍能继续维持西北军系统的存在，为今后再次崛起做好准备。蒋介石在当时也确实属意于宋，便决定由宋出面收编。

宋哲元依靠第29军打出了西北军的威名，并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但毕竟在全国各路大小军阀中势单力孤，要想为自己求得更长远的发展和政治资本，固定的地盘和庞大的军事力量缺一不可。因此，对于冯玉祥的“托付”和蒋介石的命令，宋哲元乐

得坐享其成。就这样，在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的授权下，宋哲元一口气吞并了同盟军的大小828个团。

用原本的17个团吞下828个团，看上去有些像天方夜谭，但宋哲元确实做到了。

对于同盟军的828个团，宋哲元在收编时并不是全部保留，他是在精挑细选、逐次缩编的情况下收编这些部队的。宋哲元在取得察哈尔一省和河北省的部分地盘后，首先要满足第29军的需求，尤其是完成他心目中将该军扩编为4个师（第37师、第38师、第132师、暂编第2师）的计划，随后再以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的名义将同盟军未消化部分陆续缩编为省防军。经过为时一年的整编、改编和缩编，宋哲元将自己的嫡系部队扩编为26个团，将同盟军余部缩编为10个团。

1935年，华北局势日益紧张。“察东事件”和“张北事件”的爆发，加上《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的签订，使第29军得到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尤其是当位于平津地区的中央军根据条约南撤后，经北平军



(文化传播/FOTOFEST)供图

分会批准，第29军于1935年10月接防北平、天津两市以及河北省大部分地区。宋哲元本人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张自忠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秦德纯任北平市市长，萧振瀛任天津市市长。此时，宋哲元以第37师驻防北平，第38师驻防天津，第132师驻防保定，暂编第2师（后改称第143师）留守张家口。

在获得平、津、冀、察四地后，第29军的财政收入呈翻倍增长，这为兼任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兼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宋哲元继续扩军提供了坚实的财政基础。从1936年2月开始，宋哲元大量从欧洲进口武器装备，扩建修械所，自产武器弹药。部队的发展虽然受军政部的番号限制，但他仍在第29军的建制下陆续增编了8个独立旅，并以河北省政府的名义组建冀北、冀南保安队这两支准军事武装。

截至1936年12月，宋哲元麾下的第29军已经成为一支拥有4个师、23个旅的庞大部队，其中正规军达到8万人，省保安武装力量逾2万人，这还不包括为数众多的武装警察。如此庞大的队伍，仅以一个军的番号对外实属夸张，却也是国民政府应对华北复杂局势的无奈之举。

由于宋哲元出身西北军系统的背景、财政上的基本独立，

“七七事变”时华北中日军队战斗序列

（一）中国军队方面

国民革命军第29军 军长宋哲元 总兵力：约10万人
副军长秦德纯 佟凌阁
参谋长张樾亭

第37师 师长冯治安 兵力：约1.58万人
第109旅 旅长陈春荣
第110旅 旅长何基沣
第111旅 旅长刘自珍
独立第25旅 旅长张凌云

第38师 师长张自忠 兵力：约1.54万人
第112旅 旅长黄维纲
第113旅 旅长刘振三
第114旅 旅长董升堂
独立第26旅 旅长李九思
独立第39旅 旅长阮玄武

第132师 师长赵登禹 兵力：约1.5万人
第1旅 旅长刘景三
第2旅 旅长王长海
独立第27旅 旅长石振纲
独立第28旅 旅长柴建瑞

第143师 师长刘汝明 兵力：约1.51万人
第1旅 旅长李金田
第2旅 旅长李曾志
独立第29旅 旅长田温其
独立第20旅 旅长刘汝明（兼）

骑兵第9师 师长郑大章 兵力：约3000人
第1旅 旅长张德顺
第2旅 旅长李殿林

特务旅 旅长孙玉田 兵力：约4000人
独立第40旅 旅长夏子明 兵力：约3400人
骑兵第13旅 旅长姚景川 兵力：约1500人
冀北保安队 司令石友三 兵力：约2000人
冀南保安队 司令高树勋

（二）日军方面

中国驻屯军 司令官香月清司 总兵力：约2万人
参谋长桥本群

第20师团 师团长川岸文三郎
步兵第39旅团 旅团长高木义人
步兵第40旅团 旅团长山下奉文

独立混成第1旅团 旅团长酒井镐次
独立混成第11旅团 旅团长铃木重康

驻屯步兵旅团 旅团长河边正三
（文 / 刘怡）

牟田口廉也

(1888 ~ 1966)

牟田口系日本佐贺县人，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22期、陆军大学第29期，属于统制派军人中的后起之秀。作为统制派核心团体“一夕会”的成员，他长期任职于参谋本部和陆军省，擅长案牍工作而非作战。

“二二六”兵变之后，统制派控制日本陆军中枢。为博取更快的升职机会，成员逐步被派至一线部队担任指挥官。“七七事变”发生时，牟田口廉也正以大佐军衔担任“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1联队联队长（相当于团长）之职。7月8日凌晨4时，他指示属下一木清直大队长对中方谈判代表做出无理威胁，要求派兵进入宛平城搜查“失踪”士兵，并要求中国军队让出宛平城东门，为中方代表王冷斋严词拒绝。4时23分，牟田口以电话下令一木所部攻击中国守军，并命令部署在今沙岗村大枣园沙丘阵地的日军炮兵向宛平城开炮。就这样，这位并不以谋略见长却急于“建功立业”的统治派军人直接引发了长达8年的中国对日全面抗战。

继率部入侵华北之后，牟田口廉也又以第18师团师团长的身份参与了太平洋战争初期的马来半岛战役，逐渐成为东南亚日军重要的一线指挥官。1943年升任驻缅甸的第15军中将司令官之后，他夸口称“大东亚战争的第一枪是由我打响，如今也应当由我来结束这场战争”，强烈要求对英美盟军发动正面进攻。在1944年的英帕尔战役中，他不顾地理和补给困难，一味要求前进，结果部队陷入热带丛林之中，遭到英军痛击。此役日军出动9万余人，战死2.6万人，因病饿而死者竟也高达3万人，成为一时奇闻，以至于幸存者都咒骂他为“鬼畜牟田口”。牟田口随即被解职并转入预备役。日本战败后，他在东京开设“成吉思汗”料理店，继续为自己的无能辩解，宣称“我没有错，作战失败是因为部下无能”，直至1966年死于脑溢血。（文/李菁、刘怡）

下令攻击宛平城的日本中国驻屯军步兵第1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左二）



以及南京中央政权对该部的顾忌和利用，第29军在冀察平津地区形成了事实上的割据局面。加上宋哲元在军中不断地“去冯化”，外界对第29军渐渐产生了“宋家军”的说法。不过随着“七七事变”爆发，第29军的命运最终迎来了重大转变。

未动员的“中国驻屯军”

日本陆军辖下的“中国驻屯军”，堪称“历史悠久”。这是一支从1901年6月就存在于中国境内的军事武装，起初打出的名义是驱逐义和团、“保护日本侨民”。随着《辛丑条约》签订，列强在中国有了合法驻军权，日军的这支部队也获得了相应的名义，在1901年10月正式改称为“中国驻屯军”。

按照日本官方的说法，“中国驻屯军”的任务是“担任帝国大使馆、领事馆及帝国臣民的保护”，并不承担直接作战任务，因此其最初的兵力只有1650人。中华民国成立后，“驻屯军”兵力一度减少至734人，即便到1935年初，其基本单位也只是分驻在北平、天津的8个未经动员的“平时”步兵中队而已，总兵力为1771人。

以如此少的兵力面对数量逐渐膨胀至10万余人的第29军，理论上毫无胜算。为了巩固华北的既得侵略成果，也为了今后发起军事行动时不居于劣势，日军在扶持起冀东伪政权之后，也开始增强“驻屯军”的实力。

1935年12月，日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喜多诚一在前往天津视察时组织召开幕僚会议，在会上制订了一份“驻屯军”增兵方案。1936年4月17日，广田弘毅内阁正式下令加强“驻屯军”的兵力。一天后，“中国驻屯军”新编制方案正式出笼，下辖1个步兵旅团（该旅团辖2个步兵联队）、1个炮兵联队，以及战车队、骑兵队、工兵队、通信队、宪兵队各1个。根据颁布的新编制，“驻

屯军”总兵力激增至5774人。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的“驻屯军”仍然是“平时”状态下的非动员编制。

“中国驻屯军”经此扩编，总兵力增加了3倍以上。但这还没有结束：由于第29军也在1936年启动大规模扩军，尤其是增强了平津地区的兵力，日军参谋本部决定将“驻屯军”改为“战时”动员编制，使该部在1936年底的总兵力就突增至1.4万余人。截至“七七事变”爆发前的1937年6月，“中国驻屯军”总兵力已增加至近2万人，与中国军队的数量之比为1比5。考虑到日军在火力和指挥系统方面的优势，这样的数量对比已经基本可以抵御第29军的大部分军事进攻。值得注意的是，“中

国驻屯军”在平津地区驻防已达36年之久，对该地区的熟悉度远远超过以客军身份进驻的第29军，尤其是小巷、近道的细节几乎全数掌握，更增强了攻击力。

不仅如此，“中国驻屯军”虽然身处国外，但并非孤立无援。首先，“驻屯军”随时可以得到关东军从伪满洲国境内的南下增援，伪满军队亦可随时出动助战。其次，“驻屯军”可以用已经占据的沿海军港，从日本本土调兵增援。这样一来，表面上看起来势单力孤，实际上已经有恃无恐，随时可以发起一场先发制人的进攻。

就这样，1937年7月7日，战争终于爆发了。■

“卢沟桥事变”当日时间线

7.7

中午

日本“中国驻屯军”第1步兵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在中队长清水节郎的带领下，由丰台兵营开至龙王庙，声称将进行夜间演习。

下午

第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在市政府邀请胡适、梅贻琦、张怀九、傅斯年等20多位文化界人士开会，一方面报告局势之紧张，一方面听取文化界对时局的意见。

19:30

清水节郎下令部队开始夜间演习。部分军官和假想敌旋即到龙王庙东面的大瓦窑活动。天完全黑下来后，清水率600名官兵向假想敌所在的东方移动。

22:40

根据清水节郎的记录，“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一阵枪响”令他紧张起来。他马上下令集合，清点人数。这时他发现士兵志村菊次郎失踪，有人称看见这名士兵进了宛平县城。清水立即向大队长一木清直报告，一木清直又以电话将情况报告给了联队长牟田口廉也。之后，一木清直率一个中队士兵直赴现场。

23:40

秦德纯接到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任魏宗瀚和负责对日交涉的专员林耕宇打来的电话，他们告诉秦德纯：日方在今晚的军事演习中发现丢了一名士兵，以此为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秦德纯回答：卢沟桥是中国领土，日本军队事前未得我方同意在该地演习，已违背国际公法，不得进城检查。他提议等天亮后，让本地军警代为寻找。如果发现日本士兵，即行送还。

7.8

凌晨 2:00

秦德纯接到来自北平市外交委员会打来的电话。对方告诉秦德纯：日方对他的答复不满意，强要派队进城检查，否则就包围宛平。中日双方剑拔弩张。

凌晨 3: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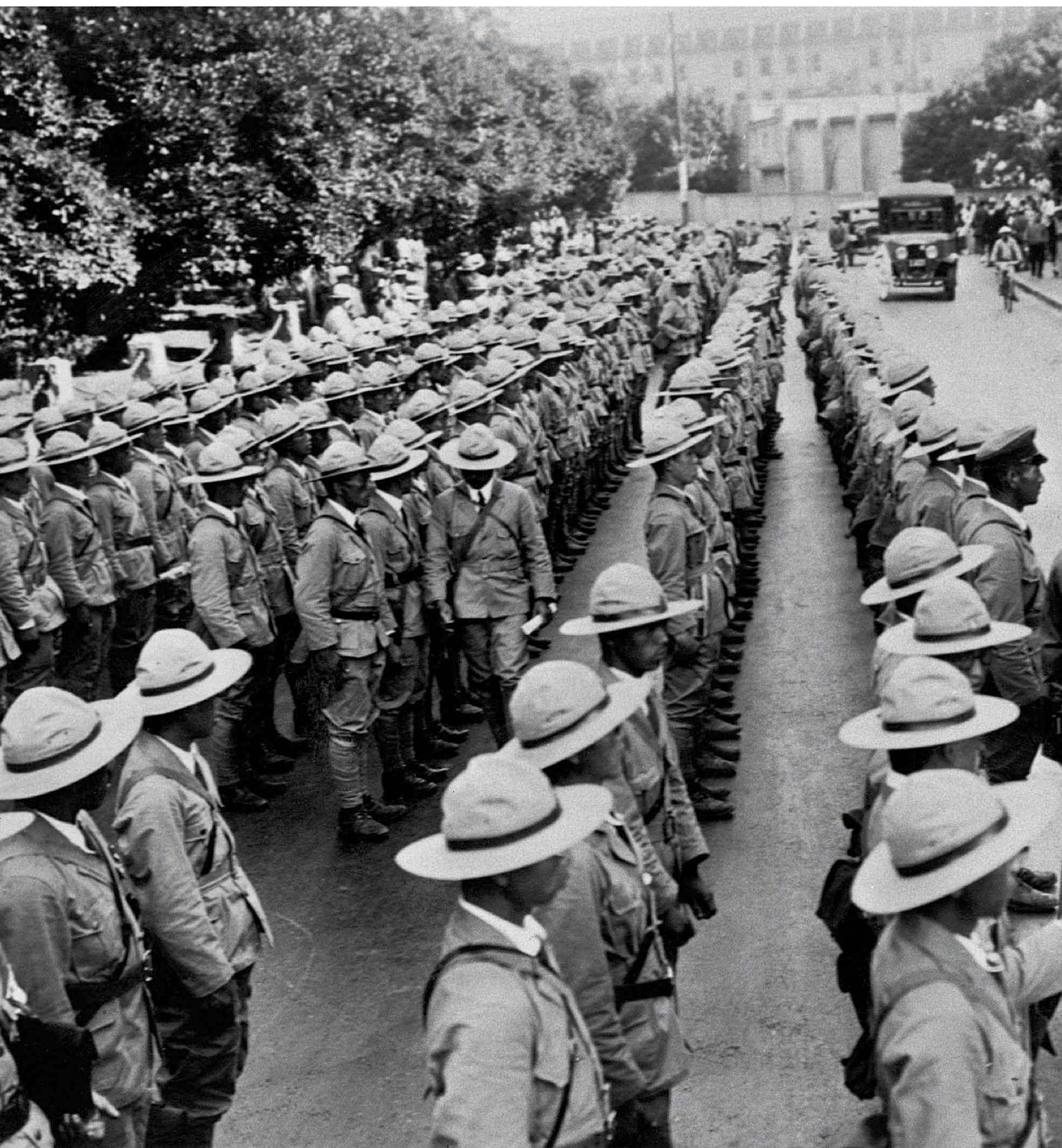
秦德纯接到第29军第219团团团长吉星文打来的电话，他告诉秦德纯：“约有日军步兵一营，附山炮四门及枪关枪一连，正由丰台向卢沟桥前进。我方已将城防布置妥当。”秦德纯当即向吉星文指示：“保卫领土是军人天职，对外战争是我军人的荣誉，务即晓谕全团官兵，牺牲奋斗，坚守阵地，即以宛平城与卢沟桥为吾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

宛平县县长王冷斋与日方经过一番交涉后，一起进入宛平县城。正在商议调查办法时，忽听城外枪声大作。中国守军开始还击。天津《益世报》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第一时间所写的报道中对此细节做如下描述：“（日军）至距离约百米时，竟发炮鸣枪，冲锋前进，于是事件之冲突，遂即开始。”

凌晨 4:23

据时任日本驻华大使馆助理武官今井武夫回忆，凌晨1点左右，他来到隔壁的第1步兵联队本部，见联队长牟田口廉也以及主要指挥官正在开会。4时许，一木清直从前线打来电话，要求牟田口廉也做出决断。牟田口回复称：“被敌攻击，当然还击！”一木又问：“是可以开枪吗？”牟田口与其核对时间后，再度下达开火令。其时为凌晨4时23分。

（章天 / 整理）



1937年9月初，日军台湾守备队临时集结，准备开赴上海前线参战



(Keystone/视觉中国供图)

“中国通”崛起： 侵华元凶的战前岁月

文 / 刘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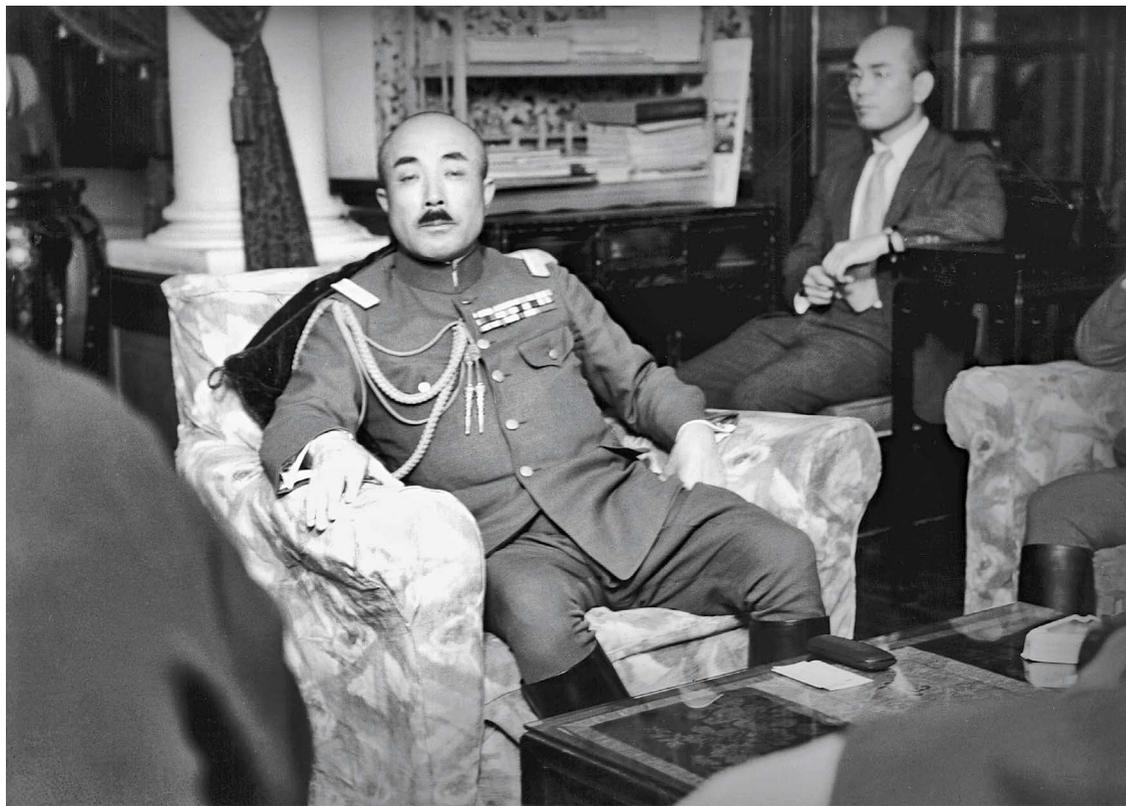
将对中国东北和华北的肢解、蚕食作为排挤政敌以及“革新国政”的铺垫，再以逐步动员起来的国家机器作为进一步入侵中国的基础：日本陆军中“中国通”团体的崛起，正是上世纪30年代整个日本社会为焦虑、愤怒和野心彻底扭曲的缩影。而他们的得势，最终使这台单向度的扩张机器失去了被有效控制的任何可能。

对日本首都东京的大部分普通市民来说，昭和十一年（1936）的初春是在一片不确定性中到来的。自日俄战争结束起一直驻留本市的陆军第1师团在不久前被确认将调往满洲，换防和文书移交工作已在进行，大街上不时有披挂整齐的军官乘坐摩托车呼啸而过。冈田启介内阁在1月21日因为众议院最大党政友会的不信任提案而垮台，但在2月20日提前举行的大选中，政友会意外遭遇惨败，不受欢迎的首相还勉勉强强继续赖在永田町的官邸。对前一年刺杀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的凶手相泽三郎中佐的军法会审已经经历了10次开庭，有两位陆军大将和一位海军大将被传唤到庭作证，牵涉的关联人员数量越来越多。2月23日清晨，东京遭遇了1883年以来第一次大雪，连下两天两夜。不止一个人产生了“昭和的变局即将开始”的预感。

2月26日凌晨，步兵第3联队的安藤辉三大尉、野中四郎大尉与步兵第1联队的香田清贞大尉、栗原安秀中尉等10多位青年将校把1483名部下召集到皇宫外西侧三宅坂的第1师团驻地操场，向他们朗读了一份739个字的《蹶起趣意书》，宣称：由于天皇身边存在“破坏国体、未尽肱股之道”的“不义奸臣”，日本如今已经处在了万民涂炭、痛苦呻吟的边缘。为了继承“热血先烈”的“遗志”，捍卫“万世一系的国体”

左图：“中国通”团体重要成员，“九一八事变”的始作俑者板垣征四郎

右图：1928年6月4日，在奉天（沈阳）皇姑屯车站附近被炸毁的张作霖专列



（秦风老照片馆/FOTOE 供图）

和第1师团舍身殉死的传统，他们将“尊皇讨奸”，剪除元老、重臣、军阀、财阀、政党等“凶徒”，恢复天皇的绝对权力。训话完毕之后，士兵们从值日军官手中夺取了军火库钥匙，带着步枪、机枪等轻武器和实弹开出营地，开始按计划执行刺杀政府要员、控制首都核心地区、要求陆军领导层响应他们的“报国”之举等任务。

在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子爵的官邸，中桥基明中尉高呼着“天诛”，向这位资深财界官僚连开三枪，其他人也扑上去用军刀一阵乱砍，81岁的高桥当场身亡。内大臣斋藤实子爵的妻子试图为丈夫挡住子弹，青年军官们将手枪探到她的身下继续射击，打了47发子弹，随后才放心地离开。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在自家卧室被机枪打得血肉横飞，随后再用军刀补上几刀。侍从长铃木贯太郎被正面连打三枪，子弹斜擦心脏而过，在医院抢救了好几天才脱离危险。被包围在官邸内的冈田启介首相性命几乎不保，幸亏其妹夫兼秘书松尾传藏主动跑进前院、吸引了对冈田的长相不甚熟悉的叛军的火力，躲在

浴室里的首相才幸免于难。在赤坂的山王饭店，叛军挂起“尊皇讨奸”的大旗，建立了指挥部，永田町的政府街区也被隔离包围，一派恐怖气象。

自1877年西南战争以来，日本已经有将近60年未曾发生过规模如此惊人的军事政变。更令人震惊的是陆军高层的即时反应：陆相川岛义之主动配合叛军将《趣意书》送入皇宫，恳请裕仁天皇体谅起事者“为国尽忠的赤诚”，下诏逮捕“元凶逆臣”名单上的要人。侍从武官本庄繁也宣称，政变者的“精神是想到了君国，故未必需要责备”。尽管在枢密院和天皇的压力下，陆军省不得不于27日凌晨发布了全市戒严令，但以川岛义之的名义发布的告示依然言语暧昧地表示：“诸君的行动是出于谋求显示国体之诚意。”戒严部队也始终拒绝与叛军做正面接触。情急之下，担心自己被废黜的裕仁甚至高呼：“备马！朕要亲率近卫师团去平乱！”

直到2月28日，当参谋本部、戒严司令部和第1师团师团长明确表态支持天皇平叛之后，2.4万名戒严部队才开始朝三宅坂、永田町和霞关发进。29

日天亮后，日本放送协会（NHK）的街头广播车开始不间断地播送以天皇名义发布的《奉敕命令》和《告下士官兵书》，同时戒严部队的坦克也出现在永田町街头。叛乱部队已经在严寒和疲惫中坚守了81个小时，此时终于不堪重负，开始三五成群地返回驻地。为首的20多名青年将校除去少数陆续自杀外，大多在当天下午被宪兵逮捕。7月5日，香田大尉等17人被军法会议判处死刑。值得玩味的是，判决书中丝毫没有提到他们的谋杀罪行，唯一的罪名是：这些军官未经天皇批准，擅自动用了“皇军”。

被称为“帝都不祥事件”的这起军事政变，与1928年以来日本陆军中的“独断”“下克上”风气、“皇道派”与“统制派”的政治角力，以及对中国东北和华北的侵略政策，具有直接关联。主张“先内后外”、通过肢解和蚕食中国来达成缓解日本经济困境的目的的统制派，经过长达近8年的经营，逐步控制了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重要职位。而鼓吹激进的“国家改造运动”、试图通过废除政党政治和议会民主制来实现军人独裁的皇道派，由于在竞争中渐渐落到下风，最终不惜通过公开叛乱来达成控制政权的目标。但无论皇道派还是统制派，在继续扩大侵华、达成日本独霸亚洲的目标这一问题上都不存在实质性差异。在“不祥事件”获得平息、军队内部意见趋于统一之后的17个月里，日本恰恰加快了全面侵华的军事和经济准备进程。而屡次遭到暗杀和政变摧残的内阁以及外交部门，此时已彻底沦为军人的附庸，再也无法采取任何制约措施。

在异常活跃的统制派和皇道派核心成员中，存在一个被称为“中国通”的群体。他们大多发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陆军的革新时代，有过在参谋本部中国课或驻扎中国东北的关东军中服役的经历。“九一八事变”前，这个团体的主要成员土肥原贤二、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冈村宁次等人大多已经官至作战参谋或陆军省、部（参谋本部）课长、班长一级的中层职位，军衔虽然不高，却能左右作战计划的制订和带兵长官的决断。正是这些“中国通”一手开创了不经上级批准擅自制造冲突事件，再怂恿上级领导人将军事行动不断扩大的“土肥原模式”；也正是他们将在中国东北和华北的侵略行动与对国内政治的施压结合起来，造成了军人势力不断坐大，最终控制了整个国策制订的局面。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时，“中国通”们已经跻身师团长一级的高级将领之列，直接参与了全面侵华的军事行动，

日后又作为日本陆军的最高决策者加速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旧日本帝国的土崩瓦解，也正在“中国通”团体的崛起之路中埋下了伏笔。

“先外后内”

1928年6月3日深夜，时任中国北洋政权最高领导人、“安国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乘坐一辆黄色钢制防弹汽车，黯然离开中南海，在前门火车站登上专列。这位已经在北伐战争中被南方革命军击败的奉系军阀领袖，打算星夜兼程撤回东北老家，像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失利后那样宣布闭关自守。4日凌晨5时30分，当列车经过位于奉天（沈阳）皇姑屯站附近的京奉铁路与南满铁路立体交叉道口桥时，只听轰然一声巨响，顿时火光冲天。正在第八节车厢喝茶的张作霖当场被炸成重伤，被紧急送往城内的私邸后，于上午10时死去。驻旅顺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立即发表声明，称这一事件的制造者“无疑是南方（国民政府）便衣队”。

皇姑屯事件，距离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尚有3年时间，距离卢沟桥“七七事变”9年。和后来的那两次事变引发的严重政治、军事后果相比，其影响似乎要有限得多。然而就主要特征而言，它已经为后来发生的一切阴谋和动荡埋下了伏笔：事件的直接策划者、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在未经上级批准的情况下，就敢于实施针对一国最高领导人的暗杀行动，且事后并未遭到严厉惩戒。在执行爆破任务时，来自日本朝鲜军（朝鲜驻达军）龙山工兵队的藤井中尉承担了埋设炸药的工作，首开两支驻外部队合作实施侵略行动的先河。关东军领导层虽然因为河本的擅自行事对其抱有不满，但事后依然参与了对真相的掩盖，并始终寄希望于能以在



（文化传播/FOTOC 供图）

满洲的冒险行动连带推动内阁执行更激进的对华政策。更重要的是，河本本人正是陆军改革派社团“一夕会”的主要成员之一，而该团体以及关东军，正是日后臭名昭著的“中国通”群体的栖身之所。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历来奉行激进侵华的“大陆政策”的旧日本帝国一度迎来了短暂的“大正德谟克拉西”时代。随着战争结束和华盛顿条约体系的确立，陆海军预算遭到大幅削减，激进扩张主义者的气焰一度稍有消弭。在政治上，以立宪政友会和民政党为核心的政党轮替体制取代了明治年代的藩阀当国；外交上，新任外相币原喜重郎倡导“协调外交”，主张在尊重国际条约和英美两国利益的前提下，通过外交和经济手段对中国施加渐进的影响。1927年“南京事件”中，币原拒绝了英国提出的联合出兵干涉中国局势的提议，成为日本近代史上少见的和平主义行为。直至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前夕，缓和政策的影响犹存。

然而不稳定的因素也在暗中累积。藩阀政治时代，日本陆军的人事权大体由长州藩出身的军人把持；随着藩阀政治趋向瓦解，外省年轻将领要求改革的呼声正愈演愈烈。1921年10月，驻瑞士副武官永田铁山、驻俄罗斯副武官小畑敏三郎以及正在欧洲公干的参谋本部部员冈村宁次这三位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的同学，在德国南部的温泉度假地巴登—巴登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讨论联合同僚一起改革军务的细节，驻德国副武官东条英机也专程赶来参会。4人商定了关于陆军革新的最初细节：领导人方面，应拥戴真崎甚三郎、荒木贞夫等非长州藩籍贯的高级将领；人事权方面，应设法将亲近的同学故旧安排到陆军省、部的重要岗位上，争取尽快升职；内政改革方面，应排除政党、旧财阀等试图约束军人集团的行为和力量，以陆军省、部为核心重构国家机器，动员大部分资源用于军事扩张；对外政策方面，应以吞并满洲和内蒙古为核心，阻止中国复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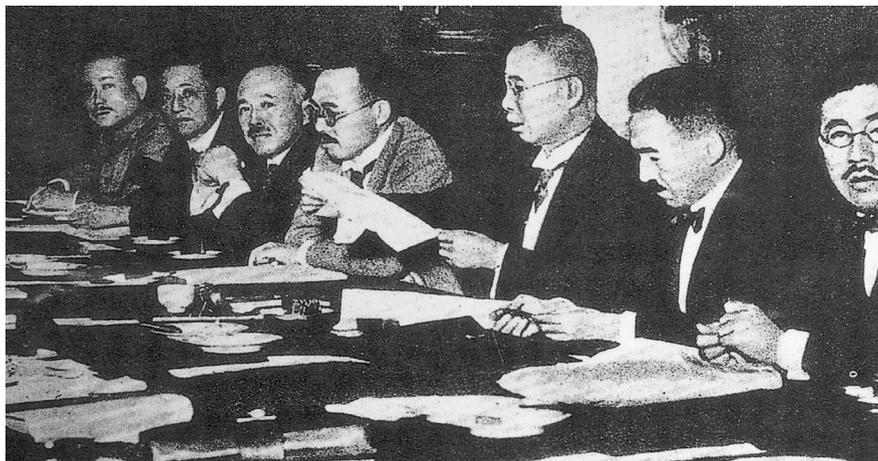
皇姑屯事件，正是日本“中国通”团体将侵略中国的具体行动与撼动内阁的大政方针结合起来的第一次尝试。

巴登—巴登会议结束后，4名成员各自归国，按照预定计划开始组建改革派团体。1927年，永田以士官学校第15到18期的同学为核心，组建了秘密社团“二叶会”；两年后，这一社团与参谋本部作战部内的另一团体“木曜会”合并，称为“一夕会”。被吸收为这一团体成员的大多是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的非长州籍将校；为了在对华政策上有所建言，不少成员有过在参谋本部中国课任职的经历，号称“中国通”。日后横行无忌的皇道派与统制派领袖，最初皆与“一夕会”有关。即位不久的裕仁天皇同样对这些团体的活动表示了支持——这位对长州藩阀的压制深恶痛绝的新天皇，正需要在军队中扶植听命于自己的新势力。

然而在陆军连续遭遇三次大规模裁军的上世纪20年代，这些野心勃勃的年轻将校在省、部中央机构中却无法迅速觅得足够的职位和上升空间。他们转而将目光投向了东海对岸：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获准控制辽东半岛（日方称“关东州”）和南满铁路，并在旅顺驻军以维护安全利益，称为关东军。由于中国政局长期动荡不宁，关东军不仅未曾受到裁军浪潮的影响，反而始终维持在1个师团、6个守备大队以上的兵力规模。与“一夕会”有关的“中国通”们进入这一部队后，由于其熟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以及欧美新出现的技术武器，很快为年事已高、精力不济的中高级将领所倚重，把持了制订作战计划、开展秘密谍报活动等重要权力。

皇姑屯事件，正是“中国通”团体将侵略中国的具体行动与撼动内阁的大政方针结合起来的第一次尝试。1927年6月，与“一夕会”成员过从甚密的外务省次官森恪在首相官邸组织召开了著名的“东方会议”，决心抛弃“协调外交”，确立日本对满洲和内蒙古的独占权，必要时不惜“坚决采取自卫措施”。参会的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随后就与其幕僚河本大作秘密商定：一旦北伐军进至长城线附近时，关东军应胁迫张作霖退出关外，依附于日本经营准独立政权，必要时甚至可以对奉军采取进攻行动。然而首相田中义一考虑到国际压力，明确要求不得轻举妄动。但急不可耐的河本已经无意收手：他打算先斩后奏，先将张作霖炸毙，使东北全境陷入混乱，随后关东军便可控制东北要地，甚至直接宣布“满洲独立”。皇姑屯事件的动机，盖在此矣。

由于田中本人的谨慎态度和影响力巨大的政界元老西园寺公望公爵的干预，皇姑屯事件并未引发



(俄国使馆供/FOTOFE供图)



(文化传播/FOTOFE供图)

太大的连锁反应。然而迫于革新派将校和关东军方面的压力，田中也无法对相关责任人施以严厉惩戒，只能将河本大作和时任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转入预备役了事。1929年7月，田中义一引咎辞职。此举意味着内阁对军人的自行其是已经逐渐失去控制力。而从“一夕会”衍生而来的统制派军官团体，受到此次行动的鼓舞，日益滋生出了“外先内后”的思想——以对中国东北、华北和内蒙古的侵略作为当前“维新”的重点，待取得了日本独占海外经济领地，再考虑在国内建立整体的军事动员体制。1928年出任关东军主任参谋的著名“中国通”石原莞尔，此时已经撰写了他的重要理论著作《满蒙领有计划》，其中明确宣称：“满蒙问题，只有日本把它完全占有之后，才能得到彻底解决。”激进派军人直接策动对华扩张，已经只是时间问题了。

“土肥原模式”

1930年11月14日一早，滨口雄幸首相与内阁成员一起从东京出发，准备前往冈山县视察陆军年度大演习。一行人正在东京火车站4号月台等待专列靠近时，18岁的右翼“爱国青年”佐乡屋留雄突然跳出，以手枪向首相的腰部和腹部连发数弹。滨口被送往医院后勉强保住了性命，但已无法继续工作，次年4月14日死于伤口感染。佐乡屋在法庭上宣称，因为滨口内阁签署了“卖国”的《伦敦海军条约》，他基于义愤才采取了暗杀行动。手枪的提供者是极右翼民间团体“爱国社”的成员岩田爱之助，

岩田则是从与日本浪人关系密切的“满蒙独立”运动分子川岛芳子（金璧辉）那里得到了这件武器。几股暗藏的逆流，至此已开始合龙。

暗杀滨口并非简单的个人行为，而是陆军激进派将校和民间法西斯分子以“实际行动”改造国家的阴谋的发端。1931年春天，被统制派军人视为精神导师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大川周明和参谋本部俄国课课长桥本欣五郎大佐秘密开会，讨论发动政变、建立军事独裁政权。他们计划动员1万名民间暴徒，包围国会临时议事堂和政府街区霞关，在首相官邸等处制造爆炸，使首都社会秩序陷入混乱。随后陆军以“恢复秩序”为名派出大军，解散现存的政党制内阁，成立以陆军大臣宇垣一成为首的新政府。宇垣本人是这一计划的知情者，甚至一度从陆军机要费中拨出了若干款项给大川等人。但“一夕会”的骨干冈村宁次、永田铁山、石原莞尔等人认为政变时机尚未成熟，加上宇垣转而希望合法地获得组阁权，这场“三月政变”最终不了了之。

桥本欣五郎并未因此就决定罢手。1931年8月底，他在东京会见了另一位“一夕会”骨干、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决定重回皇姑屯事件的模式，以在中国东北的侵略行动推动国内政坛更迭。按照他们两人的计划，关东军将在当年9月底制造与中国东北当局的冲突，随后直接入侵满洲。10月21日，陆军的120名青年将校利用内阁对这一事件手足无措的时机，冲入国会、杀死首相和阁僚，随后请海军元老东乡平八郎元帅行使帷幄上奏权，提请天皇指定荒木贞夫陆军大将为首相兼陆相，桥本、

左图：1927年6月，时任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右三）在永田町官邸主持商讨对华政策的“东方会议”

右图：最臭名昭著的“中国通”之一土肥原贤二

大川等人为各部大臣。但由于两人过于亢奋，在筹备阶段就放出了“关东军即将出兵满洲”的风声，若槻礼次郎首相甚至裕仁天皇本人都提前警觉起来。9月11日，陆军大臣南次郎决定派建川美次少将作为安抚使前往奉天，阻止关东军“独走”。得到消息的桥本立即发电报给板垣，催促他“事已暴露，应立即断然行动”，“应在建川抵奉之前断然行动”。

1931年9月18日晚9时许，建川美次的列车抵达奉天。他一下火车，就被板垣拉到柳町的“菊水”料理店接受款待。宴席还在进行中，晚10时左右，关东军独立守备第2大队第3中队的几名军官在柳条沟爆破了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随后出动部队攻击驻北大营的中国军队。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在板垣和另一位始作俑者石原莞尔主任参谋的敦促下，新任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当即决定扩大军事行动。而与此事并无直接关联的朝鲜军司令官林銑十郎按捺不住兴奋，竟命令麾下部队越境进入中国境内、参与对东北军的攻击。若槻首相虽然认为关东军的行动“岂有此理”，但还是勉强同意支出兵经费。9月23日晚，陆相和参谋总长入宫觐见天皇，得到了对擅自出兵的事后裁可。只有原定的政变因为消息走漏，在10月初被宪兵破获。

“九一八事变”的直接策划者是“中国通”团体的核心成员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在扩大阶段得到了陆军省军事课课长永田铁山、中国班班长铃木贞一、参谋本部动员课课长东条英机等同党的大力配合。而在随后炮制“满洲国”以及进一步蚕食华北的行动中，则以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表现最为突出。在1931年9月22日的关东军定策会议上，正是土肥原率先提出了“在我国的支持下，以东北四省及蒙古为领域，以宣统皇帝为首建立中国（伪）政权，并使其成为满蒙各民族之乐土”的主张，以避免成本高昂的长期直接控制。随后又是他亲自前往天津，策动溥仪前往长春就任伪满“执政”。部分是由于该计划的得逞，在随后对华北和内

蒙古的入侵中，日军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借重这种间接渗透与直接干预相结合的“土肥原模式”。

“中国通”团体后期成员今井武夫对“土肥原模式”有过相当精当的概括：“首先在中国的某一地区，使土匪或密探惹起骚乱，则中国军队必往弹压；待骚乱扩大、危及日本侨民时，便出动日军予以镇压。”实际上，这一描述多少还失之“斯文”：在无法动用亲日势力制造中日军队冲突时，土肥原和他的同僚们并不惮于亲自上阵。1933年元旦引发热河战役的“山海关事件”，便是由当地日军守备队直接挑起，随后由关东军接手大规模攻击。1935年5月的“天津事件”，同样系由日本天津驻屯军直接挑起。当年春天，土肥原曾经在中国华北、华南和西南各地进行了为期一个半月的“考察”，遍访下野军阀、失意政客以及国民党内的反蒋分子，从中寻找可资利用的机会。日后的两广“六一事变”和1936年的绥远战事，背后也都有他的身影浮现。

不过，在1933年5月长城战事结束后，中日两国在华北还是迎来了一个军事上的相对平稳期。尽管小规模摩擦不断、双方也先后着手扩充部队，但毕竟有4年多的时间未曾发生大规模正面交战。站在日方的角度，这当然不是因为他们热爱和平，而是三项现实困难使然：首先，经营“满洲国”、使其成为日本侵略东亚大陆的经济基地的计划尚有许多挑战有待克服，例如各路抗日义勇军的活动、周期较长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对苏联的战备工作，这使得石原莞尔等“中国通”核心成员暂时无意扩大对华北的直接军事攻势。其次，大部分统制派成员在“九一八事变”时还只是课长、参谋一级的中层幕僚，虽然可以在事实上左右上级的决策，但在制订全国国防方针、扩充一线部队、介入内阁决策等问题上毕竟还缺乏实权。他们需要一个阶段来巩固本集团在陆军中的关键人事安排。最后，要达成最初设想的“先外后内”、以军事入侵推动政治变革的目标，现有的财政和军事资源尚不足以胜任，需要迫使内阁采取以军事生产和动员为核心的新方针，进一步集中资源于对华入侵。正是在这一问题上，统制派与其昔日盟友皇道派产生了极其尖锐的对立，最终发展为流血事件。

恐怖竞赛

1921年巴登—巴登会议的发起人之一小畑敏三

“中国通”团体成员今井武夫对“土肥原模式”有过相当精当的概括：“首先在中国的某一地区，使土匪或密探惹起骚乱，则中国军队必往弹压；待骚乱扩大、危及日本侨民时，便出动日军予以镇压。”

郎，在“一夕会”成立后，逐步与昔日的“中国通”战友们分道扬镳，开始倾心于左派法西斯主义者北一辉的“国家改造”“昭和维新”方案。在北一辉看来，“大正德谟克拉西”时代形成的政党轮替体制、以财力而非武力决定政治影响力、对外尊重国际条约的路线，皆是与日本本身的民族性相悖的舶来品。其结果除去矮化了东京的国际地位外，还使国内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军人的地位遭到歧视，是不可容忍之举。当务之急是进行政治“维新”，“从骑在全体国民头上作威作福的那伙骄恣不义的亡国贼手中夺回国家”。是故当务之急并非“先外后内”，而是要变革内政体制、建立天皇亲政的“皇道国家”。对一批出身贫寒、深知贫富对立现实的陆军低级军官和民间激进分子而言，这一套理论尤其有吸引力，在军队高层也得到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两位大将的默许。与统制派相比，皇道派在扩大入侵中国的方针上并无实质性差异。然而后者一旦得势，将严重影响到“中国通”们建立举国动员机制的企图，因此统制派对此始终持抵制态度。而皇道派为了扩大影响力，开始采取直接攻击，渐渐演变为恐怖主义竞赛。

1931年的“十月政变”阴谋以失败告终后，以佛教法西斯组织“护国堂”和部分下级军官为首的激进法西斯分子依然汲汲于实施暗杀和爆破。1932年2月9日，激进团体“血盟团”成员暗杀了民政党核心人物、前藏相井上准之助，接着又在3月5日刺杀了政党体制的资金提供者、三井财阀负责人团琢磨，制造了“血盟团事件”。5月15日，在大川周明等人的协助下，海军中尉古贺清志带着“爱乡塾”等多个民间右翼组织的成员闯入永田町首相官邸，刺杀了76岁的犬养毅首相。由于政党体制在频繁的恐怖活动冲击下濒临解体，政界元老西园寺公望公爵最终推荐了无党派背景的退役海军大将斋藤实作为阁僚的继任者，组建了所谓“举国一致内阁”。在阁僚成员的安排上，既有皇道派领袖荒木贞夫、原“满铁”总裁内田康哉等扩张派，也有高桥是清等政党体制的拥护者。1933年7月，东京警视厅逮捕了“爱乡塾”“大日本生产党”等秘密组织的44名恐怖分子，当时他们正准备暗杀内阁所有成员和元老、重臣，计划在行动成功之后废黜裕仁天皇，将法西斯化倾向更明显的皇弟父宫雍仁亲王推上天皇宝座。由于这一案件涉及皇室内部斗争，警视厅未敢认真审理，便以“阴谋的参与者均是出于爱

（文化传播/PHOTOE供图）



1938年7月7日，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一周年之际，军工原材料已经出现短缺的日本政府鼓励国民捐献废旧金属用品

国动机”为由将他们统统释放，无异于对恐怖主义活动表示纵容。

眼见皇道派的暗杀和宣传活动影响有日益上升之势，统制派开始采取反击。1934年8月，混入皇道派内部的统制派间谍佐藤胜郎向宪兵队告发了皇道派军官的政变阴谋，致使皇道派成员村中孝次、矶部浅一、片冈太郎等人被捕。虽然军法会议以“证据不足”为由，未起诉这些人，但陆军省还是以“在士官学校散发怪异文书”为由，免去了村中和矶部的职务。皇道派对此极为不满，认为是统制派一手制造的阴谋。1935年夏天，与统制派关系密



(视觉中国供图)

1936年2月29日，参与“二二六事变”的日本步兵第3联队士兵在戒严部队的压力下，被迫结束对东京警视厅的包围，返回原驻地

切的新任陆相林銑十郎又借着人事调整之机，将一批皇道派军官转入预备役，或调离省部中枢、转任战地军官。皇道派军官相泽三郎在恼怒之下，于8月12日闯入统制派领袖、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的办公室，持刀将其砍死。此时双方的矛盾已经彻底激化，在接到皇道派分子云集的第1师团将被调往中国东北的消息之后，安藤辉三、野中四郎等人决定立即发动政变，终于酿成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

“二二六事件”平息之后，自1932年“五一五”事件以来活跃异常的西田税、北一辉、相泽三郎等人和政变主谋一同被处以死刑，长期支持皇道派的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川岛义之等高级将领也被转入预备役。统制派特别是其中的“中国通”分子

终于如愿以偿掌握了陆军省、部大权。对此际的日本而言，这并不意味着动荡将就此休止，而只是军人集团进一步控制国家机器、彻底转入全面侵华的序曲。1936年5月，中断已有23年之久的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得到恢复。根据这一制度，内阁中的陆、海军大臣两职必须以现役的大将和中将作为候选人，而不得任命已经转入预备役的将领。换言之，只要现役将领沆瀣一气、拒绝出任陆相或海相，内阁就将自行垮台。只有获得了军人的认可，各部大臣的任命才能得到通过：这是军部给政府上的第一道紧箍咒。第二道符咒是1936年8月制订的《国策基准》，它宣称要在东亚大陆推行“共存共荣主义”，排除苏联威胁、实现“日满中三国的紧密提携”，并逐步向南方海洋进军。这意味着扩大侵华的方针

得到了政府的鼓励和纵容，避免与英美为敌的传统也已经被颠覆。华北长达近4年的相对平静，即将被打破。

1936年3月，广田弘毅内阁的大藏大臣马场瑛一决定全面启动激进的财政政策，通过增发货币和公债来筹集扩军所需的资金。与前一年相比，1937财年全年日本财政支出净增33.7%，军费开支增加1/3、达到14.08亿日元，同时还增发了2.77亿日元的公债。到这时为止，日本的陆海军军费支出已经达到了年度财政预算的47.3%，比“九一八事变”时净增三成以上。这一激进举措很快造成日元汇率暴跌、进口物资价格飙升，广田内阁因此倒台。不过统制派犹嫌不足，在1937年5月又怂恿新任首相林銑十郎（正是1931年越境入侵中国东北的那位退役陆军大将）通过了以备战为指向的《重要工业五年计划纲要》，计划在未来5年将现有的飞机生产能力增加100%，轻武器产量增加300%，坦克产量增加150%，钢铁和煤炭产量分别增加到1000万吨和330万公升。这一计划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出了日本现有的财政和工业能力：战争机器已经彻底无法停转了。

无法停止的机器

1937年7月中日战事转入全面化之际，昔日主导渐进式扩张的“中国通”们，已经成为师团长或省、部中枢部长一级的高级军官，配上了少将或中将的将星。前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已升任第2师团中将师团长，前参谋本部动员课课长东条英机任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任第5师团师团长，土肥原贤二任第14师团师团长，就连资历稍浅的牟田口廉也当上了“中国驻屯军”步兵第1联队的联队长。统制派主导陆军省、部中枢人事的目标已经如愿达成，内阁彻底沦为了军人的附庸和迎合者。就连在“大正德谟克拉西”时代敢于监督政府和军队运作的新闻媒体，也变成了侵略政策的同路人：当年夏天第一拨开往华北的日军出拔之后，《朝日新闻》社发起了“军用机捐献”活动，鼓励国民踊跃捐资为“皇军”购买新飞机。到年底为止，报社共收到捐款11.5万日元，陆续为陆海军购置了90架飞机。所谓“先后内”，终于造就了“内外皆然”的局面。

事已至此，终于有人开始感到不安。曾经的“中国通”魁首、“九一八事变”和“满洲国”的策划者

石原莞尔，因为担心被拖入长期战争的泥潭，一度力主推行所谓“不扩大”方针。然而在前线的牟田口廉也和参谋本部内的武藤章等后起之秀的裹胁下，他的反对意见很快被压倒，随后又因众叛亲离而被迫辞职。在1938年1月的内阁—陆海军省部联席会议上，甚至出现了参谋本部反对扩大战争、首相近卫文磨却与陆相和海相一起要求彻底摧毁中国国民政府的罕见景象。就在几年前，“中国通”们还曾经认为肢解和蚕食中国可以成为他们控制日本国家机器的一种实用化手段；如今，就连他们自己也无法驾驭这架横冲直撞、有进无退的机器了。

从皇姑屯事变到“七七事变”，“中国通”群体在日本军政两界崛起的这9年，也是日本在政治和社会舆论上彻底法西斯化、经济上彻底总体战化、文化上全面军国主义化的最终阶段。从1930到1936年，日本全国陆续经历了20起重大恐怖袭击事件、4起政治暗杀、5起有计划的谋杀、4次未遂政变和难以胜数的阴谋活动，其中无一不与激进陆军军人和“中国通”的活动有关。他们并未设定备用计划，亦不认为除去直接侵略和军事征服以外，日本还有其他的发展之路可走。脆弱的“大正德谟克拉西”和“协调外交”，在这些自诩深知中国内情的军人的精心策划下，终于如多米诺骨牌般倒塌。日本帝国只剩下了继续扩张这一种可能：由东北到华北，由华北到华南，由中国到东南亚，再由东南亚到中部和南部太平洋。直至在盟国的一致反击下崩溃。

1946年5月3日中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第一次开庭审理日本的战争罪行。曾经的“中国通”和统制派领袖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武藤章、大川周明等人齐齐在列。东条等4名军人最终被判处死刑。当他们在这一年12月24日凌晨脑袋被蒙上黑头套、塞进绞索绳套的时候，是否也会突然想起皇姑屯、“九一八”、“华北分离工作”以及卢沟桥的那些过往呢？

日本帝国只剩下了继续扩张这一种可能：由东北到华北，由华北到华南，由中国到东南亚，再由东南亚到中部和南部太平洋。直至在盟国的一致反击下崩溃。

宋哲元：“华北柱石”的是与非

文 / 王戡



(视觉中国 供图)

第29军军长兼冀察政务委员会主席宋哲元（1885~1940）

宋哲元出任具有相当程度行政自主权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并兼冀察绥靖公署主任、第29军军长，登上了他军政生涯的巅峰。

1937年7月7日深夜，当全面抗战的第一下枪声在卢沟桥边响起的时候，国民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第29军军长宋哲元上将还在山东乐陵老家。自5月底离开北平以来，宋哲元祭扫家墓、刻印族谱、捐助学校、修缮文庙，尽享衣锦还乡之乐。“卢沟桥

事变”发生之后，宋哲元面对南京国民政府和北平各界的催促，又在乐陵盘桓了好几天才前往天津。

事后看来，宋哲元的磨蹭没有什么高明内涵，不过是与日本人折冲应对的一贯套路。几年来，他殚精竭虑方得确保华北不落入日本人之手，支撑危局的重担、不被理解的压力与为第29军在夹缝中求发展的责任，已经令他身心俱疲。因此在危机再度降临之际，宋哲元多少显得有些麻木。不过在度过最初几个星期的迷茫之后，第29军终于奋起抗敌，维护了自1933年长城抗战以来的名誉，也使宋哲元得以抗日名将的身份留名青史。

崛起于夹缝之中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之间的6年，中日双方频频爆发局部冲突，华北动荡不已。也正是在这6年间，宋哲元从率领2万残兵困守山区的杂牌军将领，一跃而成为掌握河北、察哈尔、北平、天津两省两市，坐拥10万人马的“华北柱石”，举国瞩目的一方领袖。这当中，发生在1935年的“华北事变”，乃是风云际会之关键。

当时，宋哲元是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兼第29军军长。1935年1月初，第29军多次与侵犯察哈尔省境的日军和伪满军队发生冲突。但日方反咬一口，声称“宋哲元军侵入热河”，动员部队压境，要求第29军归还缴获的武器，并不得在察省长城线以外驻军。6月初，日本多伦特务机关属员及商人4人途经张北县城时，因未携带护照，被第29军官兵扣留。日方又将此事渲染为“侮辱日本军人”，要求第29军道歉、惩处责任人，并撤退至张家口以南。

面对日方的压迫，南京国民政府指示驻华北最高军事长官、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何应钦妥协避让，不给日军以挑衅之机。两次冲突均以满足日方要求而告终。6月19日，国民政府还下令免去宋哲元的察哈尔省政府主席一职，事前甚至没有与他沟通。宋哲元于惊愕气愤之中离开张家口，回到天津租界私宅闭门谢客。

饱受日方压迫威胁的，并非只有宋哲元一人。当年5月，日本关东军和驻北平领事借口《国权报》



(视觉中国·供图)

第29军著名的大刀队在1933年长城抗战中曾有过英勇表现



(海峰提供 PHOTOE)

1937年7月，由第38师副师长李文田指挥的天津保安队准备进攻海光寺日本军营

社长胡恩溥、《振报》社长白逾桓这两名亲日分子在天津日租界内遭到枪杀，以及孙永勤部抗日义勇军进入《塘沽协定》规定的非武装区，指责何应钦及麾下军政人员“对满实行阴谋”“对日实行恐怖主义”。日军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公开出面，要求撤换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和天津市市长张廷谔，将中央军、于学忠所部东北军及国民党组织悉数撤出华北，停止一切抗日宣传活动。

蒋介石担心以武力直接对抗日本，一旦引发战争，会重演1933年长城抗战失败、缔结《塘沽协议》的惨剧，决心继续退让，对日方要求照单全收。宋哲元丢掉察哈尔地盘后，第29军也准备调往江西，但一起意外事件却改变了局面。

6月27日，失意政客白坚武受日方驱使，纠集300多乌合之众，自称“华北正义自治军”，劫持铁甲列车炮轰北平永定门。虽然暴动很快就被镇压，但平津市面陷入一片惶恐，不知中国驻军撤离后将会发

生什么。宋哲元看准机会，做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决断：指示部下萧振瀛向国民政府力陈，愿意担负起在华北与日本方面周旋的责任；同时与土肥原贤二等人进行接触，试探日方对自己入主平津的态度。

蒋介石认为，由地方军代替中央军，是以退为进、维持华北主权的可行之策，同意了宋哲元的毛遂自荐。日本方面则认为，“他们（指宋哲元及山西阎锡山、山东韩复榘等人）在不欢迎蒋介石的中央集权制上是一致的，这一点与日本军部驻外机关的利害也是一致的”（据时任日本驻北平助理陆军武官今井武夫的回忆），未提出反对意见。第29军得以顺利进驻平津，接管城防。7月17日，国民政府突然以两年前参与长城抗战有功为由，向宋哲元及所属将领颁发青天白日勋章，其中既有对宋哲元过往功绩的激励认可，也不乏以抗日名誉相约束、避免其过度倾向日方的意图。8月底，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总司令。

在此之后，土肥原贤二等日方特务分子继续游说山西阎锡山、绥远傅作义、山东韩复榘等地方军政领袖，推动其“华北自治运动”，同时向宋哲元及继任的河北省主席商震、天津市市长程克及北平市长袁良施压，要求“迅速彻底取缔妨碍我两国邦交之团体”。

宋哲元秉持“为保大权，可舍小利”的观点，对土肥原贤二敷衍应付，同时不失时机地向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要权。他一方面明确表态，在对日交涉时，“凡有妨害国家主权领土之完整者，一概不予接受”；另一方面又提出自己困难甚多，“刻下民情愈益愤昂，城乡市镇，议论纷纭。倡导自治者有之，主张自决者有之，一一阻遏，既有所不能，徒欲苦撑，亦绝非空言所能奏效”，希望中央给予谅解。

1935年底，国民政府为化解“华北自治运动”，决定放手一试，撤销以何应钦为首的中央驻平军政机构，将华北交给宋哲元全权负责。北平、天津市长和河北、察哈尔省主席由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萧振瀛等第29军干部接任，宋哲元出任具有相当程度行政自主权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并兼冀察绥靖公署主任、第29军军长，登上了他军政生涯的巅峰。

“捉摸不定”的名将

宋哲元出生于清光绪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1885年10月30日），早年在家读书务农，做过几年私塾启蒙先生。20岁时投笔从戎，用了16年时间，从士兵晋升到将军。他长期追随西北军领袖冯玉祥，深得后者的信任，成为其“五虎上将”（冯玉祥担任北洋陆军第11师师长时所指挥的5个旅长）之一。

冯玉祥治军极其严厉刻薄，手下官佐稍有讹误，便会被他打上几十军棍；宋哲元身为亲信大将，也未能幸免。尽管如此，无论冯玉祥是联合张作霖反对吴佩孚，联合郭松龄、李景林反对张作霖，与李景林反目，还是联合国共两党反对北洋军阀，抑或与共产党、蒋介石相继反目，宋哲元始终忠诚相随。直到1930年冯玉祥在中原大战中失败，西北军集团最终瓦解，宋哲元也成了光杆司令。

宋哲元本人性格宽厚诚朴、稳重又不失机变，颇受部下拥护好评，也正因此得以东山再起。中原大战之后，退入山西南部的西北军残部，经张自忠等人奔走联络，由入主北平的张学良收编。各将领资历相仿，便决议推举宋哲元为领袖，一个新的军事集团从此成型。成军之初，第29军缺粮乏饷，冬



佟凌阁

(1892 ~ 1937)

佟凌阁，字捷三，清光绪十八年九月初九（1892年10月29日）出生于河北高阳。1913年4月，他在景县投入冯玉祥所部直系第16混成旅，因功逐步擢升至旅长、师长等职。因为性格刚正温和，在军中有正人君子之称。1926年奉系军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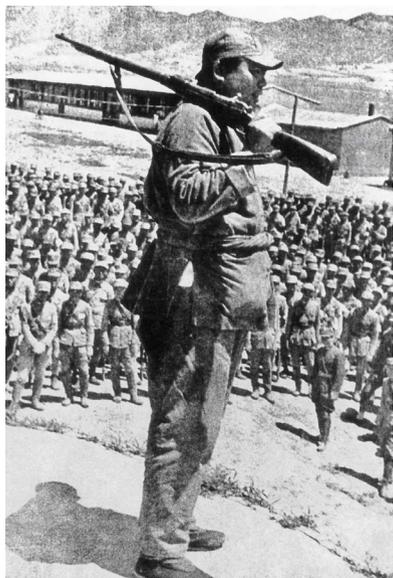
进攻控制平津的冯玉祥所部国民军，佟凌阁统兵在南口与之血战，自此成名。

佟凌阁是宋哲元多年的老部下，宋哲元担任旅长时，佟即为其麾下团长。北伐胜利之后，佟凌阁任冯玉祥部第2集团军第11军军长，随老长官驻扎于西北。1930年中原大战后，又随冯一起下野，隐居于山西。1933年冯玉祥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期间，佟凌阁前往投奔，担任过代理省主席兼民政厅厅长、第1军军长等要职。同盟军被宋哲元收编之后，他重回宋部麾下，任察哈尔省政府警务处处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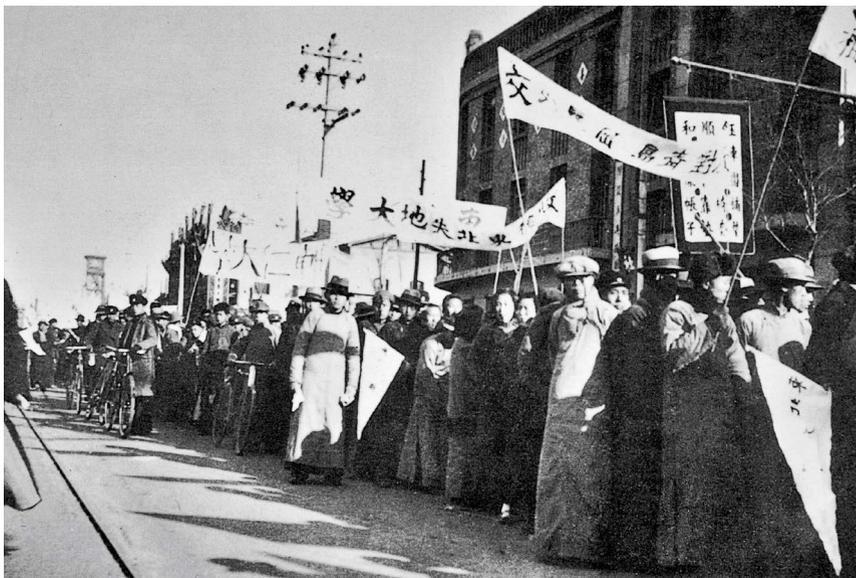
1935年8月，为整编数量日益膨胀的部队，宋哲元擢升佟凌阁为第29军副军长兼军士教育团团长。不过他职位虽高，但并非宋哲元集团的核心人物，也不参与重大政治决策，主要负责在南苑练兵。1937年7月28日日军进犯南苑时，佟凌阁将部队交给更富经验的赵登禹直接指挥，自己则担当督战任务。当天中午，在得知赵登禹决定突围、向北平城内转进后，佟凌阁主动提出由他带领滞留在南苑的部分军训大学生分开撤退，避开大路，以青纱帐为掩护北行。当日下午1时许，佟凌阁带队行至大红门东北的时村附近时，遭到日军“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1联队的伏击；勉强突围之后，又遇日军航空兵的轰炸扫射，头部受伤殉国，享年46岁。1937年7月31日，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追赠佟凌阁为陆军上将。因文书作业失误，褒扬令上的“佟凌阁”被误写作“佟麟阁”，这一讹误也延续至今。1947年，北平市政府决定将南沟沿大街改名为佟麟阁路。（文/王戟）

天连柴火都买不起，只能让官兵到操场上跑圈取暖。尽管如此，宋哲元依旧开源节流，厚待军官，尽力维持团体士气；同时对外积极交往，争取张学良、蒋介石等人的认同。

冯玉祥不甘心失败，不断策动旧部继续反蒋。1931年7月，西北军将领石友三在浦口发动兵变，炮击南京之后掉头北上攻打张学良。冯玉祥致电宋哲元，要他与石友三南北呼应。宋只在口头应付，始终没有行动。事变平息之后，蒋介石、张学良为酬谢宋哲元，



(视觉中国 供图)



(文化传播/FOTOF 供图)

左图：1933年，西北军领袖冯玉祥在察哈尔省发起抗日同盟军

右图：1935年12月9日，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和北平学联领导并组织爱国学生数千人，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高喊“反对华北自治运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

任命他为察哈尔省主席，使第29军终于有了地盘。

1933年长城抗战之后，冯玉祥到察哈尔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进攻被日伪军占领的多伦、康保。国民政府担心此举会给日方以出兵扩大侵略的借口，决心予以镇压。宋哲元亲自参与过长城抗战，理解国民政府的苦衷，向部属表示不愿意随老长官“在纸屋里玩火”。但他刚刚因为长城抗战期间，在喜峰口指挥大刀队抗击日军而誉满全国，自然不愿担上“镇压抗日”的恶名。于是，宋哲元选择一边发电要求尽快解决察省问题，一边停留在平绥铁路沿线等待观望。

最终，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因内讧而失利，冯玉祥下野。宋哲元不仅保持了名声、收回了地盘，还收编了大批流散武装，弥补了长城抗战造成的部队损失，进一步壮大了军力。宋哲元由此深信，保持模糊态度，积极敷衍应付，绝不轻易行动，才能以不变应万变。

1935年底宋哲元出掌华北之后，他的抗日盛名颇为各界所瞩目，连胡适都认为：“他们两年前在喜峰口作战时，曾有八千健儿为国家流过血。一个有过这样悲壮的历史的军队，是不会辜负国家的付托与人民的期望的。”但是，面对咄咄逼人的日本人，宋哲元的敷衍战略难以为继，更何况他的地位是在日本人“谅解”之下获得，必须有所表示。于是，宋哲元的举措令民众大跌眼镜：他坐看土肥原贤二扶持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而无动于衷；在冀

察政务委员会内，也高举吸收亲日分子、聘请日本人充当顾问。对待日方提出的共同修建铁路、开放航空、开发煤矿等要求，他并不做回绝，甚至一度计划派大将张自忠赴日考察。

宋哲元对内始终强调，他的“三原则”是不屈服他人、绝对听命中央、对外无丝毫秘密协议。但历史学家李云汉也指出，他当时给予一般民众的印象，始终是“捉摸不定，游移寡断”。

大厦将倾时

在当时，宋哲元暂时牺牲了抗日名将的声誉，日本人却不认为他是亲日派。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曾评论：“日本陆军以为宋哲元为日本买收，实则宋哲元亦支那人也，决不愿日本夺取支那领土，观其态度之暧昧可知也。”曾任日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的专田盛寿则认为，宋哲元是“对蒋对日都做出笑脸，谁也不得罪”，专以维持其在华北的利益。

从1935到1937年，虽然冀察政务委员会在政治和经济上对日方颇多让步，但第29军与驻华北的日本“中国驻屯军”依然摩擦不断。1936年1月，两军士兵为进出朝阳门发生冲突，互相开枪射击。2月，日方借口红军进入山西，要求宋哲元签署“共同防共协定”。5月，日方将“中国驻屯军”兵力扩大至1万余人。6月，两军在丰台火车站因追讨军马发生冲突。7月，大沽口因日军强行进行登陆演

习而发生冲突。8月，因日本浪人擅闯第29军营房引发冲突……一年之中，几无宁日。

面对频发的冲突，宋哲元不是宣称“养病”、躲到天津，就是借口“为母亲祝寿”“为父亲扫墓”前往乐陵，将问题交给手下应付。萧振瀛作为宋哲元对日交涉的主要助手，专门以开空头支票的方式应对日本人。到了无法兑现时，萧振瀛辞职一走了之，宋哲元则以“这是萧某人答应的，宋某人不能代为负责”为理由继续推脱。许多事端就这样大事拖小，小事拖了，热度消退后道歉赔钱了事。这一模式让宋哲元逐渐陷入麻木，以为没有“拖字诀”应付不了的冲突。

1937年5月底，宋哲元为了躲避日方关于允许侨民开矿筑路的纠缠，再度躲回乐陵老家，将政务交给秦德纯、张自忠等分别办理。卢沟桥冲突发生后，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邓哲熙到乐陵促请宋哲元返回北平，宋却说：“只要我们表示一下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同时命令第29军各部“只许抵抗，不许出击”。

此时的宋哲元已经昧于局势变化，没有认识到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抗战决心日趋强硬，也对日本陆军中侵华“扩大派”的权势日炽一无所知。蒋介石在7月间一再致电宋哲元，要求他迅速到保定坐镇指挥，星夜赶筑国防工事，并提醒“倭寇不重信义”，不要再进行谈判，宋哲元却不以为然。他借着日本“中国驻屯军”新任司令官香月清司到任的机会与其进行会晤，表示歉意并商谈“和平协议”，甚至下令撤除北平街头的工事。

但是这一次，妥协没有了往日的效果，反而狠狠抽了宋哲元一记耳光——香月清司本人就是“扩大派”的一员。在与宋哲元沟通议和的同时，他已经要求本土增派兵力。7月26日，日军占领廊坊，两天后悍然袭击了南苑第29军军部驻地，副军长佟凌霄、第132师师长赵登禹阵亡，官兵伤亡2000余人。宋哲元战守无措，相继放弃北平、天津。

退出北平之后，宋哲元被委任为第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1集团军总司令，指挥所部沿平汉、津浦铁路抵抗日军。十万之众的第29军久疏战阵，连战连败，溃退400多公里，到冀南、豫北才站稳脚跟。宋哲元饱受精神压力与折磨，撤到郑州时，终因高血压和轻度中风卧床不起，从此辞去一切实际职务，以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身份退居四川养病。第29军集团也随之分裂，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等将领各自成为一系。

1940年4月5日，宋哲元在绵阳县城病逝，享年54岁。时过境迁，经历了全面抗战初期大片国土沦丧，以及汪精卫叛国投敌在南京成立伪政府的民众，对宋哲元当年在华北与日本人的种种折冲妥协有了新的认识，坊间评论对他坚持国家主权、坚守民族气节的一面多有正面评价。宋哲元逝世后，国民政府高度认可其过往功绩，追赠他为陆军一级上将，在褒扬令中点出宋哲元“膺冀察疆圉重任，时际艰虞，竭诚措置”，蒋介石也在挽联中感叹“砥柱峙中流，终仗威棱摄骄虏；星芒寒五丈，不堪殄瘁痛元良”，对宋哲元一生功绩和往日担当给予高度认可。■

赵登禹

(1898 ~ 1937)

赵登禹，字舜诚，清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六（1898年5月16日）出生于山东曹州。1914年到潼关投入冯玉祥部第16混成旅，逐步擢升至旅长、师长等职。冯玉祥集团在中原大战崩溃后，赵登禹所部被编入第29军，成为冯治安第37师下属的第109旅。1933年长城抗战期间，赵登禹是喜峰口方向的前敌司令官，以指挥大刀队夜袭日军而扬名战场。著名抗日歌曲《大刀进行曲》，即系为第29军大刀队而创作。

长城抗战结束后，第29军的编制从3个师扩充为4个师，赵登禹被宋哲元提升为新编成的第132师师长。从在西北军系统中的资历、地位看，赵登禹远不及平级的另外三名师长冯治安、刘汝明和张自忠，能得此重任，完全是源自宋哲元的提携。因此他历来对宋忠诚有加。

卢沟桥事件发生后，赵登禹于7月25日奉命率所部驰援北平，他本人则乘汽车先行赶到南苑军部报到。7月28日日军进犯南苑时，赵登禹的基本部队第132师尚未赶到，他遵照宋哲元的命令，指挥军属特务旅、第38师的3个团、骑兵第9师第2旅以及军训学生团等部队拼死抵抗。战斗到中午时分，赵登禹接到了撤入北平城的命令。他在向南苑各部队转达此项命令后，依然先行回城，意在与正自固安开来的第132师主力及早会合。12时40分许，赵登禹坐车途经大红门时，遭到日军“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1联队的伏击，中弹身亡，享年39岁。7月31日，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追赠赵登禹为陆军上将。1947年，北平市政府决定将北沟沿大街改名为赵登禹路。（文/王戟）





〔东方 © 林国〕

张自忠：“汉奸”污名下的名将

文 / 宁广传

这位先被污名所累，继而又获平反的上将，究竟有过怎样的离奇经历？

1937年10月8日，国民政府突然发布了一道命令，将冀察政务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代理主任张自忠撤职查办，理由是“放弃责任、迭失守地”。一时间，“汉奸”“逼宫”等说辞全部加诸张自忠身上，俨然一副抗战时期的反面典型。

但就在3年后的1940年7月7日，国民政府又发布了一道命令，内言不久前战死的张自忠“久膺军寄，夙著忠贞，“卢沟桥事变”后，转战前方，屡建奇勋，方冀干城永寄，翊成复兴大业”，不仅对其明令褒扬，还给予了“追晋为陆军上将”的崇高待遇。

这位先被污名所累，继而又获平反的上将，究竟有过怎样的离奇经历？

戎马华北

张自忠，字荃忱，1891年8月11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县唐园村的一户宦宦家庭。他7岁时入私塾，因不安心读书，曾受父亲训斥。父亲病逝于赣榆知县任上后，张自忠才奋发图强，先后就读于县立高等小学堂、天津北洋法政学堂。

在天津读书时，张自忠即秘密加入同盟会，后于1914年9月和几名同学结伴北上奉天，投入北洋陆军第20师当兵。由于上过法政学堂，张自忠受到同乡、时任该师第39旅旅长车震的重视，把他送入随营军事学校速成班学习，并在毕业后任命他为准尉司务长。

1916年6月，张自忠所在的部队因为南下参与护国战争，被改编为湖南护国军第2军第1师，他被师长车震越级提拔为上尉三等参谋官，但不到一个月就因部队解散而返乡赋闲。同年9月，张自忠在车震的推荐下投奔直系第16混成旅旅长冯玉祥，并在冯氏的屡次提拔下，在7年内由一名少尉见习官升至学兵团上校团长。张自忠带兵提倡“治兵先治心”，并注重对所属军官的恩威并施，部下们都十分拥护他。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整编后，将所部改编为国民军第1军。张自忠参与了此次行动，并在之后对直系、奉系、晋系军阀的作战以及北伐战争中屡立战功，一路擢升至第28师师长、第2集团军军官学校校长。北伐胜利后，张自忠又先后担任过第25师师长、国民军第11军副军长、第2方面军第6师师长等职。1930年中原大战战败后，他率部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收编，改任第38师师长。

1933年长城抗战爆发，张自忠奉命率所部在喜峰口抗击日军。这是他生平第一次与日军交锋，部队出发前，他号召全师营以上干部开会，慷慨激昂地说：“日本人并没有三头六臂，只要我们全国军民齐心协力，与日寇拼命，就能将日寇打出中国去。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为国捐躯，重如泰山！”另外他还要求部队出发后“与地方老百姓打成一片，不动老百姓的一草一木；战斗中要节省子

弹，不瞄准敌人不准开枪”。从3月9日到4月15日，张自忠指挥的第38师在喜峰口及附近地区与日军混成第14旅团激战一个多月，直到友军防守的冷口失陷，才奉命撤退到宣化休整。

张自忠因为在喜峰口指挥作战卓有功绩，在1935年被国民政府授予青天白日勋章。此后他指挥第38师在察东、天津等地驻防，并先后兼任过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全省保安司令、天津市市长等职。

“七七”荣辱

1937年7月7日晚，丰台日军与中国军队第

左图：1937年7月下旬，日军突破第29军在北平市郊设置的工事，向守军阵地发动攻击

右图：第38师师长兼天津市市长张自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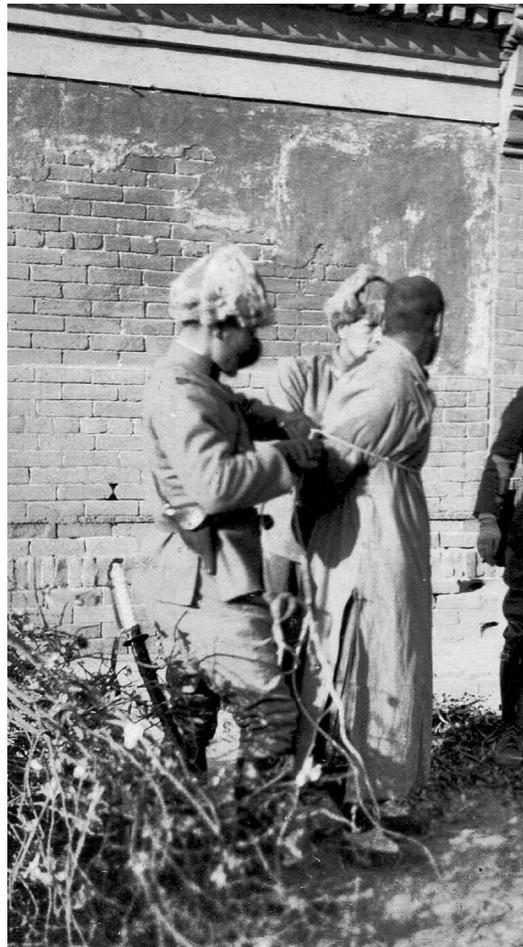


(视觉中国供图)



(文萃/FOTOE供图)

1



2

37师宛平驻军发生冲突，是为卢沟桥事件。此时，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兼第29军军长宋哲元正在山东乐陵省亲，事件的处理于是由北平市长兼冀察绥靖公署总参议秦德纯、第37师师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冯治安、第38师师长兼天津市市长张自忠三人共同主持。

从日方史料中可以发现，在北平谈判中，张自忠并不同意日方颠倒事件责任的解决条件，但在妥协派已经与日方达成此类协议之后，只得接受现实，在7月11日晚8时与日军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久太郎签订了《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但日方并不满足，随即策划扩大事态，拟增派10万部队来华，企图在不引发中日全面战争的情况下武力实现华北五省“特殊化”。

7月14日下午，张自忠应宋哲元要求前往天津参与后续谈判，并担任中方首席谈判代表。此时，宋哲元已经拒绝蒋介石要求他到保定坐镇的指示，直接前往天津，试图与日方就地解决事件。日本“中国驻屯军”新任司令官香月清司顺水推舟，向宋提出了“关于保证将来（合作）之详细事项”，史称《香月细目》。其中以第七条最为要害：“对北平的警备，将来由公安部队负责，城内不得驻屯军队。”宋哲元明白日方今后必定会提出更高要求，且南京当局与第29军内部必然会反对，于是表示“原则上承认没有异议，但要求缓行”。

据此，张自忠在与日军参谋长桥本群谈判时，先后提议以38师、132师或29军特务旅接替北平防务，反对日方提出的罢免河北省政府主席兼37



(新德怀供图)



(知堂中国供图)

3

师师长冯治安的要求，双方形成僵局。

香月继而提出通牒，限到7月19日为止接受解决条件，否则20日日军将“自由行动”。19日晚11时，张自忠偕张允荣向日方呈递《停战协定第三项誓文》，接受一些无关宏旨的条件，但在北平驻军的关键问题上仍不肯让步。日方担心谈判破裂，同意就驻军问题继续谈判，于是张在《誓文》后面附上一句：“又，撤去北平城内的第37师，由冀察主动实行之。”此后，中日双方继续就北平驻军问题谈判，但始终不能达成协议。

日方见张自忠态度强硬，于是重点挑衅张部，从25日起先后进犯廊坊、通县、团河，把第38师拖入事件中。张自忠表态主战，宋哲元随即令其担任北平城防司令，率10个团兵力守卫北平，并令队

伍反攻丰台、廊坊，以造抗战声势，企图进攻一番再视南京当局的态度做出处置。张自忠却积极做好应战准备，一面通知南苑驻军归赵登禹指挥，一面电令在天津的副师长李文田等人：“务望坚守津市，军队须多用奇兵，非极壮烈之牺牲，万不能放弃。”

7月28日，南苑之战发生，第38师特务团与日军发生激战。敌酋香月见第38师抵抗甚力，即派汉奸齐燮元送来《中国驻屯军声明》，不再提北平不驻军的条件，同意第38师一部进驻北平。宋哲元本有不愿率先牺牲、不愿单独牺牲的地方实力派心态，见蒋介石仍令自己移师保定坐镇，又闻徐永昌已经就任石家庄行营主任，断定南京当局定会先牺牲本军、再与日方和谈，于是听从秦德纯的建议，重新与日军媾和。宋哲元令南苑守军停战，调

1. 1940年6月，在枣宜会战中，被日军俘虏的中国伤兵

2. 1937年7月28日，日军进占北平南苑后，将附近民众诬为“中国军队间谍”强行逮捕

3. 1937年7月20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通信参谋铃木京大尉在丰台驻地指挥士兵与下属部队进行野战通话

第38师特务团到北平换防。结果换防部队在大红门和玉带河一带中了日军埋伏，副军长佟凌阁、第132师师长赵登禹阵亡，南苑南部守军也因腹背受敌，被迫突围而去。

此时，香月清司再度对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宋“一是脱离中央，一是离开北平”。宋下令秦德纯以北平市政府的名义，接受日方以保安队维持北平治安的条件，同意将独立27旅改为保安队，并派张璧通知日方。张自忠从潘毓桂处获得消息后，大为愤怒，立即前去阻止，与宋哲元发生激烈争吵。考虑到自己直接出面有被日方胁迫的可能，加上第29军诸将对秦德纯的退让方针有看法，宋哲元最终决定由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和北平市长，继续与日方进行和平谈判。此后南苑失守的消息传来，宋哲元决定连夜偕秦德纯等人移驻保定。此事后来一度被盛传为张自忠“附日逼宫”、企图从宋手中夺权。

7月29日凌晨2时，在天津的第38师向日军发起进攻作战，驻通县的伪冀东政权保安队随即反正，给狂妄的日军以沉重打击。日军猝不及防，见态势不利，佯为接受和平。当天下午1时，宋哲元令第38师退出天津，并通电全国军政要员：“（宋）哲元奉令移保，所有北平军政事宜，统由张师长自忠负责处理。”张自忠亦于当天下午2时起，依次就代理职务，开始进行最后的和平折冲。

张自忠不愿接受北平不驻军的条件。在独立27旅已经改编为北平保安队的情况下，他拟调派驻北苑的独立第39旅进入北平，并请旅长阮玄武担任北平城防司令。不想阮玄武不信任张自忠，当即予以拒绝。

香月清司见张自忠拒绝日方要求，遂于31日将独立第39旅包围缴械。当晚，独立第27旅从北平突围，张自忠就此孤身陷平，但仍在奉宋哲元之命进行最后的和平努力。至此，除张自忠等少数第

29军人员在北平处理“善后”事宜外，军属各部皆根据30日代理军长冯治安（宋哲元以生病为由，命冯治安代理军长）的命令，退守涿县、固安、永清以南地区，采取守势。平津一战，第29军伤亡5000余人，日军公布伤亡1233人。

面对日军继续要求解散冀察政务委员会，并以江朝宗、高凌霨等汉奸发起的北平、天津“地方维持会”接管政权的要求，张自忠一一予以拒绝，但同意将江氏等人纳入冀察政委会，以“杜敌拉拢”，并恢复宋哲元废除的常务委员制度，以贾德耀、张允荣、李思浩、齐燮元、张璧五人为常委，为防止辞职后政权变质打基础。然而，张自忠的让步和举措并不能满足香月清司。8月4日，香月命令城外日军以“道路泥泞”为由，借路穿城而过，并密令逮捕张自忠。张自忠在实力全无的情况下，于5日向常委会辞职，称病避入东交民巷德国医院。8月8日，日军入城，千年古都沦陷。

力战殉国

8月14日，国民政府正式发表《抗战自卫声明》，宣布武装应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七七事变”的处置宣告结束。全国抗战开始后，张自忠设计逃出平津参加抗战，他在北平的折冲虽告失败，又被诬为“亲日派”“主和派”，因此一度引起国人的误解，就连国民政府也下令将其撤职查办。这是他人生中的最低谷。

脱险后，张自忠一度以戴罪之身空挂军政部附的职务。1938年3月徐州会战开始后，张自忠正式复出，担任第59军军长，并在临沂阻击日军立功。对此，国民政府于3月30日发布公告：“张自忠前经明令撤职查办，兹据军事委员会呈称，此次临沂之役，该员奋勇歼敌，树立奇功，拟请撤销前令，鼓励等情。张自忠撤职查办处分应准撤销，用昭激励。”正式为张自忠洗刷耻辱。此后他先后参加了武汉会战、随枣会战和1939年冬季攻势。

1940年5月，枣宜会战爆发，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任命张自忠为右集团总司令，统一指挥第29集团军和第33集团军固守襄河两岸阵地，巩固大贡山南侧各隘路口，以主力控制长寿店以北，伺机击破进犯日军。此前，张自忠曾写下家书，内言：“吾自南下参加作战，濒死者屡矣。濒死而不死，

张自忠在北平的折冲虽告失败，又被诬为“亲日派”“主和派”，因此一度引起国人的误解，就连国民政府也下令将其撤职查办。这是他人生中的最低谷。

是天留吾身以报国耳。吾久在兵间，能习劳苦。或疲惫之极，转念当此国家民族生死存亡关头，吾幸而得为军人，复幸而得在前线，出入枪林弹雨之中，而薄有建树，吾形虽劳苦，心则至慰也。方今日寇益深矣，国益危矣，吾辈军人责亦重矣。吾一日不死，必尽吾一日杀敌之责；敌一日不去，吾必以忠贞至死而已……”做好了殉国的打算。

5月1日，日军第13师团主力对第33集团军正面展开攻击。战至7日，张自忠决定亲自指挥特务营和第74师主力渡襄河至一线督战。10日，日军第13师团得到第39师团增援后再次发起猛攻。战至14日，张自忠再次亲率总部特务营及第74师一个团前往方家集侧击日军，试图切断日军退路。

5月15日，张自忠指挥的部队与日军第39师团一部发生激战。入夜后，日军大部队抵达，迫使张自忠率部向南瓜店转移。16日拂晓，日军步兵第231联队对南瓜店发起进攻。战至下午2时，保

护总部的特务营伤亡殆尽，日军冲入阵地，张自忠随即组织肉搏，于15时伤重而亡，时年50岁。这位一度被认为是“汉奸”的抗日名将，终于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

1940年7月7日，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内言：“陆军上将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久膺军寄，夙著忠贞，“卢沟桥事变”后，转战前方，屡建奇勋，方冀干城永寄，翊成复兴大业。乃以鄂中战役，亲当前锋，抱成仁取义之决心，奋勇截敌，重创喋血，猷复猛进不已，并谆谆以效忠国家民族雪耻复仇助勉部众，终因伤重殉职，全军感痛。政府追怀壮烈，轸悼良深。应予明另褒扬，交军事委员会从优议恤，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国史馆，以示国家笃念忠勋之至意。此令。”同一天，他还被追晋为陆军上将。1947年5月10日国民政府对张自忠实行国葬。1982年4月16日，张自忠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为革命烈士。☑

松果

手作 + 艺术 + 演出 + 亲子 + 旅行 + 美酒

松果生活

与一万个生活家，一起创造美好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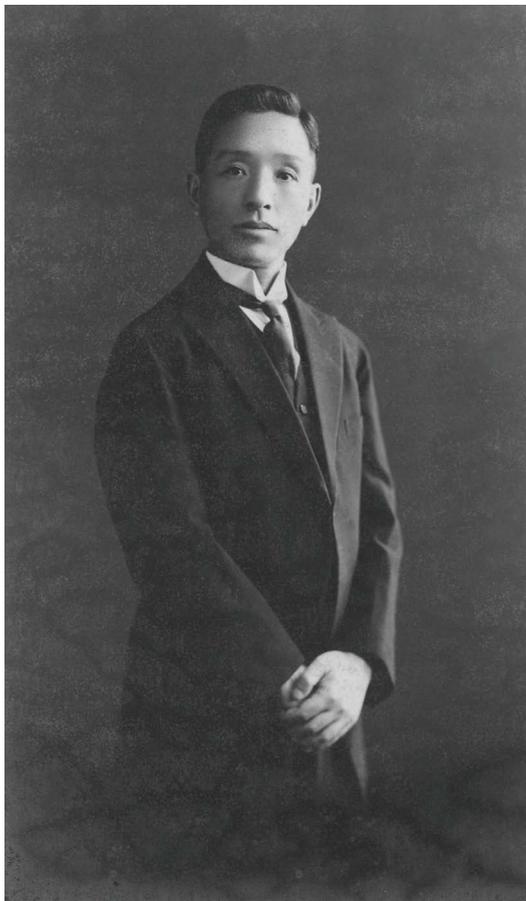
松果是一个舞台，这里有：
有品质的文化活动
富含营养的生活知识
一万个迷人的生活家
有态度的生活方式

扫描关注松果微信

扫描下载松果APP

黄郛：华北危局中的外交官

主笔 / 徐菁菁



北平政委会委员长黄郛（1880~1936）

(Olive Archive/FOTOE 供图)

1933年，日军入侵热河，长城一线失守。黄郛遵蒋介石之命担任北平政委会委员长，主持对日媾和。其媾和的结果是签署《塘沽停战协定》。该协定客观上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洞开了门户。反对者直斥黄郛为“卖国贼”、“亲日派”、软骨头。但他身故后，国民党政府两次给予其特别表彰，这在民国政坛人物中绝无仅有。褒词云：“不避险阻，力任艰难，隐忍求全，用纾祸变，心孤事苦，尤人所难。”黄郛之困亦是“七七事变”之前的中国之困。

再度出山

1936年8月，黄郛因肝癌住进上海宏恩医院。夫人沈亦云回忆，黄郛辞世前，蒋介石到医院探病。他面告黄郛：“抗战准备已过半程，再一二年可全就绪，以前种种委屈，未曾枉做。”沈亦云“不知真个如此，抑系蒋先生对症下药慰情之语”。蒋走后，黄郛感慨：“果能如此，死且无憾。”同年12月6日，黄郛于上海寓所辞世，时年57岁。

1933年4月9日，在莫干山“隐居”的黄郛接连收到蒋介石的急电：“时局艰危至此，兄等有何卓见？”

1933年1月初，关东军占领山海关，2月下旬起接连展开热河及长城线的侵略作战。短短数月，日本占榆关（山海关）、陷热河、扰滦东，进窥平津，华北形势危于累卵。山西省主席徐永昌在给汪精卫的电报中分析时局：“平津之失与不失，只恃敌之来与不来。”南京国民政府认为，保全平津是当务之急。东北被日本强占后，华北的地位更加凸显。1933年，华北仅关税、盐税、统税收入分别占全国该项总收入的20%、20%和15%，三项税收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1/6。国防会议认为：“平津若失，则海关收入，骤形短缩，其他一切筹款办法，亦惟有更形拮据。”不仅如此，在政治上，“华北远非东北可比”，其得失立刻影响全国。徐永昌在致蒋介石的电报中说，如平津失守，“即等于华北整个沦亡，人心失所依据，其促成第二个满洲国亦意中事”。

若认为战不能取胜，何以保平津？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更多地把中日矛盾的解决寄希望于国际联盟。日军进攻长城东段各口时，南京政府外交部曾呼吁英、美立即以最有效之方法制止日军之蛮横与暴行，但其结果只能令蒋介石感叹：“列强所谓助我者，仅予日本以一骂，而日本必即还我以一刀。”1933年3月27日，日本宣布退出国联。以国联制约日本之策略已至穷途末路。28日，蒋介石与汪精卫达成“剿共重于抗战”的共识，决定同日本直接交涉，“缓和侵略，保存华北，稍纾喘息”。

而直接交涉，蒋、汪二人亦有顾虑。“九一八事变”以来，直接交涉因涉嫌承认日本既得侵略利益，一直为舆论所反对，极为敏感。1932年，日本进攻锦州时，时任外交部长顾维钧就建议中日直接交涉，划锦州为中立区，避免导



〔东方IC供图〕

1937年7月，第29军37师219团士兵在卢沟桥畔构筑的机枪阵地

左图：1933年1月，进占榆关的关东军士兵在著名的山海关城楼上插上日本国旗

右图：驻防华北的东北军士兵正在保养枪支



(Betmann/视觉中国 供图)

致更严重之冲突。不料这一建议导致舆论群起反对，政府各派趁机内斗，蒋、汪离职。至平津危机迫在眉睫，军事委员会国防计划委员会秘书长翁文灏如此描述当权者的为难：“绝对的战——武力战争收回失地，或绝对的和——签字承认屈服，这两条路都是不可能的。”他提出，需要找到一个方针“利取其重，害取其轻，权衡轻重”。而这个寻找和执行方针的人势必付出代价，必须“不足计较”——“一时之毁誉，一身之进退。”

外交部长罗文干已明确表示反对与日直接交涉。他认为，在丢失东北土地的情况下，“除努力收复失地外，复有何交涉可言？”蒋、汪遂决意绕开外交部与日本接触。那么，谁是最合适的人选？蒋介石把眼光放在了自己最为信任的“兄长”黄郛身上。

黄郛原名绍麟，字膺白，1880年3月8日生于浙江绍兴，年少时家道中落，发愤读书，1905年受清政府选派赴日，入东京振武学校学习军事。是年8月，黄郛参加了孙中山创立的中国同盟会并负责掌管会员名册。1907年，黄郛在发展会员的过程中与蒋介石相识。1911年11月，陈其美在上海发动

起义，黄、蒋二人赴沪相助，三人结为盟兄弟，以陈为长，黄次之，蒋为幼。

蒋介石对黄郛主持与日交涉寄予厚望，出于多重原因。首先，黄郛是同盟会元老，资历颇深。他曾于1921年出任北洋政府华盛顿会议的代表团顾问；1923年2月入张绍曾内阁，署理外交总长。1924年，他协助冯玉祥领导“北京政变”，代理内阁总理，并摄行总统职权。更重要的是，多年来，黄郛虽与国民党关系紧密，但他从未入党——夫人沈亦云在回忆录里说他“始终只愿做一客卿，无意参与党的政治”。1931年12月，黄郛曾给蒋介石写过一封长信，劝说蒋取消训政、早行宪政。这和蒋介石一党专政、党外无党的想法大相径庭。但在与日交涉的事务上，黄郛相对独立的身份或可以减少国民党政府的舆论压力。再者，黄郛早年旅居日本，与日本政界人士多有往来，被日本人视为中国人中“理解日本之第一人”。《大公报》曾评价说，黄郛是“九一八事变”以后唯一尚可与日本议论大局之人。

事实上，华北危机之前，蒋介石就曾力邀黄郛出山，北上主持事务。1932年8月3日，国民党中



(东方IC供图)

央会议通过了以黄郛为北平故宫博物院理事长的任命，然而黄郛随即电辞。8月13日，蒋致电黄郛劝说道：“今后华北政局，无论外交、军事、政治方面均益加重要，特请吾兄北上匡助，代为主持。”但黄郛不为所动。

与日交涉，黄郛吃过大亏。1928年，蒋介石领导国民革命军北伐。4月21日，日本为阻挠北伐，以保护侨民为名，派兵进驻济南、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要求北伐军绕道济南北上。时任外交部长黄郛奉命与日本方面交涉，但日方置之不理。国民革命军于5月1日克复济南后，日军于5月3日派兵侵入中国政府所设的山东交涉署，将交涉员蔡公时割去耳鼻后枪杀，并杀害交涉署全部职员，同时进攻国民革命军驻地，在济南城内肆意焚掠屠戮。中国民众被焚杀死亡者达1.7万余人，受伤者2000余

人，被俘者5000余人，史称“济南惨案”（又称“五三惨案”）。惨案发生后，国民党召开会议，确认优先国内统一，将外交纠纷暂且搁置。黄郛再次奉命前往交涉，然而“日方态度异常傲慢”。5月5日，日本飞机又轰炸了济南。

蒋介石的妥协策略受到各方强烈指责。为纾缓压力，5月20日，蒋介石致电黄郛：“请兄暂行辞职，并望从速，否则各国外交也受影响。”他还解释说：“膺白外交失败了，一般老先生均不满意。”见蒋介石如此推卸责任，黄郛随即复电辞去所有职务。1928年12月，他在给国民党要员张群的书信中坦言自己的失望：“济案所受刺激，公私两项皆为生平未有之伤心事……令我没齿不能忘。”次年，蒋介石组织导淮委员会治理淮河，自任委员长，邀黄郛为副委员长，劝他“为三十年友谊勿却”。黄决然回电：

“欲保三十年友谊于不敝，故不必共事也。”

辞去官职后，黄郛“彷徨不知所之”，以研习佛经排遣苦闷。沈亦云拿辛弃疾的词安慰丈夫：“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此。知我者，二三子。”一家三口遂定居莫干山办学校、搞乡建。1933年4月9日，黄郛收到蒋介石急电时，已“隐居”莫干山5年。

为说服黄郛出山，蒋以电文三顾茅庐。4月11日，他在第二份电报中说：“举世处境最艰苦者莫弟若，层累曲折也太多，深盼兄即日命驾来南昌详商一切。”三天后，他又去一电：“兄如不愿任北事，能否以私人名义赴北方襄助？”这一次，黄郛动了心。

黄郛久居山野，但并非不问国事。“九一八事变”后，他自责退隐山林的消极行为是把身体给了帝国主义，精神给了释迦牟尼。黄郛和一帮同道组织新中国建设学会，发行《复兴月刊》。在发刊词中，他写道：“试问吾四万万人同立在此‘不沦亡，即复兴’之分水岭上，究竟何以自处？吾敢断言：无男无女，无老无幼，全国中无一人甘沦为亡国之民，故吾又不能不要求：无男无女，无老无幼，全国中无一人不应起而共负建设之责。”

华北危局，黄郛与蒋介石、汪精卫的看法类似。他认为，中国的武器和训练与日本相差太远，长城一线的作战中，日方所持现代化武器装备，决非一年多前淞沪肉搏战可比；期望各国仗义出兵相助，诉之国联，更是犹如“涸辙之鲋鱼待东海之大水”。解决危机之道，唯有与日谈判。后来北上前，黄郛在接受上海《大晚报》负责人曾虚白采访，解释媾和的考虑：“日军进逼，正像房屋密集的市区遭遇了大火，无论你有怎样精良完备的消防器材，和怎样勇敢熟练的消防人员，要在着火地区内消灭火种是不可能的。目前唯一救急的办法，只有把快烧到的房屋拆掉它，打出一条空巷，不让火源再蔓延过来。”他向曾虚白保证说，日本的得寸进尺不会有止境，而政府忍辱负重、争取时间延缓战火之爆发却有退无可退的止境，因此，抗日必战，政府早具决心，现在只争时间之迟早而已。

4月25日，黄郛应邀到南昌面见蒋介石。根据曾虚白自传中的记录，蒋见黄郛，第一句话即说：“膺白兄，我们是心心相印的密友。可是今天我请你来，是要请你跳火坑，你能了解我吗？”这句话没有吓倒黄郛。“勿以为我们长可在山中做‘事外逸民’。”他在莫干山别过妻子沈亦云时说，“国家垮下来将无山可入，不经努力，他日必悔，尽

最后之力，则心安无怨。”

无计可施

1933年5月14日，黄郛北上复命就职，出任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他虽知此行是“跳火坑”，但仍有一丝期望。沈亦云回忆，1933年时，黄郛北行的愿望是“先求安定”“继图振作”。

多年来，黄郛和日本政治家有很好的私交。1929年出任驻华公使的佐分利贞男和黄郛一样，都认为中日之间必须相忍为治。佐分利曾进言时任首相滨口雄幸与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今后应走对华协调路线，不可过分干涉国民政府，将国民政府与欧洲国家一视同仁地对待。”然而，这一观点遭到了日本陆军的强烈反对。1929年11月，刚刚出任日本驻华公使两个月的佐分利贞男，在回国请示修订中日新约方针时，蹊跷地在箱根富士屋饭店开枪“自杀”身亡。

“九一八事变”后出使中国的重光葵在1933年5月解职归国前，曾私下对黄郛透露：日本的军事力量已远较十年前为强；日本军界下层的军佐劫持上层，建功立业之心空前膨胀，对中国开爨必不可免。重光葵说：此乃友谊，非外交官的话。黄郛知道中日难免一战，但依然抱有期望。他曾经感叹地说过：中国真是不幸，两个邻居（苏俄和日本）都不是善类，如果是个家，我早已搬。如今是个不可搬的国，只得先顾缓急轻重。他对苏俄深抱戒心，认为“中日关系与中苏关系比，无论如何不应该放弃日本这一条路”。他始终认为，中日关系有可能达到当时“英美”和“德奥”那样的兼容——即便有争，也能相互尊重。

然而此次北上议和之艰难远超黄郛的预测。沈亦云后来回忆丈夫与日交涉的种种：“膺白当华北之任，他本人有两个弱点：一是‘真’，他‘真’而日本少壮军人毫无诚意；二是‘想解决问题’，而日本人正时时处处制造问题，永无止境。”

真正主导局面的并不是黄郛所熟悉的日本外交官僚。北上行前，黄郛在上海与日本驻华武官根本博三次会谈而未有结果。后者告诉黄郛，中方若求和，得同在平津的日军接洽。关东军在黄郛北上之时蓄意加强了攻势。5月17日黄郛抵达北平时，日军攻陷唐山；18、19两日，密云、三河、遵化、薊县相继失陷，北平已成兵临城下之势。

5月21日，爱国青年赵敬时激于义愤持刀砍伤日兵，日方借故拒绝和黄郛会谈。同日，香河失陷，

日军离通州只4英里，平津市民纷纷趋避出城。夜间，除第17军军长徐庭瑶固守北平外，其他军政机关也撤往保定。22日，黄郛在给汪精卫的电报中描述他的处境：“近日对方态度骤变，……连日专制小问题迫我，并无条件提出。略取平津，虽尚未必，而包围平津，迫我接受严酷之条件，不可不防。”然而，不可不防，以何设防？当晚10时，汪回电，只说明了谈判的底线：“弟以为除签字于承认伪国，割让四省之条件外，其他条件，皆可答应。”

事实证明，谈判的主动权皆在日方手中。令黄郛意外的是，是夜，日方突然连夜邀黄郛至海军武官藤原喜代间住处商洽停战条件。双方争执至次日晨，形成了一份初步停战条款。幕后打破僵局的是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战后发现的函电证明，当时日方确有占领平津的计划，但最终还是放弃，原因主要有三点：当时伪满内部，东北义勇军活跃，苏联势力犹在，新占之地区亦未及消化；罗斯福、宋子文5月中旬发表联合声明，美国的态度对日产生一定压力。再者，日本最希望在华北建立亲日伪满政权。黄郛出山掌管华北政务，使日本方面抱有很大幻想。5月21日，关东军致电军部建议：此刻时机有利，应速签停战协定。如迁延时日，中央军得以重建，平津秩序恢复，再发动军事行动，理由不足且很困难，恐终将悄然撤兵。同日，参谋本部复电武藤信义，同意进行停战谈判。

南京方面不可接受的“承认伪国，割让四省”最终没有出现在停战协议中，也是因为日方的自有考虑。5月25日，对华稳健派的代表人物日本公使有吉明替黄郛说了话，他提出：“以国民党政策的和缓、对排日活动的弹压来改善河北的中日关系，进而策划全面改善两国关系，主要是黄郛自己的设想，但这绝不代表黄郛可以缔结包含承认‘满洲国’条款的协定。一旦强迫签订此种协定，将让国民党政府和黄郛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反而可能导致河北事态的无法收拾。同时还会招致国民党内部反对对日政策势力的强化，带来逆转两国关系改善势头的危险。”

5月31日早晨，天气湿热无比。塘沽火车站的侧线上，停着长长一列专列。列车两端为铁甲车，中间是一长串豪华卧铺车厢，窗帘低垂。这辆列车里坐的是南京国民政府代表熊斌。他带着中国代表团走过塘沽窄窄的街道，走到日本领事馆。在阳光下等了近10分钟之后，才被放行。

对中方代表来说，这次签字仪式处处隐含着羞

武藤信义

(1868 ~ 1933)

武藤信义系日本佐贺县人，早年曾有志于成为教师，嗣后受弥漫日本全国上下的尚武气氛影响，改为入陆军教导团当兵，1892年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3期，日后又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陆军大学第13期。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期间，他都曾来华参战，对中国东北一带情形颇有了解。加之曾从事对俄谍报工作的关系，他对俄语也相当精通，曾任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一战”末期还参与过对西伯利亚的军事干涉。

明治、大正时代的日本陆军高层大体被长州藩出身的军人所把持。武藤信义虽然一向以业绩不俗著称，在1926年就晋升为大将，但担任实权职位的时间并不长。1932年初辞去陆军教育总监一职后，他的身份仅是半退休的军事参议官。但随着日本全面入侵东北以及炮制“满洲国”的阴谋成形，对东北形势知之甚详，在1926年还曾短暂担任过关东军司令官的武藤意外获得重新起用，在1932年8月被任命为关东军司令官、关东厅长官兼驻伪满首任大使，成为少见的身兼军务、行政、外交三职的关键人物，为明治以来所罕见。

为了在军事上为“满洲国”建立屏障，1933年初，武藤下达向热河和长城一线进攻的命令。关东军主力在3个月内陆续击败在华北的东北军、西北军和北上增援的中央军一部，占领热河全境，并兵临北平城下。不过由于奉天特务机关长板垣征四郎策动华北暴动的阴谋未能奏效，武藤最终授权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与中方签订了《塘沽协定》，结束军事行动。此时的武藤已经年满65岁，按例应退出现役，不过他在当年7月即患上黄疸，于8月底病死于长春。为表彰其“功绩”，昭和天皇在其弥留之际授予他勋一等旭日桐花大绶章、功一级金鵄勋章和男爵爵位。（文/刘怡）



辱之意——在门口迎接中方代表的日本官员个个级别都低于中方代表。日方代表参谋副长冈村宁次是少将，级别也低于中方首席代表熊斌中将。不仅如此，正式会议开始后，冈村提出《停战协定》草案，告诉中方：“这是关东军的最后方案，一字不容变更，中国代表应在一个半小时内，即上午11时以前，做出承诺与否的答复。”熊斌提出异议：“在撤兵区域内，如果出现扰乱治安的武装组织，中国军队可作必要



(视觉中国 供图)

上图：1937年7月，第29军37师219团的一名士兵持枪警戒远处的平汉铁路卢沟铁桥

下图：1933年初，日本关东军装甲部队开入热河农村



(视觉中国 供图)

处置。”但是冈村不予理睬。中方无任何与对方较量的砝码，僵持至10点50分，距日方要求截止时间还有10分钟的时候，熊斌无奈签字，未做任何更改。

这份贯彻了国民政府“限于军事、不涉政治”原则的协议要求中国军队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不得前进，又不做一切挑战扰乱之举动。日军为确悉第一项实行之情形，可用飞机或其他方法实行视察，中国方面应行保护，并予以便利。

冈村宁次在回忆录里说，协议的签署“气氛和睦”，“于是，昨日之敌化为今日之友”。在现场采访的《纽约时报》记者哈雷特·阿班（Hallett Abend）记录道：“签署完毕，日本人端来了香槟和葡萄酒庆祝，而这杯酒对中国人实在难以咽下，因为他们等于把整个华北拱手让给了日本。所以签完字后，这几位中国人冒着尘土，一路蹒跚地回到专列。”

委屈无以“求全”

1934年4月初，黄郛南下到南昌晋见蒋介石。蒋正忙于对江西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并没有精力和心思与黄郛商讨华北问题。黄郛汇报了华北严重的局势，提出无能为力要求辞职。蒋说：“你在华北辛苦了，请你一定坚持下去，不要管别人怎么议论。等我将江西共匪剿灭，我再全力对付倭寇。”6月，蒋介石与黄郛再次会晤于杭州，黄郛再次向蒋提出了辞职要求。蒋见黄郛困顿不堪，终于答应他不必再回北平。黄郛从蒋处夜归，告知沈亦云，夫妻两人如释重负。不料次日，蒋介石亲自登门，收回了前一晚的承诺。沈亦云质问蒋介石为何出尔反尔，蒋介石赔笑道：“膺白北上，是为党国负责，你为什么一定要阻止呢？”沈亦云又问：“辱国差使，宜派人轮流充当，为什么只让膺白一人独担？”蒋答道：“你既学佛，当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旨。”黄郛默然同意上路。

“吾人以弱者地位应付强者，既不能以理争又不能以力争，只好强颜以好意奉求。”《塘沽停战协定》只是一个开始。协议签署后，日方开始围绕协议善后问题，以各种方式侵蚀华北。1933年7月，黄郛为了求得让日军撤离停战区，支付编遣善后款48.4万元，并不得不委任伪军李际春为战区军事编练委员长。

1933年11月，冈村宁次一行抵达北平，向黄郛出示《关于北支善后交涉商定案》草案一份，并

声言本案为关东军再三审议决定者，中方只可以为文字之修正。草案内容主要包括在长城各隘口警备权属于日、伪满洲国；在接收区域内，中国允许伪满洲国在山海关、古北口、喜峰口、潘家口、冷口、界岭口设置必要的各种机关，并给以最善意的援助；中国迅速委派代表与伪满洲国交涉通商贸易、交通通讯、航空联络等问题。冈村宁次表示“满洲国”已经日本天皇诏策承认，有日本一日，即有“满洲国”一日。黄郛坚持无论何种方案，其内容如带有承认“满洲国”之意味者，在我方立场上绝办不到。

然而，双方代表前后合计七轮会谈，日方动辄以谈判破裂相要挟，最终达成的两份非正式文件，其实质内容和日本最初提案完全一样。此后，日方又在通车、通邮、设关、通航等问题上步步紧逼，企图通过这些问题让中方彻底承认伪满洲国之存在。黄郛等人百般周旋，在协定中尽量做到排除“伪满洲国”字样，但在事实上已是对伪满洲国的默认。

黄郛深感内外皆穷于应付。他在给蒋、汪的电文中说：“郛等殚精竭虑，欲为国家多争尺寸之失地而未能，彷徨午夜，相对凄戚。”他痛陈自己的无能为力：“我既无实力以取消伪国之存在，我又何能凭口舌以阻止伪国之进行！深盼能使各方了解实际环境，外瞻内审，共济艰危。”

黄郛渴望南京政府“共济艰危”，但蒋介石当时的首要大事在于剿共，也无力与日本周旋，黄郛不但是孤立无援，还要为蒋、汪二人背书。将对日谈判事务全权交给黄郛后，汪精卫怕黄郛不敢承担，特电黄郛：“弟决不听兄独任其难。弟必挺身负责。”蒋介石也致电何应钦、黄郛，许诺：“事已至此，委曲求全，原非得已，中正自当负责。”然而在《塘沽停战协定》谈判期间，蒋又在电文中质疑黄郛的工作，放高调说：“最高无上之决心，不可须臾或忘。弟以为不有一北平死战，决不能满倭寇之欲，亦不能得国人谅解也。”黄郛看出个中私心，痛心回电：“弟既强我以肩此重任，弟必给我以同等信用。”“希望今后彼此真实地遵守‘共尝艰苦’之旧约，勿专务表面激励之词，使后世之单阅电文者，疑爱国者为弟，误国者为兄也。”

蒋介石希望黄郛能够做到“委曲求全”，但与日交涉越久，黄郛越认识到，时局之下，委屈根本无以求全。

1934年6月1日晚，有人向黄郛上海住宅园中投掷哑弹一枚。2日，黄郛接到投弹者书信一封：“若

有吉明

(1876 ~ 1937)

有吉明系日本京都府人，毕业于东京高等商业学校（一桥大学前身）专攻部，早年曾在日本驻釜山领事厅、驻英国大使馆、驻上海领事馆等机构担任过中级外交官，累计驻华的时间超过16年。在担任上海总领事任内，他曾亲历过辛亥革命以及对北洋政府的交涉，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形知之甚详。20年代初，

币原喜重郎出任日本外相，奉行遵守国际条约、在对华政策上与英美力求一致的“协调外交”路线。有吉作为“协调外交”的重要执行者，在担任驻国联代表期间为东京赢得了较好的国际形象，因此被视为外交稳健派。

1932年，为缓和因“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而急剧转冷的中日关系，素有“知华”之名的有吉被任命为驻中国特命全权公使，1935年中日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之后，他又成为首任驻华大使。这一时期，日本政府对渐进蚕食华北的“协和外交”尚抱有幻想，有吉作为稳健派代表，对此持赞成态度，并努力加以促成。1933年他曾向新任外相广田弘毅呈递备忘录，认为在黄郛、汪精卫等中国高层人士的努力下，中日关系有逐渐缓和的可能；日本应当恢复“协调外交”时代以经济蚕食为主的方针，暂时放缓对华北的军事入侵。在1934年中日关于山海关铁路通车问题的谈判中，他也对中方的主权诉求表示谅解，促成两国达成协议。

作为华北漩涡的当事人之一，有吉奉行的稳健路线在中日两国都面临重重困难。对南京政府而言，即使是相对“怀柔”的经济、外交渗透，依旧构成对中国领土和经济统一的破坏；在1935年成功实施币制改革、军事上的备战措施也全面启动之后，有吉所寄望的亲日派政要逐步隐退，中国方面的态度开始趋于强硬。而在日本的激进派军人看来，将华北问题局部化的安排收效太慢，远不足以满足其扩张野心。到了1935年底，随着绥远战事的发生，有吉自感已经无力抗衡来自军人集团的压力，遂于次年3月自行辞职。回国后他曾批评广田内阁日益张狂的对华政策，称“国家的国格，犹如个人的人格”，应当对中国的国格给予尊重。1937年6月他因病去世后，中国《申报》等媒体曾给予其积极评价。（文/刘怡）



不痛改前非，勾结一二所谓现在首脑国贼，断送国土，当再进一步。”末署中华青年铁血救国团上海支部。7月1日，因与日方的通车协议生效，平沈路通车。车行至塘沽以东的茶淀时被炸，死伤乘客16人。7月7日，黄郛在给汪精卫的电文中反思妥协政策是否还有维系的可能：“去年，彼方乘战胜之余，气焰万丈，实已无理可喻。弟装矮人，已一年余。通车办后，苟再不略伸伸腰，不独弟自身将不保，国家亦极受损。”黄郛决定“伸一伸腰”。17日，他致电蒋介石及汪精卫，告诉他们他已派人同冈村宁次谈判，如情势顺利，要求无条件撤销《塘沽停战协定》，不然退一步则要求日方诚实遵守，不扩大解释，不曲为解释。这些要求自然全被日方推翻。黄郛在29日致汪精卫的电文中极为失望地说：“日方之刁难细工，真是可恶，而又可怕！”

1934年8月13日，天津《大公报》记者王芸生采访了黄郛。他向黄表示：“北方人士多盼望黄早日北返，冀以减少战区内民众痛苦。”黄郛感慨地答道：“恐怕无补于大局啊！”

他沉痛地向王说：“这一年的经过在明了国家情况的人，当然能够谅解，一般人则以为我黄某天生贱骨头，甘心做卖国贼。对外未曾做什么事，对内却须时时做解释工夫，真是痛苦万分。一年以来对内对外，尽做矮人，我并非不知道伸腰！只是伸伸腰之后有什么善后办法？为国家设想，不能那样冒险。”他停顿了一下，控制激动的情绪，继续说：“我现在好比打网球的球。日本人说：黄先生你若是没有办法，还不如请你趁早躲开，免得碍我们的事！一球拍把我拍到南方来。到了南方，逢人便问：‘膺白，你什么时候回去？’又一球拍把我拍回北方去。但一谈到办法，便好像我向中央讨债，夹在这两种心理中间，能办出什么成绩来？对方（日本）气量是小的，力是大的，而欲无穷。国人则眼光是短的，调子是高的，肩头不负责任。我的困难可知，且挂着华北政整会的招牌，办理对日本关东军的外交，北方各省的事情，无论什么都可以找到头上来，但结果是什么事都管不了！”

1934年，日本方面已经抛弃了黄郛建立亲日政权的幻想。对华北有所图谋的日本通过一系列偶发事件，开始驱逐国民党势力。1934年9月，关东军向国民党察哈尔当局提出在察东划界，要求“察东中国军队退长城线以西以南，长城线以东以北由日方设警”，遭到中方的严词拒绝。日方又要求可以在

上述各村“行军”，亦未得逞。11月，关东军唆使一部分伪满洲国伪军向长梁进攻。1935年1月15日，伪满“自卫团”与驻防察哈尔省沽源县的国民党29军宋哲元部发生“冲突”。宋哲元马上请黄郛出面与日本交涉。然而双方刚刚谈判，又发生了因日伪军在察东劫掠百姓而被29军官兵收缴40人武器的事件。关东军借此兵分两路向察东大举进攻。

1935年5月初，天津日租界《国权报》社长胡恩溥和《振报》社长白逾桓相继被刺杀。日方借口这是中国人民的排日行为，促使地方政府严加注意，否则日方将采取自卫行动。

这年，4月底，黄郛发长电给重庆行营秘书长杨永泰，要他转告蒋局势的变化，指出前因察东事件，宋哲元“已慑服”，“且已密聘日籍顾问”，日方认为他比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易于利用而有力”。“最近日方急进派有公然主张驱逐黄郛政权及暗杀殷同（北宁铁路管理局局长）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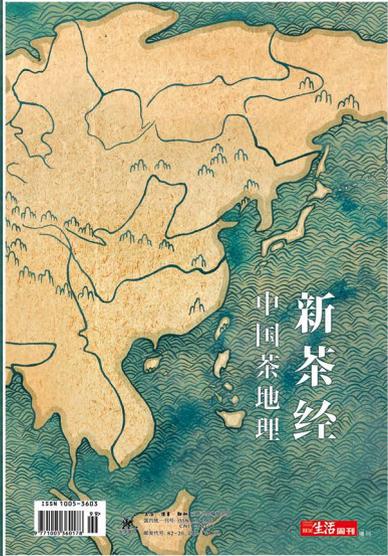
5月，绝望已极、身患肝癌的黄郛南下，决心此生终老莫干山。但他仍于7月22日再次致电杨永泰，提醒华北局势之复杂：“今日国内政情，华北囿于一时局部厉害之偏见，各动其所动；中央困于多头横议之组织环境，各静其所静，故已形成中枢无主，地方

无耻之现象。”他指出，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苟延残喘，“小则端拱无为，徒耗巨额之经费；大则为人挟持，酿成甚大之流弊”，“速电中央断然下令结束为宜”。

1935年7月，何应钦与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署《何梅协定》，国民政府中央部队和宪兵撤出北平和河北省。蒋介石嫡系的中央军撤走后，出面填补空白的，是第29军军长宋哲元。1935年8月28日，国民政府任命第29军军长宋哲元为平津卫戍总司令，次日裁撤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华北重现出长城抗战以前地方实力派拥兵自重的局面。

其实对此时的蒋介石来说，“委屈”也已至最后一步。这年6月28日，他在庐山接待了《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哈雷特·阿班。听阿班讲完他在东北的见闻后，蒋介石并没有马上向这位美国记者透露什么计划，“但从他的样子看，这一次，他已下定决心，不会屈服于日本的压力，而将战斗到底”。蒋介石告诉阿班，他意识到，如果任由日本占领华北而不作抵抗，他将失去中国的民心，也会失去手下大多将领的支持。☑

（参考资料：《亦云回忆》，沈亦云著；《和战之争与塘沽协定》，李凤琴著；《黄郛与塘沽协定善后交涉》，杨天石著）



新茶经
中国茶地理

新茶经

中国茶地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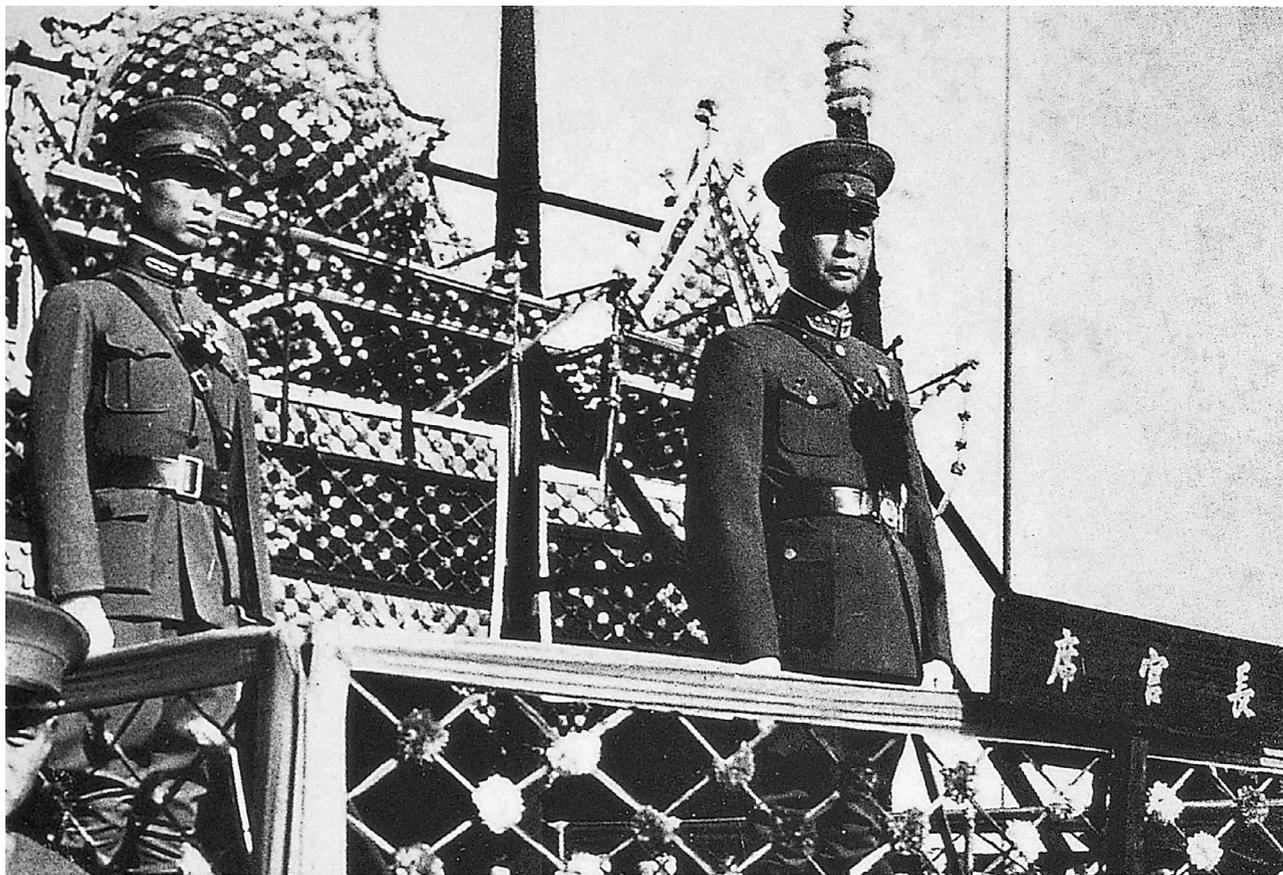
茶叶起源于中国，它原生于澜沧江畔的原始森林中，亿万年间一路向东迁徙，覆盖南中国的大部分省份。

一杯好茶，离不开地理、风土、气候、技艺的共同作用。《新茶经》以地理考察的方式讲述中国茶的故事。

历时七年，写作者十数人，足迹深入皖、浙、川、闽、滇、鄂、桂七省市，倾尽心力，无一篇不是亲自考察所得。



《三联生活周刊》天猫旗舰店



(文化传播/FOTOFE供图)

殷汝耕：投机者的覆灭

主笔 / 徐菁菁

当时的华北可谓中国的多事之地。投机政客、军阀余部云集平津，加上日本人的策动，情势扑朔迷离。翻天覆地时代的大潮眼见将滚滚而至，而潮水究竟要往哪里走，每个人自有掂量。

乐极生悲

1937年7月28日夜，在距北平百里之遥的通州，日本特务机关长细木繁中佐赶到通州文庙。通州文庙是当时“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所在地。细木繁

十万火急地提醒“自治政府”主席殷汝耕：“二张不稳”——“二张”指的是“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保安队”第一、第二总队队长张庆余和张砚田。细木繁要求殷汝耕紧急处置。殷却不以为然：“他们都是没娘的儿子，除了冀东，无处逃生，可以放心！”

时年54岁的殷汝耕或许认为，时下，他人生正在走向巅峰，区区两位保安队队长并无胆量妨碍他的似锦前程。1935年11月，他在日本方面的授意下建立傀儡政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辖管冀东22县及唐山市、秦皇岛市，人口800万，面积3万平方公里。但过去近两年时间里，冀东并不完全掌握在殷汝耕的手里。以通州为例，当时的武装力量

有三支：一是日本人的势力，包括日本警备队、特务机关宪兵队；二是“自治政府”下属的保安队；第三支是驻扎城外的29军独立第39旅第2团第1营。第29军军长宋哲元卫戍平津、拥兵自重，一直是日本方面看重的拉拢对象。关东军参谋专田盛寿是一手策划“华北自治”的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助手。他后来回忆，土肥原曾亲口向宋哲元许诺，如果宋愿意加入傀儡政权，就让殷汝耕做宋的部下。

但在7月28日这天晚上，形势已经大变。“七七事变”发生后，中日双方和谈破裂。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讲话，19日，日军动员本土的3个师团进入华北。27日深夜，南苑之战爆发。28日凌晨，日军总攻南苑。到这天晚上，29军副军长佟凌阁和第132师师长赵登禹都牺牲了，宋哲元撤回保定，平津的陷落大势已定。殷汝耕不难想象，日本人正在全面控制华北和平津，在未来版图扩大了傀儡政权中，自己将是无人可以一较高下的一把手。

然而无论是土肥原贤二还是殷汝耕都未能看到一种更为宏大的历史进程所呈现的蛛丝马迹。“冀东保安队”前身是河北省特种警察部队。冀东在《塘沽协定》后被划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驻军，只能由警察维持治安。1933年夏，蒋介石密令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以省政府名义建立特种警察部队。“冀东保安队”虽列在傀儡政权名下，但哗变事件时有发生。1936年底，驻昌黎的官兵就发生过三次哗变，最多次涉及400人。

张庆余和张砚田领导的驻通州的保安队第一、第二总队大部分人员来自原东北军，背负国仇家恨，与日军矛盾由来已久。1936年8月27日，张砚田部第四分队百余人哗变。在通州城内保安队士兵常与日本特务、“浪人”发生冲突。

殷汝耕对张庆余、张砚田等人早有戒心。张庆余、张砚田曾与教导总队长沈维干密谋设立一个与殷汝耕并驾齐驱的军务长官，以便掌握更多军权，但此计被殷汝耕知晓。或许根据殷汝耕的一贯逻辑，他认为这不过是一场官场中司空见惯的单纯的权力争夺。他托人从中疏解，并多次宴请二张，张庆余、张砚田也表现出了尽释前嫌的顺从。但殷汝耕并不知晓，冀东伪政权成立之初，张庆余曾密派亲信副官长孟润生赴保定向任河北省主席、兼天津市警备司令的商震请示应对之策。商震嘱其目前不宜与殷汝耕决裂，暂时虚与委蛇。1936年初，通过原冯玉祥国民军宿将、河北省哥老会首领之一张树声斡旋，

张庆余、张砚田曾赴天津与宋哲元秘密接触。宋哲元对二人爱国和抗日态度表示欢迎，希望他们坚定立场，强化军队训练，做好准备工作，并赠予每人1万元经费。就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张庆余派心腹刘春台密往北平面见29军37师师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的冯治安。冯治安请他于中日开战时一面出其不意在通州起义，一面分兵侧击丰台，起到夹击效果。29军参谋长张樾亭已经将张庆余、张砚田所部编入29军战斗序列。

细木繁的担忧来自一场“不合作”。1937年7月27日凌晨，驻通州日军突然向29军发动攻击。然而部署在通州旧城南门的保安队并未像日本方面安排的那样截击29军，只是对空鸣枪放炮虚张声势，29军得以安全撤离。日军对保安队甚为不满。当日9时，日军12架飞机轰炸旧城南门外保安队教导总队营地，保安队十余人伤亡，房屋被炸毁。

事已至此，张庆余、张砚田等人秘密集合，认为不能坐以待毙。他们将起义指挥机关设在县城北关，规定以午夜进攻日军兵营的枪声为起义信号，兵分三路同时行动。28日午夜，起义信号响起，枪声大作，起义部队迅速攻占特务机关，细木繁被乱枪击毙，日本特务机关人员全部被歼。

起义军冲进通州文庙的时候，细木繁刚刚离开不到一个小时。殷汝耕听到枪声，连忙呼唤卫队长，卫队长早已被起义部队架到了指挥部。殷汝耕见无人应声便藏身柜顶。起义部队官兵扑进殷汝耕的卧

左图：1935年11月25日，身着戎装的殷汝耕（右）在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成立典礼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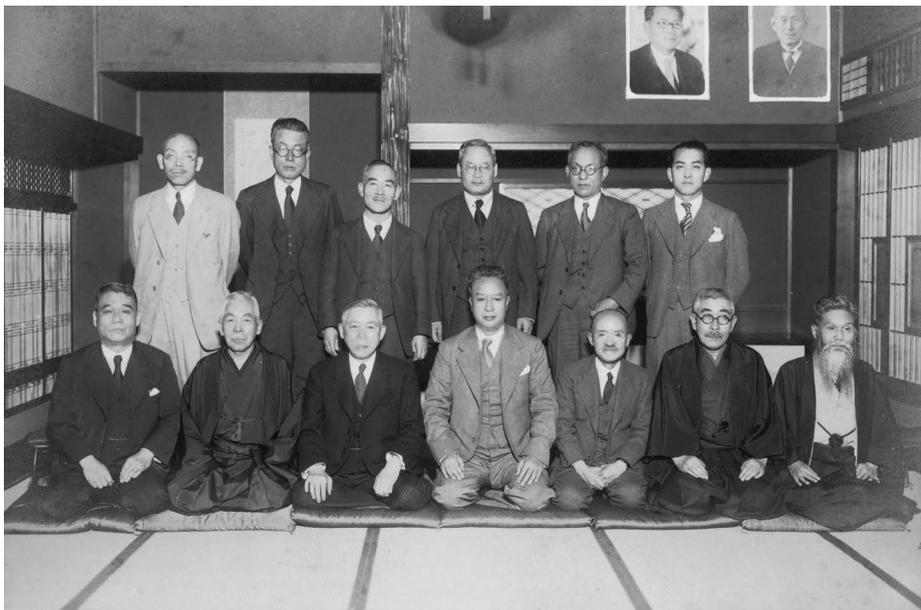
右图：1933年5月31日，中日华北停战首席谈判代表熊斌（右三）和冈村宁次（左四）在《塘沽协定》上签字



（视觉中国·供图）

左图：1940年4月，以汪伪政权全国经济委员会特派委员的身份访问东京的殷汝耕（前排中）在赤坂“锦水”料理店宴请早稻田大学时代的老师盐泽昌贞（前排右三）

右图：1947年12月1日，殷汝耕被南京高等法院判处死刑后，由法警押赴刑场



（邹德怀供图）



室，但见被单、衣服散落在地却不见人。厕所、壁橱、立柜都搜尽还是找不到人。起义军从厢房搜出一个仆役，逼迫他交代殷汝耕的去处，仆役指向柜顶：“长官您出来吧！”几个保安队士兵上去就把殷汝耕拽了下来。

张庆余后来回忆：“事先本拟枭首示众，以平民愤，但冀东伪教海锻炼所副所长刘春台劝止，说：殷逆系何应钦、黄郛的心腹，说不定拥有中央密旨，我们不宜擅杀，最好押送北平交给宋哲元，转解中央比拟安妥。”于是起义军将殷汝耕押解到北关吕祖祠指挥部监禁起来。在那儿，起义军要求殷汝耕表态反正抗日。这个要求让殷汝耕迟疑不决。

“弄潮者”

1947年，《中央日报》记者龚选舞观摩了首都高等法院刑二庭对汉奸殷汝耕的正式审讯。龚选舞在回忆录里描述殷汝耕给自己留下的深刻印象：“转过头猛一看，不由自主地揉了一下眼睛，原来这押进来的人犯简直像位明星。尽管他已年近花甲，但穿着一袭绸袍，在端正、优雅、安详之外，竟还显得有些飘逸！我甚至可以发誓，他该是我所曾见到最为漂亮的中年男子，如果退回去二三十年，他准比当时最吃香的赵丹、刘琼、陶金、舒适一类明星

还要英俊！可是，他却是那个臭名四扬的殷汝耕。”龚选舞说殷汝耕在庭上的表现“文雅之至”：“与庭上对答之际一路总是不温不火的镇静安详，不躁不急的谦逊守礼，听到他那细声温语，真令人不敢再信命相之论。”

殷汝耕的风度倒也不难解释。1883年，他出生于浙江余姚县的名门望族殷氏家族。父亲殷鸿畴官至刑部指分四川司行走，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随慈禧太后一行西逃。还京后，慈禧念其曾护驾有功，遂赏湖北安陆知府一职。殷鸿畴膝下五子，除早逝的长子外，全都曾赴日本留学，亦全是时代洪流之参与者。次子殷汝威曾在东京任黄兴秘书。三子殷汝熊历任湖南高等监察厅长，浙江、山东高等法院院长等职。四子殷汝骊1911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16年任北洋政府财政部次长。殷汝骊爱国之心拳拳，与沈钧儒共同主持“全浙公会”，组建“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募捐支援十九路军抗日，营救沈钧儒等抗日七君子。唯有五子殷汝耕与兄长殊途。

1908年，哥哥殷汝骊东渡日本，在早稻田大学经济科就读。殷汝骊有志于革命，拉着同在早稻田留学的弟弟殷汝耕一并加入了同盟会。1913年9月，“二次革命”失败，兄弟二人和其他同盟会骨干成员一道重返东京。孙中山和黄兴在东京成立军事学校“浩然庐”，组织大家学习。民主革命家陈铭枢回忆，



(秦风老照片馆/PHOTOE供图)

学校聘请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退职军人和日本大学教授担任讲师，殷汝骊和殷汝耕同任翻译。殷汝耕的日语顺溜，因此有了日本通之名。

殷汝耕的仕途发展几乎都与他的日本通身份有关。1917年，护法政府成立后，他被委为驻日特派员；1928年，任外交部驻日特派员；1932年4月，殷汝耕任上海市政府参事，在谈判中任翻译，参与签订《淞沪停战协定》。

殷汝耕不温不火的仕途生涯终于在50岁那年因一场巨大的民族危机发生了转机。1933年5月，黄郛北上就任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负责与日媾和、解决华北危机。为与日本直接交涉，他带去了一支以“知日”著称的队伍。殷汝耕就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

1933到1934年，殷汝耕在黄郛手下参与了《塘沽停战协定》及其善后协定的谈判。对于黄郛而言，那段岁月，身为外交官，“既不能以理争又不能以力争，只好强颜以好意奉求”，“彷徨午夜，相对凄戚”。日本之野心绝不只在长城一线已是世人共识。而当时的华北可谓中国的多事之地。投机政客、军阀余部云集平津，加上日本人的策动，情势扑朔迷离。翻天覆地时代的大潮眼见将滚滚而至，而潮水究竟要往哪里走，每个人自有掂量。

陈铭枢在回忆录里说，早在“浩然庐”时期，“殷

汝耕在校时，同学们对他的印象不好”。但为何不好，他并没有解释。1918年，殷汝耕与日本女子井上慧民结婚，取了日本名字叫井上耕二。井上慧民的哥哥是日本宪兵队军官。与陈铭枢无话不说的殷汝骊干脆禁止两家眷属往来。陈铭枢引用殷汝骊对弟弟的评价：“我这个弟弟品质极坏，只要利之所在，他将来不仅可以出卖朋友，而且可以出卖民族。”

以“利之所在”作为权衡标准，在当时的华北，殷汝耕的选择并不难做出。在殷汝耕看来，日本不仅有实力，也有“亲善”的可能。1920年他与日本人合作开过“新农垦殖公司”。1925年冬，奉系将领郭松龄倒戈反对张作霖事件发生。殷汝耕在郭松龄军中任外交处长。不久，郭军战败，郭松龄夫妇遇难，殷汝耕逃入日本驻新民县领事馆。日本驻华外交官森岛守人曾记述当年殷的情况：郭松龄倒戈失败后，殷汝耕“不得不逃亡到辽河畔新民县我领事馆避难达数月之久。由于奉天总领事吉田富有人情味的妥善安排，在黑夜里才使得他得以逃出东北军的重围”。张作霖曾悬赏10万元买殷汝耕的脑袋。殷在领事馆避难期间，结识了日本政界人士金井房太郎等人，在金井的护送下，得已于1926年逃往日本。后来，张学良获悉情报数次致电奉天总领事吉田茂，强烈要求引渡叛乱嫌犯，均遭断然拒绝。

从“知日”“亲日”到最终“投日”，殷汝耕随潮就势。1933年10月中旬，日本政府斋藤内阁召开会议，通过了《帝国外交政策》，其中明确提出：“支持中国大陆上之分治运动，逐驱国民党政府势力于华北之外。”

殷汝耕本并不入日本方面的法眼。1935年，在华北掌握兵权的，有北京的宋哲元、山西的阎锡山、济南的韩复榘和在保定的商震。把这4个人掌握起来，使之相互合作，便可以建成一个强大的政权，这是负责此事的天津军司令多田骏的想法。这年10月，关东军将土肥原贤二派往平津主持建立亲日亲满政权。多田告诉土肥原，亲日政权很快就可以建立，因为他已经分别和这4人进行了试探，问他们是否愿意和满洲合作，“建立一个不仰承南京中央政府鼻息的新生的中立政权”？这4个人都表示大为赞成，并表白自己并不反日，对于日本竭力扶植的“满洲国”还可以帮忙；至于新政权，只要其他三人赞成，自己一定充分合作。

土肥原贤二以知华著称，立刻判断多田的主意根本行不通。专田盛寿回忆，土肥原说，根据他多年



(左:右: 邹德怀 摄)



左图：1937年8月，进占北平的日军与中国儿童合影，佯装“亲善”

右图：1937年8月，进驻被占领的南苑机场的日本陆军航空兵部队

的经验，和中国人打交道，只有一个人在场时，他回答得很爽快肯定；要是有二人或二人以上在场，他们就会采取“你如果干，我也干”的观望态度。特别对这些实力人物，如果只是一个一个地分别说服，而不让他们面对面地共同约定下来，新政权是建立不起来的。土肥原积极设法邀请宋哲元 and 商震在北京共同聚会，研究新政权一事，果然，双方态度都暧昧不明，敷衍搪塞，不了了之。接着，他安排宋哲元和韩复榘的直接会面，也以同样的结果告终。

几轮接触，土肥原明确了策动华北实力人物的计划：“第一步先说服并切实掌握滦榆区兼蓟密区专员殷汝耕；第二步，在宋、阎、韩、商4人中选择突破口；第三步再将其三人包括进来。”总之，殷汝耕被视作是搭建亲日政权的基础。专田盛寿回忆，这是因为土肥原看出殷汝耕是真正的亲日派，说服他不成问题。

日本人看出了殷汝耕的贪念。专田盛寿回忆，由于蒋介石的反日政策，对日方亟待出售的商品征收很高的关税，有意识地拒绝贸易，令日本商业界十分为难，于是日本商人把眼光转移到了中国“主

权以外”的冀东地区。秦皇岛一带由殷汝耕管辖，殷汝耕对流入冀东的商品大为欢迎，只象征性地收极少的进口税（名为检查费）。“殷汝耕政权也由此开辟了一个很好的财源，日本的贸易公司也大大喘了一口气。在这样的关系下，日本和殷汝耕关系自然而然亲密了起来。”

那个时候，在权力上，殷汝耕也已经尝到了与日本合作的甜头。1933年9月，国民党政府就批准将冀东划分为两个区，在通州和唐山分别设立蓟密、滦榆两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由殷汝耕、陶尚铭分任公署专员。陶尚铭对日本军部并非言听计从。1935年7月，陶在日方的威逼下辞职。南京政府下令让殷汝耕继任陶滦榆区专员，苏玉琦任蓟密区专员。殷汝耕接到调令并没有马上去唐山赴命，而是先到天津，与土肥原密谈。1935年8月，殷汝耕在唐山就任滦榆区专员仪式上宣称，他本人仍兼蓟密区专员一职。因为知道殷汝耕有日本人撑腰，苏玉琦根本未敢赴任。

让殷汝耕违抗南京政府的任命是土肥原的一步试探。专田盛寿回忆，1935年11月中旬，宋哲元

的态度一直不明确，土肥原暂时决定停止对宋的说服工作，转而全力扶植殷汝耕。本来，日本方面认为“殷汝耕由于有冀东贸易的关系，同时和关东军的关系也源远流长，他揭起反蒋叛旗本有可能”，没想到的是，“他那彻底的反蒋态度，却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11月24日，专田盛寿和土肥原来到天津某一饭店，与殷汝耕及其部下见面。土肥原要求他们起事。意气高昂的殷汝耕立即说：“好事要快办，明天就宣告新政府成立，今天晚上我立即返回通州。”土肥原大为高兴，让专田盛寿马上去拿香槟酒。不巧得很，香槟酒已全部卖光。专田盛寿提议用日本酒代替。土肥原和殷汝耕客气道：“太不巧了，只有日本酒，怎么样？”殷答：“用日本酒庆祝比香槟还好。”殷汝耕干完杯，就紧急驰车返回通州。

第二天，殷汝耕在专员公署召开“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成立大会，自任“委员长”，宣称：“从此，脱离中央，宣布自治，树立联省之先声，谋东亚之和平。”专田盛寿评价说：“宣言使用的强硬语言，大大超过了我们的想象。”“蒋介石很快下达了逮捕殷汝耕的命令，可是日本军的这道墙太高，他到底没能办到。”

聪明反被聪明误

1937年7月28日这天晚上，殷汝耕对自己的前程有如此的信心不无道理。土肥原曾称赞他是效忠皇君的能人。“自治政府”成立以来，殷汝耕不遗余力。

通州有儿歌：“殷汝耕坐冀东，不是下雨就刮风。”1936年，为适应日本对棉花的需要，“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制定了一个《冀东区域植棉改良增殖计划》，强行划地几万顷土地，拱手交给日本“兴中公司”作为试验植棉的农场；日本6家纱商，也成立于“华北棉花协会”，以统制华北的棉产。同年，伪政府对拒绝日方收购的唐山华新防止产课以重税，迫使该厂陷入困境，不得不将资产一半售与日本企业。秦皇岛的耀华玻璃厂和柳江煤矿的长城煤矿公司也先后以收买股份的形式为日本侵略者所霸占。对迁安金厂峪金矿，伪冀东政府先是下令限制私人开采，后来通过天津的资本家出卖给日本人。1936年1月11日，伪政府保安队侵入塘沽，占领新河、军粮城等产盐区，并向长芦盐运稽核所索款每月60万元，否则停开新（河）榆（临榆）段车辆。当天

池宗墨

(1890 - 1951)

池宗墨系浙江平阳人，青年时期赴日本留学，曾先后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及明治大学，归国后一度供职于教育界。北洋政府时代他出任过浙江省教育厅首席督学、北京中学校长、厦门师范学校校长等职，后转入商界，曾为中国银行郑家屯分行行长和苏州通成纺织公司经理，但并不得志。北伐胜利后，池宗墨以所谓“王道政治”的宣传者自诩，敌视国民党及其三民主义理论，因此成为游离于主流之外的政界边缘人。

早在留学时代，池宗墨就与平阳同乡殷汝耕交好，北洋时期又曾一起混迹于实业界。1932年殷汝耕随黄郛北上、获任河北蓟密区行政督导专员后，池宗墨即前往投效，于1935年初出任专员公署秘书长。在此后日军推动的“华北分离工作”中，他与殷汝耕沆瀣一气，为一己私利不惜出卖民族利益。1935年11月，殷汝耕公开附日，宣布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翌月改称“自治政府”，池宗墨依然以伪政府参政秘书长的身份为其从事联络工作。1936年4月，他曾作为殷汝耕的专使前往长春和大连，“感谢”伪满洲国和关东军承认冀东伪政权的“独立”地位，并鼓吹“中日满三国，非诚笃亲善、共同协力，（就）不能确立东亚和平”。

尽管池宗墨在日本军方心目中的利用价值远不及殷汝耕、殷同等老资格“日本通”，且其政治地位完全系因依附殷汝耕而获得，但他依然野心勃勃，希望博取更多利益。1937年7月29日，冀东伪政权保安队在通州反正，殷汝耕一度被扣押，之后失去日方的信任。恰好因事不在当地的池宗墨乘机向日军示好，于7月31日获准代理政务长官一职，并获准在唐山重建伪府。为向日方输诚，池宗墨不惜多次向日方表示“谢罪”，承诺逮捕审判通州事件之责任人，并向死难日本人家属赔款120万日元。不过随着

统一的华北伪政权在1938年1月成立，冀东伪政权最终被合并，成为伪“临时政府”下属的河北省，池宗墨改任伪行政委员会参议的闲职。嗣后他再度弃官从商，任河北采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协助日本进行经济侵略。抗战胜利后，池宗墨一度被国民政府逮捕审判，但依靠装疯逃过惩罚。1951年镇反期间在北京被捕，以反革命罪被判判处死刑。（文/刘怡）



伪政府在辖区内设立大隆、大兴公司，由日本人垄断盐产。根据日本方面的需要，伪政府进口日本商品所规定的税率只相当于南京国民政府海关进口税的四分之一至八分之一。日方规定，货物一经冀东完纳，即不得再完他税。由于税率低微，大批走私货物如潮水般地涌入冀东，流向华北乃至全国各地。

在政治上，殷汝耕也毫不收敛。“自治政府”与“满洲国”缔结了军事、外交、交通协定。1936年4月12日，殷汝耕派遣秘书长兼外交处处长池宗墨为专使，率团赴伪满专程答谢关东军的支持。池宗墨在长春拜会了日本关东军司令植田和“满洲国”外交大臣张燕卿，分别呈送了殷汝耕的亲笔信。殷汝耕在感谢信中说：“不肖殷汝耕……得贵关东军充满友谊之援助，建立起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本政府这次特派秘书长兼外交处处长池宗墨赴新京，代表不肖殷汝耕……对贵军以往的真诚援助和友谊表示感谢，向阁下表示敬意。”“如没有中、日、满三国的共同协力，就谈不到增进东洋和平及东亚民族的福祉。”“特别是在确立东亚和平、民族繁荣的大计上，日、满、支三国须同心协力。为达目标，我冀东与贵国自应一马当先。”

殷的作为连日本妻子井上慧民也看不上眼。据在北平与殷家比邻而居的严家理先生回忆，他曾听井上慧民说过：“殷样（日语‘先生’）这样搞，不仅中国人瞧他不起，连日本人也瞧不起他。”

1937年7月29日上午10时许至黄昏，日军派出12架飞机轮番轰炸县城。入夜，起义军挟持殷汝耕弃城向北平进发，拟与驻北平29军会合。由于情报失灵，部队行至安定门与德胜门之间，才知北平守军已弃城而逃，北平沦于敌手。日军从城内杀出，将押解囚车的士兵冲散，殷汝耕趁机脱逃。

虽然逃得一命，但这个试图在时代洪流中投机得利的小人物最终被滚滚的历史车轮碾压而过。“通州事变”中，日本特务机关长细木繁被杀时，他的妻子适在北平幸免一死。她知道丈夫生前曾多次提

殷的作为连日本妻子井上慧民也看不上眼。据在北平与殷家比邻而居的严家理先生回忆，他曾听井上慧民说过：“殷样（日语‘先生’）这样搞，不仅中国人瞧他不起，连日本人也瞧不起他。”

醒殷注意二张行动，而殷始终不以为然。为了替夫报仇，她纠集其他日本家属，向日本驻军控告殷与二张互相串通。曾经在华北呼风唤雨的殷汝耕在日方看来实在是不值一提的小人物。殷汝耕在日本宪兵队看守所关了3个月。在狱中，他不时诵读佛经，为“通州殉难者”沉痛哀悼，给细木繁撰写纪念碑文：“同细木繁志同道合，相处无间”，“先生虽身殉，而所志竟成”。经日本驻北平武官今井武夫的竭力说情，殷才最终被释放。

1938年以后，殷汝耕回到北平，声称要过“隐居”生活。其实，1938年底，他还曾来到陶尚铭家，表示自己有意出任伪河北省长，请陶在“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面前美言几句。陶表面答应，实际并未去办。陶尚铭后来了解到，王克敏确曾推荐过殷汝耕任伪河北省长，由于日本军方反对而作罢。

令人感叹的是，1947年，殷汝耕一案在南京审理时，殷本可逃过一死。殷延聘章士钊、叶在杭与张文伯三位大律师为他精心设计辩护。据说，章士钊从“老牌汉奸”称谓里想到了妙法：殷的叛国行为主要发生在始于1935年11月25日终于1937年7月29日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期间。国民政府《惩治汉奸条例》当时尚未公布实施。这一辩护在法理上一时无懈可击。但就在此时，陪审的一位年轻法官却提出反诘：“殷某割裂冀东国土犯行固发生在《惩治汉奸条例》公布施行之前，但是为敌伪策划、修浚运河以便利兵粮运输，且由此而获任为治河伪官，却是在条例施行之后。”原来，1938年以后，殷汝耕始终不甘于寂寞。他应汪精卫伪政权的邀请赴南京担任“全国经济委员会特派委员”。这期间，他提出了日本海空军既在海上蒙受盟军威胁，不如修浚运河，贯通南北，使运输船舶得以避入内河以策安全。殷这番说辞，企图借此以求在南北两伪组织之外，独树一帜，称雄河上。因此他的此一计划虽获日方赞同，卒因陈公博与周佛海之杯葛而未见实施。

1947年7月，南京高等法院判殷汝耕连续通谋敌国，处死刑。殷汝耕不服，数次申请复判，均被驳回。他又直接写信给蒋介石，要求“俯念防共有功”，准予特赦。蒋未给回信。同年12月1日高等法院检查处对殷执行枪决。执行庭设在南京可容万人的朝天宫大殿。临刑前，殷汝耕口念金刚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而后又忽而大声叫喊：“本人并非叛国，我的心还是向着国家的。”



生生不息，因你行动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是在全球享有盛誉的、最大的独立性非政府环境保护组织之一。WWF在全世界拥有500万名志愿者以及一个在100多个国家活跃着的网络。WWF的使命是遏止地球自然环境的恶化，创造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未来。为此我们致力于：保护世界生物多样性；确保可再生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推动降低污染和减少浪费性消费的行动。

在中国，WWF的工作始于1980年的大熊猫及其栖息地的保护，是第一个受中国政府邀请来华开展保护工作的国际非政府组织。37年间我们在中国的项目领域由最初的大熊猫保护扩大到物种保护、淡水和海洋生态系统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可持续发展教育、气候变化与能源、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科学发展与国际政策等领域。



实际上没有你，就没有我们，现在加入WWF

央企重组深水区

主笔 谢九

随着央企数量即将进入两位数时代，央企的重组开始真正进入深水区，整合的难度也越来越大。

6月29日，国资委发布公告称，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整体并入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公司，成为其全资子公司。至此，我国的央企数量从102家降至101家，如果考虑到正在停牌的中国神华和国电电力即将到来的重组，央企数量将很快降为100家，距离两位数时代只有一步之遥。

事实上，这一进度其实已经大大慢于预期。早在2010年，时任国资委主任的李荣融就曾表示，要加快中央企业重组和调整步伐，年内要把中央企业调整到100家以内，未来几年的目标是调整到50家以内。但事实上时至今日才接近央企数量百家以内的目标。

最近几年以来，央企重组虽然看上去轰轰烈烈，但其实进度已经大大放缓。国资委2003年成立以来，中央企业的数量为196家，到2010年，央企数量降为120家，在7年时间里，有76家央企被兼并重组，应该说这个速度还是相当之快。但是在经过前期大规模重组之后，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央企重组的步伐开始明显放缓，截至2016年，央企数量降为102家，6年时间里只减少了18家。

最近几年央企重组的数量虽然减少，但是重组的规模和级别却大大提升，尤其是从2015年以来，以中国南车和中国北车合并为标志，央企巨无霸之间的重组开始成为常态。继南车和北车合并为中国中车之后，2015年发生的巨无霸重组还有：国家核电公司和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合二为一，重组为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五矿集团与中冶集团实施重组，中冶整体并入五矿；中国远洋与中国海运合并为中远海运；中国外运长航整体并入招商局。2016年发生的巨无霸重组有：宝钢与武钢重组成立中国宝武集团，中纺集团公司整体并入中粮集团，中国国旅整体并入港中旅，等等。不难看出，自2015年以来，央企之间的重组几乎都可以称得上是巨无霸之间的联合。

去年7月份，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动中央企业结构调整与重组的指导意见》，为深水区的央企重组

提供顶层设计。《意见》指出：“近年来，中央企业积极推进结构调整与重组，布局结构不断优化，规模实力显著增强，发展质量明显提升，各项改革发展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但总的来看，中央企业产业分布过广、企业层级过多等结构性问题仍然较为突出，资源配置效率亟待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亟待增强。”由此可以看出，虽然央企数量已经降至100家附近，但央企重组并不会就此停滞，预计未来还会大规模推进，巨无霸式的重组还将不断出现。

央企在深水区的重组，可能会为A股市场带来新的热点。当年中国南车和中国北车的重组合并，使得这两家公司的股价大涨7倍，其余巨无霸央企的重组，股价也都有着可观的收益。重组概念一直是A股市场长盛不衰的题材，巨无霸央企的重组更是如此，提前布局央企重组，始终是投资者乐此不疲的寻宝游戏。

未来央企重组可能主要遵循两条主线，第一条主线着眼于国际市场，为了提升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那些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的央企，未来强强联合的可能性很大。随着我国央企参与国际市场的力度越来越大，在很多行业，央企在全球市场上成为主要的竞争对手，彼此之间的内耗过大，最终不利于中国经济的整体战略利益。比如2015年合并的中国南车和中国北车，合并之前，两家公司经常在全球市场上彼此大幅杀价，二者合并之后，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大大增强。目前我国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央企主要来自高铁、核电和基建行业，高铁行业的南车和北车已经实现合并，核电行业的国家核电公司和中电投也完成了合并，相比之下，建筑行业的重组大幕还没有拉开。随着“一带一路”渐入高潮，建筑类央企在未来将成为国际市场上的主要竞争者，如果不能实现有效整合，很有可能重演当年南车和北车之间恶性竞争的局面。

目前我国建筑类央企主要有8家，中国电建、葛洲坝、中国建筑、中国铁建、中国中铁、中国核建、中国中冶和中国化学，这8家央企虽然各有所长，但在具体业务上还是有很大重合，随着未来“一带一路”在境外市场逐步展开，彼此之间的竞争还是在所难免，从国家整体战略的角度来看，建筑

类央企之间还有很大的重组空间。仅从数量上来看，一个行业存在多达 8 家央企，在目前大幅压缩央企数量的大背景之下也并不多见。

第二条主线是国内市场，主要是那些产能过剩、经营困难的央企，通过上下游的重组打造全产业链，理论上而言，可以更好地发挥协同效应。这条主线主要集中于煤炭、电力、冶金等行业。宝钢和武钢、五矿和中冶之间的合并都可以归于此类，不过随着近期中国神华和国电电力停牌，这个领域的重组似乎开始有了新的思路。

无论是 2015 年的五矿和中冶，还是 2016 年的宝钢和武钢，这两起重组都是行业之内的合并同类项，而 2017 年中国神华和国电电力的重组，则是上下游行业之间的跨界重组。对于钢铁、煤炭等过剩产能而言，同行业内的巨无霸重组更多是达成了规模叠加的效应，对于去产能的效果可能并不明显，而通过上下游之间的合并，则更能实现“1+1 > 2”的协同效应。

2016 年 4 月，国家发改委印发《关于发展煤电联营的指导意见》，称发展煤电联营，有利于构建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煤电合作机制，缓解煤电矛盾，促进绿色循环发展。煤电联营是指煤炭和电力生产企业以资本为纽带，通过资本融合、兼并重组、相互参股、战略合作、长期稳定协议、资产联营和一

体化项目等方式，将煤炭、电力上下游产业有机融合的能源企业发展模式，其中煤电一体化是煤矿和电厂共属同一主体的煤电联营形式。

此次中国神华和国电电力之间的重组，显然就是为了响应煤电联营的号召。目前我国煤炭和电力的央企名单中，电力央企主要是五大发电集团：华能集团、大唐集团、华电集团、中国国电、中国电力投资集团，煤炭央企主要是中国神华和中煤集团这两大寡头。在此次中国神华和国电电力重组之后，预计还有更多的整合在五大电力企业和两大煤炭企业之间展开。

随着央企数量越来越少，剩下的央企几乎都是行业的巨无霸，继续推进重组的难度也会越来越大。首先是重组企业的规模越大，对现有利益的触动也就越大，面临的阻力也就更多；其次，不同于此前大企业对小企业的合并，巨无霸之间的重组，彼此之间如何实现更好的协同效应，难度也会成倍上升，否则，强强联手可能反而会形成“1+1 < 2”的效果；最后，央企之间的整合还需要考虑如何避免损害消费者利益，从目前来看，央企之间的整合主要针对海外市场以及过剩产能，主业涉及国内消费者的央企整合尚没有展开，如果下一步的央企整合推进到电信行业，将会和国内消费者的利益息息相关。■

大家都来听一点古典音乐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 84050425 84050451
84681046 84681042 (传真)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爱乐》杂志网址：
http://www.lifeweek.com.cn/philharmonic

《爱乐》2017 年第七期要目

封面话题

美岛莉与维也纳爱乐成员的舒伯特

- 热点·观察** 深度巴赫
斑狐说乐 莱比锡，有一个声音在呼喊！
专访 意大利女钢琴家莫瑟尔谈托克豪森
话题 “纯白”的《马太受难曲》：从巴洛克到后现代
再听博列特后期录音中的肖邦
爱乐笔记 拉斯玛尼诺夫访谈
肖斯塔科维奇《第六交响曲》之迷
乐史空间 布鲁诺·瓦尔特自传《主题与变奏》39
早期音乐 珀塞尔家族中的音乐家（一）
20/21 世纪音乐 “玩”出来的音乐——互动音乐之“游戏”展示会
浮生碎乐 因父之名
藏彝爱乐 齐格弗里德牧歌、音乐戏剧与瓦格纳的希腊（下）
作曲家与作品 巴赫的康塔塔 BWV147 与 140
巴赫的《复活节清唱剧》与《升天节清唱剧》
波兰作曲家格莱茨基访谈（上）
人物 舒伯特与施莱格尔兄弟：浪漫主义的黎明（六）
资料库 巴赫音乐的延伸收集与认识
听购收 一个世纪的传奇——底特律交响乐团访问记
专题
爱乐往事 爱乐使我重生（下）

《爱乐》2017 年订阅须知

2017 年《爱乐》月刊，每期 160 页，全年 12 期，零售单价：20 元，全年定价：240 元。

2017 年《爱乐》邮局发行，邮发代号：82-24，读者可到各地邮局直接订阅，也可汇款至杂志社订阅。欢迎咨询、订阅与作为礼品馈赠他人。或在卓越网订购：
www.Amazon.cn

银行汇款：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燕莎支行
户名：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账号：0200012709201646336

邮局汇款：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 9 号 B 座

邮编：100125

收款人：爱乐

网上支付：www.lifeweek.com.cn



（附新寨一凡攝／视觉中国供图）

四川茂县泥石流：整体消失的寨子

记者 王海燕

6月24日5点45分，四川茂县叠溪镇新磨村山体高位坍塌，迄今为止，累计发现遇难者10名，仍有73人失联。这里的人们对地震灾害已经见惯不惊，但没有哪次灾难像这次一样，来得毫无预兆，毁灭得如此干干净净，又如此不留余地。

瞬间消失的新村

从四川茂县叠溪镇较场村的坝子上，可以看到地处河谷地带的新磨村全貌。6月23日那天晚上，较场村很多人没睡好，晚上的雨实在太大了。村里都是典型的羌族石木结构架子房，盖着瓦片，大雨则是典型的季风高原气候的雨，大概半小时一次，断断续续，响完一阵又一阵，打得房子“噼噼啪啪”响，响得人心慌。

镇上的居民连苍美（音）夫妇不到5点钟就醒了，



(刘峰峰摄/视觉中国供图)

左图：6月25日，航拍四川茂县山体高位垮塌现场

右图：山体垮塌前的四川茂县叠溪镇松坪沟，深山中的羌寨

如果天气晴朗，那个时候天空已经微微泛白亮起来，一些人已经早起倒粪水，另一些人则开始煮早饭准备下地了，但是当天早上雨那么大，几乎可以肯定，整个镇上都没人起床。正躺在床上准备继续眯一觉的时候，连苍美突然听到窗子“哐当当”响起来，她老公贺康林一个激灵就要翻身，喊道：“嘿，要地震了！”连苍美接话：“要地震了，怎么只听见响，床不动……”话还没说完，贺康林兄弟的电话就打进来。

贺康林的这个兄弟住在村子另一头，那里有一个平整的坝子，做成了一个观景台，观景台垂直往下是1933年大地震留下的叠溪海子，对面是一座呈现出“神龟回游”奇特形状的山体，从观景台上可以一览无余地看到，海子北岸，从西到东的狭长河谷里，分布着磨坊沟、梭梭寨、新村三个羌族寨子，合起来就叫新

磨村，其中新村处在整个河谷的最里面，临水背山。新村再往里，则是地处两条河流会流出的两河口村。

贺康林兄弟的电话打进来时，已经带着哭腔，结结巴巴地说，“哥啊哥啊，新村山体滑坡了，石皮（四川话：岩壁）都垮完了，（把新村）铲平了，新村莫得（四川话：没有）了啊，秋容大姐他们那儿莫得了。”说着说着就说不下去了，只能在电话里一阵“哦……哦……”。连苍美在边上没听清，正疑惑，贺康林已经嚷起来：“新村滑坡了，秋容也关机了，远红也关机了，天啦，天啦。”贺康林和连苍美是表亲结婚，贺康林说的秋容和远红是他跟连苍美共同的表妹和表姐夫，住在新村靠近峡谷深处一端的大路边。

消息过于突然，连苍美脑袋一下子转不过来，只是麻木地跟着贺康林翻身起床，张开嘴巴想说话，却一个字都吐不出来，又翻过身去扒衣服，乱扒了一大阵，什么都没扒到，患有哮喘的喉咙里一股痰上上下下转。贺康林给连苍美披了一件衣服，就从屋后抄近路跑去看新村，只看到半山云雾飘飘，雨水迷蒙，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大地已经一片平静。

而在事后的回溯中，当天为数不多看到滑坡现场的是王秀荣的表弟、同样住在较场村的吴强（音），当时他正好起床上厕所，一开始从窗子里看到富贵山上有树影剧烈摇动，他怀疑自己是酒喝多了或者眼花了。但这个怀疑只持续了不到几分钟，因为他立马就看到，富贵山最北边边缘处的山顶突然就“轰隆隆”直接往下坠，推进河谷，撞到前面的山上后又倒回去，像卷被子一样把整个新村完全地卷进了巨大体量的泥沙和巨石形成的土方里面。

事后经过专家测算，这次高位远程崩滑碎屑流的体量达到1800万立方米，滑坡最大落差约1600米，平面滑动距离2.5至3公里。而在现场则可以直观地看到，裹挟着巨石的土方从山顶到河谷，铺成了一个长长的锐角三角形，三角形在河谷一边的边长长达2公里左右，覆盖了几乎整个新磨村中的新村寨子，让整个寨子所处的区域看不到任何一丝人类的痕迹。

当地人以两边山体为坐标，推测覆盖在寨子上方的土方最高处可能有两层楼高。就在吴强被眼前景象吓得双腿发抖时，寨子下方100多米外的松坪沟旅游景区游客接待中心经理韩刚也被巨大的声响惊醒，往窗外一看，寨子后面苍绿的山已经变成了白花花的一片，他立马就对朋友说：“遭了，地震。”他朋友一边玩着手机一边骂他：“不可能，这不像地震的动静。”但两个人还是穿着短裤就往下冲，到了



(刘忠俊摄/中新社供图)

左图：6月25日，四川茂县山体垮塌现场，遇难者亲属在废墟上痛哭

右图：6月24日，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在茂县废墟上搜寻遇难者

楼下才发现，整个游客接待中心的50多人也都到了坝子上，大家抬头一看，惊恐地发现，“妈呀，寨子呢？寨子呢？寨子哪儿去了？寨子怎么不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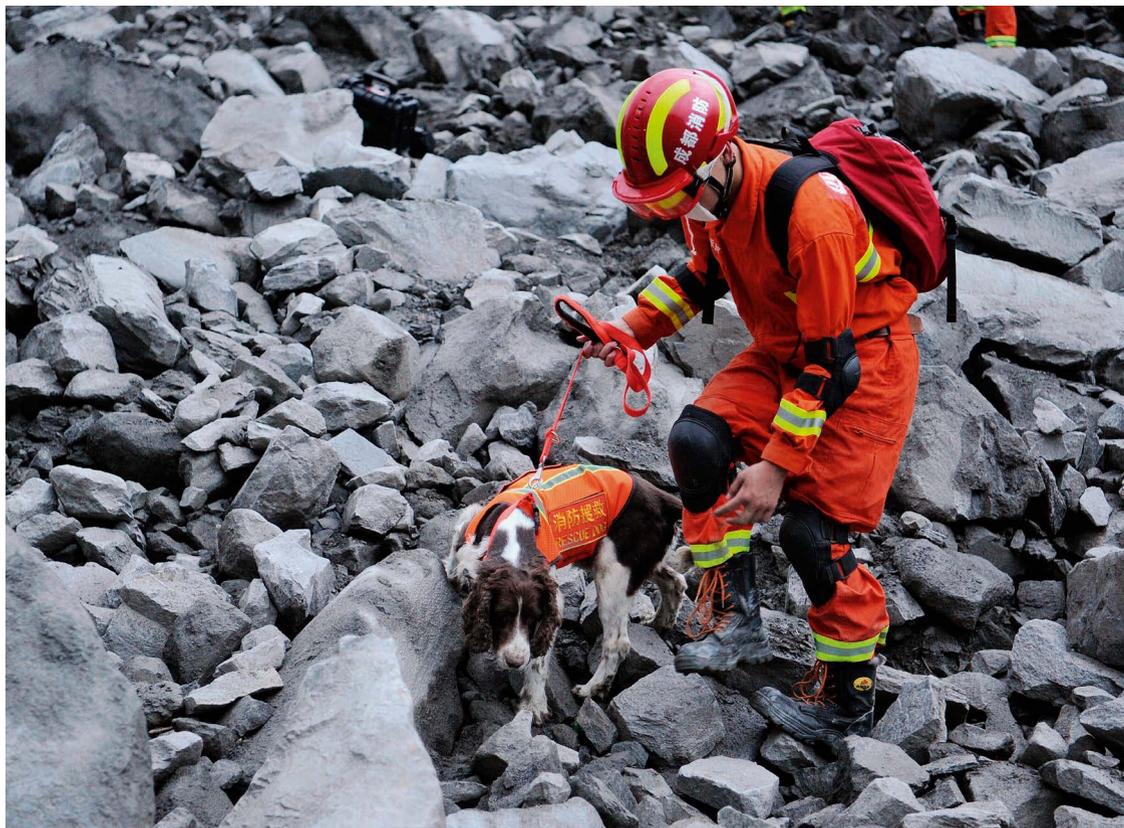
当时寨子边上没有遭遇灾难的几家农户也已经走到了坝子上，哭成一片。一对叫王成（音）和黄武珍的老夫妇手牵着手蹒跚走到韩刚面前，把他当成了儿子，用干枯的声音喊他：“孩子啊，快跑！快跑！快往山上跑。”韩刚明白老人的意思，当时游客中心旁边的叠溪河河道已经干了，泥石流在上方河道里形成了堰塞湖，随时都有溃坝的可能，老人是在催年轻人快些跑，快些逃命。他们在这个地质灾害频发的地区活了一辈子，也是第一次亲眼看到毫无预兆之下，整座寨子一瞬间彻底覆灭的末日景象，除了“往山上跑”，他们无法为年轻人提供任何经验。

认得爸爸手的女孩

吴月娥是在早上7点刚过的时候接到自己二舅

颜万龙的电话的，在那之前，她的么爷爷已经给她打过一个电话了，她没接到。她是叠溪镇邻近的一个镇政府上班，当时她赶上值周末班，没有去县城的家里，也没有回新村。她的父母正是较场村上连苍美的表妹夫吴远红和秋容（学名朱兴琴）夫妇。在电话里，住在茂县县城的二舅颜万龙一边哭一边让吴月娥请假。吴月娥的第一反应就是自己的父母出事了，她记得自己明明还多次叮嘱过母亲，这段时间少外出，就不要去县城了，路上不安全。她在政府上班，这段时间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防汛，随时关注镇上各地的洪涝灾害险情，提醒老百姓。她万万没想到的是，颜万龙支支吾吾了半天后告诉她，新村发生泥石流了，寨子在一瞬间消失了。

这一惊非同小可，吴月娥立即去搭班车往回赶，刚走出没多远，她住在梭梭寨的三舅怕她出意外，已经开车过来，在路上接到她，在车上的还有吴月娥的外婆。一行人先是到较场坝和吴月娥的二舅会合，然后又从较场坝往新村走。他们也不知道去现



（刘忠俊摄/中新社供图）

场可以做什么，只知道一定要去。那个时候，吴月娥和外婆就已经猜到吴远红夫妇凶多吉少了，在连苍美家的门口，两个人无论如何不肯下车，连苍美说，这是因为老人还遵守着当地的习俗，“不能把眼泪掉在晚辈家里”。

吴月娥到达松坪沟寨门口时，进入现场的道路已经开始实行管制，只允许救援车辆进入，几个人只好徒步往里走。直到那时，依然没人打电话告诉吴月娥远在德阳的妹妹吴茹月。吴月娥说，家里只有她和妹妹两个孩子，茹月去年大学毕业后在家待了半年，今年才去德阳上班，因为是小妹，爸爸妈妈一直宠在手心，她的性格也比月娥更脆弱一些，她当时完全不知道要怎样跟妹妹说。结果中午左右的时间，吴月娥接到妹妹的电话，茹月告诉她自己已经看到新闻，到了都江堰，正在回家的路上。吴茹月与姐姐、舅舅和外婆几个人是在事发地点100米以外的游客接待中心会合的。

吴茹月一到现场接待中心，就呜呜地哭了。当

时土方覆盖的地方已经被划为核心救援区，好几辆救护车在游客接待中心不远的地方等着，但当天唯一拉出去的幸存者只有住在村边的乔大帅一家三口，这对年轻夫妻因为婴儿啼哭正在给孩子换尿布，来得及冲出家门。但实际上，乔大帅一家三口能够奇迹生还，也是因为住在村子边缘，可以快速离开。对更多的人来说，即使当时没有睡觉，而是在田间劳作，可能结局也是一样。

看着面目全非的新村，吴月娥一家人也不知道怎么办，只能站在高处呆呆望着已经没有一丁点痕迹的寨子。因为吴月娥家处在寨子靠北边，也就是离游客接待中心更远的河谷里面，远在视线之外，吴茹月又想要去家里的位置看一看。

一开始，颜万龙怕有危险，不准她去，但最后还是拗不过，只好带她过去。因为整个原来寨子所在的地方已经堆满巨石和泥土，一家人磕磕绊绊走了很久才走到原来房子所处的地方。但能够勉强认出位置，并不是因为废墟里还有一丝房子的痕迹，

而是两姐妹根据原来房子前面山体的位置大概估计出来的。正是在这里穿梭寻找的时候，吴茹月被媒体捕捉到她说“能找到爸妈就好了，我认识我爸爸的手”，并把这句话发布到了网上。这句简短而饱含感情的话，听着让人辛酸。

但所有人都知道，遇难者生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到了第二天，已经陆续有遇难者尸体被挖出，也有人看到吴茹月家的汽车了，吴茹月的外婆立刻哭着请求救援人员，希望能找到女儿女婿的遗体。贺康林却阻止了她，“挖出来有什么意思呢？不如留个完整的人，还能就地做个坟堆”。

而在当时，吴茹月的二舅颜万龙说，他也不知道怎么安慰吴茹月，只能由着她跟着她。找到原来家所在位置后，颜万龙就劝茹月看一眼就离开，但吴茹月依然不肯，又在废墟处待了半个小时，才慢慢地挪到外围区域。

刚刚考上警校的姑娘

实际上，放弃寻找尸体后来也成了大多数遇难亲属的选择，整场事故中挖掘出来遗体的遇难者只有10人，最后一具遗体是6月25日挖掘出来的苟仕莹。罗福林是当时在场做遗体消毒的茂县民兵之一，他是苟仕莹的亲表爷爷，但他一开始完全没有认出这个姑娘，因为遗体身上全是泥浆。直到经过法医鉴定，遗体是一名还不到20岁的未婚女性，在场的村里人才想到，这段时间在家里的未婚女孩子不多，其中就包括苟仕莹。

但一开始，大家依然不敢确定到底是谁，因为遗体面部的受损程度很大，直到通过遗体手上的一个狗咬留下的伤疤，才最终确认苟仕莹的身份。“平时多么亲热地叫我爷爷，但当时根本认不出来。”罗福林说。他还记得，当时遗体的一只手上还有新涂的指甲油，他猜这是爱美的苟仕莹自己在家涂的。

根据媒体报道，苟仕莹今年春天已经通过单招考试考上宁夏警官学院，在事发前一个月的5月24日才刚刚拿到通知书。这个留着齐耳短发，平时活泼开朗的姑娘在同学间的外号叫“苟胎胎”（意思是很随和），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警察。出事前，她才刚刚从北京实习回家，准备过完假期就去警官学院报到。

和苟仕莹一起遇难的还有她的爸爸苟伯刚和妈妈王迁红，至此，这个家里只剩下苟仕莹18岁的弟弟苟仕才。和姐姐的选择相近，苟仕才于2016年9

月入伍，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某部队服役，24日早上，苟仕才得知新磨村出事的时候，他正随部队在大兴安岭灭火。小伙子当天就从大兴安岭赶回四川，直到26日上午10点半才回到已经是一片废墟的新村寨子，随即加入救援。

而苟仕莹和苟仕才的奶奶则是在事发当天走到游客接待中心让韩刚往山上跑的黄武珍。但黄武珍失去的不只是大女儿王迁红一家三口，就在她颤颤巍巍去为另外一些年轻人报信的时候，她5个孩子当中的二女儿王迁利夫妇和另外一个儿媳妇也被突如其来的泥石流埋葬了。

但这一个大家庭的灾难还不止于此。排行老三的黄武珍自己共有3个姊妹和1个弟弟。5个老姐弟和大部分子女全都居住在出事区域，其中二姐黄武群正是回家找爸爸的吴茹月姐妹的奶奶。事发时，黄武群还在县里带孙子，罗福林掰着指头算了一下，“她家一共遭了7个”。包括大儿子（吴茹月姐妹的父母）、二儿子夫妇和一个女儿（吴茹月姐妹的二叔二婶和堂妹）、大儿女夫妇（吴茹月姐妹的姑姑和姑爷），其中三叔三婶逃过一劫是因为那几天，两个人刚好上山采药去了。除了遭遇最惨烈的黄武珍和黄武群，五姐弟中，大姐黄明莲失去了一个女婿。四姐黄武线的儿女们都出门在外，两位老人却没逃脱。最小的兄弟黄明山一家（黄明山已去世），则失去了一个儿媳妇。

死亡对这一个大家庭来说，来得过于庞大、密集、突然。罗福林掰着手指头算了十多遍，才算清楚他失去的到底是17位还是18位亲人。

吴月娥说，苟仕莹本来一直在成都念书，平时回来得少，这次大概是趁着上大学前的长假，准备回来和爸爸妈妈好好待一段时间。罗福林则记得，也曾入伍当兵的苟伯刚最早是在九寨沟跑客运，生意好，挣了钱，又买了一辆中巴，起早贪黑跑机场。他终于在位于松坪沟景区的家开了一家农家乐，最开始只能接待二三十人，前年刚刚推掉家里的旧楼，新建了一座四层的大房子，开起可以住100多人的酒店。后来他当上新磨村党支部书记，这才把中巴卖了。如今，一双儿女一个考上警察学校，一个入伍当兵，和这里的大多数人家一样，苟伯刚一家人拼尽力气过上了好日子没几年。

富裕的村子

“你不晓得，那个时候好艰苦哦。”罗福林说。

他指的是1976年松潘小河水震后，原本居住在梭梭寨山顶上的人集体迁居，从不安全的“乌龟背上”来到“乌龟脚下”河谷里的情景。当地很多人不记得年份，都会说“毛主席去世的那年”，他们刚刚迁到新村，开荒垦地，一开始住的是茅草房，过了一段时间才住上政府的安置房。安置房一家两间，当地人子女多，都是一家人挤在小房子里。后来随着苟伯刚这一代人慢慢长大，分家，每家人才开始建起新房子，最近这十来年才把原来一片荒芜的河坝子建成“房子一家比一家漂亮”的富裕寨子。

住在较场坝村的居民胡茂芝则说：“新村的人格格外肯用力。”那里砂土也比周围其他地方的大黄土更肥沃，种花椒种苹果都很丰产，又可以接待游客，算得上是周围最富裕的村子。采访的时候，我就住在胡茂芝家，她平时嘻嘻哈哈，但有时候喂猪或做饭，她会突然停下来，“唉，想一想新村的人……你们不认识还好，我们都是认识的人呀，一看到名字，每个人长什么样子，怎么说话的，一下子就想起来”。

刚刚到成都的时候，我还遇到一位出租车师傅，他说自己去年刚刚和其他司机去这个村子里玩过，住农家乐，80元一位，包吃住，每到开饭的时候，主人家就开上几大圆桌的席面，住在店里的客

人都围着桌子一起吃。“正宗的农家菜，吃得又热闹。”这位师傅说，正是因为体验好，他们当时还留了老板的电话，准备今年再去玩，但就在出事当天，当他拨打那个电话时，已经得不到任何回应。

吴月娥家没有开农家乐，但她说她父母也不愿意离开新磨村，这里每年的花椒和李子收入都很好。实际上，在周围找到一个好的定居点并不是容易的事情，“神龟背上”原来的定居点虽然如今看起来没发生危险，但当地一位老人告诉我，那里原来适合居住是因为山顶上有一大块开阔平坦的地方，还有常年冒山泉的水井，但1976年的地震后，水井里的水就干涸了，老人把这个解释为“水井里的金雀被人取走了，不适合住了”。而与新村隔着叠溪海子的较场坝村虽然一直是当地的行政政府所在地，但这里同样有水源问题，需要从很远的地方用加压的方式引水供应。沿着岷江再往上，罗福林所在的太平乡，则在2008年的“5·12”地震后，有三个村子为了预防地质灾害，集体搬迁。

而处在河谷平坦地带的新村，则没有人认为这里是危险的，因为寨子并没有处在缓坡上，而是在离山脚还有很长一段距离的平地上。背靠山体上天然有“富贵”字样的富贵山，面朝“吉祥的”神龟

《读书》2017年第七期目录

欧树军 美国军政关系的变与不变
田雷 一九三七：美国最高法院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姜奇平 分享为什么经济
刘成 多元化的信用创造与货币的多元化

西学与中国

考古学如何与“中国”结合（孙庆伟）·当代中国社会学的传统与反思（孙飞宇）·中国现代史学的使命与“全球史”的真正建立（江涓）

短长书

学问真性情：梁漱溟的批评与被批评（罗志田）·杨家的《夜奔》（徐凡）·难忘王均先生（李行健）

盛洪 为什么“满街都是圣人”？
余成峰 从老鼠审判到人工智能之法

陈忠平 梁启超与何蕙珍“情事”新考
陈慧 布罗姆“棒”打弗莱为哪般？
张欣 为喜悦所惊，如风般不安
徐纬光 现代政治语境中的道德论证

品书录

《哲匠录》的洞察与回响（徐怡涛）·历史研究的温情与敬意（邵建斌）·中国农村应有怎样的未来（郝志东）

孔令伟 拉达克与清朝欧亚情报网的建立
陈言 “夜行性肉食动物”的精神史 著译者言
刘运峰 从孙犁手迹看其晚年生活与心态
刘吉平 《韦兹莱日记》中的罗曼·罗兰
朱红 花开半妍的意味
张颖 在可见/可说的临界处



生活需要读书，
《读书》丰富生活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010)84050425, 84050451
读者服务部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邮购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读书》编辑部
邮政编码：100125 国内代号：2-275



回游，紧邻叠溪河，和其他地方比起来是难得的看起来又安全又适合种植的好地方。虽然1933年这里曾发生过的大地震让整整两个羌族寨子笔直坠落，尘封在因地震而形成的“堰塞湖”叠溪海子下面，但我采访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件事已经过去很久了，将不会重演。

但灾难就这样猝不及防地降临在这个看起来受尽宠眷的羌族寨子。罗福林说，其实在出事前几天，大雨曾稍有缓和的迹象，正好这段时间是处理花椒和李子生虫问题的关键时期，很多家里的主劳动力都立即从其他地方赶回寨子，给花椒和李子除虫。他舅舅家的表弟媳本来在城里带孩子，因为心疼老人，也从县城赶回来，准备把地里的事情料理完再回县城。和这几家的情况一样，绝大多数的家庭失去的都是从30岁左右到50岁左右的壮年，留下的则是老人和未成年的小孩。

头七祭奠

5月的时候，连苍美和街对面的刘茂芝聊过一次天，说：“今年的天气怪，雨下得也太狠了。5月的雨都要下满了，这样下去，怕是要出个事才收得了场。”那个时候，她没想到，老天爷竟要出这么大事。

如今去和新村同一个村子的磨坊沟和梭梭寨，还能看到这里曾经生活的平静和富足。这里几乎每家人都有院子，会种花、种葡萄，自己养蜜蜂采蜜。吴月娥家曾经同样有一个大院子，正午面朝公路，右手边是猪圈，左边是厨房，前面两墩龙门柱，围着一圈栏杆。院子里种了葡萄和各种各样的花，她上次回家的时候，各种花都开得很旺盛了。

她妈妈朱兴琴还想办法弄来几株草莓种在地里，高原地区比平原地区的节令晚，草莓最近才刚刚结果。连苍美记得，出事前几天，朱兴琴还在家族微信群里发了好几次视频，有的是用盘子小心地托着植株上的草莓，有的是刚摘下捧在手里。她说，朱兴琴今年45岁了，从去年家里装上Wi-Fi后，就对使用微信乐此不疲，每天晚上9点过后还在群里发消息。连苍美怂她，“你倒是白天发啊！”朱兴琴回答：“我白天哪里有空嘛。”正是因为有朱兴琴，家族的微信群就格外热闹，自从出事后，群里的气氛就一直凝重得化不开。

这里的人见惯了地震和滑坡这样的灾难，连苍

美到现在还能轻松地回忆1976年那次地震，“用吊着的大锅煮饭，半天煮不熟，着急得哟！”2008年“5·12”地震给她最深的印象则是，石木结构的架子房，“石头被摇得伸出去，又缩回来，像吹泡泡糖一样。”每一次灾难都会留下无尽的麻烦，要搬迁，要重修房子，生活总会伤筋动骨一番，然后继续向前。但没有哪次灾难像这次一样，毁灭来得如此干干净净，又如此不留余地。

6月30日是头七，10点钟，开始是在“神龟回游”的观景台上遥遥公祭。随后，家属们带着香火纸钱和费力搜集起来的死者衣物到现场祭奠。按照当地习俗，在屋子里去世的人，头七那天本应该在死者房间里摆一张桌子，桌子上面三碗饭菜，下面三碗饭菜。上面三碗是给阴间的官员准备的，下面三碗是给死者准备的。备好饭菜后，用筛子在房间里筛满炉灰。当天晚上亲人们都住到亲朋家去，为死者留出足够的空间。第二天一早，亲属们要从窗子外扔一把火钳进屋，提醒死者，该走了，然后才进门。如果一个死在外面，是回不了家进不了门，只能去坟上烧纸。

但这一次的头七，没有房间也没有坟，所有人都只能去已经变成废墟的地方勉强辨认一个地方，匆匆忙忙地烧纸、烧香、烧死者衣物、燃放鞭炮。也有人在路边用一次性杯碗盛了6碗饭，并排摆在路边。吴月娥当天先去给爸爸妈妈磕头，然后一路往外，又去给二爸二妈磕头，给大妈磕头，给二孃（二姑）和姑爷磕头。没有坟堆的祭祀现场隔着三五米，一个接一个，遍地都是。不断有人哭倒在现场，剩下的人则互相拍着肩膀说“坚强些”，自己却别过头抹眼泪。

当天还难得地放了大晴，阳光炽烈，绕在半山的云雾完全散开，已经重新打通的叠溪河里的水是纯粹的碧绿盈盈，远处的山体则笼罩在阳光里，有一层梦幻的蓝紫色。但阳光下曾经新村所在的位置，除了凌乱的山石泥土，只有呛人的烟火味道和满地飘散的黄表纸，显示这里是一个干净利落的人间坟场。

而在离泥石流不远的下海子边上富贵山山腰上，有一条笔直的断裂痕迹，有人很肯定地说那里就是1933年寨子笔直坠落的位置，另外一些人则不确定，说是另外的地方。争论无法被证实，经历过那一次地震的为数不多的见证者早已作古，山上草木葱葱，如同从来没有人烟，灾难留下的痕迹和教训似乎已经被大山完全地消化了。■

读绘本，解决100个育儿问题

- 十二年亲子阅读、多家重点小学、幼儿园讲读绘本的实战派专家亲自讲授
- 从六大主题出发，为您立体解析最让父母头疼的104个育儿问题，针对每个问题推荐精品绘本
- 每期音频8分钟，一周2次，碎片化时间学习，让您轻松做最会和孩子沟通的父母
- 价格199元/年

认知
学习

艺术
创造

父母
成长

六大主题

社会
交际

行为
习惯

情绪
管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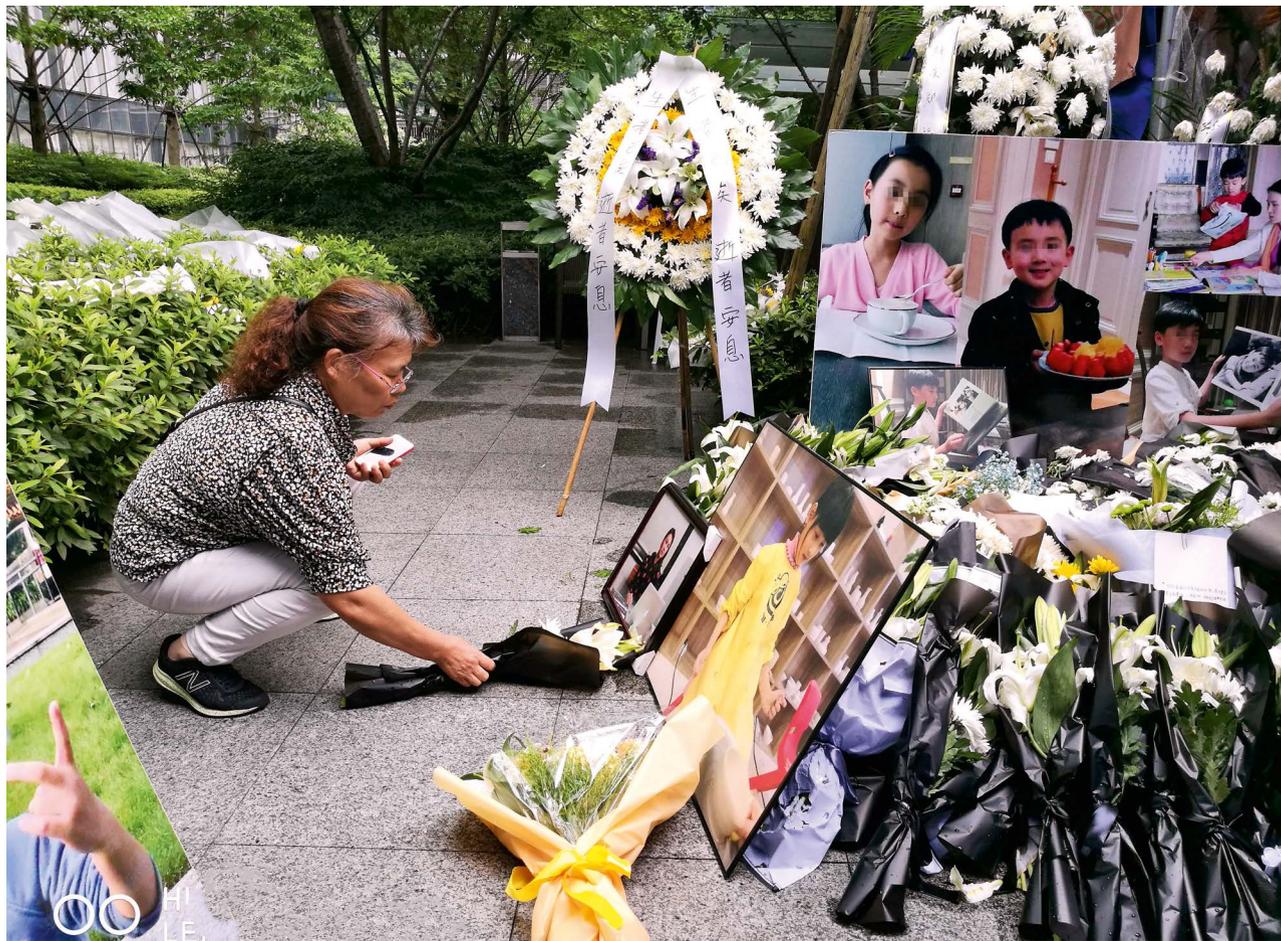
生活家：李一慢

十二年亲子阅读、绘本课堂讲课经验
曾举办线下亲子讲座超过600场

“书香中国·北京悦读季”首届金牌阅读推广人
为各大幼儿园、小学、绘本馆教师授课近百次，培养“领读者”上千人



【松果音频课堂】



纵火悲剧发生后，各界人士纷纷送来鲜花悼念，遇难者朱小贞的母亲一直在女儿和孩子们的遗像前布置鲜花

杭州保姆纵火案：消失的三小时

记者 / 王丹阳 摄影 / 于楚众

在杭州保姆纵火案的第8天，连日的梅雨终于暂歇，露出了一丝蓝天。6月中下旬本该是江南一带最潮湿的季节，所谓“梅子黄时家家雨”，今年杭州的雨水尤其丰盛，所以在雾天茫茫的钱塘江畔，“蓝色钱江”小区的那场熊熊的火灾嵌在阴雨的底色里相当鲜明。但它同时也嵌在了这座浙商云集的中心城市的中产梦里，单纯的保姆纵火案背后，人们质疑的是：在杭州最顶尖的楼盘里，为何从发现火灾到把人救出，要花将近三小时？

豪宅下的灵堂

出租车司机都知道，“蓝色钱江”是杭城数一数二的高档小区，在杭州东侧的新开发区钱江新城，豪华过它的大概只有金色海岸了。从市区的秋石高架桥转入新业路笔直朝钱塘江开去，这片CBD的楼群迎面扑来，“蓝色钱江”十来幢灰蓝色玻璃幕墙大楼规整齐刷地竖在江边，包围它的是新的市政府大楼、国际会议中心、消防指挥中心……

如今，蓝色钱江的正大门两侧公安和保安共同

把守，辨认着每一个进入小区的陌生面孔，络绎不绝的吊唁者逡巡在门口的喷水池边，朱小贞和她三个孩子的遗照被做成塑胶板，倚在喷水池、廊柱和台阶上，照片里的背景、表情和打扮醒目地透露着生前优渥的生活。物业大厅的沙发上，坐满业主以及吊唁的市民，仍难以从这场火灾中自拔出来，各方维稳人员追随着每个捧花而入的陌生人，把他们带到游泳池前的烛光和花海边。

一位从绍兴来出差的姑娘站在摆成心形的白烛图案边泣不成声。“我不去灵堂了，我只放下一束花就走”，她抽泣着向一位街道人士解释她只是一个陌生人，希望他带话给男主人要坚强。泳池边鲜花的主人已由开始的亲朋好友换成全国各地的网友，几分钟就是一位快递员前来放下花并拍一张照就走。就因6月27日晚的头七仪式被林家人搬上直播平台，千万级浏览量后，网友的鲜花接力而来。

灵堂从22日当天起就支了起来，一个蓝色雨棚隐秘在茂密的树坛中间，彻夜亮着灯火。棚外是梅雨季的雨水涟涟，棚内是4名老人近乎气竭的恸哭。每次来一波吊唁者，如孩子的学校师生、男主人的公司员工、老家亲戚、宗亲、在杭的商会同乡会，棚里都会起一阵悲恸。林家和朱家的人每晚夜不能眠，老人在酒店里仅能躺两三小时，醒来就立马来灵堂里坐着等待天亮，晚归的业主经过灵堂时，听到的是林生斌撕心裂肺的恸哭。

对于林生斌来说，妻子和三个孩子的遗照都是临时从手机里打印的。我第一次见到他是事发3天后，他几乎没有进食，一刻都无法合眼，“每天晚上我想到我老婆，我就哭”。22日一早，他接到亲戚报急电话，从广州飞回杭州再开到西溪路上的太平间时已是12点半，4个抽屉一个个打开时，林如同梦游一般瘫软下来，“我看见我女儿时，她的眼睛都没有闭上，我崩溃了……我抱着我老婆哭，她的眼泪是流出来……”

他的生意伙伴每晚轮流陪他回酒店休息，夜晚要四五个人作陪。“白天忙时他的情绪就正常，到了晚上就不行，不能让他一个人。”一位福建老乡这样说。这位祖籍福建霞浦的服装公司老板斯文而白净，让人想不到他就是那位失去了4个至亲的男主人，一次广州出差竟成永诀。如今，他背后一个严酷的事实是，公安机关已认定是保姆莫焕晶在客厅里点燃一本硬抄面的书而纵的火，他至今仍难以相信，“我们对她那么好，从来没有吵过一次架”。

“里面没有人”

按照官方的通报，杭州上城区消防大队5点07分接到报警，5点54分火势得到控制，6点48分现场火灾被扑灭。当天上午开发商绿城集团的物业公司开了个通报会，称“消防主机接到报警后，监控人员第一时间通知其他人员，在16楼接通水管营救”。绿城物业服务集团副总裁方敏青在现场通报说，消防广播是启动的，也派人挨家挨户敲门。至于最敏感的消防警铃和消防栓水压的问题，绿城的回应是烟感器、消防栓出水都正常。而当天的业主所质疑的消防警铃没有响，绿城则没有回应。

对于朱小贞的二哥朱庆丰来说，他至今脑子里挥之不去的并不是在楼下碰见的保姆莫焕晶，而是千钧一发时刻的一系列阻碍，使他至今悔恨不已。“所以我自责，如果当时咬定了他们在房间里，我拼命也要冲。”6点不到，他接到了林家大哥的电话，等他来到小区2幢1单元的楼下是6点15分左右，比他早的是亲家的两个老人，他们跟着大儿子住在江对岸的滨江区，开车过来10分钟。

莫焕晶一手拿一个铁榔头和手机呆呆地和保安站在楼下的警戒线外，她和众多从单元里落荒而逃出来的业主差不多毫无防备的样子，穿着塑胶拖鞋和碎花汗衫，不修边幅地下了楼。一开始她和邻居们说是朱小贞让她下来报警，她乘坐消防通道边的保姆电梯下来了，“他们应该是坐主梯下来了”。蓝色钱江的富奢气质可以从户型格局中主梯和保姆梯分开而见，两部业主电梯架设在单元厅内，对应客厅主门，一部保姆电梯得从地下车库而入，对应着消防通道和一扇保姆间后门。

5点30分左右，逃生的业主在地下车库、小区内转了几圈找朱小贞，甚至有人去到小区内的业主精选酒店，前台说3点后就没人来登记了……实在找不见后，莫焕晶才说人应该还在上面，至今，没有业主知道起火的确切时间点，以及她和朱小贞那天在楼上分别做了什么，只记得莫焕晶淡定的模样，以至于让人无心关注她。有人想问她为什么不至少带个孩子下来，也没有好意思问出口。甚至她什么时候被公安带走，都没人说得清楚。总之，自她下楼后，所有主人的反应都将永远随着葬身火海而湮灭无痕。

朱庆丰从莫焕晶的犹豫里越发相信妹妹就是在楼上，他试图闯进警戒线，两三个保安拦住他说屋

里已经没人。直到6点40分他按捺不住了，随着从隔壁2单元进去的保安和消防队上了电梯，“因为我穿了迷彩裤，他们没有发现”。他电梯坐到顶楼，再翻过25层的一米宽的玻璃檐架，钻到了1单元的消防走道内，再下到18楼。这个过程耽搁了不少时间，攀顶前有人建议他从某家住户的阳台横切过去，但因找不到绳子而作罢。

保姆间外浓烟弥漫，朱庆丰看不见里面，黑烟里的消防队员混乱中告诉他没有人。“他们也不确定的样子，所以我没有硬冲，但房门门还没有破，我是询问和质问他们有没有破门，而不是要求，因为我也不确定。”很快，门就破了，朱小贞和三个孩子被发现抱紧在朝北间的窗口下，房间正与保姆间和后厨平行，可见是躲在正离南部的起火点客厅和阳台最远的位置。

而此时，消防队员就没有立即将人救出，“他们说要等担架来抬出去，于是我就火了，我说湿棉被一裹就好了嘛，他们说要请示领导，对讲机里请示后还是用我的办法裹了出来……”朱庆丰最不平与愤懑的矛盾点也在这里，他认为整个过程也厮磨了几分钟，三个孩子一个个抬出时并放在走道里，随着朱小贞最后一个被抬出“楼道里放不下了，才一起抬下楼梯”。业主们看见三个被裹从楼里出来时是7点37分，女孩的长发从被筒里垂落下来，“我当时的反应是人已经没了，都是全部包在被子里的……”一位目击者这样对我说。

林家的“杭州梦”

8点05分，朱小贞的大哥朱庆勇在浙医二院前找车位，就因为他睡觉开着飞行模式，乃至7点半醒来时才接到弟弟短促的电话说“小的可能已经不行了”。就在急诊室前，三辆救护车呼啸而至，朱庆勇冲上去抱起一个被裹，外甥女结着黑油的长发蹭在他手臂上，发出焦味，事后他意识到，抱过后衣襟上的黑油是得靠肥皂用力洗的，但他们除了满脸熏得焦黑，都没有丝毫烧伤。

在只有直系亲属能进入的抢救室里，他看见医生是以插氧气瓶和人工按压的方式施救，一个半小时后，医生告诉他们要做好心理准备。“我当时求医生哪怕救一个过来……但医生说再长时间挤压，人会变形，毕竟年纪太小。”朱庆勇说。他当时就颇有微词，既然以氧气罐和人工的方式就能施救，为什

么不是在楼下，而是要在早高峰的城里开上20分钟到5公里外的医院？

随着10点半正式宣告死亡，家属被带上了楼上会议室，这时杭城的服装圈同行见到新闻后纷纷来到医院接应。众人的哭喊响彻急诊楼，三个孩子最小6岁，最大11岁，中间的外甥女林臻亚9岁。杭州的服装圈不大，互相知根知底，林家有个服装品牌叫“潼臻一生”，在西南某些城市的商场里都有代理柜台，这个品牌以三个孩子和林生斌的名字命名，谐音就是“同贞一生”。林臻亚的童装模特照如今还能在网上搜到。

来自浙江庆元的朱家和福建霞浦的林家最初在杭州相遇是2004年，应该说朱家发迹较早。2003年“非典”肆虐，世代务农的朱庆丰想着来杭州闯一闯，在市面最萧条的时候做起了服装生意，朱小贞就来帮忙看店。兄妹三人陆续在武林路上开起了零售店，再慢慢往批发等上游环节发展，于是从门面店做到了设计坊、小工厂。

林生斌初来杭州时在发廊里剪发，认识了朱小贞，慢慢也做起了服装。娶朱小贞时朱家并不同意，浙江人嫌福建地偏，而且朱家已有起色，但婚后林凭借精明的商业头脑带着妻子的服装店一路向上游冲去。如今两人已在余杭区拥有一家规模不小的服装公司，设计、生产一体化，在距家30公里外的乔司街道，他们的厂房也已达上万平方米。“林总在杭州服装圈是个响当当的人物”，灵堂内外不止一名同行这么说，他创立的男装品牌如今在杭州置地国际男装基地有个门面店，剩下都是全国各地的代理。

“我妹夫这人看起来就比较聪明，2009年时，实体市场开始受网店的影响越来越大，他及时转型，向上游做设计、贴牌，所以我们还在做批发小工坊的时候，他已经做大了。”朱庆勇说。朱家和林家都已在杭州买房落户，商业头脑和宗族人脉圈是他们在这个城市的立身之本。小夫妻在2009年买了蓝色钱江一期的房子只有百来平方米，还是贷着款的，两年后再借款换到了如今的360平方米江景大宅。“他就是有眼光，觉得这房子会升值，果然当年6.5万买下的，现在已8万”，朱庆勇说。门口的房产中介了解这房子的市价，360平方米的江景房已近3000万元，但在纯住宅的蓝色钱江，交易量并不高，业主并不急于投资，归根结底在于不缺钱。

对林生斌来说，一穷二白、小生意起家到成为民营老板，如今住在四室两厅的豪宅，这种经历对

蓝色钱江的业主来说并不算特殊。“都不是杭州人，大多是农村出来做生意做大的”，一位业主这么对我说。这片住宅并不是达官显要的阵地，反而有很多二次置业的浙商，常年在外奔波，度假拿来一住。坊间流传着，林生斌5年前还不知奢侈品是什么样子，所以他做生意异常卖力，把生意从内地二、三线小城拓到广州，只是这一次他的富商梦定格在了6月22日。

小区里的东莞保姆

当天晚上6点，上城区公安局发出通报，34岁的保姆莫焕晶存在重大嫌疑，已被控制。翌日一早，莫焕晶因涉嫌放火罪已被提请刑事拘留，根据通报，当天她从客厅的沿墙书柜里取出一本硬抄面书，点燃纸页扔在地上再自行通过保姆梯逃下……纵火目的一瞬间甚嚣尘上，有人说她偷了主人家一块20万元的金表拿去典当了2万元，被女主人发现后为了销毁证据而纵火。林生斌后来从零碎的闲话中听到此事，茫然道自己从来不知道是她偷的，只当是孩子玩耍弄丢了。

具体事因虽无法考证，但坊间对于保姆之恶的讨论至今未绝，伴随着莫焕晶在前东家的偷盗劣迹被一一扒出，人们愈益相信这次纵火同样出于贪欲。莫是他们今年初通过前保姆找来的，在小区里，大多数业主拥有保姆，他们往往通过口碑相传，互相介绍着中介，或直接是保姆本人。曾经，照顾了8年孙子的林母与他们同住，她比较挑剔用人，所以几任保姆都留不住，直到前两年因身体不好而去了大儿子家。

10号楼的业主莹莹和林家是朋友，同是全职太太的她来林家做客无非就是和朱小贞说些居家问题。“她对我说哦，这个阿姨好得不得了，人家阿姨天天下午要午睡的，她不休息的就是一直在拖地，我感觉她是绝对满意的。”朱小贞给保姆开出7500块月薪也曾令她暗叹她的大方，同样不用带孩子只负责家务，她自己的阿姨月薪是5000块。“我要表达的意思就是他们对阿姨是绝对不会吝啬的，不可能对阿姨不好。”

她对莫焕晶的印象是沉默内向，但因年轻而在穿着上相对讲究体面。如不是东窗事发，她在东莞养成的赌博史在网上流传，忙于生意的林生斌也许永不会知道她的前科。一个月前，莫焕晶提出要在

老家买房，上海的前雇主愿意借她10万块，夫妇俩听出了意思，为了挽留而不惜提出“我们借给你好了”。

工作日的白天，小区里的阿姨帮点缀在小径曲折的花园里遛着宠物或看着孩子，她们乐此不疲地谈论着那场火灾和4条人命，当然还有基本上不打招呼的莫焕晶。有人说，她买菜都是开着女主人的奔驰去的，因为年轻而自然和别的阿姨拉开距离，即使经过小区也闷声不响，不爱理人，“总是拿着手机在玩”。他们没想到，这个不合群的阿姨瞬间变成了纵火犯，有关她秀豪车、咖啡和前任雇主的私人飞机的朋友圈照片在网上被公开。

据媒体报道，她至少涉5宗民间借贷纠纷，最晚一桩是前年在东莞一法院，她为朋友麦某的7万元借款担保，以致被连带起诉。有媒体联系到麦某，7年赌博史这根导火索终于呼之欲出，她在来到上海、浙江前，常年流连于澳门赌场，2014年离开广东后赌瘾一犯甚至在手机上玩赌博软件。所以，在麦某的描述中，莫焕晶初来上海是为了躲债，她偷了前夫母亲存的几十万本钱，被发现后被迫立即还钱，于是开始东凑西借，不但被高利贷追债，把朋友也得罪光了。

从躲债到纵火

两人在上海涉足家政业是去年8月，麦某在一家注册地为奉贤的家政公司担任了3个月的法人，只是自己同样身陷债务而被迫转手，当她将莫焕晶介绍到公司来时，不想就过了一周，莫就因盗窃被赶了出去，她之后的去向就不得而知。朱小贞更不知道，莫焕晶来到家里前被上海的前雇主辞退，原因几乎也是偷了一条金项链。

今年春节，林家外出旅游，给莫焕晶也放了两周的带薪假，她发消息给麦某，告诉她这家杭州的做童装的雇主对她非常好，男主人知道她有个10岁的儿子在东莞，特意问了身高尺寸，寄了一套自家的品牌童装过去。没有人知道她放的这把火是出于要置人于死地还是别有蓄谋，在小区里，与公安接近的业主放出一种说法，莫焕晶在局里招认，是林家对自己太好了，她想制造火灾再装作救火立功，这样可以博得进一步信任来涨工资。无论真假，她缺钱是一直存在的事实。

小区里的全职太太挑起阿姨来并不宽松，换来



左图：朱小贞的丈夫林生斌（右二）几天来悲痛得几近麻木

右图：烧毁的蓝色钱江小区2幢1单元1802室南阳台，如今已整个被绿色围挡罩上

换去是家常便饭。一位业主激动地对我说，家政市场混乱也是一方面，“她们没有固定挂靠的中介，都是平台间借来借去的”。麦某曾担任法人的家政公司有个总部，位于黄浦区某个繁华的街口一幢老旧的商务楼内，如今法人姓钟，操一口广东口音，在工商资料上，公司的监事仍然姓麦。钟老板在电话里告诉我，公司平台上有300来个签约保姆，做得长的有五六年了，薪酬以在职年数划分，若要5年以上住家经验的阿姨则起码月薪7000元，而这是市场价，低了阿姨不愿来。

每位阿姨都会制作简单的简历供客户参考，如按年份列出大致的住家经历，这些是阿姨本人提供的。在那间简陋隐蔽的办公室里，两位面对面而坐的办事员告诉我钟老板常年人在深圳，她们不认识麦某与莫焕晶，在媒体报道中，钟老板承认见过莫焕晶一次，而杭州的雇主并不是从她这里介绍的。事实上，这家公司在去年11月从麦某手中转让于她。这是一家流动性非常高的公司，不管是经营权还是平台上的阿姨，在两个几乎是放满上下铺钢丝床的房间里，一位躺在床上熏着艾灸的中年妇女告诉我，

她还没有接到下家，于是这里更像个驿站，10块钱住一晚。

“这家公司一天到晚在换老板，转来转去的，去年还是一个湖北女人，今年就换做广东人了。”在大楼下，来“求职”的安徽女人陈燕这样告诉我，从她无奈和鄙夷的口吻里，我听出这家公司并非如钟老板所说的和阿姨有雇佣关系。像陈燕这样的流动性求职者占了大多数，她们在与主人家合同期满后有一段空窗期，游走在各种平台间揽活，哪家中介能促成下一单活，服务费就给谁赚。钟老板这家的服务费高达20%，原因在于租住的大楼物业偏贵。“这一行越来越不好做”，陈燕说。

在这家中介公司的求职经历是这样的，每个前来求职的阿姨，进来一说明自己的情况和需求，那两台电脑就会在各家政QQ群里刷单求匹配，对接客户成功后，两家中介公司按功劳分成，这几乎是目前家政市场通行的做法。而在阿姨和雇主的合同上，中介公司只担任见证人角色而敲章，两边都收服务费的中介公司在其中唯一的作用是帮助双方在一年内找到满意的甲方、乙方为止。



家政圈就有了约定俗成的亚文化，阿姨跳单和雇主自行缔约，形成信任关系后再互相介绍，一条游离在监管之外的地下雇佣链就此盘根错节。一位中介老板在津津乐道杭州大火后告诉我：“没法核查阿姨的来历，只有雇主自己观察，比如一个广东的单身女人为什么要在杭州做保姆？你要自己有生分心。”在他的说法里，安徽、河南是中国家政业的源头，而好经商的浙江或广东人从事家政就有几分特殊。

永远的未接来电

“保姆纵火是不错，但物业和消防为什么将近3小时后才把人救下来，谁是帮凶？”这几天，林家人激愤之处往往这么对我说。当天晚上他们回到蓝色钱江后，就陷入一种悲痛与焦灼、绝望交织的追责状态，由于绿城物业至今没有负责人出面调解，而使矛盾焦点迅速从一桩简单的纵火刑事案，转移到向开发商和物业讨要说法，紧张的对峙在这座园区般四面围起的小区里，如同黄梅天的低气压越积越重。

业主间流传着一个说法，那天4点50分左右

有一户低楼层的住户听说过几声孩子的喊叫“着火了，着火了”，半分钟后消失。由于是凌晨而使人没有在意，继续睡去。但5点30分前后，碎玻璃噼里啪啦高空坠落的声响逐渐把单元里的住户吵醒。虽然绿城一再强调现场的消防广播是有通知，但业主揪住不放的是消防警报并没有响，他们认为楼道里的烟感装置一旦触发报警，第一时间联动的应该就是震耳的警铃。

5点30分，同单元四楼的赵诚被玻璃声砸醒，他所在的主卧与阳台同样朝南，伸出头俯瞰，四五辆消防车停在底楼树丛间，晨曦中的钱塘江边之江路上插着几个人，微缈如同蜡烛，塔吊式的消防云梯在空中摇摆，却迟迟靠不上楼墙。赵诚穿着睡衣窜到楼下，才看见熊熊的火舌填满了1802室的南阳台，烟气笔直冲向天际。他认识林家，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冲上18楼。

那时，他趁着混乱跟着保安和消防从隔壁单元进楼救援，让他耿耿于怀的是在危急时刻，高档物业的严防把控也可能是阻碍。每道门禁都必须保安来刷卡开启，哪怕同楼层、不同单元的业主都无法互相借卡。他跟着消防来到2单元1801的南阳台，只见消防从门外的消防栓接了水袋，从阳台横切着浇水，“水的力量真的不大”。其次在树坛里，是一根圆鼓鼓的水管从消防车的自带泵上伸进了底楼大堂。他在浓烟中帮不上忙，却在想如果楼内有水接通，没必要在马路上取水呀？

不止一个业主在消防车边上听见消防员拿着对讲机喊道“水压不够”，他们见到消防员在车上一筹莫展，云梯在空中摆来摆去，最终因当中100米宽度的花坛而无法架靠过来。赵诚被浓烟呛得下了楼，当他6点13分在楼下碰见莫焕晶的时候，她正与公安说话，表情异常自然。“公安问她那他们还在不在，她说应该不在了，既然把她叫醒，那也该撤走了”。赵在那一刻想问她为何不至少带个孩子下来，只是没好意思问。

这时，隔壁单元24楼的徐冠华在楼下发现了一个5点08分的未接来电，那就是朱小贞打来的，事后他知道，朱小贞5点12分还拨过另一位邻居的电话，只有当有人5点30分打过去时已无人接听。这通未接来电让徐冠华懊悔不已，他在微信上写道：“5点30分后，我们不止3个邻居一次次跟消防说里面有一大三小，但是消防队就是反馈说里面没人……”当赵诚在隔壁的阳台上观摩救火时，同样没有想到，

那一大三小正躲在远离烈火的某处，浓烟正把他们推向死亡边缘。

后来，人们从消防队打听来无法架设登高云梯的原因，是小区周边的地基太软，导致找不到支撑点。这时业主才意识到100多米高的云梯无法伸到18楼的根本原因，这一最直接的路径走不通过后，楼里伸水管的做法当然就显得拖沓。赵纯阳在熟悉的消防朋友中也听来一种未被证实的说法，当时由于楼内消防栓水压不够，消防员去到消防总控室检查，发现原本该是自动挡的增压泵被放在了手动挡……各种版本的传闻至今未消，一位接近杭州消防的本地媒体人告诉本刊记者，楼上消防员曾在对讲机里要求物业打开增压泵，“但物业说要领导签字才能进总控室，消防员都发火了……”

备受非议的救援

6月29日，小区一公里外的杭州消防指挥中心的门岗亭里，一位前来接应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当天的消防数据已转到上城区公安局，一切以公安调查结果为准。事实上，消防在事后也承受来自公众对救援不力的指责。《钱江晚报》在事后第三天发了一篇专访灭火过程的文章，“当时主入门温度高达六七百摄氏度，当即判断主入门背面距离起火点非常近。这时如果强行破拆主入门，大火必将喷涌而出……所以，只能通过保姆门这唯一的途径，与此同时，对主入门立即用水枪强行降温”。在不了解起火点的情况下贸然破门，空气瞬间流通中的回火和助燃也是灭火中的大忌。

“他们5点16分到楼下，可能到破入保姆门还要叠加个20分钟，总之他们似乎是碰到了些阻挠，比如上楼时要经层层门禁、物业不肯开增压泵、保安还在消防通道里带错一次路，而且地面消防队始终没有拿到户型图。”该报道一位记者这样说。户型图似乎是救援中最为关键的一道依据，在浓烟遮蔽视线，即

“我们有过回应的冲动，但考虑到案件的调查、侦查尚在法律程序中，所以不便为自己有无责任问题做太多表态。”

使戴着头灯能见度仅1米的情况下，消防员冲着南面的熊熊火光处匍匐而进，而全然忽略了在并没有过火但被黑烟封锁的朝北房间里关着4个人。

“消防员所谓的没人可能是他们在对讲机里通报所到之处没有人，其实初到时屋内已经被烧得不成格局，他们关注的是南部过火区，被家属听成屋里没人。”这位记者从采访中得知，最先上楼的是三组共9人，“对他们来说，这样的民宅三组人是足够的了”。之后，屋内消防力量增至30人，只是他们都没能将每一扇门打破。

6月28日，莫焕晶被依法提请批捕的消息传来，绿城服务集团继6天后首度打破沉默，发表了一则致哀信，稍详地阐明了当时物业的反应。凌晨5点，24小时消控室内接到楼道的烟感器报警，7分钟后，消防联动系统同时启动，“值班保安坐电梯到18楼时，电梯门一开，感觉浓烟过大，又回到一楼，然后走消防楼梯到16楼，及时铺设消防水带灭火”。其次，消防栓出水正常，翌日检查时“进行现场水压测试，结果水压正常”。

这一说法却更是挑动连日来业主激愤的神经，质疑声诸如为何不是从18楼直接电梯到16楼，还要下到一楼走消防楼梯？有人说其实保安根本不会用消防栓，有人说出水并不代表水压正常，翌日水压正常并不代表当天……当不信任的空气扩散蔓延到第6天，开发商迟到的解释在业主眼里怎么都苍白无力。绿城在信中还解释了一缄三口的顾虑：“我们有过回应的冲动，但考虑到案件的调查、侦查尚在法律程序中，所以不便为自己有无责任问题做太多表态。”

这起乍看是刑事案件的事故已交织着一种社会角力、扑朔迷离的各种线索和头绪笼罩其上，居民因其巨大的社会能量而使此事逐渐演变成一场业主维权。恐慌过后的第3天，一群业主三四十个人开了个小会，激愤地向物业列出一纸问题。比如，物业一系列反应的具体时间以及应急预案；小区夜间的保安巡逻制度；24小时消控室在哪儿；物业人员有无消防演练……火灾惊醒了一连串的质疑，他们突然发现原来自己的单元楼下门厅里是没有值班保安的……

“你说的及时是怎么及时的？你说18楼烟大，要从16楼接消防栓，那之后为什么消防队是从底楼接了水管一层层铺到18楼的？如果水压是正常的，为什么不再往15楼接？”莹莹显然已是讨要说法群的主力，她告诉我，每晚想起那三个孩子的脸就动容地流泪，小区里的全职太太很多夜不能寐，两三

小时惊醒一次，她们白天就坐在物业大堂的沙发上聚拢谈事，她们认为，以上的疑问并非要等公安出结果，是绿城物业理应回答的。“一场大火告诉我，每个月1800块的物业费，原来你的保安跟我是一样的。”莹莹充满怨气。

尴尬的物业

“增压泵应该是消防来了以后才去开的，保安怎么会开增压泵？”上周末，绿城中国首席品牌官刘仲晖在电话里这样回应本刊记者。对于最为敏感的水压和取水问题，她表示：“有一个细节是，6点多到的1楼接水，但火势控制是在5点多。因为一楼在用水，可能居民就觉得楼上没水，但其实楼上在用水，而且把火情控制了。”

事实上，刚在5月13日，蓝色钱江的物业在此搞了一次消防演练，有些业主也是看见的，保安不仅有参与消防训练，还有应急预案方面的培训。小区之外3公里处便是杭州国际会议中心，所以这一带是G20重点会议路段，消防安全检查相当严格。1月，小区刚做过一次消防维保，由第三方维保公司担任。“保安先直接上18楼，没想到烟这么大，按照培训流程，是先去一楼拿工具，再和同伴一起上楼……险情很重的时候，要考虑自己的安全，不能一个人冲。”刘仲晖说。

但是在业主心里，稍一耽搁都让他们不能理解，不管是救人还是逃生——尽管物业认为，即使烟感器传感到中控室的联动报警控制器，保安也得先确认，否则立即启动消防广播，万一是误报，会引起业主投诉。火灾报警控制器的记录显示：5点07分，控制器发出联动启动请求；5点08分，收到各联动设备的反馈信息。联动系统启动后，17、18、19层的非消防设施电源被切断，通风增压设施自动打开，安装在入户走廊顶部的消防广播开始用中英文双语进行广播。

但是，分贝远高于消防广播的警铃却没有响，理论上，警铃与烟感器是一组联动装置，在天花板上应相隔不远。蓝色钱江的烟感器和喷淋系统装在每户电梯出口的楼道上空，室内并没有，这种排布是符合2015年前老版《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的。对于19层以上，总高不超过100米的高层住宅，仅在“走道、门厅、可燃物品库房、空调机房、配电室、自备发电机房”设置火灾探测器，不包括住

宅部分。只是在2015年5月后，规定改为“公共部位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套内宜设置火灾探测器”。值得注意的是，并不属强制范畴。

“你有没有测试过，那么厚实那么密闭的大门，这个烟要多少时间才漏到走廊？如果不是为了第一时间发现火，装在走廊里有什么用？”郑兰这么说，她是住在隔壁单元19楼的业主，她的主卧与林家的客厅有接壤。5点26分，她被烟呛醒，迷糊中过了一阵，问到丈夫是不是点了蚊香，“我老公说家里没有蚊香啊”。当她走向厨房，听见门外一阵叮铃咚隆的铁器碰撞声，开门一看是消防员在摆弄消防栓，浓烟闯进屋来。她立即关门，通过可视电话问物业是出了什么事。

“他就说是1802起火了，但他没有叫我立即撤离。”郑兰至今对此耿耿于怀，直到她发现380平方米的家里几乎所有家具被熏上一层半透明的黑色焦质，意识到自家也受害不轻。“一家三口从消防楼梯跑下来。半路上一个保安问我，还有人吗？我下意识地说，我们家就三口，这个时候我只能保证我们家。”

虽然物业在当天就公开表示保安曾依次敲门，但未被敲到的业主无法接受，郑兰诧异的是，“消防队就在我门口取水都没有来敲我的门”。像她这样家中需彻底清洗的业主最近住在小区隔壁的五星级业主酒店，“除了在没有身份证的情况下让我登记入住，别的安慰一句都没有”。某天中午，她去物业大堂质问，摔了个花瓶，后来每天开始有盒饭送到酒店。

这套房子对她来说只是每个月来度几天假，出身金华乡下的她在全国开了4家水泥厂，买到这里是因为安静，再则国外留学的女儿可以寒暑假在杭州落脚。她跟别的业主基本无来往，“但那三个孩子实在是可爱，我喜欢穿拖地长裙，他们在楼下看见我，总是说阿姨漂亮、漂亮阿姨，所以我记住了他们”。说到这里，她眼角泛起泪光。

那天在楼下的之江路上，不乏裹着浴巾光着脚的人，郑兰也同样睡衣睡裤，两手空空。她死死地盯着那笔直上蹿的火舌会否旁逸到自家，她丈夫想冲上去拿一个公文包，里面是重要过家当的公司资料。“我拖住他，我说烧了就烧了，我们不要了。现在我想，如果烧掉我们家能换来他们的命，我心甘情愿。”

难撤的灵堂

“消防队里多数年轻队员都是两年的现役兵，

培训就要半年，再实战一年半。本来接触高层建筑火灾的经验就少，再独立作战能力不强，除非临门能先断定不正对着火源，否则回火立马轰燃。”中国消防协会理事、原上海消防研究所信息研究室主任范强强告诉本刊记者。据他的说法，在住宅楼有非强制性消防设计规范的前提下，业主应自行提高警觉，比如购买家庭装独立式火灾探测报警器，“这在美国的普及率已经96%”。

范强强介绍，目前有种超前但并非强制的做法，区域消防局对重点消防单位实行远程监控，将物业的消控数据通过物联网连到总队，如此可以凭借二维码扫描掌握每一道维保信息，“包括水箱有没有水，增压泵是否正常开启，但多数大楼是不愿意花钱维保了还要接受你监督”。

一位在杭州富阳区运作一家养老院的业主这样告诉本刊，在杭州建筑圈内，他们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秘密，“消防设计、施工和大楼验收前检测是一家公司全包的，你只用给个打包价，所以你看自家监督自家”。她认为这个市场相当混乱，各种拥有资质的检测公司层出不穷，都似乎与消防行政部门有沾亲带故的关系。对这位业主来说，消防局每月有例行检查，但她认为那也是走过场，有业主难免在日常维护中为了美观或者节省，或藏起灭火器，或者是关了弱电控制。

“消防设计是没有问题的，否则你的楼是不会通过验收的。但在物业维护的工作中，说到底就是钱，你的消防设施也许都是好的，但在那一刻是否是有效地联动，那是一个系统性的运作。”这位业主在挑选物业公司时也颇费脑筋，有些物业公司并不自带保安，保安公司派来的保安又三日两头地换，“你让他们怎么接受系统性的消防训练？”

从之江路上看烧毁的1802室南阳台，如今已经整个被绿色围挡罩上。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富豪社区，8幢25层高的玻璃幕墙住宅大楼拔地而起，灰蓝色的里外双层玻璃，每个楼乍看密而不透，让人无法想象里面动辄360、380平方米的奢侈的洞天。事后，业主在议论，这座罕见地拥有新风系统的住宅楼，却都是平移式的推窗，手一伸一两个拳头的宽度，这点让他们也突然不满，认为在烟熏时相当不利于透气。

头七当天，小区里的花圈被移走，清理出的小径被雨水冲刷得晶莹剔透，物业告诉林家，一些业主的孩子上下学走过花圈会被吓着，也已经有人在

问灵堂要搭到何时。林家撤了花圈，但实在无法回答灵堂的问题，对他们来说，公安的结论还没有正式公布，人还没有火化，下一步如何走每天都折磨着他们。林生斌时而红着眼眶，呆呆望着吊唁者，若试图与他交流，他迟迟说不出话。

双方老家前来的一波波的宗亲穿着统一的黑色工作T恤，在小区里极易辨认，他们不断来到物业大堂交涉。一位和朱家一起做服装的庆元老乡这样告诉我，他们正在准备一份纸质材料，把所有关于救援时间、消防栓水压、警铃的疑问都呈给绿城总部，他甚至要调取监控室视频。“我们又不缺钱，我们只要一个真相。”焦急的亲属显然等不了官方的结论。

林生斌和朱小贞的和睦在小区里广为流传。“小林总是说，我老婆脾气怎么怎么好，我老婆很文艺范的，我老婆喜欢书法和古筝的，我老婆家里百合花摆起来的……”坐在物业大堂的沙发上，莹莹对每个陌生人解释着朱小贞的贤淑。夫妻俩近乎到浪漫的和谐让她也艳羡，今年3月朱小贞过生日，林生斌当天才放出一个惊喜，送她一辆特斯拉。“那天晚上小林来我家和我老公喝酒，他说刚刚陪老婆西湖边走了一圈，他老婆回家说：老公你过来，我给你弹一首我刚刚学会的《笑傲江湖》。她老公说：我本来不要听的哦，今天你生日才听……”

徐冠华记得，这三个孩子总是一大早就被林生斌带下来健身，老大颇有运动天赋，小大人般地照管着弟弟妹妹，妹妹害羞腼腆，而最小的那个活泼可爱，屁颠儿着跟在他们后面玩。6月25日上午，一群哇哈哈双语学校的师生前来吊唁，三个孩子都在那里就读。一个四年级的男孩和老大林恹一做过半年同学，后来林转到了学校的外籍班，他们在一个校队踢球，林是前锋。“我们对他印象很好，他很有团队精神的，又有毅力。”这个男孩老到地说。

如果林恹一没有被火灾淹没，他们应该都会出现在6月24日的一场对实验小学的友谊赛中，后来，为了祭奠这位友善的小伙伴，两校取消了比赛。在他的印象里，林恹一独立而开朗，每天骑着自行车上下学，所以他只见过他家保姆一次。“我那时看见她，我就觉得她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这个男孩站在满地的白烛边不经意地说道，直到班主任老师集合队伍，一起离开大堂。■

（文中陈燕、莹莹、赵诚、郑兰为化名；实习生刘畅对本文亦有贡献）



陈兑

加州注册心理师
《通往真爱之路》



孟子

娓娓道来，从科学角度解读真爱，很有启发和作用。



人比黄花胖

谢谢朵拉，这些话说到我心里去了。你的课给了我信心！



Yvon

振聋发聩的小课。谢谢老师，回看自己的生活，感觉很多事情都得到了解释，这就是哲学的力量吧！



a^tman

谢谢老师。人生，正是不断地选择，冲突，挣扎，最终找到自我，谢谢。



田Candy

可是这三个“着陆技术”，只是暂时地消除了焦虑情绪，如果多次使用这样的方法抑制，身体也会免疫吧



清流

临床咨询经验超过6000小时的心理咨询师
《打败紧张、焦虑、愤怒，三大情绪敌人》



李剑

牛津学者、社科院专家
《难以选择时如何更好的做选择？》



马良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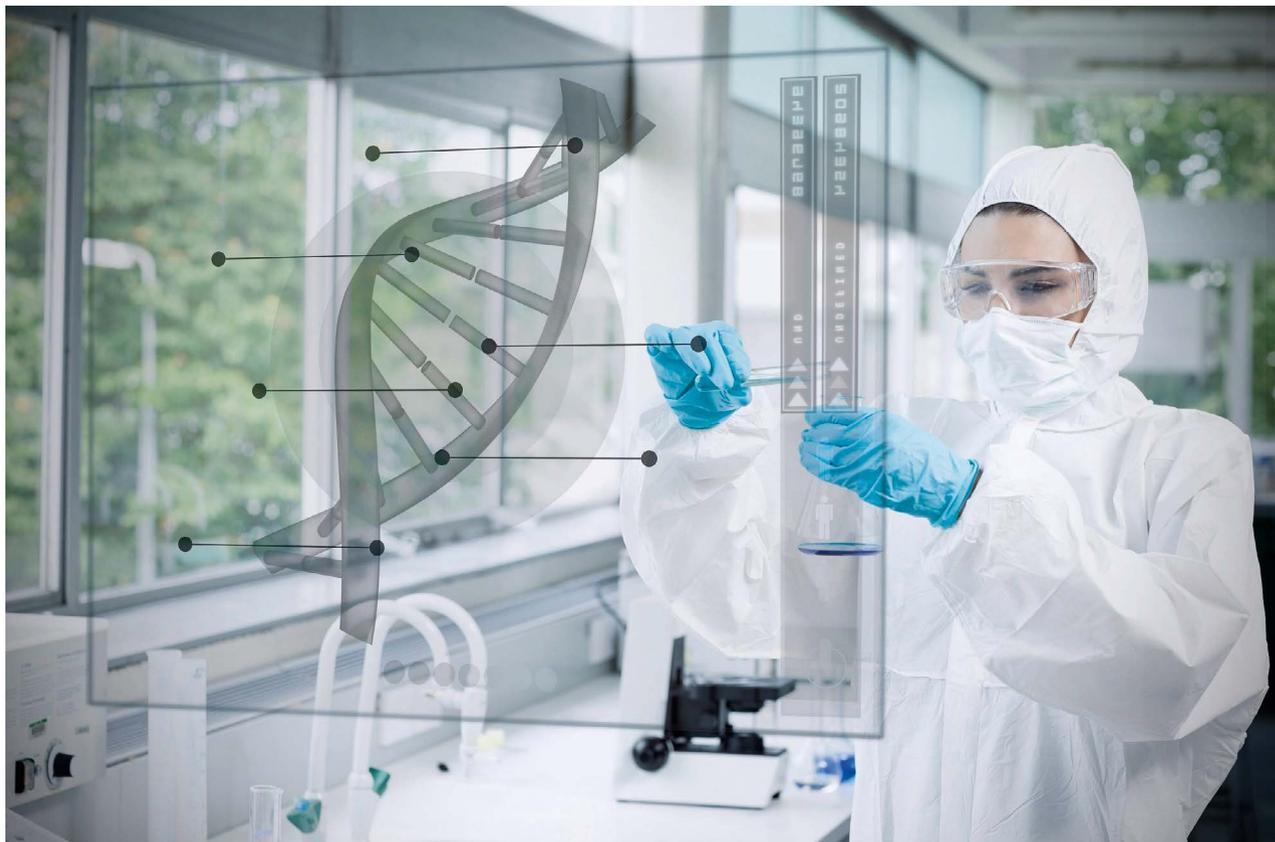
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副教授
《备孕二胎你必须准备的十件事》

放下你的焦虑

「中读小课」



扫描二维码
下载「中读」客户端



右图：2016年10月9日，美国一家DNA检测公司创始人杰拉德·罗森塔尔把亲子鉴定服务搬到了纽约的大街上

基因算命靠谱吗？

主笔 / 袁越

随着 DNA 测序技术的飞速发展，基因检测越来越火了。这是生物学研究领域的一次重大革新，它改变了科学研究的范式，标志着生命科学迈向了一个崭新的未知领域。



2009年8月14日，朵拉（左）和弗雷德·贡克尔参加“23和我”公司进行的个体基因组测试

差异决定命运

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未来会不会谢顶或者发胖，有多大可能得糖尿病或者癌症，甚至想知道自己究竟能活多久，能否生出一个健康的孩子，你可以：A. 请一位算命先生测测自己的生辰八字；B. 找一个星座大师查查自己的星盘；C. 把自己的唾液寄给一家基因检测公司。

选 A 和 B 的我们称为封建迷信，选 C 的则被视为科学，因为一个人的生辰八字和星座星盘没有理由决定他的命运，两者之间的逻辑链条是不清晰的，而基因则是所有生命现象的遗传基础，科学家们已经搞清了遗传的本质，明确了从基因到蛋白质之间的因果关系，用基因来算命应该是靠谱的吧？

没错，自从 1953 年沃森和克里克发现了 DNA 分子的双螺旋结构之后，我们终于知道生命信息是由 DNA 分子负责储存的，而基因则是由 DNA 分子当中的 G、A、T、C 这四种核苷酸依次排列而成，不同的排列方式决定了蛋白质的结构和功能。蛋白质不但是所有生命体的结构基础，也是所有生化反应的催化剂（酶），基因正是通过控制蛋白质来控制生命的，这条逻辑链不但相当完整，而且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2003 年，人类基因组计划宣告成功，来自全世界的科学家们通力合作，测出了所有 30 亿个核苷酸的全部 DNA 序列，其中包含大约 2 万个基因。值得

一提的是，这 2 万个基因的长度加起来只占人类染色体总长度的 1.5% 左右，人类基因组中的绝大部分 DNA 序列都不编码任何蛋白质。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这些 DNA 序列都是没用的，它们很可能参与了基因性能的调控，并以这种方式控制了蛋白质合成的时间和数量，进而控制了生命的进程。

随着基因组测序量的增加，我们知道地球上所有人的基因组相互之间的相似度高达 99.5% 以上，剩下的这不到 0.5% 的差异之中，大部分是单个核苷酸的差别，比如某个位点大多数人是 A，但少数人是 G，这样的差异我们称为“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以下简称 SNP）。除此之外，还包括多个核苷酸的插入、缺失和重复等其他类型的差异，但它们所占的比例很低，本文暂不考虑。

如果让一个外星人来研究人类基因组，他肯定会把研究重点放在那 99.5% 的相同部分，因为外星人感兴趣的是人类和其他生物的差异，那 99.5% 才是决定人之所以为人的主要原因。但是，人类科学家肯定会更加关心剩下的 0.5%，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以及很多种疾病的病因都是由这 0.5% 造成的。

同样，算命先生肯定也只关心这 0.5% 的基因差异，因为人类共同的命运是不需要算的。算命爱好者关心的是自己和其他同类的不同之处，几乎所有这些不同之处都源于人类基因组内的 SNP，市面上那些基因检测公司测的就是它们。

基因检测的芯片法

测 SNP 最准确的办法当然是直接测 DNA 序列，最先知道的人类 SNP 正是在基因测序的过程中被发现的。2008 年开始实施的“千人基因组计划”（1000 Genomes Project）测量了来自 26 个不同族群的 1000 多个个体的全基因组序列，发现平均每个人的基因组内都有 100 万~300 万个 SNP，具体数量和这个人所属的族群有很大关系。

这个数字看似很大，但考虑到人类基因组一共有 30 亿个核苷酸，算下来一个人平均每 1000 多个核苷酸才会有一个和别人不一样，这说明 SNP 的出现概率其实是非常低的。

SNP 是 DNA 复制差错导致的。随着人口总数的增加和基因组测序量的增大，科学家们发现了越来越多的 SNP。截至 2017 年，国际单核苷酸多态性数据库（dbSNP）里已经收录了 3.24 亿个 SNP，其中出现频率超过 1% 的 SNP 约为 8500 万个。这些 SNP 统一用以 rs 为开头的一串数字来命名，比如 rs72921001 就是一个位于第 11 号染色体上的 SNP，假如你在这个 SNP 位点上的核苷酸是 A，那么你很可能会喜欢吃香菜，如果是 C 的话，那么你很可能会觉得香菜有股让人恶心的肥皂味儿。

如果你想知道自己到底喜不喜欢吃香菜，当然可以把自己的第 11 号染色体上的那段相应的 DNA 序列测出来，但这么做成本太高了。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这段 DNA 序列，那就可以不用测序，而是通过更加廉价的“探针法”将其检测出来。事实上，为了区分不同的 SNP，国际 SNP 数据库通常会列出该 SNP 两边各几十个核苷酸的序列，这就为科学家们合成出相应的探针提供了便利。

顾名思义，所谓“探针”（Probe），就是事先制作好的一个和目标基因互补的 DNA 短片段，用它可以从庞大的基因组中钓取出特定的 SNP 序列。比如前文提到的这个 rs72921001，如果我们想要知道自己在这个 SNP 上到底是怎样的话，只要根据数据库里提供的信息，事先合成出一个带有荧光标记的 DNA 探针，覆盖了这个 SNP 两边的几十个核苷酸序列，然后把这个探针和自己的基因进行杂交，SNP 位点的不同会导致杂交强度出现差异，从而引起荧光强度的变化。我们只要设法测出荧光的强度，就可以推断出自己在这个 SNP 位点上到底是 A 还是 C 了。

探针法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把探针做得非常

小，然后将很多探针集成到一块芯片上，通过机器来自动读取荧光信息，这就大大提高了基因检测的吞吐量，降低了成本。最早采用这个办法的就是大名鼎鼎的美国基因检测公司“23 和我”（23andMe），这家公司早在 2007 年就推出了全世界第一个基于芯片法的个人基因测试盒，后来的所有这类面向普通消费者的基因检测公司大都沿用了他们发明的这项技术，其中就包括国内的诺禾致源、博奥颐和、碳云智能和 23 魔方等等不下几十家公司。

总部位于深圳的“微基因”（WeGene）也是其中之一，这家公司采用了 96 孔和 24 孔两种规格的芯片板，其中 24 孔板就是在在一块尺寸大约为 12 厘米×6 厘米的塑料板上安置 24 块芯片，每块芯片上事先放置了 60 万个荧光探针。顾客把自己的唾液吐进专门从国外定制的收集管里寄回公司，这批管子被集中送至同样位于深圳的“华大基因”（BGI）公司的实验室，由专门的实验人员从唾液中提取出顾客的 DNA，在恒温箱中和芯片进行杂交。之后这块芯片板被送入专门的仪器中读取荧光信号，再用相应的软件进行分析，就可以获得这位顾客基因组内的 60 万个 SNP 位点的遗传信息了。

“单个荧光信号并不能直接告诉我们该位点的遗传信息，必须把来自多个芯片的信号数据整合起来分析，才能判断出某个 SNP 位点到底是哪个核苷酸。”“微基因”的首席技术官陈钢对我介绍说，“我们通过大量试验，对芯片读取技术进行了多次优化，终于把数据的重复率提高到了 99.6%。也就是说，同样一块芯片，分析两次得出的结果有 99.6% 都是一样的。”

判断一家基因测序公司的好坏，数据的可重复性是很重要的指标。另一个重要指标当然是探针的设计和 SNP 数据的分析方法，这里面的学问就更多了，值得我们好好讨论一番。

祖源分析的科学基础

祖源分析一直是全球绝大部分基因检测公司的主要业务项目，我们可以先通过这个项目了解一下基因检测到底是如何进行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祖源分析就是基因亲子鉴定的扩增版，两者的理论基础是类似的，都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基因突变的发生频率非常低，绝大部分基因突变（包括 SNP）都只发生过一次。

所有这些突变都会遵循基本的遗传法则在人群中扩散，只要掌握了这套遗传法则，就可以根据相应的遗传特征判断出两个人是否有亲缘关系，以及一个人的祖先究竟来自哪里，大约是在什么时候和其他人群分家的。

这套分析方法的原理并不复杂，但实施起来却并不容易，需要事先对不同的族群进行全基因组测序，从中找出最具代表性的 SNP。比如，如果我们能找到一群一直生活在某一非洲地区的原住民，分析他们的 DNA，再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做对比，找出哪几个 SNP 是这群非洲人独有的。之后，如果我们在基因测试的过程中再次发现了这几个 SNP，就可以推断出这个测试者是那群非洲原住民的后代，甚至可以根据一套复杂的算法大致估算出这位测试者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那个非洲部落里走出来的。

这套分析方法要求 SNP 的遗传规律相对简单，人类基因组当中只有线粒体和 Y 染色体符合这个要求，因为它们在复制的过程中不会发生基因重组，最适合用于祖源分析。

虽然线粒体和 Y 染色体不会发生基因重组，但依靠它们进行祖源分析还是很难的。线粒体虽然很小，但也有 1.67 万个核苷酸，Y 染色体虽然是所有染色体当中最短的，也含有大约 6000 万个核苷酸，科学家们需要积累很多的 DNA 数据才能得出可靠的结论。

最早开始研究线粒体和 Y 染色体的是欧美国家，他们采样的范围肯定偏向欧美人群，所以欧美等国在这方面的数据积累得特别多，得出的结论也就更加精确。再加上欧美等国的居民成分本来就相对要复杂一些，那里的消费者对于自己祖先来源的兴趣也更大，所以祖源分析在欧美消费者当中很有市场，很多欧美人之所以去测基因，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测祖源。

相比之下，中国在这方面的优势就没那么明显了。比如我在“微基因”测过自己的祖源，发现我是 99.66% 的北方汉族。这个结果对我来说几乎一点意义都没有，不过我有几个少数民族的朋友还是测出了一些不同的成分，不能一概而论。

这个分析结果的理论基础来自十多年前由复旦大学金力教授牵头实施的“东亚男性 Y 染色体大调查”，研究人员深入到许多偏远地区，收集到了 1.2127 万个 Y 染色体样本，分别来自 163 个不同的

东亚人群。这些人群的分布情况和迁徙路线大都是已知的，这就给研究人员提供了很多优质的参考数据，准确地把基因和族群特征联系起来。“微基因”只要测出我的基因组内与此相关的若干个 SNP 的情况，就可以知道我的祖先来自哪里。

女性没有 Y 染色体，只能通过线粒体来进行祖源分析。但是线粒体本来就短，东亚人群的线粒体研究也做得不如 Y 染色体好，所以依靠线粒体进行祖源分析不如 Y 染色体那么可靠。不过，“微基因”收集了很多位于常染色体上的祖源特征，也可以借助常染色体的 SNP 信息来测祖源。

如果你信不过中国的基因检测公司，去国外做检测，效果会不会好一点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欧美人祖先的迁徙路线和中国人很不相同，欧美公司自然会偏向他们，专挑那些和欧美人的祖源有关联的 SNP 去测。前文说过，算命的基础是差异性。如果你测的 SNP 在中国人当中只有万分之一的出现率，那就说明你需要测一万个中国人才会出现一次不同的结果，这样的 SNP 对于中国用户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因此，对于中国用户来说，如果你想更精确地知道自己的祖先来自哪里，只能希望中国科学家们多多努力了。中国人的祖源成分虽然有可能不如欧美人那么富有戏剧性，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生的族群迁徙和融合事件一点也不会输给欧美，长达 3000 多年的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历史就是明证，仅仅用“北方汉族”这四个字来概括是远远不够的，应该可以分得更细才对。

问题在于，人类基因组测序是很费钱的，相关数据的收集整理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一般人缺乏动力，除非能一边收集数据一边挣到钱才会去干。不过，这不就是“微基因”这样的公司正在做的事情吗？事实上，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基因测序公司都是在一边提供服务一边收集数据，希望能从消费者提供的数据中发现新的东西，“微基因”自然

虽然线粒体和 Y 染色体不会发生基因重组，但依靠它们进行祖源分析还是很难的。祖源分析在欧美消费者当中很有市场，很多欧美人之所以去测基因，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测祖源。



2013年9月7日，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的斯塔格维尔种植园，烹饪史学家迈克尔·特维蒂获知了遗传测试结果，确定他的祖先在北非

也不例外。

“不过，我们毕竟是一家面向普通消费者的商业公司，不可能一上来就要求使用者填一大堆表。”陈钢对我说，“我们会使用一些技巧，比如填一次表可以拿到一张优惠券之类的，鼓励用户把他们的一些个人信息告诉我们。当然了，我们会事先向用户说明这些信息的用途。”

对于祖源分析来说，“微基因”需要的无非就是用户的出生地、籍贯和民族等普通个人信息，收集起来难度不大。用户在提供这些信息的同时，也就帮助了“微基因”积累更多的数据，提高祖源分析的准确性。要知道，对于“微基因”来说，光有一大堆 SNP 数据是没有用的，必须把每个人的遗传信息和他的民族籍贯等真实信息结合起来才有价值。

陈钢还告诉我，他们最近开始尝试一种新的玩法，鼓励使用者上传自己的正面免冠照片，然后他们在后台把和使用着基因型相似的所有人的照片整合起来，用软件加以平均，生成一张“祖源平均脸”。“微基因”希望通过这个方式，发现面部特征的遗传

基础。如果这个目标真的能实现的话，将来便可以通过一个人的基因型推断出他的长相。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也在研究类似的技术，他们已经利用该技术破获了一起刑事案件。

这项看似天方夜谭的技术真的靠谱吗？答案是：有待确定。一个人的肤色、眼珠颜色、鼻梁高低和毛发是否卷曲等特征确实和种族有关，推测起来应该不难，但决定一个人长相的并不仅仅是以上这些，还包含了面部骨骼的很多细微变化，这些变化是由遗传和环境这两个因素双重控制的，没人知道两者各占多大的比例。即使遗传所占的比例很高，能够影响脸型的基因也很可能有很多个，怎么可能预测准确呢？

事实上，基因检测的核心问题就出在这里。

从基因型到表型

依靠基因检测来进行祖源分析之所以还算靠谱，原因在于基因型和祖源是直接相关的，中间没

有多余的环节。但是，如果你想通过基因检测来预判自己未来能长多高、会不会发胖、喜不喜欢吃香菜，或者预测自己生某种病的概率，可靠性就没那么高了，这是因为从基因型到表型之间还有很多步骤，每一步都存在诸多变数，太复杂了。

基因可以看成是制造蛋白质的工程图纸，从基因型到蛋白质之间还要经过转录、翻译和翻译后修饰等若干环节，两者之间并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同样，从蛋白质到表型（Phenotype，也就是身高体重、头发颜色、是否会生病等等后天表现出来的整体性状）之间同样也要经历很多步骤，这些步骤相互之间可以有互补和互惠等不同的关系，也不能简单地画等号。

就拿遗传病来说，有一类遗传病只需要一个基因发生变异就可以表现出来，科学术语称为“单基因遗传病”。国际遗传病数据库中收录的单基因遗传病种类大概有 8000 种，其中 4000 多种病的致病机理是比较明确的，基本上可以建立一对一的关系。这类疾病理论上是可以经过基因检测测出来的，比如“微基因”就列出了 30 项中国人当中比较常见的单基因遗传病，包括苯丙酮尿症、肥厚型心肌病和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缺乏症等。其中肥厚型心肌病不做检查的话很难看出来，患者如果不注意的话有可能在做剧烈运动时发生猝死。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缺乏症又名“蚕豆病”，患者进食新鲜蚕豆后会诱发溶血性贫血，严重的有生命危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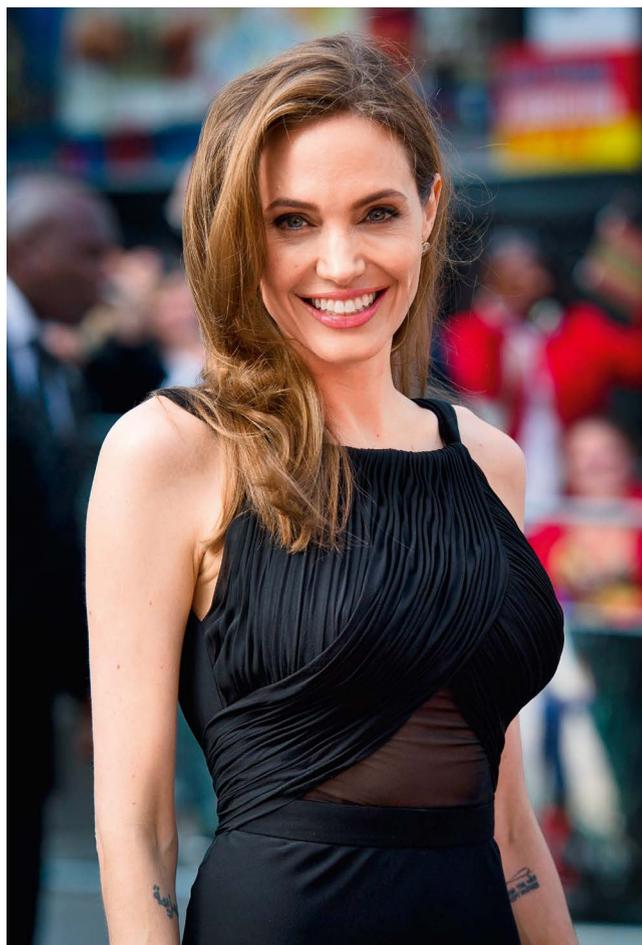
如果基因检测查出一个人携带有某种致病基因，并不等于他一定会得病，因为单基因遗传病大都是隐性遗传的，即只有两条染色体上携带的都是致病基因时才会发病。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基因检测仍然是有用处的，因为如果夫妻双方都是携带者，那么他们生出的孩子将有四分之一的可能性患病，因此如果某人在基因检测时被查出是某个遗传病的基因携带者，那么配偶就应该也去做检查，防止生出患病的下一代。

不过，绝大部分单基因遗传病的发病率都很低，一般人中招的可能性很小。但像糖尿病、心脏病和癌症这类高发性疾病则大都是由多种遗传因素叠加而成的，很难通过消费者级别的基因检测做出可靠的判断。另外，像智商这样的表型背后的相关基因就更多了，一般的基因检测是根本查不出来的。

还有，绝大部分疾病不但和遗传有关，还和环境有很大关系。比如乳腺癌的发病率不但和致癌基

因有关，还和患者的初潮年龄、生育年龄和家族史等等很多因素密切相关，即使是携带有 BRCA1 或者 BRCA2 这两个著名的乳腺癌基因也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得癌症。安吉丽娜·朱莉之所以决定预防性摘除乳腺和卵巢，绝不仅仅是因为基因检测，还和她的好几位直系亲属都已得了癌症有很大关系，这个决定是在参考了多方面因素后才做出来的。

一种表型到底和遗传有多大的关系？这是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疾病的遗传性不但难以界定，而且是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的。举例来说，身高的遗传性在最近这 100 年里有了显著的增加，但这不是因为我们的基因发生了变化，而是因为人类的营养水平普遍提高了，营养不良对于身高的影响力大大下降。再比如，肺癌一直被认为是



安吉丽娜·朱莉在得知自己携带乳腺癌基因后，参考了多方面因素，最终决定预防性切除乳腺和卵巢

一种和后天生活环境（比如吸烟和空气污染）关系密切的疾病，但如果一个村庄坐落在一家管理不善的火电站旁边，或者该村的村民人人吸烟的话，那么肺癌对于这个村的村民来说就变成一种具有高度遗传性的疾病了。

正因为如此，像“微基因”这种面向普通消费者的基因测试结果是不能用于医疗诊断的，该公司也取消了“健康建议”栏目，因为他们不相信消费者有能力区分遗传因素和环境影响之间的差别。但他们仍然保留了一些和健康有关的项目，比如运动基因、营养代谢、健康风险和药物指南等等。不过，虽然这些项目的理论基础大都来自可靠的科学论文，但使用者在解读时仍需谨慎。

比如，运动基因栏目中的“膝盖前交叉韧带保护能力”是和胶原蛋白的合成能力挂钩的，理由是韧带的主要成分是胶原蛋白，但真实生活中一个人的韧带保护能力还和他的腿部肌肉力量有关，所以这个指标只能作为运动时的参考。再比如，营养代谢栏目中的“乳糖代谢能力”衡量的是成年人体内的乳糖酶的活性，但其实乳糖酶基因谁都有，只是有些人成年后不再表达了而已，这个基因的表达通路经过适当的训练是可以重新恢复的，因此这项检测肯定会有很多人觉得不准。

以上这些测试结果之所以不完全可靠，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相应的科学论文都属于纯粹的相关性研究，并没有对双方的因果关系做出合理的解释。

相关与因果

镰刀型细胞贫血症是几乎所有遗传学教科书上都会拿出来详细解释的一种遗传病，因为这是人类第一个完全搞清楚致病机理的单基因遗传病，从致病基因到贫血症之间的因果关系是非常明确清晰的。

当初科学家们先是从镰刀型红细胞入手，发现患者血红蛋白 β -肽链的第6位置上的谷氨酸被缬氨酸所代替。随即进行的生化实验表明，仅此一项变异就能降低病人血红蛋白的携氧能力，并导致红细胞从圆盘形变成镰刀形。之后，科学家们找到了编码镰刀型血红蛋白的基因，发现DNA序列中的一个核苷酸T变成了A，正是这个变化导致了它所编码的氨基酸发生了改变。

这个例子象征着传统研究范式的胜利。这套研究方法的核心诉求就是寻找因果关系，研究思路则

围绕着“假说”（Hypothesis）做文章。研究者首先必须提出一个可被证伪的假说，然后设计出精巧的科学实验，通过改变预设条件并观察相应的实验结果来验证（或者证伪）该假说。然后，研究者会把这一过程重复很多次，这样才能找到自然现象与科学理论之间的因果关系。

这套研究范式统治了科学研究几百年，取得了一大批丰硕的成果，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生活质量。但是，自从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后，情况悄悄地发生了变化。

就拿前文提到过的香菜基因来说，这个基因的发现过程和科学界常见的研究范式背道而驰。首先，“23和我”公司的研究人员并不知道去哪里寻找香菜基因，也没有提出过任何假说，而是在自己的用户群中发放了一份调查问卷，其中有一条就是询问他们是否喜欢吃香菜。问卷收集上来之后，研究人员按照用户对香菜的态度把所有人分成两组，然后从他们的SNP数据中寻找规律，rs72921001就是这么被发现的。直到今天，科学家们也只能说这个SNP很可能与嗅觉功能有关，但它和香菜之间真正的因果关系尚不清楚。

不知道因果关系并不妨碍基因检测公司利用这一信息为用户提供服务。事实上，各家基因公司在更多的人群中收集到的数据表明，用这个SNP来预判用户对香菜的态度还是很靠谱的，只在中国遇到了一点小麻烦。因为中国烹饪大量使用香菜，很多中国人即使觉得香菜味道像肥皂，也渐渐地接受了这个味道，起码不那么讨厌它了。

这个香菜SNP的发现和“23和我”公司的芯片设计很有关系。人群中喜欢香菜和讨厌香菜的人都很多，因此这个香菜基因的多样性肯定是非常高的。这家公司的科学家在芯片上放置了一大批专门针对高频SNP的DNA探针，虽然这些SNP的功能还是未知的。等到公司收集了很多用户，积累了大量数据之后，就可以利用这些高频SNP来寻找有意思的基因了，香菜基因只是其中一个比较好玩的例子而已。

事实上，这就是大部分这类普通消费者级别的基因检测公司的生财之道。“23和我”公司2007年底刚开业的时候，一个基因测试盒的售价高达1000美元，但第二年就降到了399美元，后来更是降到了99美元的最低价，其目的就是为了收集更多用户的基因数据，最终以此来盈利。其实这也是谷歌这类互联网公司的生财之道，“23和我”正是从谷歌

那里学会了这一招。

就这样，在坚持了很多年，积累了80万用户之后，“23和我”终于在2015年初挣到了第一桶金。著名的生物技术公司基因泰克（Genentech）宣布付给“23和我”1000万美元现金，用于购买该公司收集到的和帕金森氏症有关的SNP数据，希望能从中寻找到和这个病有关的基因，从而开发出针对这一绝症的新药。如果成功的话，基因泰克公司还将支付5000万美元，使得这项合作的总价值有可能高达6000万美元。

“微基因”显然也想复制“23和我”的成功模式。陈钢告诉我，他们设计的芯片上有10万个探针检测的是已知功能的SNP位点，另外50万个探针检测的是未知功能的SNP位点，后者是专门为中国人量身打造的，包括了一大批在中国人群中出现率很高的SNP位点，他们希望能把中国人群的遗传多样性都包括进来。

但是，这里面存在两个问题。第一，这些位点的选择必须考虑到探针的灵敏度问题，有些SNP位点出现率很高，但因为自身顺序的原因导致探针很难设计，从生产工艺的角度讲麻烦太多，只能被舍弃。第二，光有基因数据一点用处也没有，必须同时收集到用户的个人健康信息才有用，这就涉及个人隐私的保护问题。其实这类研究的目的是造福全人类，用户在购买服务的同时还能为科学研究做点贡献，本身应该是件好事，可惜很多中国人对于疾病的认识还处在原始阶段，觉得生病是一件丢人的事情，不愿意让别人知道。

有家公司自认为能够一举解决这两个问题，这就是同样位于深圳的华大基因。

大数据的魅力

“我们一直没有在针对普通消费者的基因检测方面做太多事情，因为我们觉得现有的数据量还不够大，相关性不够可靠。”华大基因的创始人兼现任董事长汪建在接受我专访时开门见山地说，“所以我们决定先从自己的员工做起，而且是从全基因组测序再到生化指标检测再到影像系统数据收集等等一起做。我们有6000多名职工，加上家属有3万到4万人，足以构建一个非常庞大的优质数据库了。”

采访是在位于深圳郊区的国家基因库进行的，这是在发改委等国家部委的支持下，由华大基因研

“如果基因是A，健康是Z，从A到Z之间还有很多步骤，……所有这些步骤都有很多数据需要研究，只有掌握了这些数据，才能搞清楚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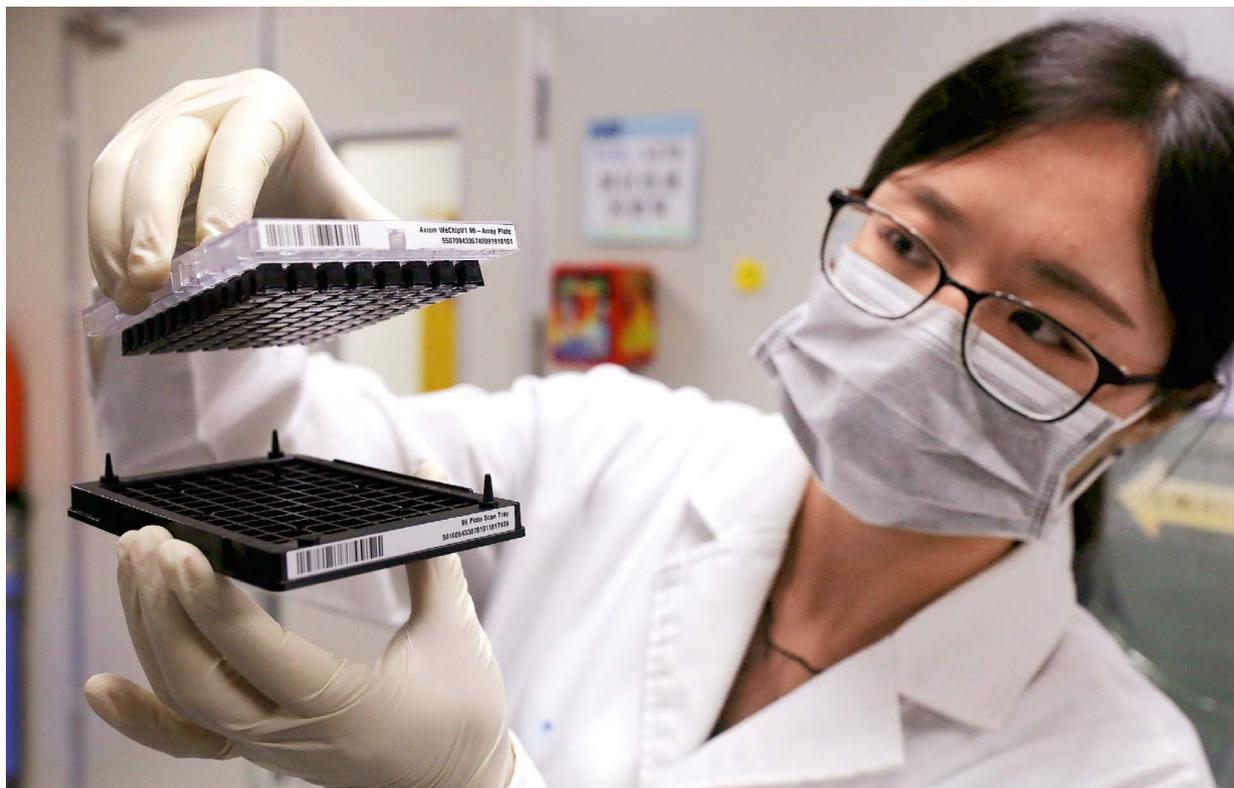
究院负责组建并运营的国家级研究机构，其基因测序和数据储存能力在全世界都是数一数二的。华大基因本来就是靠DNA测序起家的，当年曾经代表中国参与了人类基因组计划，负责并完成了其中1%的测序工作。

基因测序可以很好地弥补探针设计上的缺陷，在基因检测领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汪建显然早就不满足于只测DNA了。“如果基因是A，健康是Z，从A到Z之间还有很多步骤呢，包括小分子代谢、维生素和氨基酸调控等等等等，所有这些步骤都有很多数据需要研究，只有掌握了这些数据，才能搞清楚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汪建一边打着手势一边说，“我有一次讲课时给每位学员发了一串糖葫芦，第一个葫芦是DNA，第二个是RNA，然后是氨基酸、蛋白质、组织、器官……如果生命是一串糖葫芦，那么我们必须把所有的葫芦都串起来，把所有的关节都打通，否则是不行的。”

在汪建的构想中，华大基因最终将会变成一家医疗健康服务机构。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决定先从公司员工做起。他不但自己以身作则，还在公司内部强力营造了一个健康生活的氛围。比如国家基因库里面居然没有电梯，上下楼只能爬楼梯。他还在每个楼梯口放了一台体重秤，时刻提醒大家注意控制体重。我还注意到，国家基因库的办公室桌上散落着好多握力器，他随手抓起一个对我说：“我们公司开会发言的时候每个人都拿一个握力器，握多久就讲多久，我一次能握100下！”

不过，除了“少食多动”这些常见的口号之外，华大基因极力发展的大数据分析并没有为员工们提供太多有针对性的健康建议。不过这也很容易理解，因为这项工作才刚刚开始，数据量积累得还不够多，不可能从中总结出什么惊世骇俗的健康理论。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这个故事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汪建一边捏握力器一边对我说，“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流行过一阵子克山病，这是一种心



左图：华大基因的技术员在操作“微基因”公司的基因芯片

右图：华大基因的创始人兼现任董事长汪建

肌病变，没人知道病因。80年代初期，联合国发展署为了帮助中国攻克克山病，送给中国政府一大堆仪器设备，能够对环境中的微量元素进行分析，分析结果发现，克山病高发区的土壤中硒的含量很低，于是中国政府开始有针对性地为老百姓补硒。到了1986年，这个病终于消失了。当年我还是个医生，被派去大理和楚雄做调研，发现那里的土壤和水系中的硒含量非常高，但当年那两个地区照样有克山病，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才意识到，当年云南很穷，得病的人都是因为吃不饱肚子，后来经济发展了，老百姓有饭吃了，克山病自然也就消失了。”

这真是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从中可以总结出很多道理。

首先，这个故事说明相关性研究有很多陷阱，一不小心很容易找错目标。这方面还有一个著名的案例，有人曾经发现尼古丁受体和肺癌有很强的相关性，但如果你想研究尼古丁受体分子到底是如何致癌的，结果恐怕会令你失望，因为两者之间并没有生物学上的关系，两者的相关性纯粹是因为尼古

丁受体和吸烟有关，而烟草才是导致肺癌的真正杀手。

总之，我们不能轻信相关性研究的结论，而目前大多数消费者级别的基因检测的结果大都是基于相关性的研究，只能作为参考，不能成为医生治病的依据。“23和我”公司曾经受到美国FDA的惩罚，原因就在于该公司夸大了基因检测的可靠性，导致很多用户把检测结果当成制定医疗方案的根据了。

其次，这个故事说明新发现往往来自于新技术的应用。在克山病的故事里，联合国提供的环境微量元素测量设备是关键，没有它就没有硒理论的出台。同理，基因研究领域近年来的飞速发展同样得益于DNA测序技术的进步。要知道，2003年测出的第一个人类基因组序列耗时13年，总花费约为30亿美元。14年后的今天，这两个数字分别降到了数天和数百美元，甚至有可能在未来的几年里降到一天和100美元的水平。相比之下，RNA和蛋白质测序的技术仍然停留在10年前的水平，小分子代谢领域的研究方法也没有太多改进，这就使得DNA成为



（摄于华大基因）

生物学研究领域的一匹黑马，而且早就一骑绝尘，把其他研究手段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如今生物学之所以会出现那么多关于基因型和表型之间的相关性研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第三，虽然相关性研究不太可靠，但如果采样范围足够广、数据量足够大的话，相关性总有一天会转变为因果关系，隐藏在大数据中的事实真相早晚有一天会浮出水面。

就拿基因研究来说，如果我们能把全世界所有人的基因组顺序都测出来，相关性肯定就变成了非常可靠的因果关系了。即使做不到每个人都测，只要能测出一定比例的基因组，比如把三分之一的人口都测一遍，那么隐藏在基因组中的很多秘密一定会迎刃而解的。问题在于，基因组研究的数据量非常庞大，“微基因”把原始数据发给了每一位用户，我那份数据的大小是 14.5MB，大致相当于一首高质量的 MP3 歌曲。我每次用记事本打开它时都要等很久，因为普通文本文件很少有这么大的。

这还只是 60 万个 SNP 位点的简要信息，如果

是全基因组测序的话，光是记录测序结果的文件就有 1GB 左右，大致相当于一部高清电影的大小。标准的全基因组测序结果还会加上质量评分和测序深度等附加信息，通常是 90GB 左右，如果换成音乐的话恐怕一辈子都听不完。如果再算上转录组学、蛋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等等中间步骤的数据的话，任何一个人的健康数据都将是 TB 级别的。对于这个级别的大数据，无论是存储还是分析都将耗费大量的电脑资源，任何一家公司要想开展这方面的研究，都必须首先把大笔投资放在计算机系统上。好在 IT 领域近年来发展神速，计算机的速度越来越快，硬盘的储存量越来越大，价格却越来越低了，无论是华大基因还是国内另一家以测序为主业的旗舰型基因公司诺禾致源（Novogene）都已经有了几十 PB 级别的数据储存能力，足以应付目前的研究任务。

同样是最近这几十年才发展起来的新兴行业，生命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差距为什么越拉越大呢？原因就在于研究范式的不同。

研究范式的改变

前文提到，最近这半个多世纪的生物学研究是以研究因果关系为主的，研究人员首先必须明确自己的研究目标，要么是一个基因或者一个蛋白质，要么是一种化学药物或者一个治疗方法，然后研究人员必须在实验室里建立一个细胞模型，把实验条件变来变去，考察每一次改变所导致的结果，并在这个过程中搞清其作用机理。这一步完成之后，还要再转移到昆虫或者小鼠中，利用动物模型来做实验，直到动物模型也做得差不多了，这才敢转移到人身上。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科学家直接在人身上做实验都是不现实的，因此只能绕这么一个大弯子。

这套模式导致的结果就是一名科学家往往只关心某一条生化路径，找到的新药也只能解决某一条路径出现的问题。在汪建看来，这是现代生物医药领域最大的瓶颈所在。

“分子生物学在最近这 50 年里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高估了单一基因的作用，因为人类的复杂程度是超出我们想象的。”汪建对我解释说，“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有很多代偿性机制可以用来弥补单一基因缺陷所带来的隐患，但他年纪大了之后这些代偿机制很可能就逐渐失灵了，所以人老了才更容易生病。

现在的绝大多数化学药都只是堵住了某一条代谢路径，这个思路是行不通的。”

在汪建看来，现代医学确实提高了人类的寿命，但主要的功劳来自抗生素和疫苗的使用。这两样发明都是针对病菌的，可以较为容易地在培养皿里做实验。但像癌症和老年痴呆症这样的疾病就没办法做实验了，所以进展缓慢，逐渐变成了现代人最厉害的杀手。大数据研究方式则可以绕过这个障碍，不用拿人来做实验，仅仅通过分析各种数据，从中找出规律就行了。

“在我看来，目前的基因大数据领域有两种玩法，分别代表了两个哲学层面的概念。一个是 Why Not（为什么不），一个是 For What（为了什么）。”汪建对我说，“像‘23 和我’这样的公司玩的是前者，反正就是闹着玩的，靠不靠谱无所谓，只要消费者玩得起就行。我虽然也在玩前者，但我最想玩的其实是后者，这就必须要有确切的科学证据才敢去做，于是在很多人眼里我就显得有些保守了。”

汪建的这段话很可能是有感而发的，因为他曾经的部下，担任过华大基因 CEO 的王俊不久前刚刚离开华大，创立了碳云智能公司，准备立即把他那套“糖葫芦”理论付诸实践。

“不过呢，新生儿遗传缺陷、癌症和传染病这三个领域有些不同，因为这相当于和死神赛跑，病人等不了了，所以我决定先从这三个领域入手，做点实际的事情。”汪建补充道。

他所说的新生儿遗传缺陷，指的就是华大基因开发的一套无创产前诊断方法，用的是华大最擅长的高通量测序法。以前孕妇要想做产前诊断的话只能抽羊水，存在一定的流产风险。华大的这套方法只需抽取孕妇 5 毫升静脉血就可以判断出胎儿的第 13、18 和 21 号染色体有没有出现异常情况，其中 21 号染色体三体就是唐氏综合征的病因。

癌症指的是癌细胞的基因检测，这是目前流行的癌症靶向药物在使用前必须经过的一步。传染病指的是用基因测序的方法判断感染源，同样可以帮助医生迅速判断出到底应该用什么抗生素。

稍微想想即可知道，这三个领域用的都是纯粹的高通量基因测序技术，和前文所说的那些研究不太一样，肯定不是汪建和华大基因最终想要实现的目标。但那个目标太过遥远，要想实现它，华大基因首先必须生存下去，于是这家公司正在将工作重

心从纯粹的基因测序服务转移到医疗领域的实际应用上来，其医学部分马上就要上市了。

可惜的是，中国目前没有任何一种基于基因检测的诊断方法被列入医保，中国患者只能自费。

至于华大基因未来的那个目标到底是什么，其实谁也说不清，因为研究范式已经发生了改变。“我们是一家 Data-driven（数据驱动）的公司，不再是 Hypothesis-driven（假说驱动）了。”汪建说，“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先生产出数据，然后再从里面找假说。”

至于说能否找得到，那就要看数据的总量和质量了。每一个自费花钱做基因测序的人，其实都是在为这个目标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结语

汪建是一个直性子的人，采访结束后的闲谈过程中，他提到自己最近正打算驾船沿着达尔文当年的足迹来一次环球旅行，把达尔文当年研究过的动植物的基因组统统测一遍。“这事就是纯粹的 Why Not，虽然尚未得到政府的支持，但我现在自己也玩得起，于是我就想痛痛快快地玩一把。”

达尔文的那次环球旅行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因为他就是在那次旅行途中开始思考进化论的。事实上，在达尔文的时代，生物学并没有多少理论可以提供指导，也没有多少假说可供研究，还处在发现相关性的时代。那个时代的博物学家们满世界寻找新颖的动植物标本，有点类似于现在的基因学家到处给人测序。最终，达尔文在浩如烟海的动植物标本中发现了规律，写出了《物种起源》这本现代生物学的奠基之作。在他之后的生物学便一直沿着他定下的道路前行，取得了一大批丰硕的成果。

如今生物学再一次遇到了瓶颈，医学研究领域的发展速度明显慢了下来。也许这就是一个信号，告诉我们生物学又到了需要发现相关性的时代了，生物大数据研究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火起来的。此时汪建重走达尔文之路，好似生物学迎来了一个新的轮回，只不过这个轮回发生在更深的层次上，其结果也很可能像当年的进化论一样，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GANT：为中国现代都市精英度身打造的生活方式

2017年第一季度，在整体零售市场面临巨大压力之下，创立于美国的服装品牌 GANT 却逆势而上。这个源于美国东海岸常青藤文化，逐渐演变出美式运动休闲系列，后融入欧洲经典风格，最终品牌化发展的国际服装品牌，在中国市场营业额同期增长超过 30%，同期同店增长也达到高双位数，去年新开店数超 60 余家，创造了历史性的一刻。

来自美国东海岸的精英生活方式

GANT 的品牌故事始于美国东海岸。

1914 年，伯纳德（Bernard Gantmacher）和妻子在纽约新天堂区创建了他们的第一家店铺，主营业务是给美国的上层社会提供高级服装的订制。渐渐地，他们精湛的工艺和完美的品质得到了纽约富有阶层的认可。

从小规模的订制服到品牌化的发展开始于“二战”结束以后，伯纳德先生敏锐地觉察到美国人生活方式的改变。在 GANT 帝国迅速膨胀的过程中，极具里程碑意义的设计——领扣衬衣，很快成为时尚人士的新经典。1949 年，GANT 品牌成立，并在纽约麦迪逊广场出现了第一家 GANT 专卖店。绣在每件衬衫内襟上的字母“G”也成了一种品质的代表。

品牌发展中，将美国东海岸常青藤精英文化与 GANT 产品设计完美融合，并逐渐演变出美式运动休闲产品系列，后融入欧洲经典风格，塑造了独特的成熟、积极、健康的品牌文化，迅速被美国都市精英奉为经典，逐步成为引领美国时尚的品牌，并走向世界。

下一站，中国

2007 年，GANT 进入中国市场。“中国市场，尤其时尚行业，在过去 10 年间呈现快速的发展状态，同时培养了其独特的时尚品位。中国的消费者有着更为多样化的消费行为，寻求更加多元和快速变化的品牌。”GANT 中国总经理白嘉骏（Matthew）在接受采访时说，“GANT 在品牌的发展过程中，一直不断研究和学习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时尚品位、衣着剪裁以及面料喜好等等。我们也针对中国市场的消费者对于衣着剪裁和面料喜好等特点，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and 变化。”

截至 2016 年底，GANT 已进入中国 59 个城市，成功地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品牌建设，接下来，将会以更快的速度向市场渗透，覆盖更广更深的零售市场和区域。

“GANT 不仅是一个服装品牌，还是一个全球化的生活方式品牌。”Matthew 强调，GANT 在发展的同时，对环境可持续性发展高度负责。“我们不断创新产品，使其具备更多元的功能性、舒适性和时尚性，同时兼顾推动在生产中的环保性，维护可持续发展的环境。”

在 Matthew 看来，亚洲市场尤其是中国市场，是一个在过去 20 年中高度发展的新兴市场，全球品牌都尝试进入中国，吸引及服务中国消费者，竞争也异常激烈。中国的市场及消费者也开始成熟，消费者变得更为理性，他们会综合地挑选喜欢的品牌，因此对于品牌来说，更大的挑战是怎样理解中国消费者的变化，用中国市场的变化来优化自己的品牌，赢得消费者。GANT 预计在 2017 年重点引进具备功能性面料服装和时尚舒适的鞋类，2018 年引进部分童装。“我们还会不断拓展我们的门店以及线上业务，希望中国的消费者有机会接触到 GANT 全品类的产品，享受舒适的生活。”

GANT 中国总代理朗浩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电商数字市场项目总经理戴维（David Zheng）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国外电商和国内电商的区别之一，即中国消费者是被向导型的，国外消费者是比较自主型的。平台的选择上，国内电商消费者比较偏好去几家大的电商平台购物，国外的消费者去品牌官网较多。再者，国内消费者对于价格更为敏感。基于此，我们将这些关键因素做了一个最优组合。”戴维说：“GANT 中国电商模式主要为 O2O。目前 GANT 中国的电商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和国内几家大型电商平台都有合作。未来我们将打造全方位无缝对接的购物体验，让消费者无论在线下还是线上，都能享受到我们最真挚的服务和产品。”

对于在中国还处于快速扩张和发展阶段的 GANT 来说，几年内成为国内生活方式领导品牌的目标并非遥不可及。



雷诺的机会还有多大？

主笔 / 李三



雷诺集团经典车型传播经理
尼古拉斯·费尔南德斯



东风雷诺市场部部长助理周秀妍

作为中国市场的后来者，雷诺眼下面临的形势并不轻松。尼古拉斯·费尔南德斯先生是雷诺经典车型传播经理，他把雷诺的处境归纳为两大挑战：一个是品牌知名度，另一个是渠道。偌大的中国市场已经被各大车企豪赌多年，留给雷诺的机会还有多大？

雷诺亚太区主席、东风雷诺汽车有限公司总裁福兰（Francois Provost）先生表示：“我们依然希望在中国创造奇迹。雷诺的长期目标是占有 3.5% 的市场份额，就像在全球其他市场那样。我们计划每年向中国市场推出一到两款车型，以丰富雷诺在中国市场上的产品组合。”

三联生活周刊：雷诺在现代汽车工业中有怎样的位置？

尼古拉斯·费尔南德斯：就我个人而言，雷诺历史上的经典时刻是关于方程式赛事方面的，正是在这些赛事中，雷诺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比如，在方程式 50 年的历史中，我们看到在一些顶尖赛事里都有它的身影，可以说它遍及世界各个地方，而作为全球性公司，雷诺的积极参与，对公司也是大有裨益的。

回想在上世纪 20 年代，那时候的雷诺才 20 多岁，是一家年轻的公司，但已经创下了很多有关速度的纪录，雷诺也因此被人们牢牢记住。那段时间应该说是雷诺公司的前期阶段，也是充满机遇的阶段，参加赛事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参加赛事依然很

重要，雷诺积极参与 F1 赛事，同时也参与了新的电动方程式赛事。虽然电动方程式现在还不算很出名，但它是推广新技术的一个重要平台，而且它是面向未来的。通过参与这样的赛事，雷诺能够证明自己是一家有很强创新能力的现代化公司。我认为，目前这一时期对于整个汽车行业，包括雷诺公司在内，都非常关键，我们乐于挑战当下，前瞻未来，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取得成功的关键。

三联生活周刊：雷诺在中国的现售车型有哪些竞争力？

周秀妍（东风雷诺市场部部长助理）：大约 2000 年左右，得益于当时聘请的设计师给雷诺带来的变革，科雷傲、卡缤、Espace 以及塔利斯曼，有了很多经典设计。比如前脸和整体外观，从而形成了比较独特的风格。与此同时，雷诺集团和日产形成了联盟，在汽车行业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动力。

雷诺也有很大的热情去发展新能源汽车，在欧洲市场上，雷诺的电动车发展得很好。此外，自动驾驶技术也是雷诺未来的重点发展方向。说到东风雷诺的产品，科雷嘉、科雷傲先后上市，它们都是按照雷诺全球质量、技术、安全标准进行生产，我们对这些车型非常自信。

三联生活周刊：雷诺在赛道上不断打破纪录，你怎么理解雷诺的挑战精神？

尼古拉斯·费尔南德斯：雷诺有 R.S. 系列，也就是雷诺运动车型，比如说 Clio 和梅甘娜。雷诺参与 F1 比赛的工程师把赛车的技术加到民用车

上,从而造就了Clio R.S.或梅甘娜R.S.这样的车型。Clio R.S.一个很重要的改变就是它没有换挡杆,而是变成了像法拉利和奥迪那样的手动拨片,虽然这对奥迪R8来说不算创新,但对于小型车来说,这就是一种创新,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生产这种类型车的原因。对于科雷傲来说,我们既生产常规的底盘,也生产运动型底盘。

雷诺的口号就是“为激情而生”(Passion for life),面向很多年轻顾客,激情对我们很重要。雷诺希望通过对R.S.品牌的建设,以及在F1和电动方程式中取得优异成绩,使销量逐步上升。赛事非常重要,我个人认为,它和民用车在品牌形象、发展动力、技术以及品牌精神传承上,都有很直接的联系。例如在刹车上的创新,可能两三年之后就会用于民用的梅甘娜或者科雷傲上。当然这对所有雷诺的工程师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否注意到中国市场留出的空间越来越狭小?一方面,自主品牌推出一些高端品牌,构成上行态势;另一方面,豪华品牌也会推出一些价格相对低端的车型。面对这种夹击压力,雷诺有哪些具体措施?

周秀妍:的确,我们每天都会面临很大的竞争和压力。我们在中国市场上清晰地看到,本土品牌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但我们对于自己的品牌和产品有着充分的信心,因为我们的价值主张也是有差异化的。

我们计划每年定期推出一到两款车型,比如说Espace。因为对于一个汽车公司来说,最重要的当然是它的产品,所以我们要定期推出新的车型。最近在上海首发的Espace给中国的客户带来一种新的体验和概念,当时在欧洲推出的时候,还引起一些争议,大家在想这个到底是怎么样的车?这款车在欧洲市场的表现证明,这是一款非常成功的产品。还有东风雷诺现在推出的两款产品——科雷傲和科雷嘉,我们也会不断地去改善它。与此同时,我们还在加大推广活动。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一个后来者,雷诺如何在中国市场确立自己的位置?

周秀妍:东风雷诺在中国是比较新的公司,进入相对较晚,规模也不是很大,并且经销商网络还在扩展当中,所以我们在这方面会做进一步投资,同时会把精力和资源都集中到恰当的地方,做好营销、市场方面的部署和工作。还有,就是我们提出

的暖心科技,提供一些很暖心的服务,让顾客切身感受到差异化的体验。

三联生活周刊:雷诺如何吸引中国经销商进行渠道建设?

周秀妍:东风雷诺现已有160家经销商,在今年底将会拓展到200家经销商。我们的经销商网络不同于其他汽车厂商,采取的是不同的战略。因为我们一方面看到这个市场的确是非常发达的,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经销商网络为用户提供良好的服务,有一点我想强调,我们不会只关注规模,只关心数量的扩大。

东风雷诺的确是进入这个市场的后来者,过去一年可能不太容易,但是推出科雷嘉、科雷傲以后,在市场上也取得了很好的反响,人们对我们的品牌和产品有了很大的信心,而且有的经销商也开始盈利,同时,雷诺和东风也形成了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所以,对于以后吸引更多的经销商,我们抱有很大的信心。

三联生活周刊:近期雷诺又重启了Alpine这个品牌,雷诺品牌和Alpine品牌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

尼古拉斯·费尔南德斯:Alpine这个品牌也是非常著名的。在雷诺总部附近,我们专门设立了一个为Alpine品牌做的展示空间,只有Alpine这个品牌。Alpine这个名字来自于阿尔卑斯山挑战赛,这是一个非常艰险的比赛。最早一次取得冠军在1973年,也是Alpine第一次取得这个赛事的冠军,遗憾的是后来淡出了。雷诺决定重新推出Alpine这个品牌,应该是在今年底或者明年,选择的款式是1955年款的Alpine,因为那是Alpine品牌故事的开端。

三联生活周刊:Alpine品牌是否会进入中国市场?

周秀妍:雷诺集团目前有五个品牌,首先是雷诺,然后是达契亚,之后在俄罗斯推出了拉达,在韩国推出了雷诺三星,而第五个就是Alpine。雷诺希望做出不同的汽车,面向全球的用户,提供更多的选择。雷诺三星、拉达以及达契亚,它们都是面向本地市场的品牌,同时也是能够让更多人买得起的品牌。而Alpine品牌相对独立,而且是走高端尊贵路线。对雷诺集团来说,重启这样的品牌,也是一个挑战。在中国市场,雷诺也会推出Alpine品牌,不断致力于满足中国用户的需求。■

诗人余秀华：喧哗后的清醒

记者 艾江涛 摄影 黄宇

一个诗歌的故事，开始变成一个女人试图掌控自己命运的故事。



余秀华

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全国首场点映前一天，余秀华来到北京。从下午到深夜，三拨人转战了三个地方，喝了许多不同的酒。第二天早上，余秀华的房间里依然放着半瓶打开的威士忌，带着一些酒意，她在采访中不断开着旁边工作人员的玩笑，还会突然唱一句“来呀来喝酒啊，不醉不罢休”。

还没成名前，余秀华也喝酒。横店村出售的散装白酒，只要想喝，她会直截了当地管父亲要钱。喝酒会让她觉得好受一点。只是，在纪录片的导演范俭看来，成名之后，与那些文人和记者在一起，她会酒兴大增。

宁愿写不出诗，也要离婚

过去20年里，让这个写诗的湖北省钟祥市横店村村妇最难以忍受的，就是那段与上门女婿尹世平的婚姻。余秀华不止一次在诗中表露出对婚姻的绝望和对心目中爱情同样无望的追求。2015年初，当她的诗在网络走红，这种在外人眼里不易被理解的对婚姻的不满，在公众面前被不断放大。起初，她讲述着对爱情的渴望：“我不敢相信爱情”；“切肤之爱和灵魂之爱，我都不曾经历”。后来她落实到行动，在争吵和抗议中，一步步终于摆脱在她看来如同枷锁一样的婚姻。

范俭把镜头对准这一切。2015年1月，范俭接受优酷邀请，最初是拍一部《一个女诗人的意外走红》的短片，可当他进入余秀华的村庄和她的生活，叙述的线索逐渐丰满起来，一个诗歌的故事，开始变成一个女人试图掌控自己命运的故事，不同在于，这是一个内心极其丰富而敏感的写诗的脑瘫农妇。

“结婚的第二年还是第三年，我就想离婚。不适合婚姻也不适合那个人。我真的觉得结婚没有一点好处。整天和一个傻子面对面生活在一起，那不是很傻的一件事吗？”余秀华说完后，又反问了问我一句：“你结婚了吗？”

根底在于精神无法交流，像纪录片中余秀华所说：“我老公看见我写诗他觉得烦，我看见他坐在那里我也觉得烦，互相看着都很不顺眼。”这桩婚姻的

起点就是一种交换，一方面男方年龄比她大十几岁，一方面则是他倒插门娶个残疾人，父母都觉得是人家亏了。那种最初的不平等，正如余秀华在诗中所写：“在这人世间你有什么，你说话不清楚，走路不稳/你这个狗屁不是的女人凭什么/凭什么不在我面前低声下气。”

只有余秀华觉得自己亏了。像虫蚁咬噬一样的生活细节太多。建筑工人尹世平常年在北京打工，只有农忙和过年的时候才会回家。片子中，余秀华便在饭桌上对母亲说：这个家什么时候完整过？在《我养的狗，叫小巫》一诗中，余秀华写到家暴：“他揪着我的头发，把我往墙上磕的时候/小巫不停地摇着尾巴/对于一个不怕疼的人，他无能为力。”

然而在拍摄的过程中，范俭选择了节制。私下的沟通中，余秀华的前夫尹世平也有表达自我的诉求，镜头中的他，是一个普通而务实的农民，面对余秀华的离婚要求，他带着委屈对余秀华的母亲说：“她成名了就要离婚，我这20年给人当奴隶啊？”

成名的确给余秀华的计划带来困难。起初，她和父母一样，担心别人骂她出名后就老把老公蹬了。那是2015年5月的一天，余秀华在和尹世平剧烈争吵后，无望地哭了一个晚上，最终妥协。在范俭的镜头下，她坐在荷塘边很快写下一首诗：“坐了很久，两块云还没有合拢/天空空出的伤口，从来没有长出新鲜的肉/五月的草，绿出自己的生命，一半在根里，一半在草尖。//风太小，恨倒不下去，爱立不起来/一棵草有怎样的绿，就有怎样的荒，雨淋不进去/风吹不出来//一直到最后，两块云也没有合拢/她站起来，身体里全是骨头断裂的脆响/蝴蝶断下的一只翅膀，从草尖山下滑。”

“一开始她对周遭的压力是妥协的态度，后来她决定不妥协了。一定要反抗，把所有东西抛在脑后。”范俭用镜头记录下这种变化。10月，余秀华跑到当地法院起诉离婚。在电话里，她对老公说：“你这个月回来，15万元。下个月回来，10万元。你随便你随便。”她明白用钱可以摆脱这桩婚姻时，一切反而变得简单。

两个月后，两人协议离婚。晚上，母亲一个人躲在院子里哭。余秀华跟出来问：“我离婚是什么丑事还是坏事，你凭什么那么伤心？”母亲过了半晌说：“没见过你那么心硬的。”余秀华说：“我心硬也是你给我的心。你要哭你就哭。”其时，母亲已经被查出癌症晚期，纪录片拍摄完成后不久，便

离开了人世。

那一场景让不少人难以释怀，影片的发行总策划之一秦晓宇，曾在点映后的活动上问她，事后有没有给母亲道歉？余秀华再次怼了回去：你为什么认为我应该向母亲道歉？我做错了吗？面对我提出的同样的问题，余秀华说：“我心肠硬不硬，她都会死。哄她开心，就是别和我老公吵架。别的事可以，这件事我做不到。”

让余秀华多少有点郁闷的是，影片播出后，自己成了一个离婚的榜样。还真有人向她借钱：秀华，我也想离婚，但是我没有钱，我得给老公5万块才能离婚。“我是不得已，她为什么？这不是很傻嘛，离婚还要给男人钱，这太傻了。”余秀华很不理解。

婚姻带来的痛苦消失后，还能写出诗吗？余秀华的回答是，宁愿写不出诗来，也要离婚。还有人问她，是否怀念成名之前的时光？余秀华直接怼了回去：你觉得我傻吗？她告诉我，就在几天前还写了一首诗，主题依然关于爱情：“我把石头含进嘴里，跳舞/爱人，我含过水，含过火/含过鸩毒/现在，我把石头含在嘴里/跳舞。”用她的话说：“爱情，是一个我得不到的东西。越是得不到越是渴望。”

张扬和孤独

一起变化的，还有余秀华的村庄。2016年初，横店村开始搞新农村建设，政府给这个有300多户村民的村子，盖起一排排二层小楼，每户交9万元后，由自己装修再住进去。新农村就选址在余秀华家附近。考虑到她已是名人，政府特地保留了余秀华家的老房子，但麦地被征了，荷塘也被填平了。某种程度上，她诗歌中那些美好的意象和景致大半消失。谈起家乡，余秀华的口吻是，那里曾经是一个很美、待着很舒服的地方。新的苦恼是，她每天要拖新房子的地板砖，烦死了。

尽管为横店村写了很多诗歌，但余秀华与村民的交往一向很少。范俭告诉我，成名之前，她几乎一半时间都宅在家里上网。2009年学会上网后，她的朋友都是通过网络结识的，她喜欢的人也都在外边，村庄只是她生活的一个地方。也正因为如此，片子几乎没有处理她与村人的关系，基本聚焦在她的家庭之中。对此，余秀华说：“范俭拍得比我平时还要开放一点，我平时在家有东西吃基本不下楼，我不和任何人交流。我觉得和他们（村民）交

流毫无必要，为什么和你交流？为什么让你知道我的想法？村里人的想法我都知道，多数人的想法，就是想把日子过好一点，然后生活简单一点，就是这样。”

“多年来，我想逃离故乡，背叛这个名叫横店的村庄 / 但是命运一次次将我留下，守一栋破屋，老迈的父母 / 和慢慢成人的儿子 / 而儿子仿佛一个慢慢走近的客人，慢慢染上了我的体味。”在2014年的一首诗中，余秀华谈到自己的儿子。在她眼里，已经读到“大三”的儿子很高冷，不发朋友圈，从不主动联系任何人，别人找他，OK，我回你一下。这种内在气质多少有点像余秀华，对母亲成名后的热闹，他从不掺和，正因如此，片中并没有他的片段。有时候，想起有阵子没联系儿子，余秀华会在微信上和他聊上几句，但尽量不去影响他：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

更多由于性格原因，余秀华也很少在父母面前吐露感情。“我怎么可能当着她（母亲）哭？我都是嘻嘻哈哈的，永远那样。无论在外面受了多大伤害，他们不可能知道，我不会讲，我不会哭。喜不报，忧也不报，我觉得没有必要，不需要他们的理解。”余秀华说，和父亲在一起，更多聊的是家常，今天吃什么明天吃什么。

成名之后，村里人见了面总会开点善意的玩笑：呀，名人回来了！名人又要出去了！苦了一辈子的父母，看到女儿出息，有时也会高兴过了头。父亲有段时间很高兴：“哎呀我姑娘出名了！”有时候村里人遇到问题，他会忍不住说：“我认识很多记者，这个事我帮你搞定啦！”余秀华认为父亲搞不清楚状况：“爸，你吹什么牛，记者没有一个靠得住的。他来找你的时候是他需要你，你找他的时候他才不理你呢。”说完她回过头来调侃道：“真是的，我不相信你们这些破记者。你们都是工作需要。”

外界的认可固然让余秀华更有自信，可在范俭看来，重要的变化在她的观念深处。两年多来，与各色人等的接触及大量信息碰撞中，余秀华有时会让他觉得吃惊。前段时间在上海的一次采访中，余秀华忽然谈起对“道德”的思考：“我觉得道德不是先天的，是社会阶级发展的一个产物：是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欺骗。我更相信人性的自觉，人性的自觉就包括了两性关系的自觉。”“我说你哪来的这些想法，你最近读了什么书吗？她说没读啊，她就是

这样想的。”范俭一琢磨，道德有时候的确是那么回事。

2015年初，在北大举办的一次活动上，一个年轻的学生问她：你是如何接受自己的，如何做一个幸福的女人？余秀华当时的回答是：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我也没有完全接受自己。对于怎样做一个幸福的女人，我没有什么经验。而在采访中，余秀华对我谈起传统问题时，她却说：“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这是理想主义，你分得开吗？不可能，要么都留下来，要么都舍弃。”某种程度上，她开始想得更清楚，也试图接纳自己，无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一面。

“现在的她和2015年的她又有些不同。现在的她性格更张扬一些，反正她的性格一直都是张扬的，现在更张扬。她一直喜欢开身边人的玩笑，太多了。我也习惯了，我们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就进入互掐模式。她的性格越来越强烈，但那种孤独的东西也越来越强烈。孤独是永恒的，没法克服的。尤其是对一个诗人来说，那种想法你没有办法和人分享。她面对人群的时候和面对自己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你看她现在嘻嘻哈哈，打情骂俏，其实这是她跟世界相处的方式，用来消解内心很痛苦的东西。”范俭说。

2015年，秦晓宇在天津大剧院举办了一个工人诗会。剧院方希望票房好一些，想把余秀华也请来。诗会上，余秀华朗诵了一首《你没有看到我被遮蔽的部分》，感动全场，电影《我的诗篇》另一位导演吴飞跃当时就流泪了。现在回想起来，秦晓宇仍很激动：“她那天没有拿诗稿，背着读，读得极好。好到什么程度？诗歌朗诵有几种，第一种是播音腔、朗诵腔，抑扬顿挫带着花腔，我认为是最失败的朗诵，很无聊；第二种是一般诗人的朗诵，有自己的口音和特质。由于身体原因，余秀华的发音、表情本身就很有特点，她声音出来的方式很怪，但与诗歌内容深刻的悲剧性高度吻合，感染力极为强大。”

那天，现场交流持续了一个小时，直到剧院关门。回答问题时，余秀华指着后面的打工诗人说，他们的诗歌背后都是一个群体的生活，不像我的诗，只与自己的灵魂有关。活动结束后，大家一起在一个火锅店唱歌喝酒。“那时候的余秀华单纯地像一个孩子。蒋山唱歌的时候，她像一个小学生那样带着崇拜的眼神聆听着，一点也不嚣张。”秦晓宇觉得，

可能那才是她本我的时刻，平时的嚣张，只是一种出于保护的武装。两种极致性格在她身上的融合，倒很像索德格朗的一句诗：“我是只深及膝盖的水，我是水与火诚实而没有限度的结合。”

难道还有明天，可惜还有明天

2016年底，《摇摇晃晃的人间》获得2016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IDFA）长片竞赛单元评委会大奖、2016东京纪录片提案会最佳亚洲提案等国际大奖。导演范俭说，不少西方观众主动与他交流，希望将余秀华的诗歌翻译成英文。她的名气现在到了国外。

在信赖的人面前，余秀华不时会流露出一种惴惴的担心。那种担心，就像她在《我爱你》一诗中写下的句子：“我要给你一本关于植物，关于庄稼的 / 告诉你稻子和稗子的区别 // 告诉你一棵稗子提心吊胆的 / 春天。”

然而，这是一棵聚光灯下的稗子，一个被需要表演的稗子。纪录片中，参加完一次在香港的活动后，在浓雾笼罩、街灯迷离的街头，余秀华袒露出自己的担心与脆弱：惶恐。推得这么高会不会忽然摔下来，会不会突然就粉身碎骨？可当我问她现在是否还惶恐时，她却爆了一句粗口：我他妈现在已经跌下来了，都快被烦死了。紧接着，她又说道：“有。不知道担心什么，反正挺惶恐的。总是有一种担心，我胆子很小的。我总是担心别人把我给睡了，结果昨天还是被一个女的给睡了。”

在深圳的一次活动结束后，范俭带余秀华看了一次大海。海边的沙滩上，到处是快乐的人群，远处的波浪层层叠叠，将水花传递给摇摇晃晃的余秀华。她胆怯着不敢走，听到范俭在一旁的鼓励，才鼓起勇气迈出第一步：你不害怕，那我也不害怕。

范俭告诉我，余秀华经常开玩笑说，她有a、b、c、d好多位男闺蜜。据说成名之后，她还曾鼓起勇气向一个年龄比她大许多的男人表白过，遭到拒绝后，哭了一个晚上作罢。当我调侃她拥有更多追求爱情的自由和资本时，余秀华说：“我从2015年离婚到现在，一年半了，也没找到男朋友啊。这就是证明。上天给了你一些东西，另外一些它不会给你。你想，走在大街上放眼望去都是漂亮女人，他也不脑残，干吗找一个残疾人啊？我特别害怕和一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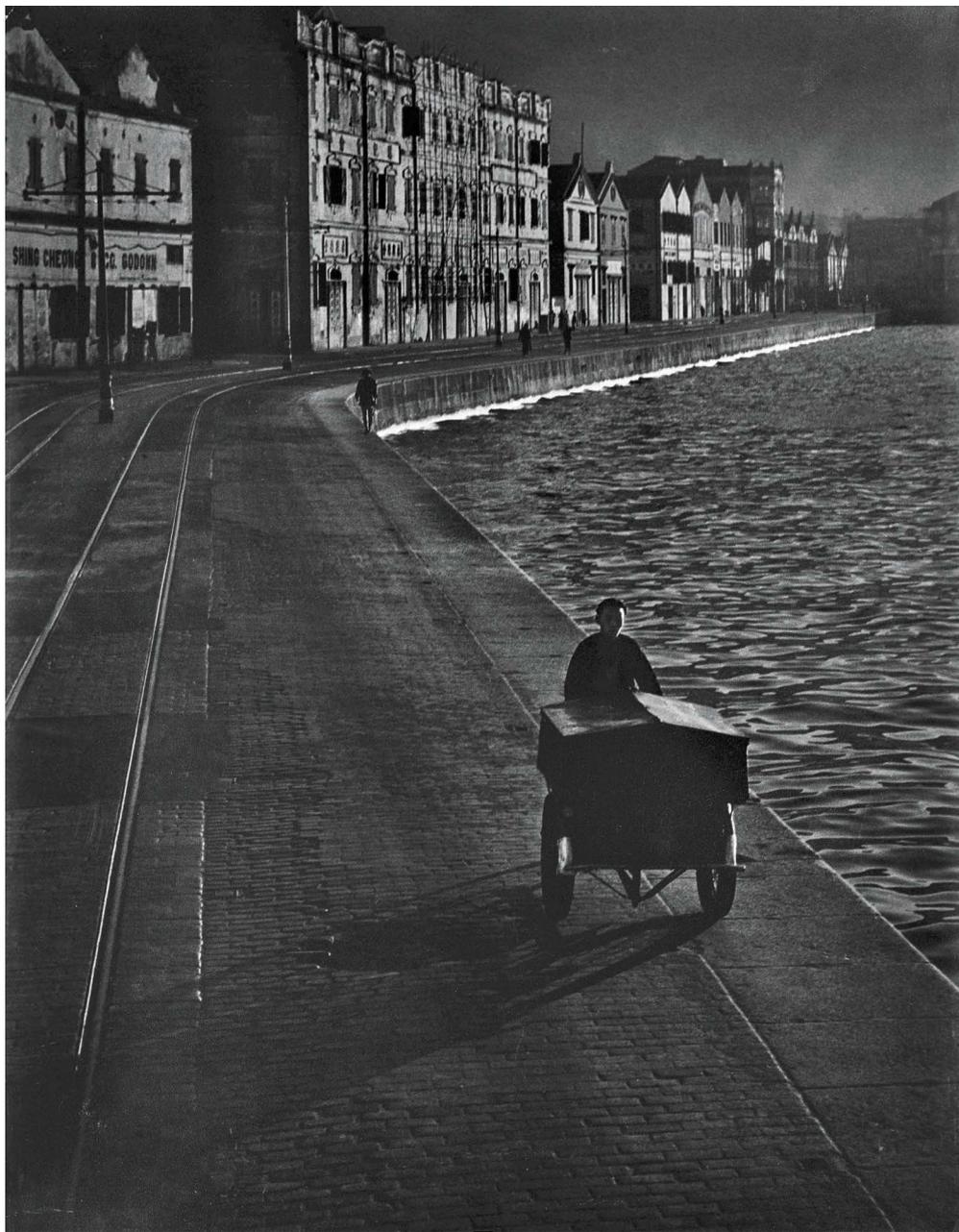
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导演范俭

相处，有点距离还是好点，真的相处在一起，我害怕，我真的害怕。我觉得那段婚姻对我的影响可能是一辈子。”

“突然成名相对于生活，于事无补。”正如片中余秀华所说的这句话，离婚，并不能解决她面临的所有问题。离婚后，在车上，范俭曾问她：你感觉怎么样？余秀华说感觉像个梦，离了和没离一样。

生活仍将继续，诗歌也将继续，如同这世上所有的人一样，余秀华的痛苦与纠结也将继续。一切，或许正如《摇摇晃晃的人间》英文名字《Still Tomorrow》所揭示的诗句一样：“如果还有明天，可惜还有明天。”

（实习生吴扬对此文也有贡献）



1



2

摄影师何藩与香港市井记忆

记者 / 张星云

6月底，香港苏富比艺术空间举办“何藩：镜头细诉香港光影”展览，近30幅拍摄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街头的手洗黑白照片原作，带人们看到另一个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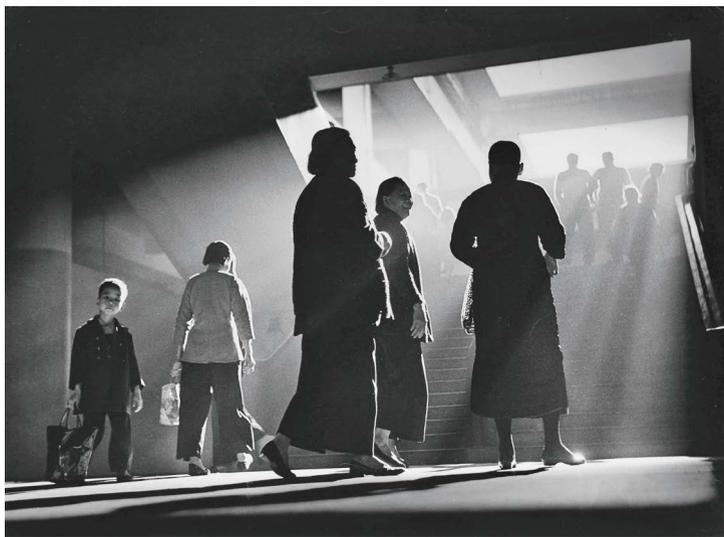
忆香港人的旧

尽管何藩五六十年代便因拍摄香港街头成名，但他生前很少与家人提及作为摄影师的历史。

对女儿何诗敏来说，摄影师何藩是一个她基本不曾了解的身份。她出生时，何藩的摄影生涯已经结束。1979年何诗敏到美国上学，从此与母亲和弟



3



4

“何藩：镜头
细诉香港光
影”展品：

- 1.《日暮途远》
(1955年)
- 2.《靠近阴影》
(1954年)
- 3.《好久不见》
(1963年)
- 4.《午后闲聊》
(1959年)

弟一直生活在圣荷塞。在她眼里，何藩就是香港邵氏电影公司旗下的演员，情色片导演，好脾气的父亲。80年代何藩独自留在香港拍电影，往返圣荷塞看望家人的时候，何诗敏印象中父亲很少拿起相机，也从没教过自己和弟弟拍摄，即便家庭合影，也是母亲负责拍照。

1997年香港回归，65岁的何藩退休，移居美

国与家人团聚。习惯了忙碌生活的何藩突然闲了下来。他应邀当了几次电影节的评委，此外无所寄托，直到1999年遇到画廊主马克·平苏卡亚纳（Mark Pinsukanjana）。会计出身的马克喜欢艺术，刚刚在帕罗奥图(Palo Alto)与人开办了Modernbook画廊，旨在将小众艺术家的作品和画册推介出去。马克告诉本刊，如今回望，正是由于自己没有专业的艺术

1. 年轻时的何藩用那台伴随他一辈子的 Rolleiflex F3.5 相机记录香港市井

2. 《后巷》(1955年)

3. 《背道》(1956年)

4. 《在爸爸的怀里》(1966年)



1

教育背景，随心所欲的眼光反而让他看到了何藩作品的价值。

那时何藩每周会去马克的画廊买画册，很快和马克成了朋友。有次何藩无意间说起，马克才知道自己的这位朋友曾经在香港是名摄影师。马克记得，他第一次看到何藩的摄影作品时特别震惊。何藩拿了14张黑白照片，两人在画廊一张一张看，聊了整整一下午。马克当天就给自己的朋友伊莱恩(Elaine)打电话，后者是当时旧金山湾范围内收藏摄影作品最多的藏家。伊莱恩随即开车去了马克的画廊，当场买下了这14张照片。从此马克决定代理何藩的作品。

20年来，马克售出了上千幅何藩的摄影作品，帮助何藩整理了上万张旧底片，并将何藩的作品带到了旧金山、洛杉矶、纽约、圣塔菲、芝加哥、迈阿密，也包括伦敦、巴黎、曼谷等美国之外的地方做了50多次展览，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也收藏了何藩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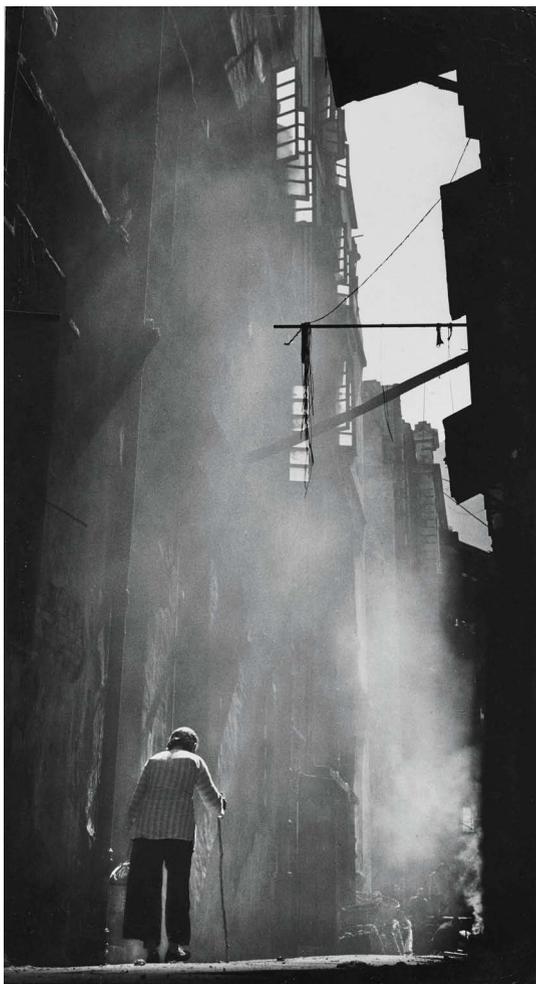
在纪实摄影为主流的五六十年代，何藩运用光

影、几何等方式，将街头题材带到了艺术摄影的范畴，这种观念远远超前于当时中国的其他街头摄影师，也正因为此，如今人们看到他的作品，依然不觉过时。

2012年，何藩的个人作品展“昔日香港”第一次回到香港A0 Vertical影廊展出，五六十年代的香港街头面貌，通过他的摄影，在50年后重新呈现在香港人眼前。2014年他在香港举办了第二场个展“香港回忆录”，也是移居美国20年后，第一次以摄影师的身份回到香港。“其实我第一次在香港办个展是在1952年，那时我才21岁，还在大学念中文。”那次何藩就跟采访他的那些记者感慨。不过，他1952年办展所在的中环思豪美术馆已经成了商场，高楼林立的中环早已不是他记忆中的景象。他在香港生活将近50年，也是巨变的50年。

街头漫游者

何藩1931年出生在上海，是富商家庭的独子。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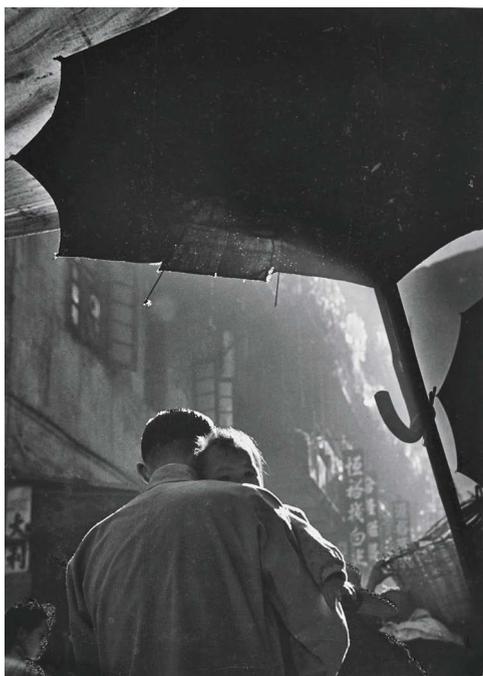


3

在经历了抗日战争后，1947年何藩随家人移居广州，两年后，又与很多新移民一起到了香港。那年何藩18岁。

父亲曾一度想让他继承家族丝绸产业，但何藩没有经营头脑，而是狂热地爱上了文学。在香港读高中时，他沉迷于阅读，因此导致头痛，医生无法确诊他的病因，只让他至少休学一年。休学的何藩经常在香港街头散步，父亲建议他可以趁机拍拍照片。他买了一台当时非常流行的禄来双反相机 Rolleiflex F3.5，从那时起，这台相机伴随了他一生。

香港靠山临海，有贫穷的村落也有高耸的大厦，游荡在香港街头，何藩被这座城市丰富的形态和复杂的生活吸引。他那时常从半山麦当劳道的家走到中环的娱乐戏院或皇后戏院看电影，随身带着相机，



4

看到什么拍什么。他在中环、西环、上环、湾仔等步行所及之处拍了大量照片，石板街、楼梯、街市都是他的拍摄场景，苦力、商贩、街上玩耍的孩童都是他的拍摄对象。

50年代是香港社会阶层对立最明显的时代。1951年，战后新生一代加上大量的内地新移民，使得香港人口突破200万，人口的急速上升令社会负担加剧，木屋、茅棚和天台屋成了大批贫民的住所。社会底层的生活成了何藩的拍摄主题。

在50年代，摄影是有钱人的爱好，而很多有钱人往往喜爱拍摄美丽的景色。出身中产家庭的何藩，尽管也拍摄了很多帆船与海景，但他对横街窄巷里的市井生活显然感兴趣，这一点与同时期同样出身富裕家庭的法国街头摄影大师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有着相似之处。

何藩捕捉城市的线条，电线杆、台阶、晾衣架、窗框、砖墙、斑马线，它们像城市的脉搏，令画面充满优美的节奏感。

禄来 Rolleiflex F3.5相机的腰平取景设计为何藩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他不必举起相机放在面前，而是端着它放在腰前，微微低头，便可准确取景对焦，完成拍摄。这样即便他身着干净考究的衬衫和西装外套站在穷街陋巷，整个拍照过程也不会引起任何街上行人的注意。

只不过，在50年代的香港，摄影还远远没有成为一项公认的艺术形式。因为没有正式的专业学校教授摄影技巧，为了提高自己的摄影水平，何藩加入了香港摄影协会，他还成为摄影俱乐部的成员，在那里认识了当时数一数二的摄影师简庆福。

俱乐部的这些摄影师自称“业余摄影师”，因为当时的专业摄影师是指在影楼拍摄人像和婚纱照的人，或者为新闻、时装、广告、杂志拍照。大部分业余摄影师只是单纯地追求拍照的乐趣，并不以此为生。

那是一个香港街头摄影蓬勃发展的年代。1955年，美国摄影学会刊登了34幅来自世界各地的最新获奖摄影作品，其中至少有11幅作品来自香港。美国摄影学会评价，来自其他国家摄影师的作品多侧重静态的人物刻画，但中国香港摄影师镜头下的作品，能够捕捉生活的脉搏。

何藩不只想简单记录底层人民的贫苦生活，他还试图寻找人们生活中的美好，而这种美好最直接地来自于光线。他在清晨时观察黄包车夫拉着车走

在空荡荡的大街上，拍下车夫印在地上的影子。在午后的中环街市里，他跟随几位身穿黑色长衫边走边聊的妇女，拍下阳光勾勒出人形的瞬间。他爬到楼顶上，等待行人走过两栋楼影子间隙的阳光地带，然后拍下来。

为了拍摄作品，他几乎偏执。他常常在街头看中一个地点，布置好构图，然后等待主题的出现。往往需要几天等待，才能等到光线和人物都完美的瞬间。他摸清了中环每条街道楼梯最佳的光线时间，往往等到下午3点45分至4点时再去拍摄。由此，何藩获得了自己的街头摄影语言。

光影与几何

“尽管如今何藩的艺术价值在亚洲已经得到了很高认可，但最初是欧美的评价体系先认可了他。”马克对本刊说。

在欧美，何藩常常被称作中国的雷·米茨克（Ray Metzker），后者被誉为美国现代派摄影大师，尤其以使用黑白光影著称。他们同一年出生，虽然有着完全不同的成长背景，但两人的作品在风格上极其相近，大多取材于城市街头的拍摄，而他们的照片都呈现出了对线条、阴影和几何结构的表达。

所有看过何藩作品的人还有另一种感受，这些黑白影像虽然取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街头，但如今看来依然没有过时的感觉，不会像其他老照片一样让观众产生怀旧之情或者对故事时光的多愁善感，何藩的作品中透露出一种现代感，甚至说是一种接近恒定的美。

他20多岁时，已经成为作品入选国际摄影学会沙龙最多的香港摄影师。1956年，英国摄影学会推选他为会士，1966年美国摄影学会也给予他同样的荣誉头衔。1958年，何藩在美国摄影学会的排行榜上位列榜首，并于接下来的10年，在世界最佳摄影师排行榜上位列前十。

何藩在1959年出版的《街头摄影业谈》、1972年出版的《现代摄影欣赏》两本书中，谈论了他所追求的摄影理念。他将摄影划分为“写实”与“画意”两种类别。在他看来，画意摄影不记录客观现象，而表达主观感受，为艺术而艺术，创造“美”的意向。他自称1956年拍摄的《日暮途远》是他“日后街头摄影之先河”——夕阳残照下，冷清的街头只有一辆三轮车缓缓走过，如此情景正是庾信《哀江南赋》

里“日暮途远，人间何世”的意境。

何藩认为自己50年代末60年代的作品则是在追求写实与画意的结合，通过拍摄大都市中的小人物，“用感官的具体物象或符号表现出超现实的具有暗示性的意蕴”。《后巷》《午餐》《在爸爸怀里》《午后闲聊》都是其中代表。

后来的香港摄影评论家、策展人冯汉纪将何藩视为“都市漫游者”。这是本雅明所提出的概念，后来被苏珊·桑塔格在《论摄影》中发扬光大：“摄影师是一个有备而来的独行者，他们在都市游走，穿梭于城市中天堂与地狱的极端景观，怀着欣赏与同情之心，在城市漫游者眼中，世界永远‘风景如画’。”

电影浪潮

何藩曾在新亚书院（后来的香港中文大学成员书院）读比较文学，但没有兴趣从事学术性职业。他也在父亲的丝绸厂里当过经理，但怎奈没有商人头脑。此时的何藩刚刚结婚，为了照顾家庭，他决定寻找出路。

偶然的一次机会，他在报纸上看见一则小广告，一家电影公司正在寻找新演员，何藩决定试一试。登小广告的这家电影公司是刚刚成立不久的邵氏兄弟公司。邵氏影业1958年在香港成立，60年代建立了当时世界最大的私营片场——邵氏片场。

在香港念大学时，何藩曾与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成立“大学生活电影会”，看法国新浪潮电影，写影评，也制作实验电影。他们中的很多人日后成了香港文化和电影界举足轻重的人物，比如罗卡成了电影评论家和学者，负责香港国际电影节和香港电影资料馆的统筹，吴宇森成了大导演、编剧和制片人。

何藩想成为“香港的费里尼”，但邵氏需要的是演员。1960年，何藩与邵氏兄弟签了一纸8年的演员合同，演出了《新不了情》《双凤奇缘》《宋宫秘史》《女秀才》等电影。1966年，何藩出演何梦华导演的《西游记》，在片中饰演唐三藏，一举成名，之后他又陆续演了《铁扇公主》《盘丝洞》和《女儿国》。

何藩成了邵氏公司的当红小生，享受着明星待遇。但他没有失去自己做街头摄影师的平视之心。有一年夏天，片场拍戏期间，他看到一位临时演员穿着厚厚的戏服卖力表演，浑身湿透。何藩让自己的女助手给这位年轻人送一杯水，但女助手拒绝了，表示她只为主角服务。于是何藩要了两杯水，亲自

将其中一杯递给了这位年轻人。这个大汗淋漓的临时演员，就是刚开始表演生涯的成龙。几十年后，两人在旧金山的电影节上重逢，成龙在台上当演讲时发现了人群中的何藩，立即跳下讲台，与何藩握手问好。

尽管何藩的表演事业一帆风顺，但他并不想继续当演员。实际上，他每每在表演前感到焦虑，在镜头前永远没法放松下来。他觉得“在镜头后我可以找回真正的自己”。1969年，何藩与邵氏签订的合同到期之后，他放弃演员职业，决定成为导演。

尽管初期他拍过一些实验艺术电影，但导演生涯发展的轨迹与他最初预期的并不一样，他最终成了一名三级片导演。在80年代，这类电影深受香港大众欢迎，票房甚至超过主流电影。何藩将自己在摄影中对光影、蒙太奇的理解全都放进了电影中，《春满丹麦》《长发姑娘》和《三度诱惑》成了他的代表作，《三度诱惑》更是香港历史上第一部票房超过1000万港元的三级电影。1992年台湾金马奖想邀请何藩为评委，一度引起争议，但最终他还是应邀担任了评委，也算是确认了他的地位不只于一位艳情片导演。

何藩的息影之作是1994年的《玉蒲团》。该片在慕尼黑赢得大奖，在欧洲电影院线上映，后来也成为北京电影学院的教材之一。张艺谋还是学生时，就看过这部电影，他曾表示这是他最爱的情欲片之一。

“艳情片不是我的目标，我只是为生活而制作这类电影。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坚持制作实验和艺术电影，但现实不容，我不能靠没有票房保证的艺术电影生存，我唯有投降，跟随着投资者的品位。如果可以重新来过，我会以自己的尊严为先，也会坚持创作艺术电影的梦想。但很可惜，人只可以活一次。”晚年的何藩曾经这样说道。

从当演员时期起，何藩便很少再拍照了。移居美国前，伴随了他一辈子的那台Rolleiflex F3.5禄来双反相机也坏了。他离那一条条斜阳下的香港街头越来越远。

何藩开始整理以往的旧底片，支撑他度过了最后的退休生活。那些整理出来的五六十年代香港街景黑白照片让他重新获得了认可。他和很多喜欢他照片的人一样，在心底，香港的街道是黑白色的，光影斜照。☑（感谢张伟民为本文提供的帮助。本文图片由香港苏富比提供）

陆帕与史铁生的时间对流

文 / 驳静

“我可能试图找一个全人类共有的情绪，比如说孤独，酗酒问题，生存恐惧的问题，边缘化问题。”

从2014年的《假面·玛丽莲》开始，不会说英语的波兰导演陆帕（Krystian Lupa）逐渐成为一个被中国戏剧观众熟悉的名字。随后，又有了《伐木》和《英雄广场》，他带来的每一部戏，都受到热烈讨论。今年的林兆华戏剧邀请展，陆帕又有新戏。不过，特殊之处在于，这回他选择了一个中国作家史铁生的文本，在天津大剧院进行了最终定名为《酗酒者莫非》的排演。

史铁生的原作《关于一部以电影作舞台背景的戏剧之设想》，是他生前唯一一次戏剧尝试，主角是一位酗酒者，名字就是个A，而不是后来陆帕版本中的莫非。史铁生在他的剧本结尾写道：我相信，这东西不大可能实际排演和拍摄，所以他最好甘于寂寞在小说里。难于排演和拍摄的直接原因，可能是资金以及一些技术性问题的。但难于排演和拍摄的根本原因在于：这样的戏剧很可能是上帝的一项娱乐，而我们作为上帝之娱乐的一部分，不大可能再现上帝之娱乐的全部。上帝喜欢复杂，而且不容忍结束，正如我们玩起电子游戏来会上瘾。

这个“不大可能实际排演和拍摄”的文本，最早林兆华想过要排。天津大剧院总经理钱程把这部作品推荐给陆帕后，后者“相见恨晚”。实际上，陆帕显然对史铁生这个人更感兴趣，谈到剧本，他说：“剧本本身是好的，但史铁生并没有把所有的东西都想好。”剧本里，只有酗酒者A是一个具体可触的人物，“排戏的时候就要把那些想象中的人物具体化”。所以陆帕把史铁生的剧本当作一个初稿，慢慢补充，排的时候，就加一点这个，加一点那个，影像比重也往下调整。

但此前，波兰语世界对史铁生一无所知，所以

陆帕找人翻译了他的《合欢树》和《宿命》，当然，还有最著名的《我与地坛》。陆帕好几次使用了“谜”这个字来形容在陌生的中国，排一出陌生的中国作家所写的戏的经历。比如，演员选择就是件挺难的事。实际上主角定为王学兵之前，还有两任人选，最开始是濮存昕，之后又定了何冰，这两位都由林兆华推荐给他，其中何冰还作为该剧主创参加了林兆华戏剧邀请展发布会。

陆帕说他不知道钱程是通过什么方式找来的演员，他自己对中国演员非常陌生，“只能看、听，然后决定是否接受”。有一天他们带来了王学兵，陆帕以前当然没听说过他，在那之前，他看了一部王学兵演的电影，“觉得很有特点，值得见面，聊一聊”。

排戏过程中，陆帕发现王学兵想象力很丰富，很天才，有很强的个性。他在舞台上具有自主创造力，而不是那种只听导演摆布的演员。“他很擅于倾听，我把自己的想法讲完了，他会挑战这种想法，因为他听得非常投入，自己在理解这个角色，会做自己的加工。”

最终效果也的确让许多人惊喜，这种惊喜不只来自中国演员在舞台上展现出来的沉静一面，人们还有一种模糊的感知，如剧作家李静所说：“中国人在舞台上终于有了飓风般沉默的精神性的面容。”

关于这个剧，演出前后讨论热点中的另一部分，不可避免地集中在陆帕对史铁生的改编上。一个西方导演对中文文本如何处理？处理得怎么样？批评的意见是，他们不认为“将史铁生的个人经历和形象融入戏剧主角莫非身上”是件合适的事。还有人觉得，陆帕作为西方导演，仅以几个月时间去理解史铁生，并不足够。

在演出之前，我们跟陆帕有过一个半小时的采访。等演出结束，再回过头去看这次采访，会发现，这几个许多人关心的问题，在戏完全成形之前，导演就已经想得很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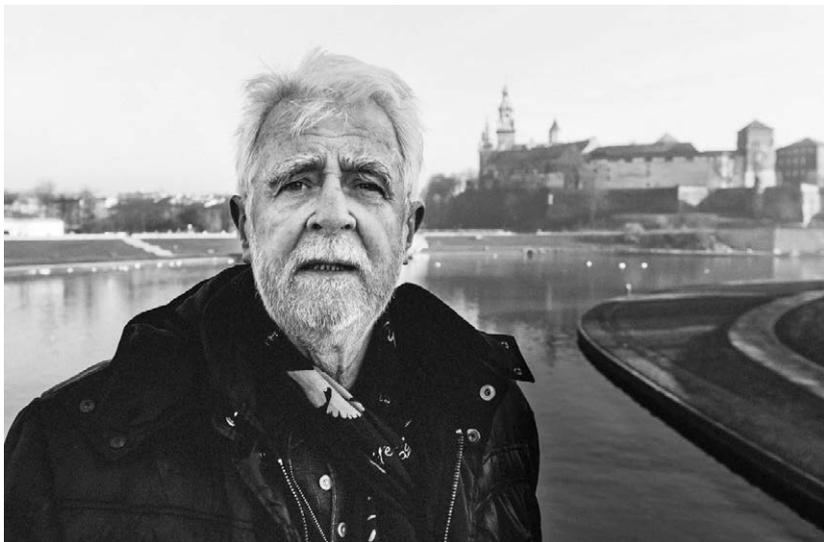
(驱动传媒供图)



(驱动传媒供图)

戏剧《酗酒者莫非》剧照(上、下)

专访陆帕：戏剧的对照是生活而非文学



波兰导演陆帕

三联生活周刊：塑造酗酒者这一舞台形象，需要创作原型吗？

陆帕：这是个非常个人化的作品，即便不是自传，主人公莫非和史铁生本人的生活也是融合在一起的。我们当然并不确定，史铁生本人生前是否有酗酒经历，据他的妻子说并没有。但这点就没必要纠结了。反正他的体验无论是来自哪里，都有种生活化的深刻。

我自己年轻时跟朋友们在剧院里喝得也比较多，但我没有机会变成真正嗜酒的人，因为我多喝一点就会不舒服，但我的朋友里对酒有依赖的大有人在。所以我知道，比起清醒者，酗酒者会说出更多真相，再加上底层人物设置，他的视野也更宽。史铁生对一位酗酒者心理状态的把握能力值得佩服。我也佩服他的勇气，他通过这样的人物，诉说自己相信的真理。我还特别喜欢剧本中酗酒者的语言逻辑，那是一种被边缘化的、被视作精神病人的语言。

三联生活周刊：酗酒算是种心理疾病，你觉得这是史铁生的身体疾病在作品里的某种投射吗？

陆帕：史铁生的疾病和酗酒者的状态之间，肯

定有极大的关联。也正因如此，这部戏的内容才得以充实。因为原作里其实真正的角色只有酗酒者一人，大部分台词都是独白。他一个人走路，一个人畅想。杨花儿，酗酒者的过去，20岁的年轻人，耗子（这是酗酒者的另一个自我），这些角色其实都源自史铁生自己的生活，我希望观众能关注到这些。

三联生活周刊：据说还有一位完全由你创造的角色，一位荷兰女记者，为什么是个荷兰人？

陆帕：这里有个挺有意思的故事。我每次去国外，告诉别人自己来自 Poland（波兰），对方都会恍然大悟地说，哦，你是 Holland（荷兰）人。波兰、荷兰，人们真的分不清吗？记者代表了我，所以我让她跟我一样，来自一个人们说不清楚究竟是哪儿的国家。这位记者刚刚结束一段恋情，前男友很爱中国，所以分手后，她一个人来中国，碰到莫非，二人之间发生了一些故事。但在观众看来，这可能会有些糊涂和不明确。而且他们两个交流是用英语。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角色？

陆帕：我会想，我作为一个外来者，要怎样进

入中国的世界，我这个外部者的视角怎么体现。而且，我从前对中国一无所知，我需要对这里的观众诚实，想让他们知道，我是外来者。这位记者的另一项重要功能，是她需要代替我问很多问题。但她和莫非，两个人英语都很差，也就是说，语言也是残疾的，作为工具，也是非常不完美的工具。

三联生活周刊：史铁生的这一戏剧文本，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

陆帕：我觉得，如果一个作家创作时没有感受到世界的很多矛盾，他写出的就不会是真正的文学作品。如果史铁生的剧本没有难度、没有意义，我就不会去做。如果是已经完成了的成熟剧本，我也不会去做。我要添加自己的内容，人物和作者之间有矛盾，所以我既要进入作品，更要去感受作家本人，在剧本里添加枝节，让观众明显地感受到写作的过程。

三联生活周刊：是不是相比剧本，史铁生更吸引你？

陆帕：最近几年我最喜欢的，是奥地利作家托马斯·伯恩哈德，他的作品里就有很多矛盾。排一个作品，就必须挑战这个作品，必须跟作家对话。是伯恩哈德教给我这种对话方式。戏剧有这样一个特点，它不是给一个完成的文本加图片，不是给它插画，戏剧要回归真实生活。所以，对我来说，戏剧的对照是生活，一部戏并不是照着文学排，而是要照着生活排。所以每次都要做逆时间的旅行，回到过去，回到文学之前的生活场景。

三联生活周刊：听说你去了三次地坛，很好奇你在那儿做了什么？

陆帕：在我读的史铁生作品和他的人生经历当中，最让我感动的一幕，就是史铁生写，母亲偷偷跟在他身后，又不想让他知道，但其实两个人又互相知道。这个细节对解读这个剧本最重要。所以在创作的不同阶段，我要去地坛这个地方看看，要感受触摸这个空间。我要去那儿感受冬天和夏天，看它在不同季节下是个什么样儿。我每次去，都幻想找到他写的那处和母亲互相藏身的地方。但那里现在植物很少了，实在没有一处看上去可以藏身。但奇怪的是，他们在天津找到了一个类似的地方。据说，其实拍电影常常遇见这种情况，作者描述的地方，往往并不最适合做取景地。因为作者总会加入自己的想象，那实际是作者头脑里的地方，与那个地理名字重合的地方有出入太正常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实地到了地坛，跟读到的有什么不一样吗？

陆帕：现在的地坛已经没有从前的气氛了，那个让史铁生产生艺术感悟的地坛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在戏里面，我用一个废弃的广场代替了它。地坛经历过翻新，可能翻新者的审美比较奇怪，它破坏了史铁生的地坛，就像某种东西被剥夺了，所以我选择了一个最丑陋、最无趣的地点作替代品。这在莫非和记者的对话中也有体现。莫非告诉记者，他原先有个特别好的地儿，他在那儿发现自己的写作使命，反思人生。现在只好去到这个广场。我想象了广场的样子，画了草图，在天津照着这图找，最后竟然在那个发生过爆炸的地方，找到了与草图完全一致的地点。

三联生活周刊：在中国排一个中国作家写的戏，难在哪里？

陆帕：其中一个最难的问题，是钱程和他夫人张青都是梦想家。我自己没有在中国排过戏，天津大剧院也是第一次国际化地制作戏剧，我们双方都没有太多经验。找演员的过程很难，也很漫长。有一两个角色因为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演员，我最终取消了角色。但最后找到的演员们都很了不起，因为他们充满兴趣和激情。

三联生活周刊：在国外进行艺术创作，会考虑适应本地文化这件事吗？

陆帕：肯定不会是完全本土化的，因为如果是一个外国导演排出来的中国的东西，会十分搞笑。《酗酒者莫非》的中国性，大部分是演员带来的。我可能试图找一个全人类共有的情绪，比如说孤独，酗酒问题，生存恐惧的问题，边缘化问题。这很像戏中记者和莫非之间的角力关系，互相摸索，互相了解。既要划界限，可又找不到基准点，既要寻求共同点，又不断发现不同点。可一切总是模糊，说不清。

三联生活周刊：你仍会对这种跨文化创作感到焦虑吗？

陆帕：在每个国家的体验都不一样。我自己没有偏见，不会勉强他们接受自己的想法，当然，到最后还是导演说了算。一般，我会先了解当地文化和已有的创作条件。其实我现在很大的焦虑，是我现在慢慢变成一个国际导演，我正在跟自己国家的文化产生越来越大的距离。在波兰，因为政治原因，戏剧不能自由发展，我有点伤心。我感觉波兰文化在慢慢下坡，于是我自己不得不出国排戏。■

万物理论到底是什么意思

记者 苗千



牛津大学物理学教授弗兰克·科洛塞和他的新书《万物理论》

“万物理论”（Theory of Everything）早已经超越了粒子物理学的范畴，成为普通人也熟悉的物理学名词之一。近年来，在各种职业物理学家们所热衷撰写的“关于一切”的通俗物理学读本里，“万物理论”几乎已经成了一面招牌。在生物学家或是人类学家撰写的通俗读本中，故事一般是从地球上出现最原始的生命形式开始，直至试图以生物学家或是人类学家的眼光解释现代社会的一切现象。而在物理学家眼中，一切都是从大约 140 亿年前的宇宙大爆炸开始。混杂着各种理论、假说、推测，还有各种可靠或不大可靠的证据，物理学家们愿意让人们相信，在人类文明出现了几千年之后，我们已经大致掌握了关于这个宇宙的大部分知识——换句话说，对于我们观测到的任何现象，我们几乎都有可能拿出某一种物理学理论对其进行解释，而且我们还有可能把这些理论结合在一起，形成某种“万物理论”，或者叫大统一理论。

物理学家们在这样面向大众的通俗读本中所展示的态度或许过于乐观了。在物理学界，“万物理论”这个名词恰恰会让人们想起某一段历史，提

醒人们不要过于乐观，而对于正奋斗在致力于建构现代万物理论的物理学家们来说，这个词实际上所代表的是一段历时几十年，且仍然在持续失败的过程。

牛津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弗兰克·科洛塞（Frank Close）在 2017 年 3 月出版了自己的新书，干脆就以《万物理论》（*Theories of Everything: Ideas in Profile*）为名。在这本书里，作者仿佛化身为一位语言学家，为读者讲述“万物理论”这个名词含义的演化过程——人们似乎永远都在追寻万物理论，却又一次次在接近成功的地方失败，以此来不断拓展自己对于“万物”的概念。

在科洛塞教授的这本小书中，故事从 1894 年开始。以测量光速闻名的美国物理学家阿尔伯特·迈克尔森（Albert Michelson）在这一年说道：“（物理学）一切潜在的规律都已经被建立起来，以后物理学的真理需要在小数点六位之后寻找。”在几年之后，开尔文勋爵在 20 世纪的第一年对于当时物理学成就的描述更加直接：目前在物理学中已经没有什么值得发现的了。

或许物理学家们就是偏爱这样的表述方式。实际上在迈克尔森第一次表示人类已经发现了“万物理论”的大约200年前，艾萨克·牛顿在发表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时，就是以上帝的代言人的身份，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向读者讲述上帝以是何种数学形式创造了世界。以至于英国诗人亚历山大·波普为此作诗：“自然和他的法则隐藏在黑暗之中。上帝说：‘让牛顿出现！’于是，有了光明。”而200年后，当物理学家们以一种更有信心的方式描述万物理论，几乎已经没有了上帝的位置。

当科洛塞教授在21世纪描述起100多年前的这段历史，他并不认为是物理学家们的自大才导致对于当时物理学发展形势的完全误判。以当时人类的认知范围来说，确实可以说人类已经掌握了某种程度的万物理论。开尔文勋爵在发言中提到，随着电磁理论理念的提出，人们已经意识到了光和热等现象都是某种形式的运动。在同一个讲话中，开尔文勋爵随后提到了在物理学的蓝天之上著名的“两朵乌云”，却完全没有料想到这两朵乌云是一场暴风雨的前兆——在短短几年之后，这两朵乌云就引发了物理学的大革命。

正如赫胥黎所说，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就是从历史中学不到什么东西。经典物理学被摧毁还不到百年之后，物理学家们又开始向往着建造一个新的万物理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就声称一个包容一切的万物理论已经不远，全然不顾人类对于弥漫在周围的暗物质至今还一无所知。

霍金无视物理学家们在过去几个世纪所经历的失败，而做出这样的预测，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个顶尖物理学家的敏锐。当时人类对于暗物质的研究尚未成为显学，当时人们也还有足够的信心利用现有的框架把暗物质包容在内，当时宇宙学的观测手段也还不够丰富，人类要再过十几年才会发现宇宙在加速膨胀，一

个更让人迷惑的名词，“暗能量”，到那时才会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之中。除此之外，当时物理学的大框架与现在其实相差无几，所谓的“标准模型”已经提出了多年，尽管还未被证实，但霍金已经有理由相信标准模型将是构成万物理论的框架。

标准模型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预测——希格斯波色子，直到2012年才被在欧洲的大型强子对撞机通过对撞实验寻找到，而这个理论的最终完成并不意味着万物理论的完成，因为紧接着，大型强子对撞机继续通过实验几乎排除了理论物理学家们所热衷的超对称理论，弦论等理论成为万物理论的可能性。

标准模型成为21世纪物理学新的蓝天。至今为止人类的一切高能物理学实验无不完全符合标准模型的预测，同时物理学家们也清楚，在这片蓝天之外，所笼罩的是重重黑暗。人们曾经以为对于所谓的万物理论，艰难之处在于把不同的理论结合起来，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对于万物的概念却不断地被扩展。

科洛塞教授认为，尽管无法描述一切，但至今为止已经被反复验证的标准理论或许将成为未来某种万物理论的“核心理论”。以这个理论为中心，人类有可能去逐渐探索万物的存在形式。尽管万物理论看起来还遥不可及，但以目前物理学的最大难题——量子力学与相对论的结合来看，很有可能人们最终会意识到，时间和空间实际上都不是最基础的形式，所谓的时空可能只是某种更根本的存在的显现。

或许当物理学家们每一次认为自己处于找到万物理论的前夕，就意味着又一次物理学大革命的到来，传统观念又一次被推翻，物理学的上帝与魔鬼轮流出现。或许这就是物理学进步的方式——正如英国诗人约翰·斯夸尔（John Squire）续写的波普关于牛顿的诗：“一切并未长久，魔鬼喊道：‘让爱因斯坦出现！’于是一切又恢复了原状。”



美国物理学家阿尔伯特·迈克尔森

健身的后续效应

文 / 袁越

很多喜欢健身的人都有一个体会，那就是大热天出去健身，往往在跑的时候还不怎么出汗，跑完后反而会大汗淋漓，好像跑步时身体有意积攒了很多水分，直到停下来之后才会一股脑地释放出来。

冬天健身也有类似的效果，那就是跑的时候不怎么热，跑完后却感觉自己的身体一直在发热，甚至连羽绒服都不想穿了。有时候这种感觉会持续好几个小时之久，这感觉会让跑步者感到欣慰，觉得自己仍然一直在消耗更多的卡路里，减肥计划应该可以提前完成了。

关于健身和减肥的关系，一直存在两种相互矛盾的理论。一种理论认为健身时消耗的卡路里数量虽然不高，但健身会提高身体的基础代谢率，使得健身结束后身体仍然在加速燃烧卡路里，减肥效果就是这么来的。

但是，另一种理论却认为，光健身不节食是减不了肥的，因为一个人的新陈代谢率会自动保持平衡，健身时消耗了更多的卡路里，休息时身体便会自动调节基础代谢率，减少能量的消耗。

这两种理论的关键就在于如何解释健身后身体持续发热的现象，这种后续效应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的格兰·肯尼（Glenn Kenny）博士决定从散热的角度研究一下这个问题。他花了上百万美元制造了一台仪器，能够准确地测量一个人在不同情况下的散热效率，而且可以精确到分钟。

研究发现，一个人在健身结束后体温确实会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但原因并不是因为肌肉还在燃烧卡路里，而是因为身体里蓄积的热量散不出去。不知什么原因，人一旦停止锻炼，身体散热机制的工作效率就会立即降低。肯尼博士虽然也不清楚这里面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但他猜测这可能和心血管系统的变化有关系。

身体在散热时是不会消耗多余的卡路里的，因为此时的新陈代谢率并没有增加。换句话说，虽然你在运动结束后感觉自己的身体仍然在发热，但这并不等于说你消耗了多余的脂肪，锻炼的减肥效应在你结束锻炼之后很快就消失了。

来自南澳大利亚大学的约瑟夫·拉夫吉亚（Joseph

LaForgia）博士也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和肯尼不同的是，拉夫吉亚博士的研究对象都是一些准专业运动员，习惯了高强度的训练。他在研究了这些人的新陈代谢率之后，发现他们在每一次大运动量训练结束后，基础代谢率确实会有所上升，有时甚至会在一个较高的位置上维持7小时之久。

这个结果说明，起码对于准专业运动员来说，锻炼的后续效应是真实存在的。

问题在于，当拉夫吉亚博士认真计算了这些运动员的代谢率之后，发现锻炼结束后增加的卡路里消耗量只相当于高强度训练时多燃烧的卡路里的十分之一。换句话说，健身结束后的减肥效果其实很一般啦。

如果只是中等强度的健身运动，那么锻炼结束后多燃烧的卡路里所占比例就更低了。再加上中等强度的健身运动本身也不会消耗太多的卡路里，因此中等强度的锻炼对于减肥来说好处是非常有限的。

那么，为什么准运动员的健身后续效应比一般人强呢？拉夫吉亚博士认为，这些人在结束训练后的身体持续发热有可能是因为他们体内的免疫细胞正在努力修复因高强度训练而受到损伤的肌肉细胞。不过，这种修复过程本身并不会消耗太多的卡路里，减肥效果同样很一般。

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只要记住一件事就够了，那就是健身对于减肥来说意义并不大，要想瘦下来，必须管住嘴。☑





朝鲜战争

[美] 布鲁斯·卡明斯 著 林添贵 译 定价：36.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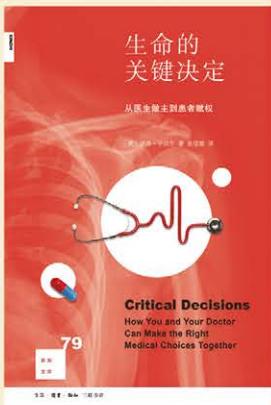
本书作者布鲁斯·卡明斯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著名教授，专长为朝鲜现代史、国际关系史以及东亚—美国关系史，他的相关著作是朝鲜战争研究的经典。本书对朝鲜战争的论述开辟了新的视角，对战争起因和动力的分析更加深入，便于读者更为全面地理解这场战争的实质。



慈禧回銮：1901年的一次特殊旅行

杨红林 著 定价：36.00元

与庚子年仓皇西逃时不同，辛丑回銮堪称一次特殊的长途旅行。书中近百张图片记录了慈禧辛丑回銮途中的情形，多为国内仅见。结合官方史书、媒体报道、当事人回忆录以及各类方志的记载，深入发掘照片背后的历史。



生命的关键决定：从医生做主到患者赋权

[美] 彼得·于贝尔 著 张琼懿 译 定价：39.00元

医疗决定该托付给谁？四十年前兴起的患者赋权运动，只是在表面上改变了医患之间的互动方式，却无法使双方共同做出更好的医疗决定。本书通过分析各种医疗现象，指出患者赋权的关键在于让患者深入了解各种医疗选项，以及在面对医生时能清楚地直抒己见。



沙盘上的命运

李菁 著 定价：49.00元

作者在《三联生活周刊》多年刊发的人物专访集结，分为“国民党”“共产党”“文艺”三本。这些人和事普通读者都有所耳闻，但大历史之下的关键时刻、细节的真相及所涉人物和家族后来的命运等，则鲜为人知。



孔子的学问：日本人如何读《论语》

[日] 子安宣邦 著 吴燕 译 定价：39.00元

著名思想史学者子安宣邦在书中梳理了近代日本解读《论语》的代表人物，并兼及朱熹、李泽厚等中国学者的解读。《论语》在今天的日本仍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而近代日本的《论语》解读也一定程度上折射近代日本的思想、社会与政治特征。



家训传家：中国文化的根基与传承

韩昉 著 定价：39.00元

家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重视家法与国法、和睦乡里与宗族、孝敬父母、诗礼传家、修身齐家等观念，均在家训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现行教育中学校、家长、学生所存在的诸多问题，也可从中得到启示。



以西班牙 U21 为例

文 / 张斌



6月30日，在波兰克拉科夫举行的2017年U21欧青赛决赛中，德国队以1比0战胜西班牙队夺冠

德国足球三日两冠，一时无双，德意志王朝正君临天下。德国足球复兴的故事一讲再讲，这个夏天的收获也确实令人艳羡。欧洲U21也被称为“欧青赛”，青春的战场，决赛中力克此前大热西班牙，德国队自然大喜过望，他们多么希望自此可以决胜未来。暂且按下德意志不表，表一表功败垂成的西班牙，从这支球队身上同样可以悟到真经。

西班牙王朝背影依稀，近两届大赛力不从心，但其近20年的欧洲统治力还是毋庸置疑的，9次欧洲U17夺冠，8次U19称雄，4次赢得U21，三度捧起欧洲杯，冠军总数量一时之间对手难以超越。称霸U系列，才有可能登顶巅峰，世人皆知。2011和2013年，西班牙蝉联U21冠军，今年再入决赛，与德国一争高下。小组赛，西班牙三战连捷，半决赛3比0完胜意大利，让对手心服口服，公开承认，输给了一支伟大的球队。与德国决战前，西班牙呼声甚高，一度被赞誉为西班牙史上最佳U21，其实力远不在不少国家队之上。

过往两届U21夺冠，西班牙就此拥有了德赫亚、蒂亚戈·阿尔坎塔拉、伊斯科、莫拉塔、埃雷拉、哈维·马丁内斯和马斯切拉诺等一干未来的主人翁。今年U21，西班牙同样喜获丰收，数位妖人星相十足。德国队虽然夺冠而去，但金球奖和金靴奖尽归西班牙人。皇家贝蒂斯队效力的塞巴略斯小组赛前两场比赛没能获得首发

机会，但星光难掩，成功驱动中场，成为第五位领走欧洲U21金球奖的西班牙人。金球奖得主萨乌尔·尼格斯也是妖人一枚，半决赛完成帽子戏法，让意大利人感到绝望。以上两位当然入选了U21最佳阵容，还有一位入选的西班牙球员阿森西奥，这也是前途不可限量的年轻人，此前因为他西甲豪门曾经上演过一番热闹的争夺战。

虽然败给德国人，但这支西班牙队显得更加成熟和体系化。这个年龄段的球员较量的不仅仅是天赋，而且还要看在关键成长期的磨砺程度，西班牙队明显领先一步。数据显示，西班牙U21队国脚们总计在欧冠中出场56次，德国队总计31次，近来势头不错的英格兰队达到17次，意大利则仅有可怜的4次。当然，西班牙新星的欧冠经历如此炫目主要得益于萨乌尔在马竞的30次出场，以及阿森西奥的8次，欧冠的打磨作用不可替代的。

不仅仅是欧战出场次数领先对手，西班牙众位妖人在各自的俱乐部中大多已经拥有了稳定的出场机会，后卫贝莱林在阿森纳出场89次，塞巴略斯为皇家贝蒂斯效力了98场之多。与意大利半决赛，西班牙队中仅是在西班牙联赛中出场场次累积超过750场，两位替补登场的球员的场次积累甚至有超过170场的。德国与意大利队的场次总计也接近了700场，英格兰队首发球员总计400场。但如果细致地计算球员们本赛季的出场分钟数，西班牙队则占据更大的优势，达到3.9万分钟，意大利队落后5000分钟，英格兰队不足1.8万分钟。

任何球星都是体系的产物，西班牙以及所有足球强国的成功轨迹都证明了这一点。2008年，夺得欧洲杯的那支西班牙队中仅有一人并非出自有效的青训体系。回顾2011和2013年夺得U21冠军，西班牙队的联赛首发场次总和分别达到了944场和745场。2012年欧洲杯，西班牙国脚们曾经一道赢得过332场各级青少年大赛的胜利，队伍早熟和稳定。

道理似乎谁都懂，道路就在那里供你选择。西班牙联赛中的一种做法很值得借鉴，西甲的B队是不参加所谓预备队联赛的，而是直接角逐第三级别联赛。下赛季，塞尔维亚和巴萨的B队将升至第二级别联赛，年轻人们早早地便可以与高水平球队充分竞争，就此成就一代又一代。也许，别人的成功是永远学不来的。☑

国产万吨大驱刚完成“入学考试”

文 / 宋晓军

6月28日，中国首艘万吨驱逐舰在上海下水。就在几个小时前，美国国防部宣布，美国海军授予亨廷顿·英格尔斯工业公司首艘“宙斯盾”驱逐舰DDG-51 III的建造合同。随后，一些关心军事的朋友就问我，如何比较中、美这两型万吨级驱逐舰？对此我的回答是：国产的万吨大驱相当于刚完成本科的“入学考试”，而美国的DDG-51 III则相当于刚完成了博士后的“入学考试”。

为了说明这个答案，有必要先提一下美国国防部在海军第一艘“宙斯盾”驱逐舰DDG-51 I下水后和服役前的1990年2月发布的一份文件。这就是由国防部作战测试与评估办公室发布的《作战适用性指南》。“指南”的开篇就为“作战适用性”下了定义：在作战环境中使用（武器）系统时符合要求的程度，它考虑可用性、兼容性、运输性、互操作性、可靠性、战时利用率、维修性、安全性、人为因素、人力支援、后勤支援、文件及训练要求等要素的综合影响。那这份“指南”对于一艘新建的驱逐舰又意味着什么呢？

简单说，一艘新型驱逐舰在完成建造和船厂测试交付海军后，只是交付了它的固有功能——功能（如反导、反舰、反潜等）加性能（如武器的理论精准度和射程等）。从理论上说，一艘驱逐舰的固有功能不可能100%就转换为作战能力，只能对其在有多个制

约因素限制下的“作战适用性”进行测试、评估后，才能大致从理论上得出它的固有能力在不同环境下作战部署时所能转换出来的作战能力。然后，海军会根据此在技术上磨合、调整，在训练上进行有针对性的加强，让驱逐舰的固有功能不断逼近100%转换为作战能力的理想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国防部推出《作战适用性指南》前的1986年，美军刚开始进行“总统管总、军种主建、战区主战”的军队指挥体制的改革，而“作战适用性”流程的确立，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改革配套的措施。也就是说，负责主建的军种在接收了武器装备后，会通过执行“作战适用性”的流程将有作战能力定量指标的武器装备和人员提交给负责主战的战区，而战区可以据此安排其执行适合其作战能力的作战任务。换句话说，“作战适用性”流程的确立，实际上为生产商与军种、军种与战区之间的“交接”建立了一套标准。不仅生产商在设计、建造武器装备时要考虑这个标准，军种在接收到武器装备后要按这个标准实施训练和提出技术改进建议，而且战区也要根据这个标准安排军种部队的作战部署。其实，美海军恰恰是通过“作战适用性”流程，才逐渐对“宙斯盾”驱逐舰的作战能力做到了“心中有数”，进而至今已发展出了DDG-51 I、DDG-51 II、DDG-51 II A和DDG-51 III四型近70艘万吨级驱逐舰。而这，就是我前面将DDG-51 III型驱逐舰比喻为博士后“入学考试”的原因。

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那中国海军的万吨大驱为什么是刚完成本科“入学考试”呢？答案是——2014年底军委主席在全军武器装备会议上强调：要着力构建先进实用的试验鉴定体系，摸清武器装备性能底数，确保武器装备实战适用性。2015年，中国军队就启动了“军委管总、军种主建、战区主战”的指挥体制大改革。而中国海军万吨大驱的设计、建造、下水、测试直到交付海军服役的过程，不仅是中国军队新指挥体制确立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武器装备“实战适用性”流程确立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说，与上述两个“过程”重合的国产万吨大驱，就相当于刚刚进入学习和成长的关键期——大学本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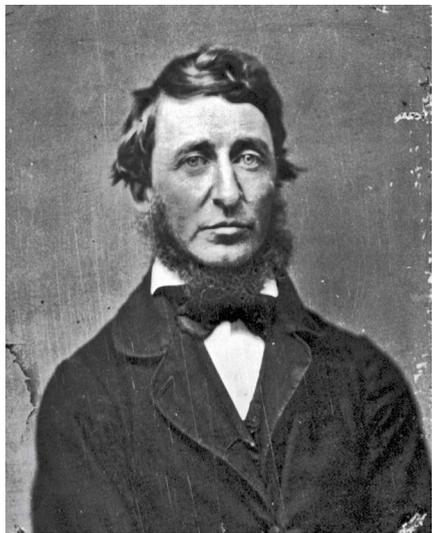


6月28日，中国首艘新型驱逐舰下水仪式在上海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举行

梭罗 200 周年诞辰

主笔 / 薛巍

历史上一直不乏诋毁梭罗的人，但今天的世界尤为需要梭罗的精神。



美国作家梭罗

假如梭罗还活着

今年的7月12日是美国作家梭罗的第200个生日。他的家乡康科德将举行为期4天的庆典，镇上的旅馆3年前就被订满了。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前梭罗学会主席威廉·豪沃斯在《美国学者》杂志上撰文说，梭罗环保英雄的形象在1970年第一个地球日时达到顶点，如今他却遭到了嘲笑，保守主义者痛恨他的反商业情绪，后现代思想家们认为自然是可疑的绿色的模糊形状。现在有许多读者说他是懒惰的富家子弟，傲慢、缺乏幽默感，是说谎的精英。

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欣赏梭罗的老师爱默生，对梭罗则非常不屑：“这位伟大的自然保护主义者放火烧康科德森林；这位爱默生自助观念的典范，却在黄昏从瓦尔登潜回，向莉迪亚·爱默生要晚饭吃；梭罗敬仰的诗人惠特曼认为梭罗病态地厌弃人类。罗威尔说，梭罗似乎在公开场合主张回

到燧石与黑铁的时代，而他的兜里却揣着一盒火柴，必要的时候也知道如何熟练地使用。”

豪沃斯介绍说，如今梭罗在学术研究上的命运令人担心。学院派的批评提出了各种版本的梭罗：躁狂—抑郁、同性恋、异性恋、厌恶女性、马克思主义者、天主教徒、佛教徒、迷恋仙境。但他的其他方面仍有待全面的研究：居家男人、灵性之人、科学工作者、日记作者。豪沃斯说：“我研究了一辈子梭罗。我不喜欢他也不憎恨他，但我非常了解他。我查找他的论文，在康科德住过，重复了他的旅行，两次通读他的日记。他骨子里是工人阶级，在他哥哥去世之后，独自承担家里的铅笔厂，在厂里吸入的石墨灰损害了他的肺。住在瓦尔登湖边时，他自己洗碗，在很冷的湖水里洗衣服。”

豪沃斯认为，在环境恶化的今天我们非常需要梭罗的环保意识。“南极在融化，授粉的无人机也许会代替正在死掉的蜜蜂，工业主义在损毁地球的外表。以前清澈的瓦尔登湖淤积了重金属、放射性标记物和工业磷。”1860年梭罗对一位朋友说：“如果不能把房子放在一个尚可忍受的地球上，房子有什么用呢？”如果他还活着，他会喜欢如今的许多东西：音乐点播、GPS导航（尤其是对一个测量员来说）、网上丰富的自然视频；他会喜欢强大的数据库，欣赏把他的书做成超链接、加以可视化的尝试。

《瓦尔登湖》出版之后，并没有掀起什么波澜。不多的评论中有一篇来自英国，夸奖它富有诗意的感受力，作者是乔治·艾略特。1848年他又写了论文《公民的不服从》，直接影响了世界历史，因为他得到了甘地、马丁·路德·金和曼德拉的敬佩。他的一些描写被同时代人视为无意义的漫谈，现在被气候学家视为珍贵的研究。他对康科德地区河流、湖泊做了详尽的研究，被后人视为美国第一位湖泊学家。他的植物学记录也成了研究全球变暖的必需品。

美国哲学家约翰·卡格说：“蒙田远非一位隐士，他积极地参加社会和政治活动。他研究了风景和野生动植物，研究了镇上的人，研究了他自己。他的结论是，如果把其中一个跟其他事物割裂开来，它们都无法完整地被看到。”

《纽约时报》艺评人霍兰德·科特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梭罗开始厌恶人类，这是有原因的。随着他对自然界的热爱变得敏锐，他开始相信树是有灵魂的，他变得无法容忍人类的掠夺行为：肆无忌惮地猎取动物，往土地上丢垃圾。”

梭罗的坎坷经历

豪沃斯介绍说，《瓦尔登湖》中，一个厌倦了城镇生活的人在林中的湖边盖了一个小房子，在那里孤独地住了一年，观察内在和外在的天气。《瓦尔登湖》也是一个中年人孤独的梦，是一次治疗行动，记录的是一个作家重访他任性的、自命不凡的青年时代。这是回忆录和精神之旅的双重叙述，其范围没有超出离家几英里的范围，花销不超过30美元（相当于现在的730美元）。多年来，爱默生雇用梭罗给他打杂，后来把自己的地交给梭罗使用，希望他在瓦尔登湖的逗留能宣传一下超验主义者的美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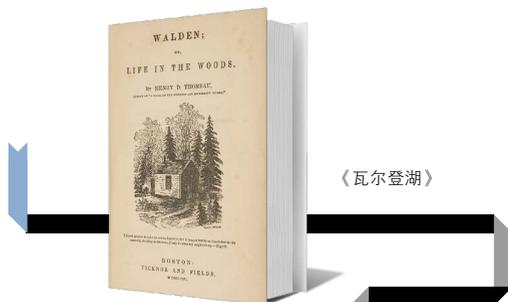
今天，瓦尔登湖和它的林地组成了一个公园，每年有近50万参观者，但是在1845年7月梭罗去的时候，它的湖滨非常凄凉，都是些树桩、老旧的工业遗址和擅自占用空地者的小屋。他在《生活的目的》一章中写道：“我到树林子去，是因为我希望自己有目的地生活，仅仅面对生活中的基本事实，看看我能不能学会生活要教给我的东西，免得我在弥留之际觉得自己虚度了一生。”他脑子里想着死亡，因为他去瓦尔登湖本来是计划写另一本书的，一本记录他跟哥哥约翰的一场旅行，约翰在1842年死于破伤风。

豪沃斯指出，《瓦尔登湖》并不好读，读者最好跳过冗长、过时、粗糙的第一章“省俭有方”，从第二章读起。因为《瓦尔登湖》是很偶然地形成的一本书，是“回收利用的谈话、随笔的碎片和个人的发泄组成的大杂烩”。许多段落好像是在说给一个看不见的同伴听的。他在瓦尔登湖居住的半途中，因为拒绝交税而在监狱里过了一个晚上，他认为税收会用于赞同奴隶制的美墨战争。在有人替他交了罚款之后（可能是他的一位阿姨），他前往缅因州登山。被暴风雨困在山上时，他在一片被烧过的树林附近躲雨，看到再生的树叶时他感叹：“坚实的土地！真实的世界！常识！”入狱和登山的经历把《瓦尔登湖》的内容从狭隘的个人抱怨变成了更广阔范围内的遭遇。

1847年秋，30岁的梭罗离开了瓦尔登湖的房子，再也没有回去过。1849年他出版了《一周》一书，结果卖不出去，他用独轮车把卖不出去的书从火车站运回家。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现在有了近900部藏书，其中700多部是我自己写的。”为了还债，他成了土地测量员。这一经历帮他了解了当地的生态系统。

梭罗最喜欢的叙述体系是旅行和日历。《瓦尔登湖》把这两者融合了起来。秋天的凉意唤醒了他对地点的神秘性的感知。冬天带来了休眠和思考。在最冷的一个月，读者抵达了全书的高潮，他描写了冬日的瓦尔登湖。他对瓦尔登做了仔细勘探，发现湖的最深处是102英尺。“我真心感谢瓦尔登湖，这么深，这么纯洁，可以作为一种象征。”最后随着一年循环的结束，又到了春天。他在穿过铁路前往村子时，看到解冻后的泥沙从铁路两侧的陡坡深沟流下去。“路基上布满叶饰图案，如同火炉里的熔滓，说明大自然内部正是一片旺火。大地不仅仅是死气沉沉的历史的一个片段，它是活生生的诗歌。我们这个地球不断超越自己，不断改变自己，在自己的轨道上扑棱翅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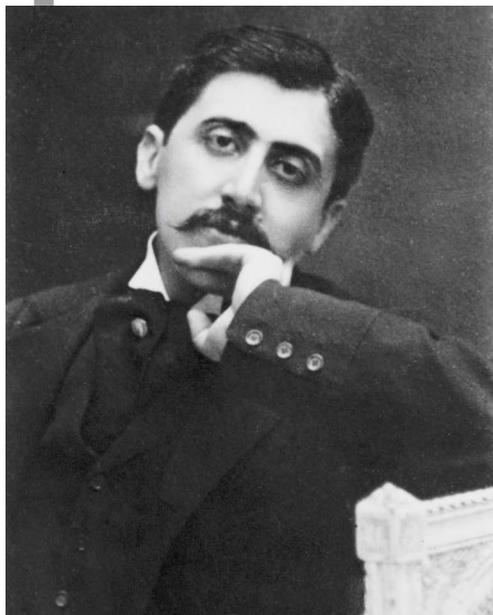
梭罗44岁时死于肺结核。他的日记有200多万字，47册、7000页。“这是美国文学最大的、难以估量的秘密，也是会改变梭罗研究的一面透镜。”爱默生的日记是按主题排列的，梭罗的日记是按时间顺序排的。在野外远足时会停下来记下他的发现：开花的植物，觅食的鸟，水中的树影。他的眼睛和头脑不懈地在工作。他在书中说：“清醒才是真正活着。我们必须学会自己苏醒，使自己保持清醒，不靠机械的帮助，而是寄厚望于黎明，就算我们在酣睡之际，黎明也不会抛弃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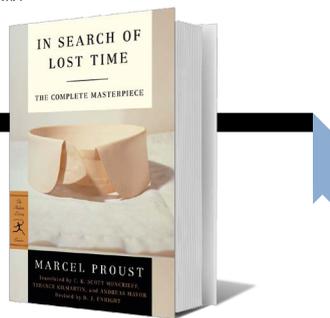
在夏天，读懂普鲁斯特

文 / 马凌

“假若在漫漫长夏阅读普鲁斯特，这些回旋往复的主题定如溽暑、蝉鸣、微风，萦绕不去。”



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与他的著作《追忆逝水年华》英文版



巨著的中译本

好友要去医院探病，对方刚刚动完一场大手术，她觉得带一束花去过于平凡，莫若送一套《追忆逝水年华》，因此问我哪个版本好。这一问，真是令我百感交集。一则，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弟弟罗贝尔·普鲁斯特、著名外科医生，也是哥哥的遗嘱

执行人，曾经感喟说：“可惜的是，要身患重病或腿部骨折，才有时间去看《追忆逝水年华》。”无论是从时间还是从心境的角度，这部大书都更适合病人、闲人、有阅历的人，拿来探病也算不俗的礼物。二则，目前国内的普鲁斯特全译本，还是只有上世纪90年代集合了15位译者的七卷本译林版。此后，翻译家周克希先生独立翻译了第1、2、5卷（周译书名为《追寻逝去的时光》），于2014年宣布弃译。又一名翻译家徐和瑾先生，则在独立翻译了第1、2、3、4卷后，于2015年病逝。细论起来，多人译本风格不太统一，周译有繁花似锦之趣，徐译有清和简明之美，但正如法郎士所说：“人生太短，普鲁斯特太长。”后两种未成全璧，恨何如之。

一天早晨，普鲁斯特夜里睡了没多久刚醒来，还躺在床上，就对他忠实的女管家说：“我写下了‘完’这个字，现在可以死了。”《追忆逝水年华》的法文全本将近3000页，500个人物，200余万字，皇皇巨著，令人“望长生畏”，令人敬而远之。如果说，名著就是那些我们急于购买却懒于翻开的书，《追忆》一定是在榜单前三甲。即便是在小众读者群里，它也是被谈论得多、被阅读得少——坚持读到最后一页的更少。反过来说亦正确：有相当一部分读者不想精读它、却想谈论它。在这个意义上，“缩写”和“导读”都大有可为。前一个工作，周克希做了，他在2016年夏天推出《《追寻逝去的时光》读本》，选译了七卷中的精彩部分，又用尽可能简洁的文字连缀成篇。后一个工作，徐和瑾做了，他在2014年翻译了同年法国出版的《与普鲁斯特共度假日》，那是法国最资深的八位普鲁斯特研究专家为普通读者做的导读，一本“最好的入门书”。

徐和瑾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在俄语、德语、捷克语和匈牙利语中转了一圈，后在复旦大学法语系任教多年。我与徐先生有一面之缘，某年上海书展，为了推介《追忆》，充作嘉宾与他对话。那次，他穿一件白色短袖衬衣，风度儒雅，言谈简淡，有谦谦君子气度。目前网络上最常能看到的他的照片，就是那次活动的产物。记得攀谈中他说起，一直住在复旦凉城新村那边的老宿舍区，除了书别无所有，

亦别无所求。徐先生用 11 年时间翻译《追忆》，完全是因为喜爱；同样，他翻译《与普鲁斯特共度假日》，也是缘于一见倾心。为了译它，他甚至停下了《追忆》第五卷的翻译。最令我动容的是，或许是因为清寒吧，他在治疗期间还预支了本书的翻译稿酬。知其人再观其书，这本粉绿色封面的清新小书，蓦然显出“遗作”的沉重。

《与普鲁斯特共度假日》囊括了一众法国顶尖的普鲁斯特研究者和编辑者。2013 年，受法国公共电台的邀请，他们就各自有心得的题目，讲述作品中印象最深的一页。于是诞生了八个主题，分别是时间、人物、社交、爱情、想象、地方、哲学、艺术。读过《追忆》的读者知道，这八个主题，恰恰是交织在书中的深层脉络，每个主题大都包括五篇文章，每篇后附有小说最能表现主题的精彩片段——有趣的是，常常是普鲁斯特本人的表述为每一篇的点睛之笔。在普鲁斯特研究领域，庞德的教诲众所周知：“对这本书的最完美的批评应该只写一段，这一段必须有七页长，而且只能用分号。”可是八位作者并未如此矫情，既属厚积薄发，又能深入浅出，几乎可以算作知识分子服务公众的范本。

徐和瑾先生的译本照法文原本多了两个附录，一是参考三个法国权威版本，编出了长达 39 页的《追忆似水年华》梗概。二是将正文中提及而囿于篇幅未能录入的精彩片段，一并翻译收入。他体恤地解释说：“这样一来，这本书就可以有两种读法。一是按书中页码的次序一页页读下去，二是先读《追忆似水年华》的梗概，并按其中注出的书中页码依次阅读小说的精彩片段，读完后对这部小说就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再去读八位学者的分析，也许印象更为深刻。读完这本小书之后，想必会对普鲁斯特的长篇小说产生兴趣，那就去阅读七卷本的全书。”

如何了解一个人？

据说有这样一个规律，购买《在斯万家这边》的读者中，只有一半人买了第二卷《在花季少女倩影下》；购买《在花季少女倩影下》的读者中，只有一半人买了第三卷《盖尔芒特那边》。但读者阅读了《所多玛和蛾摩拉》之后，却不再拒购《女囚》《阿尔贝蒂娜失踪》和《重现的时光》。我想这是因为《所多玛和蛾摩拉》一卷勇敢描写同性恋，同时也是

全书的转折卷，那些马塞尔自认为已经熟悉的人物，现出“陌生的另一面”，映照着普鲁斯特津津乐道的主题之一：“我们永远无法了解别人。”普鲁斯特研究权威让-伊夫·塔迪埃撰写“人物”部分，他为夏吕斯男爵设了专节，夏吕斯男爵出身极其高贵又有很高的文化修养，他令人入迷，也令人不安，塔迪埃指出：“叙述者——以及普鲁斯特——特别感兴趣的，是表象和心灵深处之间、表象和现实之间的戏耍。夏吕斯从外表看极其阳刚，但内心却是女人。描写这种双重性，对一个热衷于寻求本质的小说家来说，是一件十分诱人的事情。”最神乎其技的是，塔迪埃只引用了《所多玛和蛾摩拉》开卷的一段 19 行的描写，就让读者领略了普鲁斯特文笔的精妙、思想的深邃。

相对而言，《追忆》中的爱情主题最能引起普通读者的共鸣。书中人物一旦恋爱，就会依次体验热情、不安、嫉妒、不幸，有时还会绝望，没有人最终能享受自己的情感。“爱情，”普鲁斯特说，“是一种相互折磨。”书中负责撰写“爱情”部分的是尼古拉·格里马尔蒂，他是哲学家，认为“等待”“失望”以及“想象的事物的魔力”，是理解普鲁斯特式爱情的关键词。

“爱情的这种痛苦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们只想要我们没有占有的东西。第二个原因是我们只要占有有所爱的东西，就不再知道为什么我们想要这东西了。总之，正如我们从斯万和叙述者的例子中看到的那样，是嫉妒的痛苦向我们揭示我们的爱情，同时把我们所爱的女人在场和我们痛苦的结束联系在一起。因为她不在我就痛苦，是这种痛苦使我知道我爱她。因此可以说，爱情和痛苦不可分离，只有痛苦才能向我们揭示爱情。”

在小说里，无论是斯万对奥黛特，还是马塞尔对阿尔贝蒂娜，皆处于这种强烈而又不幸的爱情中。相形之下，还是夏吕斯聪慧，他是书中少数认为“爱是幸福”的人：“在生活中，重要的不是喜爱什么，而是喜爱本身。”

如何留住流逝的时光？为什么爱情使人痛苦？是否能真正了解一个人？假若在漫漫长夏阅读普鲁斯特，这些回旋往复的主题定如溽暑、蝉鸣、微风，缭绕不去。要在某一个霹雳电闪的瞬间，读者会在字里行间看到自己，以及普鲁斯特所照亮的所有人的痛苦的深渊。■

余华：温暖与百感交集的旅程（1）

文 / 朱伟

我通过《十八岁出门远行》认识的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是林斤澜与李陀接手《北京文学》后，1987年第一期的小说头条。这个不到6000字短篇的结构极其巧妙：我在山区公路上走了整天，到黄昏时想起了旅店，找旅店时见到了汽车。搭车是一个转折，没想到车又坏了，坏到没法再修。这时有五个人骑着自行车从坡上下来，抢车上所载苹果，我在阻拦中被打。然后，更多抢劫者涌来，搬空了苹果，开始拆卸汽车，我发现司机也是同伙，他跳上拖拉机，抢走了我的背包。于是，天黑了，只剩下遍体鳞伤的汽车和遍体鳞伤的我。结尾是，我躺在汽车里，见到父亲正在整理一个红色的背包。父亲说：“你18岁了，该去认识外面的世界了。”“他拍了一下我脑后，我就欢快冲出了家门。”叙述已经非常老练。它不写承上启下的故事，只写悬念与悬念的意味——从旅店到汽车到司机到抢劫，最后躺在汽车里，“没想到旅店你竟在这里”，又出乎意外，用结尾联结了开头。在路上那时是时髦话题，没想到余华能以这样简略的线条，只以“走过去看吧”做支点，留出很多空白，就完成了这题材中的象征。这个短篇已经显示出余华出类拔萃的两个特点：睿智的构思能力与对精妙叙述的迷恋。构思决定框架，而叙述乃建筑美学。小说一开头，他就写“我从早晨里穿过，现在走进了下午的尾声，而且还看到了黄昏的头发”，推进极快，“黄昏的头发”是影子，他迷恋这样的句子。他写那个修车的司机搬起的屁股上有晚霞，轻易就摆脱了叙述的陈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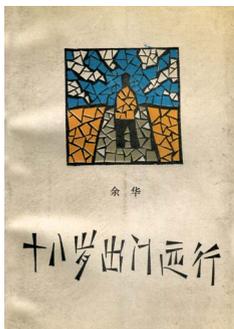
如果对比三年前，1984年，也是发表在《北京文学》第一期头条的《星星》，就能意识到余华经历过怎样的脱胎换骨。《星星》是他第一篇发表在重要刊物上的小说，写一个智力超过他年龄的孩子（我以为，性格原型就应该他自己），迷上小提琴后得罪了左邻右舍，也招惹了孩子们。最后，父母决定把小提琴卖掉，于是孩子忧伤极了。这是一篇因果明确、叙

述直白的习作，当时的《北京文学》请他到北京改稿，让他加了一个光明的尾巴。那是苏辛群主事的时代。

余华因为这篇《星星》，进了海盐县文化馆，之前他中学毕业后，在一个乡镇卫生所当牙医。他认识我后告诉我，他最初的创作是由崇拜川端康成始——因为读到《伊豆的歌女》，使他有了最早的创作欲，他从川端康成小说中读到敏锐的多愁善感。他后来对川端康成的概括是：“川端拥有两根如同冬天里的枯树枝一样的手臂，他挂在嘴角的微笑有一种衰败的景象。”他说，改变是1986年春，一本《卡夫卡小说选》。在杭州的一家书店里，当时只剩下一本，朋友先买了。随后，回到这朋友家中，他许诺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换下了这本《卡夫卡小说选》，读到《乡村医生》后，如醍醐灌顶——原来小说还可以这么写。他说，是卡夫卡解放了他的想象力，教会他要用异常锋利的思维，轻而易举，就直抵人类的痛处。他读到的这本《卡夫卡小说选》，应该是外国文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孙坤荣主编的。

1987年余华像是迅捷完成了一个三级跳，一下子就成为莫言、马原之后，新生代作家中最耀亮的一位。他先在《北京文学》又发表了一个篇幅不到4000字的短篇《西北风呼啸的中午》，写一个陌生人上门，莫名其妙地拉“我”去看望一个将死的、其实并不相识的朋友。这个荒谬的中午，“我”被拉到一个死人身边，作为“朋友”，认了一个悲伤的母亲。这个荒诞结构，是他在《十八岁出门远行》成

功的基础上，进而思索人与人关系的结果。写完后，他大约马上意识到了短篇小说空间局促而无回旋余地，于是就有了中篇小说《四月三日事件》。那时他还陷在抽象的荒诞里，《四月三日事件》令我想到法国新小说派代表人物罗布·格里耶，它的主题是恐惧。小说以第三人称“他”，叙述童年视角中敏感到夸张的感觉世界。“四月三日”是个莫须有事件，是“他”在不安中感觉到会有什么“事件”发生。这预感从对“他”构成诱惑的女



作家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余华第一本小说选《十八岁出门远行》，定价3.9元



2004年，余华在巴黎的朗诵会

同学白雪的暗示与梧桐树下那个中年男子始，延续到最亲近的同学、父母与邻居。“他”先是处处感觉，大家都在背着他议论他；然后，事情真按他的想象发生，他处处感觉到被监视，所有人都参与了监视。他因此就感觉“四月三日”会有针对他的谋杀，结尾便爬上了停在车站一列货车的煤堆，决心离那个“阴谋”远去。小说是由荒诞想象构成的因果，作为他的第一个中篇，说实在的写得有点累。他告诉我，这小说其实是他儿时梦魇的写照。他说他儿时梦到最多的是周围长满青苔的井，说不清在梦里曾滑到井里多少次。再有，就是在梦里杀人，没有杀人经过，只有因杀人带来的惊险追捕，常常吓出一身冷汗。他说他儿时因此有莫名的惊恐——走在狭窄的路上，常怕正常行驶的汽车会突然冲过来撞到他；夜晚走在弄堂里，对面过来的人影也会吓他一跳。在《四月三日事件》一开头，他就写道：“他突然发现自己踩在她躺倒在地影子上，那影子漆黑无比，那影子一动不动。这使他惊讶起来。”这个“她”是“身穿淡黄色衬衣”的白雪。

紧接着《四月三日事件》，这年年底，他又在《收获》上发表中篇小说《一九八六年》，跳出惊恐开始写残酷。《一九八六年》有一个引子，交代“文革”中一个历史教师失踪，留下妻子与一个三岁的女儿，妻子后来改嫁了。历史教师是因研究古代刑

罚而被抓，当晚其实他逃跑了，所以，小说真正开端，是他变成疯子，回到了镇上。这小说有意思的是写受尽精神折磨的疯子与女儿现在一家的关系，从象征的角度，疯子当然代表“文革”那一段无法回首的过去。小说里，疯子回到镇上，影响了已经生活在新时代中女儿的欢乐，给“她”母亲带来了惊恐。疯子在自己身上做古代的种种酷刑表演，那些鲜血淋漓的表演显然是他的研究与“文革”记忆的综合，他的表演就一次次传递给“她”母亲，赋予她噩梦。最后，“她”母亲终于恢复了正常，如释重负地说：“天亮时我听到他的脚步，他走远了。”这时，疯子已经死了，“她看到父亲的头发全白了”，生活就迅速平复，他们三人又可以一起上街了。结尾一节，余华换了一个视角，写疯子叫着“妹妹”迎面而来，伙伴就对“她”说，这疯子在寻找他妻子，并暗示“她”看前面走来的母女。于是，“她看到这母女俩与疯子擦身而过，那神态仿佛他们之间从不相识”，“她俩走得很优雅”。从这个中篇起，余华找到了他独特的落点：以优雅的语言写残酷。这篇小说里，他写太阳，已经是“一颗辉煌的头颅，正在喷射鲜血”；写火焰，已经是“一堆鲜血在熊熊燃烧，噼噼啪啪四溅的鲜血溅到了他的脸上，像火星一样灼烫”。余华的写作方式与苏童是截然不同的，余华迷恋这种锋刃割裂皮肉中的张力。☑（待续）

黄昏里一盏灯

文 / 中读 @ 阿娟 图 / 陈曦



“是谁传下这行业，黄昏里挂起一盏灯。”小麦已经不记得是在哪里第一次看到这句话的，依稀觉得，又寂寞又美好。因了这样的寂寞和美好，文艺女青年小麦踏入了出版圈。

小麦所在的出版公司业内排名前十，账面上好看得不得了，宣讲会尽显气派。这公司似乎财力雄厚，慷慨霸气。但第一份工作带来的新鲜感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一个讲究出版效率的公司，每个人都只是流水线上的螺丝钉，虽说怀揣出版理想，小麦也是乐于先从螺丝钉做起的。勤劳又肯干，她很快成为部门的得力干将，年终一个重要项目还立了头功。原本盼着银行卡上的年终奖能如进公司时所承诺的那样，一路高歌，没想到，冰冷的四位数让她深深理解了什么叫资本家。当然，如今的小麦会觉得那时的念头幼稚，却并不可笑。

接下来的一年，小麦更努力，成了领导不可或缺的助力，再难做的项目交给她，她都能圆满交卷。但各部门开始各自为营，类似于近代史上的军阀割据混战。书卖得好，市场人员和发行邀功，卖得不好，他们便明里暗里挖苦编辑。当业绩整体不如以前时，连行政前台都会在小麦申领A4纸时讥讽编辑部不知节省成本。一心为做好书，为挂起一盏灯的小麦，怀疑自己进了一家假的出版企业。在目睹了两个部门领导发数封长邮件吵架并抄送全公司后，她决定离开。

辞职前，小麦回顾了两年来的工作经历和感受，认为该公司过度依赖授权品的不良运营模式以及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是下一份工作需要避免的。

于是，小麦婉拒毫无诚意的挽留，进入一家国字号老牌出版社，哪怕薪水从头开始也接受。

小麦迅速适应新环境，同样成为部门得力干将。两年后，一封提拔邮件让她如坠冰窟——一个业务能

力不如她、对上唯唯诺诺、缺主见的同事成了她的新上司。这才让小麦意识到，不管自己如何优秀，表现突出，都是无法逾越这里的用人规矩的——工作年限要够长，不看功劳看苦劳。失落，委屈，愤怒，不平……小麦全都在心里默默经历了一遍。

调整一段时间后，她又全情投入工作，毕竟这是自己热爱的。与其他部门的对接仍然存在问题和困惑，比如，这里的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是一根葱，很多人都会在你推进项目的途中使绊子，不是为了让你摔倒，只是让你能记住人家也是一根葱。这些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每每发生就像蚂蚁啃噬皮肤，渐渐堆积，心里阴影面积显然会增大。其实这些人身居高位，但思想和知识迭代早已跟不上时代，他们还躺在大国企的保护伞下慵懒地晒着太阳。有时候，小麦愤愤地在心里说：跬什么？离开这艘大船，你们什么都不是！

小麦工作依然卖力，用得顺手的人总是有干不完的事儿。大领导凡难收拾之项目必找她，同事们亲切地送昵称“烂尾王”，意指专业打理烂摊子。小麦笑了，苦涩啊，无语啊，国企生存之道是少做少错，多做多错，不做无过，傻子才揽活儿。可她不想成职场老油子，也不想变成自己曾讨厌的人。

深夜的长安街，她一边赶路，一边听着在线课程。行业的巨变让她开始重新思考信息传播、分发的媒介本质，重新审视自己的职业本质，也重新走在探索的路上。老国企是她必然要抛弃的，虽然她刚刚加薪成功。但适合自己去闯荡的新世界在哪里还需要制订周密计划，根据科学参照数据，做出明智之选。

“是谁传下这行业，黄昏里挂起一盏灯。”这句话，小麦觉得，原来是寂寞又悲壮的。☑